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汉译精品

政治经济

# 新自由主义 批判读本

[英]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 黛博拉·约翰斯顿 编 陈刚等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by Alfredo Saad-Filho Deborah Johnston



#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新自由主义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至 80 年代苏东阵营瓦解,新自由主义更踌躇满志,环顾世界罕有对手。撒切尔夫人由此提出了“别无选择”的惟我独尊的口号。面向 21 世纪的人类难道真的舍此无他、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这一口号过于独断,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恰,如漠视平等、限制民主和对自由人权的双重标准,而且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人类的选择本来就是多样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有多种选择。这不仅符合自由的价值与人权,而且更可能符合实际,对世界文化发展而言也不啻是福音。

上架建议:社科 / 思想人文 / 政治学

ISBN 7-214-04387-4



9 787214 043870 >

ISBN 7-214-04387-4

F·804 定价:25.00 元



汉译精品 · 政治经济

# 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

[英]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 黛博拉·约翰斯顿 编  
陈刚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英)萨德-费洛(Saad-Filho, A.), (英)约翰斯顿(Johnston, D.)编著;陈刚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14-04387-4

I. 新... II. ①萨... ②约... ③陈... III.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 IV. F091.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200 号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Copyright © Alfredo Saad-Filho and Deborah Johnston 2005.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luto Press Ltd, Londo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6 by JSPPH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204

- 书 名 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  
编 著 [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 黛博拉·约翰斯顿  
译 者 陈刚等  
责任编辑 刘 焱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387-4/F·804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 (Alfredo Saad-Filho)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政治经济发展专业的高级讲师。著有《马克思的价值：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The Value of Marx: Political Economy fo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2002)与《马克思的资本论》(*Marx's Capital*, 2004, 与本·法尔恩合著); 主编《反资本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导言》(*Anti-Capitalism: A Marxist Introduction*, 2003)。

黛博拉·约翰斯顿 (Deborah Johnston)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发展经济学讲师。从事劳动市场与贫穷的研究, 并承担英国、俄国与很多非洲国家的顾问咨询工作。




出版统筹 余江涛

策划编辑 蒋卫国

责任编辑 刘 焱

封面设计 南京七九八文化

 cn798@126.com



## 致 谢

衷心感谢伊丽莎白·威尔逊, 是她的提问促成了本书。还要特别感谢 Pluto 出版社的安妮·比齐与考斯塔·拉帕维萨斯对本课题的全部支持与鼓励。



## 译序：必须另有选择

新自由主义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地位；不仅在西方和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当然清议者未必吃香，但实践领域的追随者却可能春风得意，风头甚健。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主要确立于 70 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其时欧佩克石油价格冲击和越南战争次第袭来，还有金融危机相继出现，战后原有的主流理论凯恩斯主义应对这一局面显得捉襟见肘，标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二战后曾给人无限遐想的“凯恩斯妥协”解体与“黄金时代”终结。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80 年代与 90 年代的金融危机更使之影响渐大。撒切尔夫人(1979 年)与罗纳德·里根(1980 年)当选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支配地位的官方标志。至 80 年代末苏东阵营瓦解，新自由主义更踌躇满志，环顾世界罕有对手。正是在此背景下，撒切尔夫人提出了“别无选择”(TINA)唯我独尊的口号。

面向 21 世纪的人类难道真的舍此无他、别无选择？

非也！人类的选择从来就是多样的，否则就没有自由。西方学者常用来批评唯物史观宿命论的观点正可用来作为回答。其实这些年在资本主义阵营之外，社会主义的实践与探索仍然在继续。在主流的西方国家，各种来自于内外的异议也一直不断。我和几位同仁翻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集《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可以说是新近的一



个代表。该文集共收入了 30 篇评论文章，作者皆出身名门、成果累累。这些文章对新自由主义基本上持批评态度。批评不是喊口号简单棒杀，而是有深度的分析，并辅之以翔实数字，因此颇值一读。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评论涉及到一些深层次问题，用该书作者的话说，关及“本根处”。其实是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问题。例如，人类组成社会的最高目的和行为实践的最高价值是什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城邦的最高目的就是培养好的公民。中世纪基督教的天上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新型城市文明兴起与公民社会登场以后出现了世俗化，还有利益原则与自由平等的精神。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都是此精神在不同领域的伸张。作为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有这样几种理论值得注意。一是洛克、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和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特别后者直接成为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按此理论，市场的自然法则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人们的行为，即使是最自私的人在反复比较考虑之后也发现这样对自己最有利。于是市场的地位凸显，而政府变得不那么重要，至多是守夜人而已。这里评判重要与否的标准是人——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但落到实处，突出的是市场和资本。生产效率的确大大提高了，但社会矛盾也空前尖锐。自由主义的产生从来就是一柄双刃剑。

19 世纪以降，以“看不见的手”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挑战。一是体制外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资本主义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实质仍是资本对劳动的压迫与奴役，并指出它包含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危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另一重要挑战来自体制内，即 20 世纪的凯恩斯主义。所谓体制内挑战就是不涉及体制根本，只是在此范围内作些重要修正。凯恩斯认为，市场可能会失灵，政府对此不能完全自由放任。因为在他看来经济活动的水平由总需求水平决定，一旦总需求不足，就

可能导致失业和衰退,从而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周期危机的观点颇类似于马克思,不过凯恩斯不认为危机靠体制内力量已不可克服,而主张通过扩大需求、增加就业和调控税收来加以解决,政府应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调控,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危机被完全超越也未可知。

20世纪30年代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给凯恩斯主义一显身手的机会。面对危机,信奉自由放任的美国总统胡佛束手无策,黯然下台。罗斯福新政则因推行凯恩斯主义而出名。二战结束以后凯恩斯主义风头更健,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据此作出一定的调整,社会矛盾得以缓解,政府与工会也都有一定的施展空间,著名的“凯恩斯妥协”正因此而来。国家向普遍福利的方向重建,社会因而得到稳定,经济也开始复苏和发展。一切似乎都很美好,直到70年代的危机把繁荣的泡沫无情吹破。凯恩斯主义失势,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

新自由主义像传统自由主义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对于凯恩斯主义关于“市场失灵”的指责,它对之曰政府也会失灵,而且更糟,因为官僚主义缺少效率。当然它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为强调金融与银行的作用,并要求政府在减少管制、私有化和加强金融资本力量方面发挥作用。用本书的概括,新自由主义把市场说成是最佳的可以自我调适的社会结构,如果不受外来阻碍,就会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的经济需要,有效地使用所有经济资源,并自动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产生充分就业。因此市场的全球化将会是把这些好处带往整个世界的最佳方式。现代世界的我们之所有拥有贫困、失业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乃是因为市场受到工会、政府等诸多限制。全球化需要在全世界创造“对市场友好”的社会结构:通过削减工会的力量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它们的工人受资本权力的支配;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诚然不是完美无缺,但却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话说:“已经别无选择。”

更具体地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主要与“美国模式”相联系。其特点是减少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与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缩小政府、削减最高税率、开放



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以及放弃自然失业率之下的充分就业。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则有著名的“华盛顿共识”，除前述内容外，还特别提倡发展中国家为经济稳定而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对穷人的资助，放松对国内市场的管制，经济向外国商业与金融开放，以及出口引导的经济增长。

如本书所揭示，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运作规则，一种有利于中心统治边缘和资本统治劳动的新规则，即在中心与边缘、资本与劳动、市场与政府关系方面有利于前者驾驭后者。也就是说，在劳资之间有利于资本，在国家与地区之间有利于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之间更有利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在美国的资本中则更有利于金融资本；即有利于后者的财富与资源向前者流动。在本书中所有这些都只是一般的指责与批判，而是有具体数据作为佐证。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新右派”和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胜利，也是左翼力量、工人乃至整个工人运动的失败。到上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左翼要么放弃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主张，要么面临选举败北。在外围地带，1989—1991年的苏东巨变使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前景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一些非洲国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只花几个月时间就从往昔“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粉墨登场为“新自由主义新兴市场”。在这种左派意识形态国际性溃败的气候中，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几乎不可阻挡地轻易横扫了政治领域。

关于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如本书所介绍，新自由主义“所偏爱的政治形式是相对的民主：民主，但不要太多”。这种新民主是脆弱而又贫乏的，它最好是有所限制和代议制的。迄今为止淹没于政府重压之下的个人自由获得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不过作为一种政治表现制度的民主却遭到了贬低。市场的规则也被应用到了政治中。金钱前所未有地成为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政治就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打包待售和商品化了。许多公民丧失了政治兴趣。政治选择变得极为有限，以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成为大多数政党共享的基础，而政治差异则变得无足轻重了。

新自由主义当然并非一无是处。它对自由市场地位的维护和对政府失灵弊端的批评无疑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对金融作用的推重则抓住了现代经济的要害，这些对摆脱东南亚等地的金融危机均不无裨益，其对全球化的提倡与推动也顺应了人类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虽然过于突出发达国家特别是大资本的利益，用本书的话说，那是它自己的全球化，但我们可以批评其偏向，不能否认全球化本身。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在当今世界仍声名赫赫，霸权依旧，很少遇到有力度的挑战。但是它对当代人类话语权的垄断过于霸道，更何况话语权不仅仅是话语，而涉及人们的价值、信念、利益乃至人类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例如“别无选择”这一口号就过于独断，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恰，如漠视平等、限制民主和对自由与人权的双重标准，而且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许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有所察觉，试图作出某些改变，如书中提到的信息经济学和第三条道路等。其效果如何，仍有待于观察。

事实上，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应该由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作出选择，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更应该有多种选择。这样不仅符合自由的价值与人权，而且可能更符合实际，对大众而言效果也可能更好，对世界文化发展而言也不啻为福音，因为文化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本书对新自由主义负面的东西分析与批判甚为有力，但对如何替换，论述仍嫌不足，即拆解有余，建树不足。当然，书中也提到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伟大的挑战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民主之挑战，另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挑战。但具体如何，语焉不详，也很难详。窃以为，我们目前至少可以对新自由主义在三个方面说“不”：第一，人类的选择权不应当被垄断或排斥；第二，前述种种弊端应尽可能避免；第三，对非资本主义因而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应当受到鼓励。在此方面，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下面该谈谈中国问题了，这是我们更感兴趣的。中国像世界其他



地方一样,身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又进行了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因此也难免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本书作者看来,由于中国政府的审慎领导,中国向现代化迈进所付出的代价与经受的阵痛比俄罗斯等国要小得多,而取得的成绩则大得多。但是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书中指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出现了原始积累的过程。例如,“从1978年开始,在农村,有千百万的中国人离开了土地,也就是说受到了有力的剥夺和无产阶级化了”。在城市中,雄心勃勃的资本家获得了资本使用权,通过贪污、挪用国家基金,也就是说,通过获得非资本主义资源的使用权而建立私营企业。由此就推动了资本家阶层的产生。最后,大量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来到了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一个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部分被创造出来。因此,非资本主义来源对于资本形成的资助,农村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分离,工人从国有企业下岗,这些过程都是非常清楚的。它们都是国内原始积累形式。书中所揭示的这个过程令人惊心动魄,虽然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从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角度,用如此清晰的语言概括出来,仍令我们动容。我们不想完全否定这一过程,它的来临多少有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完全可以使这个过程所引起的阵痛更轻一些,代价更小一些,公平和人道更多一些,腐败也更少一些。对于资本、市场,我们应当从更高价值观和人民利益角度出发,力求用其利而避其弊,对新自由主义也可以作如是观。如果举国上下都能对此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现代化道路就会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我们超越新自由主义弊端之努力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本书主要由江苏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所几位研究人员承译。翻译与出版得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 刚

2006年6月

# 目 录

译 序：必须另有选择 陈刚	1
导 言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 黛博拉·约翰斯顿	1
<b>第一部分 理论透视</b>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反)革命 杰拉德·都曼尼 多米尼科·莱维	11
第二章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改变 托马斯·I·帕雷	24
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流经济学 考斯塔·拉帕维萨斯	37
第四章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安沃·塞克	51
第五章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 西蒙·克拉克	64
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政治学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学 罗纳德·芒克	76
第七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国际关系 阿莱让德罗·科拉	91



## 第二部分 全景考察

第八章	新自由主义和欠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 特伦斯·J·拜勒斯	107
第九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 雨果·雷迪斯	119
第十章	国际贸易中的新自由主义：稳妥的经济学抑或信念问题？ 索耐·德拉尼亚加拉	130
第十一章	“常见的货币实践的避风港”：国际货币与金融的新 自由主义之梦 简·托波罗斯基	139
第十二章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 经济发展议程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	148
第十三章	对外援助、新自由主义和美帝国主义 亨利·维尔特迈耶 詹姆斯·彼得拉斯	158
第十四章	给发展中国家农民的“胡萝卜加大棒”：新自由 主义农业理论与实践 卡洛斯·奥亚	168
第十五章	贫困与分配：回到新自由主义议程？ 黛博拉·约翰斯顿	179
第十六章	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 苏珊妮·麦格雷戈	188
第十七章	新自由主义、新右派与性政治 莱斯利·郝佳特	198
第十八章	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议程 赖斯·莱维多	208
第十九章	新自由主义与公民社会：计划与可能 萨波·辛哈	219

第二十章	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市场力量 vs 民主力量 亚瑟·马克伊文	229
第二十一章	新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 菲利普·阿莱斯提思 马科姆·索耶	238
<b>第三部分 新自由主义实践</b>		
第二十二章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诞生：资本主义的一次重组 阿·坎姆贝尔	251
第二十三章	英国的新自由主义经验 菲利普·阿莱斯提思 马科姆·索耶	268
第二十四章	作为新自由主义霸权载体的欧洲一体化 约翰·米留斯	280
第二十五章	新自由主义：东欧新边界 简·托波罗斯基	290
第二十六章	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	299
第二十七章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新自由主义：从结构调整到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帕里克·邦德	310
第二十八章	新自由主义与南亚：一个狭隘话语之例证 马修·穆卡特内	320
第二十九章	日本新自由主义评价 伊藤诚	330
第三十章	东亚及东南亚资本关系的新自由主义重组 达优波·常	338
	撰稿人	348



# 导 言<sup>①</sup>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 黛博拉·约翰斯顿

我们生活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它在诸如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意识形态、文化等众多领域对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民生活产生了强烈影响。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并深入到生活的重要方面,以致很难对其性质与历史重要性进行评估。然而由于学理的和政治的缘故,必须作这样的评估。

本论集包括 30 篇评论文章,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作了考察,从而为相关的活动家、学习者与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份研究议程。这些文章被分为三组,包括理论篇、应用篇和历史篇。收入本论集的文章具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它们从原初的政治经济视角考察新自由主义的起源、特征与内涵。第二,虽然它们来自独特的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与卡莱茨基主义(Kaleckian)思想流派,但这些文章在内容与方法上仍然相互接近。这些共同的东西展现了当代政治经济的活力、发生在这些思想流派之间的对话之深度与广度,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交流的可能性。第三,这些文章对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种实质性的评论,也就是说,涉及事情“本根处”的评论。它们显示新自

---

<sup>①</sup> 感谢丹尼·埃里弗(Daniel Ayliffe)、弗兰西斯科·坎姆诺尼(Francesca Campagnoli)、安娜·玛丽·米兰多(Ana Maria Miranda)、瓦特·捷米德(Walter Schmidt)和玛丽·劳拉·梯莱里(Maria Laura Tinelli)所作的富有成果的研究。

由主义是与世界上特权集团的权力与财富相关的霸权主义计划的组成部分，它特别有利于各国国内的金融利益，在国际上则有利于美国的资本。因此，分析把握全球化与帝国主义不可能离开新自由主义。这些论点将在下面得到简要的阐释。

## 新自由主义入门

对新自由主义作纯理论的概括是可能的，理由有这样几个。首先，在方法上，虽然新自由主义经验中有一些重要的共性的东西（下文将释），但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因此，这些经验并不一定包含一套能够被明确定义的固定特征，如对“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研究可预期的那样。新自由主义与许多复杂程度各异、范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有关。其中一些被高度抽象了，例如，金融权力的增长或民主的退化，而其他则相当具体，如私有化或外国政府与地方非政府组织(NGOs)之间的关系。然而，当它通过民主政治、经济、法律、意识形态和传媒压力的合力，如果必要的话再加上国际威慑和军事力量的支持，侵入新的领地，践踏穷人，损害权益，击败抵抗时，就不难认出这个怪兽了。

其次，如第七章和第九章所主张，新自由主义并非与帝国主义和全球化无关。在传统的（或主流的）话语中，帝国主义或者缺位，或者按更新近的说法，主要表现为“美国主题”：给世界带来文明，并使一切都有利于神圣的三位一体——绿面孔的美元老爷；其代表、偶尔也是竞争对手的圣欧元和圣日元。新近的归顺者得到了一个重新装修的国际机场、一家崭新的麦当劳分店、两个豪华旅馆、3 000 个非政府组织和一个美国军事基地。这个提议不可能被拒绝——或有其他结局。<sup>①</sup> 全球化

---

<sup>①</sup> 要进一步考察当代帝国主义的不同方面，请参见 Panitch and Leys(2004)。

反而被普遍当做一个不可避免、不可抗拒和善意的过程,它会导致更充分的竞争、福利的改善与民主在世界上的传播。但实际上,所谓的全球化过程——在其实际存在的意义上(请参见 Saad - Filho 2003)——只是新自由主义的国际面孔:一个世界范围的发展战略和社会规则,它们能让一项帝国主义计划得到扩展,该计划由美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地居支配地位的资本家联盟之同盟所主导。这个把目标集中于国内新自由主义与海外帝国全球化的雄心勃勃的权力计划由各国形形色色的社会经济政治联盟来贯彻,但是地方金融和本身也受金融支配的美国统治阶级利益通常是霸权主义的。

第三,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分析需要一种多维的方法。新自由主义源远流长且复杂多样,对其出现不可能从时间上精确界定。如第三章到第六章所显示,新自由主义混合了多种来源,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关于凯恩斯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评论、货币主义及其新古典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后续理论。它们的影响随着战后秩序的崩溃——如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弥漫全球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之终结,70 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70 年代中期富裕国家所谓的“凯恩斯妥协”之瓦解,80 年代苏联阵营的倒台与穷国发展的选择余地剧减——特别在 80 年代与 90 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增长。第一章与第二章显示,选择余地的丧失为综合保守派观点和美国权贵的利益、意见提供了空间。这口火锅由富有进取精神、民粹主义的保守主义者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提供,肉汤由金融提供——在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1979 年所领导的“成功一击”之后,日益成为世界霸主。<sup>①</sup> 通过说服与武力,新自

---

<sup>①</sup> 花旗银行副总裁 M. J. 霍根(M. J. Horgen)声称自从联邦政府的政策改变以来“世界已经改变”,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未来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宣布沃尔克的政策变化是“自二战以来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变化”(Business Week 5 November 1979, p. 91 and 22 October 1979, p. 67)。



由主义已经无所不在。

然而，重要的是避免对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作过于线性的描述。例如，撒切尔夫人的货币主义经济论坛的关键成分就是前工党政府强加的；她只是发展了它们并给予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然而，里根、撒切尔夫人的清教徒观点和那些宣扬美利坚帝国的商品、新自由主义内阁的政治实践的小丑文人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紧张关系。例如，里根的“巫术经济学”（用他的副手布什的话说）对该信条的守护者而言就是无法接受的。历史显示，使那些原初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处于支配地位较为容易，因为国内各种利益的剧烈冲突和力量的相互掣肘，根本不可能让历史随心所欲地从头再来。对此，第十四章关于农业自由主义的不对称运用之讨论作了很好的阐述。把那些高收入的顾问空投到遥远的无关紧要的国家是相当容易的，在那里美元老爷能够很容易地使土著卑躬屈膝。礼仪的这种净化使他们几乎被文明化了。然而，无知的群众和他们的残酷领袖是否应该拒绝美元外交，少为（新的）规则买单？大规模杀伤武器是可以利用的，它们能够被部署在很远的地方并被有效运用。

虽然各国情况有别，但历史分析仍能够揭示相当多的细节，总的图景是清楚的。新自由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系统地运用国家权力，把（金融）市场强加给国内，并使之变得必不可少，这个过程可通过“全球化”从国外复制。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和第三十章指出，在美国、联合王国、东方以及东南亚各国，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特殊机制的资本主义，它保护资本（主义）并打压劳工的力量。这是通过由国内力量和国外压力推动的社会、经济、政治转型来实现的。国内力量包括金融集团、主要工业家、商人、出口老板、传媒大亨、大地主、地方政治领袖、最高层的文武官员及其知识界、政治界代表之间的联盟。这些集团与来自该中心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他们倾向于迅速遵循来自那个中心的要求。他们的努力导致脱离大多数人的权力关系出现世界性的显著改变。公司的力量在增长，而金融的影响无可匹敌，政治的范围发生改变并指向权利。左派政党与群众组织大大减少，而行业工会受到钳制

或力量被失业所抵消。外部的压力形式包括关于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讨论、对宣传新自由主义价值的国家与民间社会机构的涉外支持、不知羞耻地使用外援、解除债务和为支持新自由主义纲领买单、外交压力、政治骚动与必要时的军事干预。例如，第二十四章显示，欧盟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如何使联合的过程成为保护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工具。对此加以补充的是第二十五章关于东欧解体的分析，一些国家被引向一种西欧式的新自由主义，另一些则追随俄罗斯的寡头模式。总之，新自由主义到处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与舞台。它发布政治与经济的议程表，限制可能的结果，影响预期，并把难题带给那些对其主张、方法和推论发起挑战的人。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理论并非一成不变。为了对付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批评，即它增加了世界上的贫困与分化，新自由主义理论试图以一种更受欢迎的方式来展示这个妖魔。尽管有些材料支持这种理论上的改头换面，但这种变化仍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没有改变。财富分配与贫困问题在第十五章中讨论，第二十一章将拆解“第三条道路”的诸项议程，该道路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一张人性化面孔的新自由主义”。

### 一个多方面的权力计划

为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繁荣，新自由主义为解决资本积累问题提出了一个表示友善的金融方案。第一章、第二十二章和第三十章表明，新自由主义通过相互矛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借口反通胀、促进生产发展，大规模削减社会权利，把规章制度强加于一个焦躁不宁的工人阶级。新自由主义也使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能力方面变得只起短暂（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和局部（投资、就业与产出的分配）作用，成为一个迅速国际一体化（并且由美国领导）的财政部门，并把这种变化合理化。



在此过程中，新自由主义促进巨额的财富向当地富人和美国转移，这是第十一章和第十五章所揭示的。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毕竟并不是一种“经济松绑”的模式，一般说来它并不能提升“个人的主动性”。在不干预的理论托辞下，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进行了广泛而带有进攻性的干预。它强加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经济秩序，该秩序的基础是重点突出金融与国际精英的联盟，还有各国穷人的从属地位与对美国利益的普遍服从。最后，新自由主义并未促进迅速增长。虽然它提升了世界上的权贵及其附庸的权力与生活水平，但它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灾难。从国内来看，“市场关系”的扩张侵犯了人们享有食物、水、教育、工作、土地、住房、医疗、交通与公共福利设施以及两性关系的权利，这是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所显示的。法律的改变是为了约束大多数人，使其难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和作出别的选择。警察、法院与武装军队被用于消除“新民主国家”（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赞比亚）出现的反抗，就像在“老牌民主国家”（如法国、印度、意大利、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一样。第二十章表明，民主到处受限于全球资本想夺取土地并剥削其人民的权利，而第八章考察新自由主义在许多国家与已出现的资产被大规模掠夺齐头并进。最后，新增利润流入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变化增加了边缘地带的压力，在那里剥削的比例必然迅速增长，以支撑精英在国内的消费达到美国那样的超常水准。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促进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的霸权体系。第十二章显示新自由主义关于提高穷国的生活水准之允诺并没有完成，第十三章讨论外国援助作用于这个剥削过程的方式。这些章节以及本书的其他某些章节认为，新自由主义妨碍了那些最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减轻贫困的政策实施：如第二十八章所示，在南亚，新自由主义减少了对这些政策的宣传，这是很致命的。

这些剥削议程主要但不完全是这些国家内部（以及相互间）权力关系变化之结果。它也是技术变化，特别是更加廉价的国际运输、通讯与



计算机的力量、互联网、“灵活有弹性”的生产的出现、生产企业与金融市场之间更加紧密的国际联系之成果。

## 超越新自由主义

尽管在它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变化,以及有提升少数人生活水平的成绩,但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资本积累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失业与就业不足现象已非常广泛,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几乎到处恶化,生活在边缘的人在经受经济停滞的折磨。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少数人掌权、弄权和破坏环境的全球性制度。这个制度孕育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并为自己的永久地位和摧毁反对复制自己的抵抗力量创造了物质基础。第二十六章到第三十章讨论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日本、东亚和东南亚仍在继续的危机。这几章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到处引起不稳定,而第十章显示,新自由主义关于贸易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心论点缺少理论和经验的证据支持。

新自由主义也破坏了它自身的存在基础。它一直错误地发出经济增长与提高生活水平的信息而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忍耐限度,使自己编造的用来遮蔽争论并使其破坏性后果合法化的谎言充分暴露。无休止的“改革”祷告完全未能实现其关于“提高效率”的允诺,而使新自由主义政府,还有它们的言论与大话失去了合法性。考虑到金融的发展迫使政府限制利率调节的范围——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工具,消费信用的爆发支持了中心地带生活水平的提高。最重要的是,群众运动已出现并成功地向新自由主义霸权挑战。无论它们有何种局限,正如第十九章所论述的,新近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爆发的社会运动,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更有局限性的社会运动表明,新自由主义

并非无懈可击。这本书将详细阐述这些主张,并指出一个拒绝、批评和斗争的方法步骤。

陈刚 译

### 参 考 书 目

1. Panitch, L. and Leys, C. (eds) (2004) *The New Imperial Challenge: Social Register 2004*. London: Merlin.
2. Saad-Filho, A. (2003) 'Introduction', in *Anti-Capitalism: A Marxist Introdu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 第一部分 理论透视





#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反)革命

杰拉德·都曼尼 多米尼科·莱维

20 世纪后 20 年与在此之前及二战之后的那几十年形成鲜明对照。把这后 20 年的资本主义说成是“新自由主义”是很正常的。的确，在 70 年代与 80 年代之交，无论是在中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的作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较早的资本主义构架常被归于“凯恩斯妥协”。如果不是过于简化的话，这些年那些中心国家——美国（与加拿大）、欧洲与日本——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大幅度增长、持续性的技术变化、商业权力的增长、福利制度（特别与保健、退休有关）的发展和低失业率。这个局面在 70 年代被破坏了，世界经济也一样，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进入“一种结构性危机”。其主要方面是增长率消失、失业率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这正是新的社会秩序——新自由主义出现的时候，最初是在那些中心国家（开始是联合王国和美国），然后逐渐输出到边缘国家（参见第二章、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三章）。

下面我们将探讨新自由主义的性质及其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资产负债表。新自由主义经常被描述成有关市场与个人利益的思想体系，它与政府干预相对立。虽然新自由主义确实代表一种思想体系并有它自己的宣传，但是它基本上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上层统治阶级——最有钱的人——的权力与利益在一次颠覆后得到了重建。我们注意到通过“融资”，上层资本家阶层与金融机构的力量得

到加强。虽然产生结构性危机的条件在改变,但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经济仍苦于增长缓慢、失业与不平等现象的惊人发展。这是那些最富裕国家成功地恢复其收入与财富的代价。<sup>①</sup>

## 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把当代世界的灾难归之于全球化太容易了。在此方面人们必须非常小心。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两个现象范畴的确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它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机制。

全球化,或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是一个早就存在的过程,一个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共产党宣言》中将其概括为(由世界市场所确立的)资本主义的内在过程。国际贸易的增长、资本的流动、世界(全球规模的)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革新毫无关系(参见第七章)。然而,可以把现阶段的特征概括为日益增长的外贸业务、资本的国际流动、跨国公司的发展,还有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发挥新的作用。虽然美国的支配地位不是新东西,但对美国在帝国主义国际集团中的霸权和苏联垮台以后的单极世界而言,新自由主义仍在发挥作用。

资本主义的国际化总是以剥削与直接使用暴力为标志。这是帝国主义的核心(参见第八章和第九章)。它已经产生了许多许多的战争,并毁灭生命与文化。它使人类的一部分陷入奴隶状态,并使这个最极端形式的灾难遍布全球。凯恩斯妥协的世界与与殖民主义、越南战争并存。的确,呼吁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反全球化运动的“可能世界”)并非对过去的依恋。

相反,新自由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一种新运作规则,它对中

---

<sup>①</sup> 下面的分析引自 Duménil and Lévy(2004)。



心—边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它的主要特点包括：一套有利于所有者和股东的新的劳资规则；取消政府对发展与福利的干预；金融机构的巨大增长；在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实行一种有利于前者的新型关系；一种新的有利于合并与并购的法律标准；加强中央银行，其活动目标是稳定价格，还有让边缘的资源渐渐流向中心的新规定。而且，伴随新自由主义而来的新的全球化还包括边缘国家无法承受的债务重负、资本自由流动所引起的灾难。然而，新自由主义在当下的主要特点是逐渐扩张到地球的其余部分，那是它自己的全球化。

### 新自由主义的产生：资本复兴

给新自由主义最初出现作精确定义是很困难的，在讨论类似问题时常会碰到这种情况。这也同样适用于其终结或被取代。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在国际上。“货币主义”表现了一种新的理论与政策趋势。但是标志年肯定是1979年，那年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立即提高利率。这也是我们所谓的**1979行动**。

70年代作为过渡的年代而引人注目。60年代后期，第一个长期贸易赤字出现在美国。这显然与欧洲国家与日本不间断的赶超有关。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在出现美元过剩，因此，转持黄金的现象在增加。美元被迫对黄金和其他主要货币贬值。美国于1971年终止了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

尽管美国在此情况下失去了相当权力，但浮动的通货仍代表美国手中的一种新工具，在以后的年份成为新自由主义框架最初的构成成分。新的成分在迅速增加，例如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这是美国1974年确立的，60年代则对其加以限制。联合王国参加了1979年的运动，其他欧洲国家跟着仿效。新自由主义风头正健，而凯恩斯主义政策受到

批评。<sup>①</sup>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他任期的最后岁月试图刺激美国经济,徒劳地号召国际合作;德国表现出更加关心通货膨胀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迹象(马克的作用在增强)。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定导致沃尔克被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确保实际利率波动幅度在6%—8%之间(根据通货膨胀率修正)。除通货膨胀外,在欧洲与美国又兴起失业潮,从而为产生新的劳工规章创造了条件,该规章由里根与撒切尔所强加。

要找到一系列能够比图 1.1 更详尽的有关新自由主义起源的资料也许是很困难的。纵轴是美国 1%最富有的家庭所持有的财富份额。可以看到,这 1%的人在 70 年代之前拥有接近总量 35%的财富。这个百分比在 70 年代缓慢下降到 20%左右,在接下来的 10 年再次攀升(也请参考 Piketty and Saez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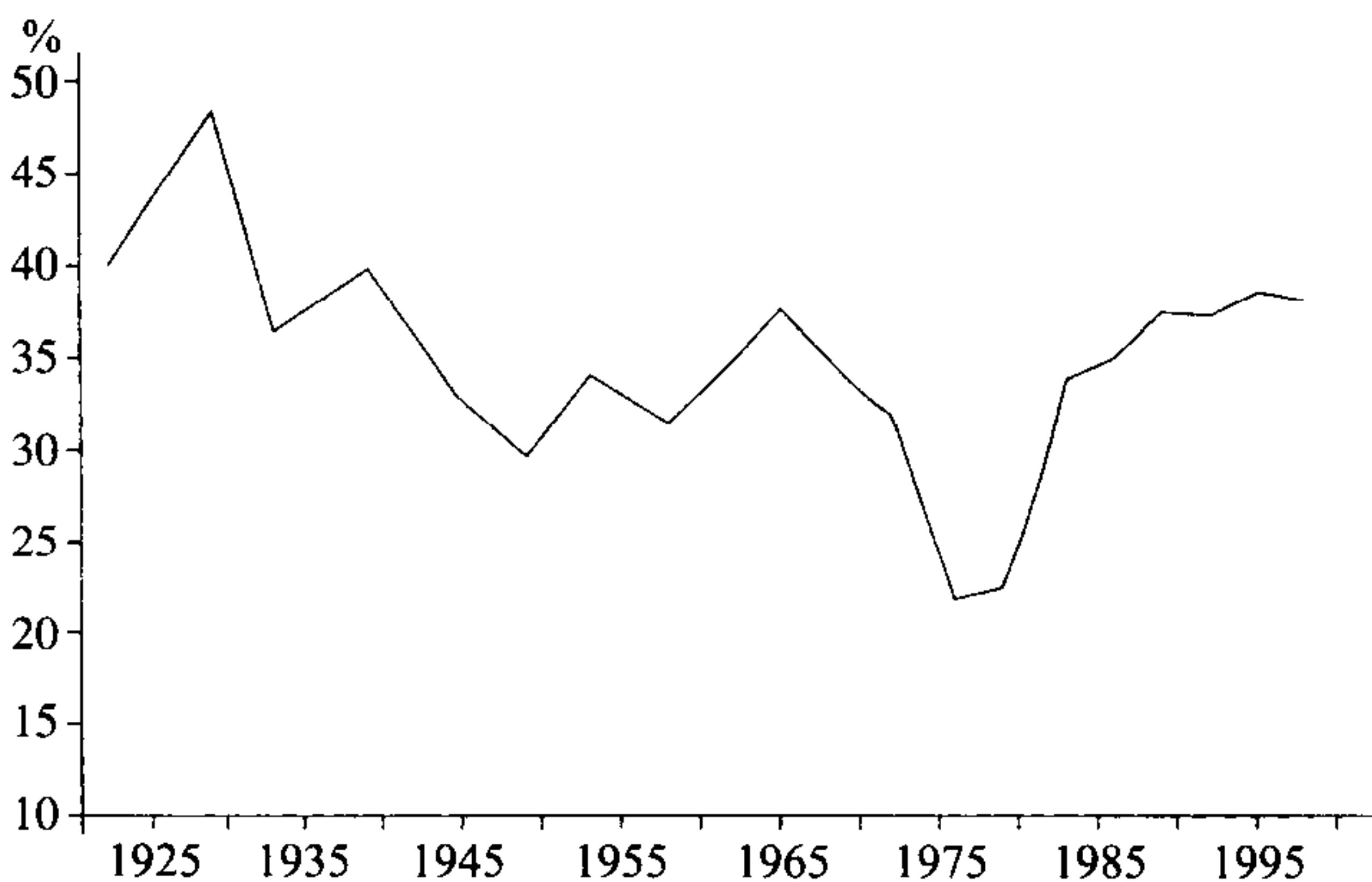


图 1.1 美国 1%最富有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包括住宅、有价证券、现金与耐用消费品)份额

资料来源: Wolff(1996)

对这个变动的原因与结果都应该强调。资本的收益在 60 年代与 70 年代突然下降;70 年代公司分配的股息很少,实际利率很低,甚至是负数。股票市场(也随通货膨胀率而动)在 70 年代中期崩溃,然后是停

<sup>①</sup> 新自由主义崛起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已由赫莱纳(Helleiner 1994)作出分析。

滞。在如此情况下统治阶级的收入与财富受到剧烈冲击是很容易理解的。由此角度看,也不难理解不平等程度的显著下降。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解读为最富有的那部分人阻止这种相对下降的企图。

70年代的结构危机也是美国领导地位(越南战争失败之后)在名义上或实际上下滑的历史时期。日本与德国之星冉冉升起。声称由三个中心(美国、欧洲和日本三位一体)来组织全球秩序的风险在增加。这个风险在整合美国那些能够强烈影响这个国家政党与选举的不同商业和金融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Ferguson 1995)。这个风险刺激了总统选举中的民粹主义成分(populist component),民族自豪感受到激发。这种情形对1979年里根的当选是决定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激起了沃尔克的行动。(在金融方面,利率的提高有三个好处:打击通货膨胀,增加债权人的收入与财富<sup>①</sup>,以及用国债的增加作为抨击福利国家的论据。)

不能把这些事件单独地评价为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政策的失败。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70年代的结构危机。但是,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较强的替代模式——如欧洲、日本和许多周边国家所为——的利剑已经出鞘。欧洲“社会主义”迅速顺从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它们包括国际资本流动及其配套的宏观政策框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与避免公共事务支出、鼓励合并与兼并。然而,欧洲公众的反对使社会保障的内容被保留了很多。因此出现了混杂的社会构造,也就是“社会新自由主义”(参见第十六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九章)。

虽然新自由主义确定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构造,但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变化长期趋势之继续。19世纪后期以来金融机构的大幅提升及与之并行不悖的资本中心化在20世纪80年代又创新高。这些金融机构及其相应的大国集中了巨大的金融财富(例如,花旗集团拥有位于许多国家的3000多家公司,2000年其资产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它

---

<sup>①</sup> 反通胀之战是第二个目标的一个组成要素。



们把传统银行与具有新功能的保险活动，例如资产管理结合起来，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美国，所有传统的“资本家”任务都委托给负责管理和人力资源事务的庞大队伍。在所有领域，无论是金融还是非金融，一场管理的革命正在进行之中。

关于宏观政策，应该强调的是，在 80 年代，金融并不反对加强中央银行，而是控制它们。货币政策变成金融的一个决定性工具，用于加强对它有利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目标被严格控制总的价格水平、保护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与财富所取代。为此，需要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内采取一整套制度与政策。凯恩斯主义制度不再是争议，而成为目标(objectives)。

## 损失与收益

新自由主义有利于极少数人而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财产权显露其阶级基础。本节描述它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可通过比较美国、欧洲、日本以及边缘区域的资产负债表得出。

### 谁得益，谁受损？一种阶级的分析

1979 年利率的提升令人惊异并终结了通货膨胀。尽管名义利率逐渐下降，较高的实际利率仍维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水平上。图 1.2 显示了美国与法国的长期利率。显然，这样高的利率有利于债权人，无论其是个人还是机构。而且，股东的股息率很高。60 年代，以股利形式分配的利润接近 30%（在缴税和支付利息之后）。到 20 世纪末逐渐向 100% 攀升。2000 年，股票指数随之达到顶点。

与此同时，作为债权人的一部分股东增加了头寸。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美国，股东的金融资产数额接近其可支配收入（亦即税后收入）的 100%；在新自由主义年代则达到 150%。与此相对应，（债权人

以外的另一部分)股东增加了他们的债务,20世纪末,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60%提高至超过100%。政府也受到影响。高额的实际利率大大增加了美国的预算赤字。在法国,它们是赤字的直接来源。(新自由主义将实际利率居高不下归咎于赤字。)

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进程使金融投资与金融活动在总体上更有吸引力。“金融化”一词可以用来说明这些金融投资的新趋势(参见第十一章)。金融部门(金融企业)的规模在利润增加的同时也迅速增长。60年代的美国金融企业自有资本(总资产减去负债)还只达到非金融企业的25%;在7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期间跌落到18%;到2000年,该数字接近30%。直接或通过附属机构逐渐介入金融活动的非金融企业数量也多得惊人。而且,证券业的所有权也越来越集中于金融机构如共同基金或退休基金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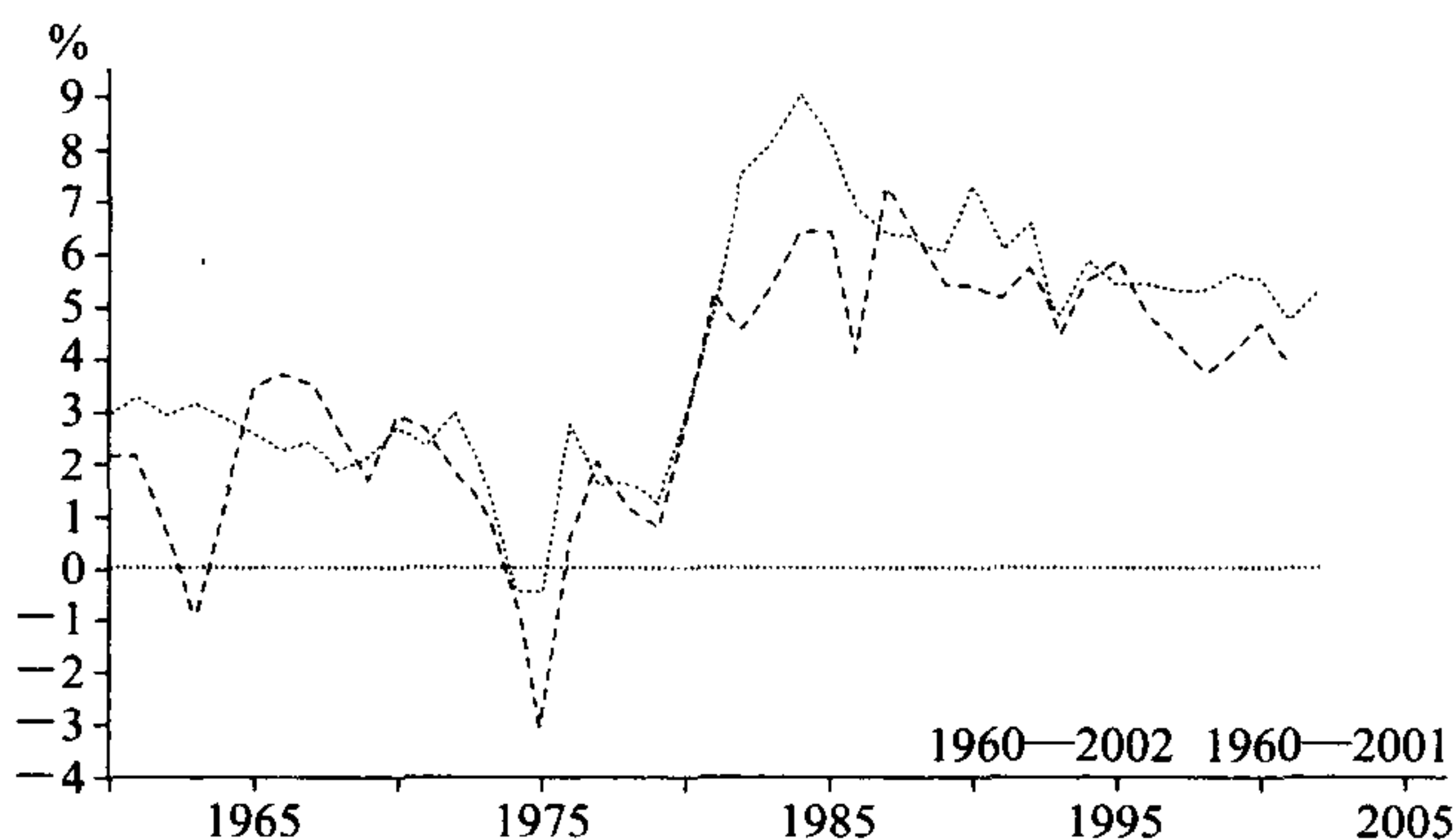


图 1.2 长期实际利率：法国与美国

资料来源：OECD, *Statistical Compendium* 2001。

新自由主义一个重大的结果是恢复上层的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与财富,他们的财产表现为他们所持有的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与汇票。规模更大的部门持有这样一些证券并获得相应的收益,特别是退休基金(例如美国)。显然——根据国家标准尤其是国际标准——这些直接相关的阶级享有一种比较有利的处境。这是新自由主义提供退休金的

方法。这些社会集团被引导得相信它们会更为富有并且现在是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个印象由于 90 年代第二个五年期间其证券投资组合价值之增加而加强了,但为期短暂。这些集团财富的增加是新自由主义的目标之一,只有在此情况下才能够得到它们的支持。其资产集中于大的基金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控制金融的工具。<sup>①</sup> 然而,在 21 世纪之初它们必须面对如下威胁:在不工作即退休之后,仍具备过体面生活的能力。<sup>②</sup>

新自由主义不必为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负责,但在结构性危机仍然猖獗时出现的金融收益下降使危机的影响得以延长,特别是经济增长放慢与失业。

6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初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率下降之后——该下降导致了 70 年代的结构性危机,利润上涨的新趋势出现了。然而,非金融企业所恢复的利润渐渐集中到富有的股东与金融机构手中。因此从非金融企业的角度看显然不存在利润恢复,因为它们的利润还得付息和分红。这样一种下降的情况持续到 20 世纪末。假定新股的发行或借入资金能够以向非金融机构派发零股的代价来为房地产投资、融资,如此“慷慨”的分配将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然而,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到 21 世纪仍未出现如此情形。资本积累(来自投资的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将紧随分红和付息后的利润率进行。因此新自由主义向金融利益的倾斜给增长和就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心区域的经济增长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有时被贴上“混合经济”标签的非金融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政府的强力

---

① 除来自管理退休基金这种赢利性强的业务的收益以外,金融还运用其能力把资本分配到不同的公司和国家,控制私营经济与公共政策。此外,从政治角度看,由中产阶级参与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所产生的幻象,对于维持新自由主义秩序至关重要。

② 在美国,劳动力中低收入的那一半没有退休计划。



干预。由于低利率和分红,利润仍留在非金融企业中,并被投资于混合经济。

以法国经济为例。20世纪60年代,法国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折旧后)达8%,20世纪末逐渐下降到约2%!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变化之组成部分。自90年代以来,法国企业试图减少负债。(自筹资金投资的比例在很多年内高达100%)它们也参与了一个组织化与集中化的过程。这些调整不利于建构新的生产力:赢利更大而不是规模更大,或者合并而不是增长。如表1.1所示,就增长与就业而言,代价还是很大的。

表 1.1 年平均增长率

时期	1950—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9
美国	4.11	4.41	3.24	2.98	3.00
法国	4.54	5.71	4.10	2.37	1.72

资料来源: National Accounting Frameworks(BEA, INSEE)

即使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也不能被视为一种经济增长和积累的模式。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增长率低于以前年份的水平(参见表1.1)。该表并无新奇之处,但显而易见,新自由主义奇迹并未出现。美国经济在增长方面的记录依赖于“长期繁荣”,它出现于衰退前的1993年到2000年。该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从世界其他地方异常流动的后果之一。(Duménil and Lévy 2003)

日本因其金融模式优于新自由主义而免受80年代初期利率上升的影响。日本资本市场的利率在这10年中像其他地方一样增长着,但企业从银行借款的利率更为优惠。然而,日本金融机构的转变正在进行中,并逐渐向国际金融开放。主要变化出现于1985—1990年之间,可将其描绘成新自由主义的第二次冲击。企业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源。借贷的成本变得更高,公司为股票市场的活力及其相应的管理方式所吸引。这种开放在短短几年之内就促成了一种金融泡沫,不动产领域的投机接踵而至。非金融公司很快

便不能负担高昂的融资成本。金融机构逐渐根据新的国际金融规则来改造。因突然陷入对股票市场投机风险的担心，金融部门深受1990年泡沫破灭之害。日本陷入一次持久的危机。在其他国家，这次实际上源于日本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改造的危机曾被用做支持更为普遍的调整的论据之一。

虽然拥有独特的结构，但韩国作为处在边缘区边缘的国家，还是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新自由主义受害者的个案。从20世纪最后10年直到1997年危机期间，韩国的增长速度记录甚至高于鼎盛时期的日本。接着韩国进入一个向新自由主义部分开放的时期，其支配的形式与日本所实行的很相似（参见第二十九章和第三十章）。公司的融资成本在90年代第二个五年中上升，耗尽了利润。外国资本回流的目标已根据新自由主义需要作出调整，它们逐渐进入该国，带来流动资产的迅速增长。当东亚国家金融风暴明朗化的最初征兆出现之时，它们突然离开这个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给紧接而来的危机增添了引人注目的结果。判断韩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王国会产生什么后果仍嫌太早。它会彻底破坏拥有巨大增长潜能的早期模式吗？增长率会消失吗？宏观经济将会产生一种新的不稳定吗？我们还不知道。

可以这样概括上述机制：国际金融（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发展有两个战略步骤。（1）取消对金融的管制，允许其（与国家代理人共谋）进入特定的国家；（2）改变非金融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使之更有利于后者，特别是美国金融自身。

### 边缘国家的剥削与灾难

一个国家越是远离中心，其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越是有害。新自由主义在边缘国家的第一次表现是所谓“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决定借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一个

主要的政治目标：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战。但是70年代与80年代的政治形势是不同的。该危机的主要原因是1979年实际利率的上升。它又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危机所恶化，这对边缘国家的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下降也为这些国家局面的恶化推波助澜，例如石油价格的变化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危机开始于1982年8月，当时墨西哥宣布它已经不能偿还它以前承付的款项。一个连锁反应出现了，一年以后，27个国家重新安排了偿债计划。拉丁美洲的四个国家（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与阿根廷）拥有74%的国际债务。

所谓“发展中国家”债务（按世界银行定义）的实际利率（使用美国扣除通胀因素的GNP统计法）从负利率跳跃到接近2%。2000年，这些边缘国家的债务比1980年多4倍。事物的另一面显然是巨大的利息流从这些国家转向中心区域特别是美国的银行。按美国扣除通胀因素的GNP统计法，这些发展中国家1996年时的产出水平甚至低于1979年。

除了债务的负面影响之外，边缘地区的国家还因为拒绝了自我发展战略而受到新自由主义不合理要求的伤害。资本输出会传导发展是一个神话。稳定货币汇率能够促进外国投资的观点同样有害。的确，这样的稳定也许在短期内能够鼓励外国投资，但它不能够持续发展。高成本的融资、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调制出了停滞与危机并存的新自由主义鸡尾酒。

图1.3显示了巴西、墨西哥与阿根廷从1960年或1971年以来的产出曲线(GNP)。新自由主义年代，三国在增长率方面的骤降差别甚微。对墨西哥或巴西说来，增长率被分割为两段或三段。同样明显的是，衰退发生了。对该边缘地区的敏锐观察家来说，增长缓慢与衰退是新自由主义进程的底线。阿根廷的情况稍稍复杂一些，自80年代的持续滞胀以来，以及在那个阶段以后，90年代回到新自由主义，起初在90年代的前五年促成了新的经济增长。众所周知，这个插曲在90年代末的危机、悲参与分化中结束（参见第二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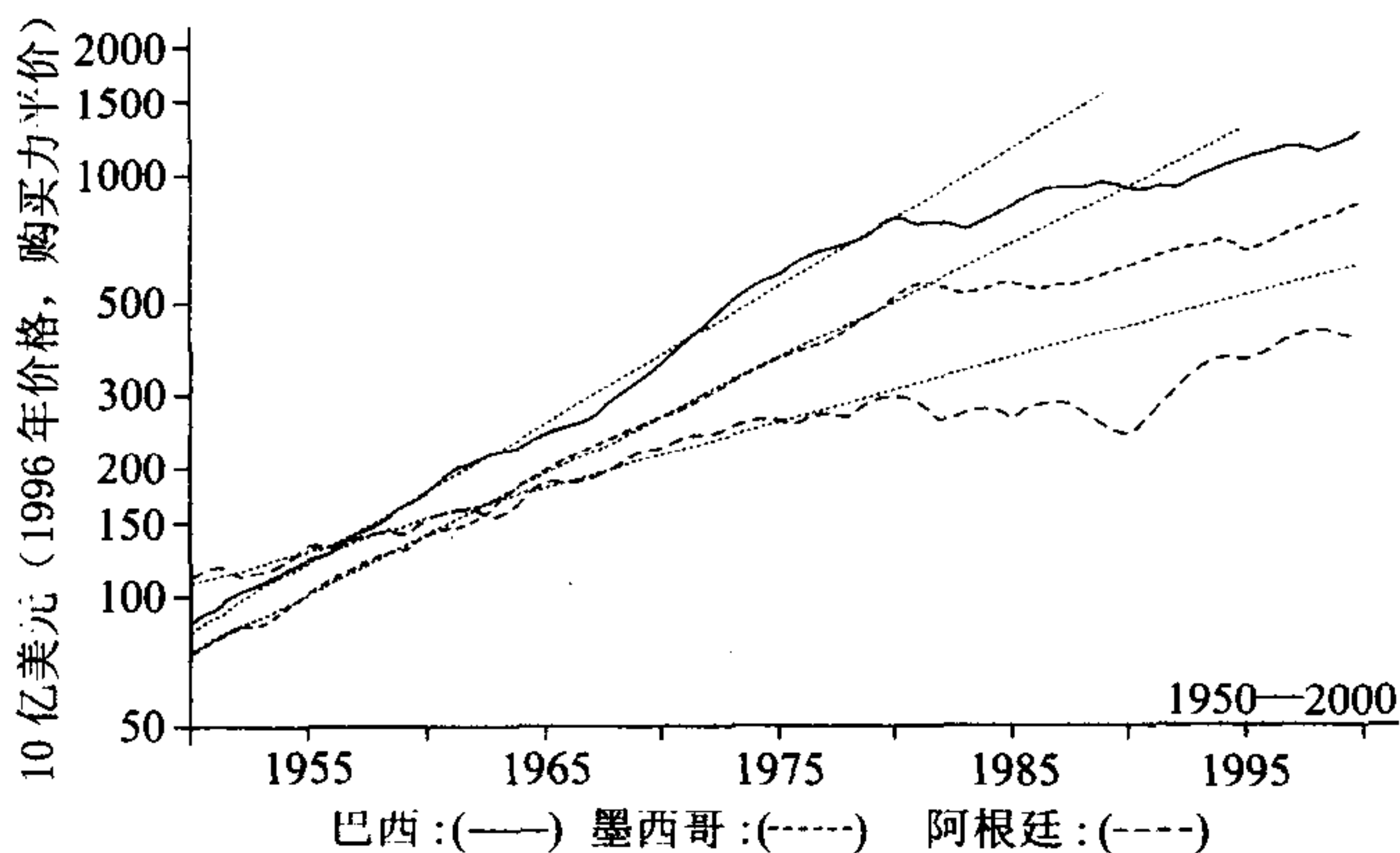


图 1.3 产出：巴西、墨西哥与阿根廷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2003

中心区的经济利益常被人谈及。其争议表现为：以低廉和越来越少的价格购买自然资源（农业、矿产和能源）；跨国公司对这些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这些劳工不得受制于极端的劳动条件；收入流被这些国家所累积的债务所耗尽。对此，还必须加上一点，即逐渐购买主要的、有可能带来更多利润的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所带来的允许跨国公司可以低价购买整个行业（例如电信业）的机遇。

2000年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投资（国库券、债券、商业票据、股票分红、直接投资，等等）达34880亿美元。相应收入为3810亿美元，也就是说，回报率接近11%。有趣的是该收入接近美国所有企业税后利润的总额，这部分收入中不含由国外流入的收入——其数额亦相当于美国企业税后利润的总额。<sup>①</sup>

这些机制证明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掠夺性的制度。上层统治阶级力量的加强在不同范围内和程度上处处给增长带来损害，不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是在边缘地带。的确，按他们自己的目标进行评估，新自由主义在恢复这些阶级的收入和财富方面还是很成功的，在巩固美国经

<sup>①</sup> 1950年这个比例仅为10%。在80年代开始时它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降临突然上升，主要与利率的上升有关。

济的领先地位方面也一样。但是对于美国人民乃至世界的其余部分说来,这种领先地位的代价过大。

陈刚 译

### 参 考 书 目

1. Duménil, G. and Lévy, D. (2004)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Duménil, G. and Lévy, D. (2003) *Neoliberal Dynamics-Imperial Dynamics*. Paris: Cepremap, Modem<<http://www.ceprenmap.ens.fr/levy/>>.
3. Ferguson, T. (1995) *Golden Rule: 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Logic of Money-Driven Political Syste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Helleiner, E. (1994) *States and the Reemergence of Global Finance: From Bretton Woods to the Nineti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5. Piketty, T. and Saez, E. (2003)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1), pp. 1 - 39.
6. Wolff, E. (1996) *Top Heav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第二章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范式的改变

托马斯·I·帕雷

最近 25 年来,经济政策与公众的思想被一种保守的经济哲学支配。众所周知,那是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反映了一个与 19 世纪英国曼彻斯特的经济自由主义相联系的知识谱系。曼彻斯特体系立足于自由放任经济学,并与自由贸易和废除限制小麦进口的英国《谷物法》密切相关。当代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竞争的效率、个人对决定经济产业的作用、与政府干预和市场规则相关的扭曲,这主要与经济学中的芝加哥学派<sup>①</sup>相关。

新自由主义的两个关键信条是:(1) 收入分配理论;(2) 就业总人数的决定作用之理论。关于收入分配,新自由主义主张生产要素(劳动与资本)都得到它们所应得的报酬。这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过程来实现,而报酬有赖于要素与(供给)不足及其生产能力(它将影响需求)的相对关系。关于就业总人数的决定作用,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市场不会让有价值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被浪费。价格会代之起调节作用而保证需求的产生,所有要素都会各尽其用。这个主张是芝加哥学派

---

<sup>①</sup>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与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他们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货币主义的基础，它声称经济会自动地自我调整至充分就业，所以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永久提高就业只会产生通货膨胀。<sup>①</sup>

这两个理论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它们与 1945—1980 年间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形成对照。在这个较早的时期，起支配作用的就业决定理论是凯恩斯主义，它主张经济活动的水平由总需求(AD)水平决定。<sup>②</sup> 此外，凯恩斯主义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受制于 AD 产生过程和导致失业的周期性衰退。有时衰退可能很严重而产生经济萧条——例如经济大萧条。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货币与财政政策能够稳定需求产生的过程。

关于收入分配，凯恩斯主义一直有分歧，它产生了一次致命的分裂，而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胜利。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倾向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付其所值”的收入分配理论，而欧洲的凯恩斯主义(与剑桥以及众所周知的后凯恩斯主义有广泛联系)对此则加以拒绝。后凯恩斯主义代之以主张收入分配主要依赖于制度因素。因此，重要的不仅是一个要素的相对不足和生产率议价的能力，而后者又受制度安排的影响。这可说明工会、法定最低工资、雇工的工作权利与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失业保险)的意义。最后，公众对经济的理解也很要紧，因为通过一种议价权力的透镜来看待经济的公众将会得到工会和社会保障机构更多的政治同情。

## 大逆转：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与新自由主义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25 年(1945—1970 年)里，凯恩斯主义一直

---

① 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来制定，它对利率作出安排，从而对经济活动的水平产生影响。财政政策则与政府为影响经济活动而对支出与税收进行的安排有关。

② 总需求是经济生活中对商品与服务总的需求水平。凯恩斯主义相信企业的生产以它们对社会总需求水平的预期为基础，所以总需求水平决定经济活动总的水平。

是理解经济活动界限的主要范式。这是现代货币政策(控制利率)与财政政策(控制政府的支出与税收)的工具得到发展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工会活动范围达到历史高度、“新政”式的社会保障机构与规则得到扩展的时期。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开始衰落,后来被复兴的新自由主义取代。这次复兴连带引发了社会经济的混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越战时期和欧佩克石油价格冲击,这些都是 70 年代的标志。然而,这些混乱仅提供了一个转折点。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基本原因可以在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分歧中发现,它未能增进公众对能够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由市场”相抗衡的经济之理解。

整个凯恩斯主义统治时期,美国一直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反对派,正是它提供了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基础。这个反对派在新政时期出现,保守主义反对派创造了退休收入保障制度。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存在,正如保守派发起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1947)所示,它通过破坏工会组织的权力与能力来终止和重挫美国工人组建工会的权利(参见第二十二章)。

新自由主义的复兴也得到了经济和文化因素的支持。新政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层面的胜利也许对自己的垮台负有责任。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所推动的景气度上升、战后劳资之间的社会契约也许促成了这样的信念:收入分配与民众失业的核心经济问题已被最终解决。结果,公众逐渐认为,曾发挥过很大作用的政策与机构(如工会)已无存在必要。

在文化层面,美国一直有著名的激进个人主义,它在边缘人的形象中得到体现。植根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进一步推动了激进个人主义的发展,后者促使人们厌恶集体经济观念的厌恶,否认市场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特别是,集体经济行为受到那些认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者的扭曲。因此冷战为普及这样一些经济说辞提供了沃土:“天然的”自由市场无需政府即可存在,政府管理的削减乃是福祉(参见 Palley 1998a,



pp. 31 - 8)。

政治与文化的因素对于解释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无疑很重要。但是凯恩斯主义也遭受了内部的观点分歧,这种分歧正是其软肋。分歧之一源自收入分配理论。凯恩斯相信收入分配的边际产品理论,据此工人得到的报酬正是他们在公司的价值。这使工会和其他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干预失去了理由,所有这些都可说成是市场混乱而非纠正与不平等交易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凯恩斯与凯恩斯主义对于理解 AD 的决定地位以及它对雇工收入的决定作用贡献良多,在对生产条件以及它们与 AD 如何相互作用、影响方面的分析更无可匹敌。<sup>①</sup>

凯恩斯主义第二个弱点是坚信价格下降趋势与名义工资刚性(后者尤甚)应对失业负责。这个状况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出版之后的年代。论点是更低的名义工资将会使价格更低,增加货币资产的实际价值,从而刺激消费与 AD。此外,较低的价格将会增加实际货币供给,从而降低利率与刺激投资支出。较低的名义工资与价格由此能够解决失业问题。

新凯恩斯主义关于价格与弹性工资的观点被美国经济学家采纳。实际上,它指出价格与工资刚性对失业负有责任,这些刚性包括工会和最低工资法等因素。一言以蔽之,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立场是今天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灵活安排的潜在先驱。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与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形成鲜明对照,在它那里失业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与商业信用的缺乏。在一个货币经济中,如果人民决定持币不用,消费就会干涸,价格弹性会恶化因债务而起的需求问题。因此,较低的价格与名义工资增加了债务人的付息负担,使他们缩减消费并有可能拖欠债务。<sup>②</sup>后凯恩斯主义的底线是货币紧缩通过减少交易成本产生巨大的经济效

---

① 对这个论题的发展,见 Palley 1998a。

② 关于价格与名义工资减少的不太稳定的可能性,正式的分析请参见 Palley 1996 ,ch. 4;1999)。



率,但是它通过价格与名义工资弹性使经济调整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这两个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关于收入分配的决定地位与名义工资刚性下降对于失业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内部产生了深刻分歧。在政策层面,该分歧为新自由主义把新政下的劳动力市场革新概括为市场混乱而不是对市场失灵的修正开辟了道路。

而且,这些分歧为抨击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开辟了道路。美国的新凯恩斯主义支持这样一些实用主义基础之上的政策,即价格与工资在实践中刚性地下降,因此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它并非新凯恩斯主义所争辩的弹性之理论优势,而只是价格与名义工资弹性的经验可能性。理论上,这是凯恩斯思想要义的一种退化,它提供了一个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放的公共政策,这些经济学家声称经济政策应当放弃充分就业目标,而代之以关注让工资弹性成为现实。

### 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实践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能够通过其收入分配与就业决定的理论得到理解。根据前者,市场保证生产要素能够得其所值,因此不需要社会保障机构与工会。的确,社会保障机构能够通过干预市场过程而使社会福利降低并引起失业。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大萧条的论述,他声称萧条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错误的货币紧缩引起的。该政策的含义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应当抛弃凯恩斯主义激进的需求安排和旨在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他们应代之以透明的政策规则,作出审慎的政策抉择,从而避免政策失误,让市场解决问题。<sup>①</sup>

---

<sup>①</sup> 此外,弗里德曼以规则为基础的政策论点得到第二代芝加哥学派政治经济学论点的补充,大致意思是政治家由自利的动机所驱使,实际从事欺骗公众和侵犯其利益的活动。按照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说法,要有摆脱政治控制的独立政策机构。这个主张的问题是去除政治责任并不能去除那些控制者的私利(Palley 1997)。

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运用经常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亦即是,实用主义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决策者偏离理论。关于收入分配,新自由主义政策一直追求取消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它采取的形式又让最低工资实际价值下降,削弱工会,以及从总体上产生一个不能确保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氛围。新自由主义政策就这样使其理论得到实现,该理论坚持不需要就业保障与刚性工资,结果加大了工资与收入的不平等(Mishel et al. 2001; Palley 1998a)。对新自由主义来说,这是由于市场如今对人的回报正是按其所值。对后凯恩斯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有利于资本。

关于宏观政策,新自由主义也前后不一且机会主义,偏离了其理论说辞。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定者寻求运用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处方,即为货币供应目标而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利率调节。结果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现失业的大规模增长,并推动失业率达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全球实际利率大幅提升,重要的金融市场出现涨跌无常。这又迫使政策制定者放弃货币主义的试验,重拾以利率为基础的政策。

然而,在重拾以利率为目标和激进的凯恩斯主义稳定政策之时,政策的目标已改变。在实践中充分就业的概念被放弃,而代之以“自然失业率”(即与失业有关的非加速通胀,NAIRU,即通货膨胀率不增亦不减的失业率;参见第二十一章)。这种自然失业率是难以察觉的,也被认为由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决定。采用自然失业率的说法有两个目的。首先,它为提高平均失业率提供了政治借口,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其次,它为使实际利率处在一个更高水平提供了借口,因此有利于富人和金融部门。因此,即使为缓冲商业周期影响而反周期调整利率,利率的平均水平也会更高。类似地,财政政策也会反周期地调整以与商业周期对抗,但也都有利于富人特别是其政治利益。这在税收政策中最为明显,税收的削减必然以高收入集团为目标。

新自由主义实行的稳定政策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稳定政策是



适当的政策回应,新自由主义决策者以一种不太适合的方式加以运用。这已为新近的美国税收政策所证实。因此布什政府机会主义地利用2001年的衰退减税,但是这些削减的税负主要指向富人,因此每次行动产生不了多少经济活力,为与衰退而战要求暂时减税的基本结构仍在继续。第二,由需要求助于稳定政策可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够完备。毕竟,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市场经济被认为能自动和迅速地调整至充分就业。

把这些碎片粘合到一起,对后凯恩斯主义的挑战促成了两个层面的竞争。第一,需要向特定的新自由主义稳定政策挑战,该政策与希望相距甚远。第二,需要向新自由主义基本的概念框架挑战。这两个任务都很艰巨,既然卷入了一场关于特定政策的争论,就要冒让此争论被认为其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非根本有别之风险。

###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记录

撒切尔夫人1979年的当选与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当选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式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参见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三章)。从那时以来的25年里,新自由主义政策理念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中都有拓展式应用。比起1945—1980年,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突然放缓和收入不平等加大的时期,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Mishel et al. 2001; Weisbrot et al. 2002)。

工业化国家主要由与“美国模式”相联系的政策主导。这些政策包括减少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机构、削弱劳工工会与劳动力市场保护、缩小政府、降低最高税率、开放国际商品与资本市场,以及放弃自然失业率伪装下的充分就业。国际经济政策中居支配地位的是“华盛顿共识”,它提倡私有化、自由市场、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金融资本流动、放松对劳工市场的管制与宏观经济的紧缩政策。



华盛顿共识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方面的失败——它实际上使增长更慢——已经出现不受信任的强烈反应。人们现在广泛认识到：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倾向于不稳定；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对国内来说是不够的，可能促成全球的通货紧缩并使速度降至最低；民主与在方方面面提升社会的制度对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还需要劳动力市场保护来防止剥削。然而，虽然在反对华盛顿共识方面已取得很多进步，但在与“美国模式”抗争方面没什么进展，它才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华盛顿共识的根本源泉（参见第十二章）。

在公众争论层面，美国代表一种样板经济并与被认为僵化不灵活的欧洲经济形成对照。然而，事实却更为复杂，可以说两个模式都有短长。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长是更低的平均失业率、更高的人口就业比例与更快的生产增长（部分地由合法与非法移民所引起的人口增长所推动）。它的缺点是与欧洲模式相比，收入不平等愈演愈烈（如美国的 CEO 薪金所显示），贫困人口比例更高，生产增长更慢（直到 90 年代中期），工作时间更长以及对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底层的那一半人而言工资停滞。对快乐经济学的研究（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2）显示美国的快乐水平有下降趋势，而联合王国的快乐水平趋于稳定。这两种经济最积极地追求走新自由主义道路，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的人民更快乐（参见第十六章和第二十四章）。

美国与欧洲经济产出的差别可以用图 2.1 来说明。<sup>①</sup> 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总的失业率，而与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的微观经济政策决定收入不平等的类型。扩张的宏观政策将减少失业，而与之对立的宏观政策则会使失业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破坏增加了收入上的不平等，而维持保障则使收入不平等永久化。一个纯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布局将旨在削弱保障，因为它们是对市场的一种扭曲形式，也会放弃不必要的充分就业这个反周期政策。

---

<sup>①</sup> 这里的分析来自 Palley(1998b)。

在实践中,政策运用并非如纯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所暗示。美国追求一种扩张的、建立在大规模预算赤字和反周期利率基础之上的宏观政策,并结合以削弱社会保障的政策。结果就业相对充分,而收入分配日益恶化。与此相对照,欧洲追求的宏观政策主要是高利率与财政紧缩,同时维持其社会保障制度。结果是高失业,但收入不平等仅略有恶化。

最后,图 2.1 也可用来理解一个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所建议的政策布局。在微观层面,需要有社会机构与劳动力市场保障制度来确保一种适当的收入分配。在宏观层面,政策应当有一种扩张的倾向以保证充分就业。这个政策布局的基本理论框架是适合的,收入分配主要受社会与制度力量的影响,而充分就业需要在总需求层面作出安排。挑战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即关于劳动力和工商企业家的条款要能保证市场具有适当的激励,而企业有足够的灵活性。与此同时,宏观政策必须提供足够多的总需求,但不能产生这么多严重而不可接受的高通胀。

		宏观政策选择	
		紧缩	扩张
微观政策选择	削弱保护	纯粹的新自由主义	美国
	维持保护	欧洲	后凯恩斯主义

图 2.1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差别：美欧经济政策差别

上述关于宏观与微观的政策分析也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教训。美国与欧洲的模式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有缺点。然而在政治上,美国模式——具有较低的失业率——很难被削弱。与此同时,欧洲模式有削弱其劳动力市场和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这说明在选举中对低失业的关注超过了对收入分配与公正的关注。这样一个结论得到快乐经济学的支持,该研究报告说失业造成了非常高的快乐成本。人民关心公正,但不足以成为政治抉择。这就意味着一种成功的经济学模式必须重视失业问题,它显示欧洲大陆的宏观政策对其社会

模式造成了损害。

### 经济学话语中的政府重构

除了重塑公众关于什么是宏观与微观政策的最佳结合之理解,也需要重构公众关于政府的经济角色之理解。传统自由主义对政府经济参与的解释集中于“市场失灵”,这些失灵与垄断、自然垄断、公共产品问题及其外部性有关。<sup>①</sup>基本的思想是市场失灵导致供应失当(或许生产得过多或过少),要求政府干预——通过调节、税收和补贴,或政府对生产的全面控制——以解决该问题。

市场失灵的概念极为有力,但也产生了一个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论点,框架依据是“政府失灵”。它主张,虽然市场可能出错,但政府的补救可能更糟,因为官僚主义缺少效率和缺少市场式的刺激。

政府失灵的论点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有激进的个人主义色彩。然而,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可以行进得更远,这方面的作用还没有被足够理解。政府不仅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能够发挥作用,而且也是与教育卫生相关的必要服务的一个提供者。此外,政府在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确立商业周期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在更深意义上,政府是私人市场运作的内在构成要素,它通过一套法律系统条款支持契约的使用。没有建立契约的能力,市场经济的好处将会大大削弱。

最难理解的是政府对于防止“破坏性竞争”的作用。这种竞争与所谓囚徒困境相联系。与此一致的情形是,市场刺激引诱人们行动,而产

---

<sup>①</sup> 垄断可以来自私人行为或技术的性质。这两种情况都排除了竞争的好处。公共产品则与这样一些活动有关,如提供安全防御和街道照明。市场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因为私人生产者不可能不让人免费享用这些产品。一个人行动的外部性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影响。当个人决定行动时,并不考虑这个影响的代价与益处,而导致一种不太理想的结局。



生一种不是最佳的均衡，市场不可能产生能支持社会达到最佳均衡的刺激。该种情形也由受贿问题表现出来。贿赂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因为它使商业置于行贿而不是经济效率的基础之上。因此，社会应以避免贿赂为目标。然而，不规范的市场倾向于产生贿赂。如果一个人行贿而另一个人没有这样做，行贿者就会得益而另一个人就会受损。结果，所有人都会以行贿为刺激。听之任之，市场会因此产生一种“坏的”均衡，在其中所有人都行贿。所有人都不行贿的“好的”均衡只能依靠惩罚行贿的法律得到支持。这说明社会多么需要政府支持生产效率最佳的行为。现实世界则常常受产生破坏性竞争的情境所困扰——例如贿赂、过度的广告花费、各辖区间为吸引商业投资而进行的税收竞争，各国为吸引商业而进行的全球竞争使劳工待遇步步走低、达到低谷。所有这些情形需要政府加以干预和纠正。

### 后凯恩斯主义 vs 第三条道路：同与异

在本章结束前，有必要对前述后凯恩斯主义含义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sup>①</sup>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作一比较。第三条道路是一个想颠覆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的替代性尝试(参见第二十一章)。它寻求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道路与政府集权的计划经济道路之间阐明一条人性化的路径。因此，它与20世纪60年代的混合经济有某些共鸣，该经济主张把私人所有与国家工业结合起来。

然而，虽然第三条道路寻求把市场人性化，但它仍从根本上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因为它基本上接受新自由主义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主要理论信条。从此视角看来，第三条道路只是一

---

<sup>①</sup> 在 Arestis and Sawyer (2001)中提供了有关第三条道路经济学的研究，该理论已被那些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政府在上到处运用。

种早期市场失灵观点的更新版本，它旨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失灵观点。因此第三条道路重点强调市场失灵如何可能来自不完全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完全论点是市场失灵的又一个来源，最近 20 多年以来它得到理论上的认同。此外，第三条道路认为，政府与其通过国有企业来从事生产和冒政府失灵的风险，还不如以税收和管理作为改变私人部门行为的更可取的手段。类似地，当它涉及必不可少的服务如卫生、教育之提供时——市场对其提供不足——第三条道路乐意让政府为这些服务立约，再让私人部门来生产。

第三条道路这些革新原则上与后凯恩斯主义主张一致，但是后凯恩斯主义本质上仍不同于第三条道路，因为它拒绝新自由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的主张和存在充分就业必然趋势的论述。劳动并不会由于一个来源不明而不确定的市场过程而自动得其所值。收入分配的类型受到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影响，制度干预是需要的，因为在资本与劳动之中，市场有偏向资本的趋势。而且，资本主义经济受制于总需求的波动，会产生不必要的失业。走低的价格与工资弹性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只会使之恶化。结果就需要货币与财政政策干预来修正需求不足的问题，并切盼防止价格普遍走低和名义工资下降的制度来避免毁灭性的债务和紧缩。这些分析显示后凯恩斯主义从根本上不同于第三条道路，它们也说明这些政策分歧正是区分英国的“老”工党与“新”工党、美国的“老”民主党与“新”民主党之处。

陈刚 译

### 参 考 书 目

1. Arestis, P., and Sawyer, M. (eds) (2001) *The Economics of the Third Way: Experien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 Blanchflower, D. G. and Oswald, A. J. (2002) 'Well-being over Time in

- Britain and the US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3.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4. Mishel, L., Bernstein, J. and Schmitt, J. (2001)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2000—2001*.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5. Palley, T. I. (1999) 'General Disequilibrium Analysis with Inside Debt',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1, pp. 785 - 804.
  6. Palley, T. I. (1998a) *Plenty of Nothing: The Downsizing of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Case for Structural Keynesia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 Palley, T. I. (1998b) 'Restoring Prosperity: Why the US Model is not the Right Answer for the US or Europe',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20, pp. 337 - 54.
  8. Palley, T. I. (1997)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Deflationary Policy Bias', in H. Hagerman and A. Cohen (eds) *Advances in Monetary Theor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9. Palley, T. I. (1996)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Debt, Distribution, and the Macro-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0. Weisbrot, M., Baker, D., Kraev, E. and Chen, J. (2002) 'The Scorecard on Globalisation 1980—2000: Twenty Years of Diminished Progress', Briefing Paper,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 C.



### 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流经济学

考斯塔·拉帕维萨斯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与政策中的支配地位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后五年。其普遍特征是确信自由市场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最佳的组织机制。这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学信念,虽然它也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和社会的含义。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效率的信念是最近 30 年来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在主要大学、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还有经济部门中。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源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密切相关,哈耶克是奥地利新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参见第六章)。但是哈耶克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较小。而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在国际组织中,主流经济学理论开始从新自由主义最恶劣的暴行退却。一种新的干预主义逐渐出现,它寻求规范市场,但没有向资本主义经济是最佳组织机制的观念挑战。

因此本章主要关注新自由主义时期主流经济学两个相互关联的发展。第一是战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衰落,该学说提倡控制市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这与新自由主义形成对照(参见第二章)。尽管官方的凯恩斯主义在衰落,然而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所使用的财政与货币手段仍然保留凯恩斯主义的特点,认识到这一点

很重要。这些方法的流行常使活跃分子与新闻记者得出臆断：战后官方的凯恩斯主义复归了。在最近几年这个误解已被特别指出，这时新自由主义争论已边缘化，一种新的干预主义逐渐出现于主流经济学。如下文所示，这种新干预主义没有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激进，它并不代表与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决裂。

新干预主义引出主流经济学的第二个主要发展，即逐渐把信息、制度和社会习俗结合进微观经济分析。它为实现自由市场最佳产出而对其出现的偶然甚或制度性缺陷作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视域。主流经济学很快同意自由市场由于一些原因也会出现功能障碍，包括市场参与者中的信息不对称、社会机构的不良管理，甚至还有社会信用的缺失。这个发展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因为它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并提供政府政策改善信息流，创造或修正制度，或促进社会习俗让市场运作得更好。然而，新的经济干预并不向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挑战。

下一节将从这个视角简要思考战后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从现在的视角看来，该发展等于是老调重弹，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实质上能免于危机。接下来一节将转向考察关于信息、制度与习俗的新经济学，指出它并未提供一个有关资本主义的有效的理论批评。最后一节作简要概括。

## 凯恩斯主义的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国际资本主义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衰退中拯救出来。战争恢复了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脏地带美国的生产规模、就业、生产率与利润。马歇尔计划及与之相联系的对欧洲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进攻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复兴这个满目疮痍的大陆创造了合适的条件。充足的劳动力供应、连续不断的技术进步与逐渐出

现的大众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经济繁荣。该繁荣依赖美国的霸权,它通过国际机构来发挥作用,如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正如压迫和不公依然存在一样,过度贫穷和不平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未消失。但是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美国与西欧大多数劳动人民能够指望有稳定的工作与实际工资的增长。

这时,对此奇迹的赞扬纷至沓来,而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位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支配地位得以确定。凯恩斯在他写于 30 年代大衰退中期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抨击流行的正统经济学,他指的是古典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他自己的老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批评特别切中要害,因为大衰退显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四伏。第二,凯恩斯是一位主流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在政界左右逢源。凯恩斯的书从三个基本方面颠覆了主流经济学。

首先,凯恩斯(Keynes 1936, pp. 18 - 21)拒绝萨伊定律,这是正统经济学的基本信条之一。萨伊定律主张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与供给趋于平衡。这个主张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情境中变得清晰起来。在这样的危机过程中,商品不能卖出,工人失业,也就是说,该时期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因此萨伊定律实质上是说,资本主义不可能有长期和自发的危机。与之相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总需求常常会下降而小于总供给。对凯恩斯来说,总需求的系统缺陷意味着自由市场无法出清,因此造成大规模的失业。

第二点与第一点密切相关,凯恩斯拒绝货币数量理论。这个理论从 18 世纪以来就存在,它主张价格水平从根本上由货币的数量所决定。因此在任何时期,价格经常上涨的大致原因是货币供应的扩张。凯恩斯抛弃货币数量理论并不奇怪,因为他已经拒绝了萨伊定律。如果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可能出现大量的未售出商品与失业工人,如对萨伊定律的批评所示,那么随之而来必然有一些资本家有待售商品而没



有后续的钱用于别的商品。这些资本家囤积货币，从而套牢了购买力，使其无法达到能减少未售商品储备与失业工人有效需求的水平。为了说明这个现象，凯恩斯(Keynes 1936, ch. 15)发展了流动性偏好(如资本家或其他人的货币储备)的理论。

第三，对凯恩斯来说，经济活动发生于不可逆的历史过程之中，因此经济人形成并受制于对未来的预期。但是预期的形成从来就不完全是理性的，而总是掺杂了心理的冲动。而且，经济人必然也形成别人会预期什么、以及他人对别人预期内容的预期。对于作出经济抉择而言，存在一个不可化简的心理成分，这对凯恩斯拒绝正统的经济思想来说至关重要。

凯恩斯对正统理论的攻击将他置于经济学的“异端”与“激进派”阵营。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提并论的新宏观经济学。假如资本主义经济特点可概括为总需求的不足，那么凯恩斯就为政府经常的经济干预赋予了合法性。从增加总需求和减少失业的观点来看，政府手段如增加公共开支、减税与降低利率突然在理论上变成正当的了。然而，必须看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并不以一种价值理论为基础，这使它有别于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理论。凯恩斯的同样问题是未能以足够的深度重新认识资本家与工人在经济上的相互作用。他的宏观经济学以主观的价值理论为基础，同时大部分接受了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这是凯恩斯对经济学正统理论批评的一个主要缺点，它使古典主义理论最终赢得了时间，并且消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激进成分。<sup>①</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长期繁荣时期，政府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发挥越来越直接的作用(参见第十六章)。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稳步增长，许多生产能力(特别是公用事业)来自公有制

---

<sup>①</sup> 在此方面，凯恩斯与马克思形成鲜明对照。马克思也拒绝萨伊定律与货币数量理论。马克思经济分析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与劳资关系的剥削本质，他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挑战比凯恩斯的挑战更为持久(Itoh and Lapavistas, 1999, ch. 2, p. 6)。

企业。而且,大量福利设施得以兴建,涵盖了卫生、失业救济、教育和住房等领域。理论上被凯恩斯赋予合法性的政府经济干预最终可能要面对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分化的趋势。显然,政府干预限制了私营资本主义的泛滥,消除了失业并为所有的人提供了福利。凯恩斯主义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名词,这正是令战后最初 10 年的混合经济沾沾自喜的观点。

这个思想体系在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综合”中找到学术支持,该综合作为一个理论建构逐渐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美国、英国的主要大学的经济系。学院派经济学家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更为激进的成分削弱至面目全非。对于“新古典主义综合”来说,大规模的失业只有在工资刚性下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干预并维持总需求。概括这个思想的是菲利普斯曲线,这是一个肤浅的概念,假设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声称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菜单。60 年代所有的大学图书馆充满集中关注“新古典主义综合”的华而不实论点的学术著作,事后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当代主流经济学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些理论著作,甚至对它们不屑一顾。然而记住战后官方凯恩斯主义的高层领导者像当前这批学院理论家一样傲慢,对自己的经济学有效性同样自信,是很有益处的。

官方凯恩斯主义被紧随 1973—1974 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而来的危机摧毁。高失业与高通胀的长期并存并不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的”经济干预之影响。更糟的是,公共支出的增加导致政府的长期赤字,使全球危机趋于恶化。70 年代中期利润系统崩溃,价格体系在几个发达国家由于迅速而持久的通货膨胀而严重瓦解。维持了战后繁荣的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中尤以布雷顿森林协定为甚,它于 1971 年暂时中止,最终于 1973 年崩溃。

新自由主义作为政府对 70 年代后五年的经济灾难的反应而悄然兴起。就经济政策而言,它基本的和长期的构成是放弃旨在实现充分



就业的政府干预。失业开始被视为重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必要代价。必然与此变化相伴随的是对劳工组织的大量批评,其中尤以撒切尔政府领导下的英国为甚。劳动力市场弹性(换言之,强行削减实际工资,创造大规模失业以及支持临时工市场的发展)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健康标志。福利供给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政府开始放弃生产资料所有权,最引人注目的是公用事业的私有化。在接下来的年份,官方意识形态增加了对自由市场好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政府干预会错误配置经济资源的宣传。

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对凯恩斯主义的指责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为首,该理论是货币数量理论<sup>①</sup>的翻版。通货膨胀,这个70年代关键的经济问题被弗里德曼当做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它来自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组合之中作出选择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自然失业率”,任何企图让实际的失业率低于这个“自然失业率”的尝试都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如果政府希望减少通货膨胀,它们就必须依靠货币数量理论的古老药方,也就是说,它们必须限制货币供应的增长。这个思想被80年代的英国撒切尔政府与美国里根政府欣然采纳,旨在限制70年代后期的高速通货膨胀。

时隔不久,货币数量理论在实践中就显示出其实质上的空洞无物。80年代的前五年,货币供给与价格上涨之间的经验关系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变得难以捉摸,使人们对货币主义关于货币数量以一种可以预见的方式影响价格的观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英国和美国政府实际上都未能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从而使情况更糟。但是货币主义政策使经济危机恶化,并使失业者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加。通货膨胀率最终下降了,但只是由于不能承受消费与投资方

---

<sup>①</sup> 弗里德曼内容广博的著作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享有盛誉,但在今天,读者已经很少了。本章所涉概要之主要论述见Friedman(1956,1970)。



面的经济萧条之重。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 80 年代中期步入歧途,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逐渐由“新古典经济学”居支配地位,后者主要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有关(参见 Lucas 1972,1973)。卢卡斯关于宏观经济学的论述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影响广泛而深远,因为它毕竟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市场出清属性。卢卡斯实际上复活了萨伊定律,他声称长期过度供给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存在失业,那也是政府政策本身的结果,例如,坚持错误地让总产量高于那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参与者的自由经济选择所认可的水平。对政府政策来说,它的含意深远:既然经济本质上会自我均衡,在它运行过程中政府应当力戒干预。卢卡斯的信息清晰无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给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政府的宏观经济干预一无是处——它实际上只会适得其反。

然而,尽管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这些理论观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宏观经济干预的实践。相反,无论经济危机何时出现(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是规律性的),政府都会组合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亦即通过减税、增加公共支出和降低利率来抵消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干预实质上以凯恩斯主义为工具,尽管官方仍坚持新自由主义,在此方面最明显的是日本。在 90 年代,一系列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被用于对付持久的衰退。甚至美国这个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也经常使用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付萧条的幽灵,在 1998—2000 年的股票市场泡沫之后尤为明显。

因此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宏观经济干预的实践仍非常活跃。而且,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直相当可观。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抨击政府干预的理论浪潮迭起,但仍不应遮蔽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政府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主导力量。但是一去不返的是这样的观念——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特点——经济干预应以实现充分就业与确保社会福利为目标。

宏观经济干预在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一直具有重要地位,这意味着政府常常需要经济方面的建议,来决定如何进行干预。在此方面,新自由主义时代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攻击是给资本主义政府帮倒忙,因为它们不能取代战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行为的指导作用。最近几年,主流经济学依靠信息传播分析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作用分析之理论开始填补这一裂隙。不过,对自由市场的有益性这一新自由主义基本信念,并无根本性的突破。

### 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当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扎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与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所发展的一般均衡的思想基础之上(参见 Arrow and Hahn 1971)。一般均衡论的分析以“理性个人”为轴心,这是一个想象的创造,该理性个人专注于个人利益而不考虑其他,没有利他意识,并长于计算为实现自身预期目的而必需的手段,但是从不使用权力和暴力(参见第五章)。经济活动的自然之域被设定为市场,个人把商品带到市场上与其他人的商品相交换。再作进一步的(极不现实的)假设,所有人都得到充分的信息、完善的市场安排、一般的定价以及没有“外部性”(例如,没有出乎意料的市场决策结果),一般均衡论的分析由此推出:自由市场交换取得了经济效率。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居支配地位的那些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出现了重要的发展。这些发展的动机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广泛存在的经济现象与制度所提供,靠一般均衡的理论并不能很容易地说明。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是钱的存在本身。钱是一种好东西,但它既不能直接消费也不能用于生产。对“理性个人”而言,长期将没有实际用处的货币而不是商品作为财富的一部分持有显得不合逻辑。钱可充当交换媒介并不能解释上述问题,因为如果“理性个人”是信息充分的出价者,在一个



完善的市场上运作,如一般均衡论所主张的那样,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没有理由使用交换媒介。他们可能代之以先行计划一系列直接的商品交换,以避免对消费或生产无益的持币需求。简言之,对纯粹的一般均衡而言,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既没有逻辑上的位置也没有一点实际作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在把资本主义——历来最发达的货币社会——当做一个直接交换或以物易物的社会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稀奇古怪的立场。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对付令人棘手的理论难题用力甚多,例如货币所引起的难题,还有银行、不同的劳工运动与市场失范等。市场参与者具有充分信息的假设颇受欢迎。经济学家失望地代之以假设资本主义市场的特点是参与者中信息分布的不对称。资本主义经济仍然由理性和自私的个人所构成,但是他们被假设拥有不同量的信息,涉及商品的使用、劳动生产率、投资计划的性质,等等。问题是,如果两个信息不对称的个人进入经济中公平交换,信息更灵的人就能够占对方的便宜,从而得到不合理的较大份额的好处。凭直觉从形式上可察觉,在这样的条件下,假定的自由市场效率就会消失。信息不对称意味着自由市场贸易是没有效率的,这样一个结果理论上可用于解释多种经济现象。<sup>①</sup>

主流经济学中信息理论分析的繁荣也伴随着对流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与规范的强调。该主张的先驱之一,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强调,经济制度是那些能够形成“理性个人”选择的社会习俗(参见North 1981,1990,1999)。在诺斯看来,开放市场的经济交易总是要花费参与者的成本。这类成本对那些想促成它的人来说不同于为了达成协议(签订一份契约)而耗费的成本。与市场相关的制度决定了成本的高低。结果,制度的实行影响经济参与者所作出的决定,从而

---

<sup>①</sup> 例如,参见 Akerlof (1970)、Spence (1973)、Stiglitz (1974)、Grossman and Stiglitz (1980)、Stiglitz (1994)。



影响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自然地,对经济活动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机构是政府,它总是在一种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中运作。与此方向相近,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也非常关注商品交换的交易成本,强调制度对于减少这些成本从而提高市场效率的作用。对威廉姆森来说,经济制度由官僚制度定义并且可以直接决定其他制度;制度的这些特点改进了资源配置并减少了交易成本(参见 Williamson 1975,1985)。

主流经济学对制度与交易成本的强调伴随着把社会规范与习俗结合进经济分析这样一种宽泛化的变化。微观经济学惯于认为经济动力与冲动只来自“理性个人”(无感情地计算成本与收益)。然而,80年代和90年代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承认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也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来自社会影响的实践与刺激(如社会礼仪或性行为)超越了狭隘的经济范围。例如,关于“工作”的社会规范,工人中的流行观念是“工作”是“好”的,而失业是“坏”的,这些能够对劳动力市场上年轻工人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学家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声称,在“工作”的规范和因福利施舍所产生的“懒惰”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它能够影响到个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策。<sup>①</sup>

自70年代早期开始的微观经济学的逐渐变化有助于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它常与对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见解的批评相联系。例如,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市场无效运行,甚至崩溃。与之相联系的是需要有合适的制度来支持市场并防止它们崩溃。一道祥瑞的光芒再次照亮政府的经济干预,提供这样的干预对市场是“有利的”,并且旨在消除它们的不完善。

既然失业可以被视为源自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能够为这种干预提供例证,那么政府干预也许是必要的,可以改进信息流以及就业合同的签署与实施,或许还可以保证更高的就业水平。可以给

---

<sup>①</sup> 关于不同市场运行的社会规范意义之例证,请参见 Akerlof(1984)。

出的另一个例子是金融市场,它在面临信息不对称(缺少透明度)时可能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因此政府应在金融领域进行干预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只要它的干预能够改进信息和消除不完善。广而言之,为了提高经济效率,社会规范可给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支持,例如诚实与值得信赖,它们能够通过社会政策得到实施与加强。一种新的干预主义逐渐并难以察觉地出现于主流经济学中,它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方面,并提倡对市场有利的政府行为,以减少市场的不完善。

新干预主义潮流的领军人物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总统与一些国际机构的顾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斯蒂格利茨的影响与90年代相联系,特别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直到70年代初,理论思考仍主要是政府干预值得向往与需要有意识地对发展过程作出安排。此后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崛起,所谓华盛顿共识成为主导性的发展思想,特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其他国际组织(参见第十二章及 Fine et al. 2001)。华盛顿共识是一套新自由主义思想,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包括对穷人的资助),放松对国内市场的管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经济向外国商业与金融开放。整个80年代与90年代人均收入与经济增长非常令人失望,这一点都不奇怪。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在发展中世界经常发生。自90年代初以来,斯蒂格利茨依靠信息理论分析与提倡对市场作有限控制的政府干预,领导了对华盛顿共识的持续抨击。

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抨击很自然地吸引了那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人,特别在发展中世界。因此,认识到斯蒂格利茨的激进主义远没有凯恩斯主义意义深远是很重要的。尽管他有对自由市场的批评,但斯蒂格利茨与当代主流的新古典主义没有根本的理论分歧。他很少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因其内在的不稳定性,而很容易产生失业与危机。相反,对斯蒂格利茨来说,如果市场能够像纯粹经济理论所规定的那样运行,那么资本主义将的确可能是最有效的制度。然而不幸的是,市场由于信息的原因而不完善,它妨碍市场完美运行。结果,斯蒂格利



茨的实质信息是，政府干预应当解决市场的不完善，以准确地改进市场的运行。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斯蒂格利茨的替代思想都认为市场在配置资源和使经济组织化方面理所当然地优于所有其他社会组织。显而易见，两者的共同基础就是新微观经济学的论述已被融入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建议与分析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声明从90年代以来就常常提及需要改进信息流、增加透明度、抑制腐败与创造一种社会氛围，让市场在其中能够运行得更好。与此同时，国际组织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硬核仍然没有改变。

### 代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联

新自由主义统治的那些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太有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而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特权与影响，包括在学院中。要解释这种边缘化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它出现于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多发时期，但是工人运动影响的消失与苏联的崩溃无疑对之有促进。尽管影响消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是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替换方案，特别那些有关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自由市场缺乏效率。要对付有关自由市场的不太周密的辩护与自由市场斗士理论上的夸夸其谈，不算困难。甚至指出在世界各地，特别在发展中国家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给穷人与弱者带来灾难性后果也并不太难。

本章已指出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的巅峰已过。甚至有批评来自主流经济学内部，这些批评主要集中于信息、制度与社会规范，这些都动摇了资本主义市场最优的简单理论观点。一种的新的干预主义在主流经济学理论内部崛起，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个复杂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引以为自豪的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赖以运行的社会



结构,并认为制度、信息与社会规范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极其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压迫性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规范深受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之影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不可能离开剥削、压迫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参见第五章)。这些也适用于资本主义政府的经济干预,该政府在阶级利益与冲突方面从来就不是清白无辜的。

主流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已成功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缺陷,同时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方面。但是即使最激进的批评者一般也避免承认资产阶级分化与权力的含义。的确,他们退缩到在理论分析中只提及社会阶层,他们已经不能够对那些正在从事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人提供有效支持。这个任务继续落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肩上。

陈刚 译

### 参 考 书 目

1. Akerlof, G.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pp. 488-500.
2. Akerlof, G. (1984) *An Economic Theorist's Book of Ta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Arrow, K. and Hahn, F. (1971)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4. Fine, B., Lapavistas, C. and Pincus, J. (eds) (2001)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5. Friedman, M. (1956)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 Restatement', in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Friedman, M. (1970)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Monetary Theory*. IEA

- Occasional Paper 33,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7. Grossman, S. and Stiglitz, J. (1980)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pp. 393 - 408.
  8. Itoh M. and Lapavitsas C. (1999)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and Finance*. London; Macmillan.
  9. Keynes, J. M. 1936(1937)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0. Lucas, R.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 pp. 103 - 24.
  11. Lucas, R. (1973)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3), pp. 326 - 34.
  12.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3.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North, D. C. (1999)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5. 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pp. 355 - 74.
  16. Stiglitz, J. (1974) 'Incentives and Risk Sharing in Sharecropp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pp. 219 - 55.
  17. Stiglitz, J. (1994)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ial Market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pp. 19 - 52.
  18. Williamson, O.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 Williamson, O.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 第四章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安沃·塞克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巨额财富同时又有大面积贫困的世界里。最富有的国家人均 GDP 已超过 30 000 美元,而最贫穷的国家还不足 1 000 美元。甚至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低标准也会被高估,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巨大不平等意味着穷人生活水平远低于平均数。超过 12 亿人(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被迫生活在每天一美元标准之下。除中国之外,过去 10 年的迅速全球化是与贫困与饥饿的增加联系在一起。这个时期有 1 300 多万儿童死于腹泻。目前,每年有 50 多万妇女死于妊娠与分娩。有超过 8 亿的人苦于营养不良(参见第十五章与 UNDP 2003, pp. 5 - 8, 40)。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为地球上所有的人提供适当的粮食、医疗和住所。

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回答简单得令人惊异:无限制的全球贸易。这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全球化的主宰。它的实践得到一套基于标准经



济学理论的论述之辩护。市场被说成是最优的可以自我调适的社会结构。它声称如果允许市场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运行,它就会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的经济需要,以及有效地使用所有经济资源,并自动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产生充分的就业。就范围而言,市场的全球化将会是把这些好处带到整个世界的最佳方式。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迈克·穆尔(Mike Moore)的话说,“帮助[世界上]穷人的最有效方式是继续开放市场”(引自 Agosin and Tussie 1993, p. 9)。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条公理。

从此观点看来,现代世界的我们之所有拥有贫困、失业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乃是因为市场受到工会、政府与许多植根于历史与文化的社会实践的限制。对历史的这种解读不仅意味着将其用于说明世界上那些穷国的情况,而且也适用于那些富裕国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成功的全球化需要在全世界创造“对市场友好”的社会结构,通过削弱工会的力量使雇主能够雇佣和开除他们所选中的人;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从而使它们的工人受国内资本权力的支配;以及向外国资本和商品开放国内市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第二条公理。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直受到行动者、决策者与研究者的反对。不过,该概念仍具有巨大的权威。它在社会科学领域,在公众的思想中以及在决策圈仍有重大的影响。事实是,那些支持这些行动事项的强国与机构成功地扩展了对市场的统治。同样还有一个事实是,巨大的贫困与深刻的不平等在世界各地继续存在,危机也在继续爆发。

### 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依据的自由贸易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依据以正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为基础,其中心论点是竞争性的自由贸易会自动有益于所有国家(参见第十章)。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指出的,这是(标准)经济学理论的一

个“神圣信条”(Krugman 1987, p. 131)。要评价其意义,请思考下面的对话。批评家指出,今天的世界与标准自由贸易理论所设想的竞争情况大不相同。他们提醒我们,虽然富裕国家现在鼓吹自由贸易,但它们在爬上发展的台阶之时,自己却大搞贸易保护与国家干预。他们指出,甚至现在,富裕国家仍常常不遵循它们自己的说教(Agosin and Tussie 1993, p. 25; Rodrik 2001, p. 11; Chang 2002; Stiglitz 2002)。

新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对此指责准备了一个回答。他们说,真正的竞争条件在过去并没有出现,所以过去并不是一个有益的指导。然而,在国际机构的帮助下竞争可以遍布全球。在那时,自由贸易就会像所承诺的那样发挥作用。因此消除对市场的限制是必要的,特别在发展中世界(Bhagwati 2002, lecture 1)。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结论。

争辩以此方式集中于如何接近以及以什么样的社会代价使现实的市场能被打造成充分竞争的市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而言,市场从不以教科书的方式起作用,因为权力统治现代世界:垄断权力、阶级权力、国家权力与中心高于边缘的权力(McCartney 2004)。试图将一套竞争模式强加给现实社会不会成功,只会导致广泛的“连带损害”。对那些捍卫者而言,假定的市场长期收益能证实短期的过渡代价为正当。如果这些代价是其他因素引起的,那就更是如此。其极端形式曾被它的倡导者称之为“休克疗法”,据说通过对那些有碍的制度与实践进行一场全方位的进攻是最好的方式。

这场争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双方都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亦即是,在假设的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将会如约而行。本章指出这个论断是错误的,即使在它自己的基础上。造成发展与不发展、富有与贫穷、就业与失业的并非缺少竞争,而是竞争本身。

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以与国内竞争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它有利于(竞争的)强者而不利于弱者。由此观点看来,与全球化相伴随的损害可想而知。这也告诉我们发达国家应认识到,它们当初踏上发展之路时,不受限制的国际竞争对它们的发展计划构成了威胁。



它们如今强烈否定的，正是当时它们相信的。也就是说，市场的最大力量被最充分地发挥之日，正是其对更为广泛的社会事务造成损害之时。

## 标准自由贸易理论的逻辑

教科书关于自由贸易理论的介绍，一开始就有意误导，要求我们把两个国家当成自由从事以物易物活动的个人。我们被告知，这样的个人只有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够得到其他东西，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收获的话。如果他们的期望是适当的，每个人将确实有所获。因此自由贸易将对所有的参加者有利，其他一切都是细枝末节。

但是像任何魔术伎俩一样，它包含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误导。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从事对外贸易乃是做生意。国内的出口商将商品出售给外国的进口商，后者再卖给他们的居民，而国内的进口商则从外国的出口商那里购物并卖给我们。在这个链条中的每一步，作出商业选择的动机都是利润。国际贸易理论实际上是一套类似竞争的理论。为了使标准的自由贸易理论表现得真理在握，因此有必要显示国际竞争有益无害。这是标准自由贸易理论的现实信心所在，也是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要对之作出全面强调的只有高级教科书<sup>①</sup>。怀疑则来自别处。

要使这个故事看起来像真的，必须具备几个条件。首先，如果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都会导致进出口的平衡，那么该贸易就必须能够促使相关的价格变动获得均衡。可以设想一个国家积累了一些贸易赤字。这就意味着其通过出口卖到国外的商品价值少于其通过进口在国

---

<sup>①</sup> 中型教科书有时掩盖了国家如个人的虚构故事与阐释国际竞争的实际法则之间的鸿沟，而代之以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标准命题。据说，“国家”应当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从事贸易，因为各国都会从贸易中获利。这就像说国家不应从事帝国主义、战争或掠夺活动一样。这作为一种理想也许是值得嘉许的，但它却不太能够解释实际结果(Magee 1998, pp. xiv, 19)。



内售出的商品价值。由于这种不平衡将会被自动修正,出口给外国人的东西必须更加便宜,然后才可以设想他们会买得更多;进口给国内买者的东西也将更加昂贵,这样他们才会买得更少。其次,这些相关的价格变动必须能够有效地减少贸易赤字。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提高相对于这些进口商品的出口商品之货币价值。这样的对立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假定出口价格下跌了(比如说)10个百分点,外国人对这些商品多买了5个百分点。那么出口商品总的货币价值仍旧是跌大于升,因为价格的下降大于销量的增长。因此该标准理论还需要设想卖出的数量能够对价格有充分的敏感。<sup>①</sup> 用国际贸易理论的语言,第一个必要条件是一国的贸易条件(相对于进口价格的出口价格,用国际通货来计算)在出现贸易赤字时将会自动下降,而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该下降将会有效地消除贸易赤字。把它们结合起来,这两个假定将保证贸易赤字,还有贸易盈余,将会自我修正。于是,尽管发展水平有别,每个国家在资源方面,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以及其他任何方面都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有自己的位置。换言之,自由贸易将保证每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不再遭受竞争(Arndt and Richardson 1987, p. 12)。

要使这个故事起作用,前面的假设是必要的,但还不充分。我们还需要设想其在就业方面的含义。国家因贸易的影响也许会在某些部门失去就业机会而在另一些部门又得到一些。一些公司会繁荣,而另外一些则可能不再存在。所有这些都不排除这些就业机会有可能花落他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标准理论包含这个问题,即设想竞争的市场会为所有想工作的人自动提供就业机会。它要使贸易理论得以继续,就得保证国际调整不会导致任何工作机会的丢失,因为那些失去

---

<sup>①</sup> 最后一点是以“弹性条件”而为人所知的。贸易平衡被表述为出口价值与进口价值之比。如果出口少于进口,该国就会有贸易赤字。出口价格下降导致出口量的增长,这并不能保证出口价值的增加。类似地,进口价格的上升也许会减少进口商品的数量,但是并不能保证进口价值的下降。因此即使贸易条件按既定方式改变,贸易平衡也未必能实现,除非在数量上有足够的回应(弹性)。要使上述结果发生,必须具备弹性条件。

一份工作的人将被假定会找到另一份工作。这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支点。

概言之，标准贸易理论依据三个命题。首先，一个国家的任何贸易赤字都将促使其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其进口价格而下降，即贸易条件的下降。第二，这样一种下降将会提升出口物相对于进口物的货币价值，即将促进贸易平衡。这就需要出口相对于进口的比例的提高大于出口相对于进口的价格下跌，也就是说，要有适当的弹性。第三，一旦这个问题被解决，就不会有任何国家遭受由国际贸易引发的大规模失业。这三个论点构成了比较成本优势的新古典理论。它们总的意思是国家一直从国际贸易中得益。

在比较成本优势与比较要素优势之间作出区分是很重要的。两者常被混淆，虽然它们概念有别。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意指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将建立与两国充分就业密切联系的平衡贸易。即使其中一国在贸易开始时拥有绝对低的成本，因而能够获得一种原始的贸易顺差，比较成本理论仍然说自由贸易将会自动消除这种原初的优势。为理解它的涵义，可设想贸易开始时我们对顺差国的所有企业根据它们的绝对成本优于它们的外国竞争者的程度来进行排列。然后，由于自由贸易自动消除贸易顺差，具有最小的原初绝对优势的企业将第一个失去其成本优势（我们将直接回到该理论所提出的机制）。这将在幸存者那里重复发生，直到红字的记录多到让原初贸易顺差完全消失。最后的幸存者将是那些在链条顶端的企业，例如，那些具有最大的原初“比较”成本优势的企业。显然，对那些因在贸易中处于原初绝对劣势而一开始就有贸易赤字的国家来说，相反的情况将得到抑制。这里，最有利的将是那些在原初比较成本方面具有最小劣势的企业。

比较要素优势理论假设比较成本优势能调节贸易，寻求解释某一特定国家处于比较成本优势链条顶端的特殊企业。基本的回答是，其产品来自成本低廉地区的大多数企业将会得到好处。而一地的低成本又可由相关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之相对丰富得到解释。



因此如果一些国家的土地相对丰富,那么根据要素优势理论,土地密集型产业如农业在国际贸易中将最可能拥有比较成本优势。<sup>①</sup>

### 乐土的烦恼

我们已看到标准贸易理论断言市场过程将会自动消除贸易的不平衡,而维持全面充分的就业。于是国际贸易提供了通往更廉价和(或)更令人向往的商品之通道而不伤害任何人。一切都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东西,如果国家只允许市场按其魔法起作用的话。

这个故事的第一个难题是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这一切。贸易不平衡并未自动消除,发展中世界没有,甚至在发达世界也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在固定汇率制下没有,在浮动汇率制下也没有(Harvey 1996)。恰恰相反,持续失衡绝对是司空见惯。例如,美国拥有贸易赤字已近30年,而日本享有贸易顺差近40年。对于充分就业是竞争性市场的一个自然结果之主张,也有一个类似问题。正是在过去10年里,甚至发达国家也经受失业率从3%到25%的变化。当然,情况更糟的是,在不发达世界目前约有13亿人失业或未就业(ILO 2001),其中许多人可能一辈子就业的希望渺茫。非常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并不会自动趋向充分就业,即使在发达世界。这很早就是凯恩斯主义与卡莱茨基主义分析的基础(参见第二章和第三章)。

第二个难题是标准贸易理论在论述竞争时在理论上会产生完全的逆转。当经济学家讨论一国内部的竞争时,他们很清楚它有利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如果两批公司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那些成本较低的

---

<sup>①</sup> 新古典主义对此问题的看法形成于赫-俄模型(HOS)。这个模型提出了进一步的命题,即国际商品贸易,不需要有直接的劳动力与资本流,将使各国的实际工资与利润率趋于均衡。众所周知,这是HOS的“要素价格均衡化理论”(Magee 1980, ch. 2)。



公司将会击败成本较高的公司。前者的势力范围将扩张，而后者将缩小。经济学家将这个成果作为竞争的美德，因为它战胜了弱者的公司。同样的理由可用于一国内的两个地区。一个具有较低生产成本的地区能够在高成本的地区卖出它的很多产品，而不需要在那里买很多。因此低成本地区将享有地区贸易顺差，而高成本的地区将苦于地区贸易赤字。正统的经济学家发现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假定那些在较弱地区失去工作的人在较强的地区会找到新的工作。

然而，当同样一些经济学家讨论国家之间的竞争即国际贸易时，他们会放弃以前的理论而代之以一种不同的说法。一国内部的竞争被说成是惩罚弱者而奖励强者，国家之间的竞争则被说成是扶持弱者而削弱强者。这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圣经中的景象而加以吁求，只是有些缺少描述的价值。那么，其名堂在哪里呢？

### 国际规模的实际竞争

一旦人们认识到实际国际竞争以国家竞争同样的方式起作用，则国际贸易理论不再神秘：它有利于竞争的强者而不利于竞争的弱者 (Shaikh 1980, 1996; Milberg 1993, 1994)。

让我们稍花些时间回到一国内部两个地区之间竞争的情形。我们发现所有的学派都认为它将产生如下结果：具有低成本生产者的地区倾向于享有贸易顺差，而高成本地区倾向于遭受地区贸易赤字。所有的学派都赞成，国际贸易开始时，在两个国家竞争的情况下会有与前面类似的结果。原初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将倾向于享有贸易顺差，而另一国则会有贸易赤字。而且，各方都承认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将是国际资金的净流入者，因为它卖到国外的比它买的多。贸易赤字国家则会遭受资金的流失。

正是在这一点上标准贸易理论与实际竞争理论之间出现了一个关

键的背离。标准贸易理论说在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如果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资金流入的结果会提升该国总体价格水平。这意味着出口价格也会提高。相反,如果政府让汇率回应市场的压力,标准理论说资金流会提升汇率,这会使出口给外国人的商品更加昂贵。在贸易赤字国家则发生相反的变动。于是顺差国家会发现,它的出口价格在外国市场涨了,它的进口价格在国内市场跌了,都是由于实际汇率(根据价格水平修正的名义汇率)而出现的自发运动。<sup>①</sup>换句话说,顺差国家的贸易条件将会自动提升,而赤字国家则会自动下降。这是比较成本理论基本的假设。

比较成本理论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一旦国家从事国际贸易,其相关商品价格就不再由其相关生产成本所决定。在贸易开始时,各国的竞争所产生的相对价格由相对成本所规定。因此,作为国际相对价格的贸易条件最初也是由进出口商品的相对成本所规定。但是比较成本理论要求贸易条件随后以平衡贸易的方式变动。可以说它们可能不再由相对成本规定。它们不可能服务于两个主人(Shaikh 1980, 1996)。

实际竞争理论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竞争促使价格从而贸易条件一直受相对实际成本的制约。在一个享有原初贸易顺差的国家,作为结果而发生的资金流将会使贷款额增长,也会使利率走低。相反,在开始就有贸易赤字的国家,资金流将紧缩信贷,而使利率提升。随着利率

---

<sup>①</sup> 请看下面的例子。日本在国际贸易开始时就有顺差,出口平均价格为 1 000 日元,进口平均价格为 2 000 日元(在 1 美元=100 日元的汇率下,每单位商品的进口价格为 20 美元)。因此最初的进出口比价是  $1\ 000/2\ 000=1/2$ 。根据标准理论,如果该汇率是固定的,日本的贸易顺差将会在日本引起通货膨胀,美国的贸易赤字将会在美国引起通货紧缩。因此日本出口价格将会提高到 1 200 日元,而美国的出口价格,也是日本的进口价格,将会跌落到 16 美元(在固定汇率下,单价为 1 600 日元)。或者,如果汇率是浮动的,它可以提升至 1 日元=0.015 美元。这并不影响日本出口物的国内价格(1 000 日元),但却把从美国进口物的价格提高到 1 333 日元(20 美元/0.015)。在任一情况下,日本的贸易条件都将从  $1/2$  提升到  $1\ 200/1\ 600=1\ 000/1\ 333=3/4$ 。日本原初的竞争优势因此会自动减少,美国原初的竞争劣势也会减少。



在顺差国家的走低与在赤字国家的提升，逐利的资本将会从前者流向后。因此顺差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成为净贷方，而赤字国家则是净借方。它最终以资本流动来补偿，而不是消除贸易失衡。贸易失衡仍将继续，特别是赤字国家将成为国际负债者。这是一幅人们很熟悉的历史画面。

因此实际竞争理论表明，国际贸易将有利于那些能够以最低的实际成本生产的国家。实际成本又依赖于三个要素：实际工资、技术发展水平与自然资源。实际工资高将提高成本，但高水平的技术与易得的自然资源能降低成本。

富裕国家有高水平的技术，也常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有很高的实际工资。穷国总的来说技术水平低，有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很低的实际工资。国际竞争，例如自由贸易将会使两种不同的格局产生冲突。每个国家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将会有所收获，而那些处于不利位置的将会受损。工作岗位会在扩张的部门产生，在收缩的部门则会消失。

在此情况下，穷国将会被迫进入这样一些部门，在其中它们的低工资足以补偿它们的低技术水平，它们的自然资源，如果有的话，能够给它们充分的成本优势。相反，富裕国家将会在高技术部门以及某些自然资源方面拥有优势。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国际劳动分工。首先，实际竞争中并没有什么能保证任何国家的贸易都会实现平衡。的确，个别国家完全有可能没几个部门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因而只有很有限的出口。长期贸易赤字（出口少于进口）的国家将被迫减少它们的储备资产，依赖对外借贷（外国资本流入）来填补这些赤字。这样的情况常常导致通货危机与经济破产。其次，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增加的工作机会能与减少的工作机会相抵。所以完全有可能某些国家就业情况比以前更糟。第三，甚至穷国的低工资优势也会逐渐削弱，除非它们的技术水平迅速提升，或者它们的实际工资提升速度低于那些富国。推



动力中至关重要的变量是技术进步之差异：如果富国以更快的速度提升，那么穷国也必须扩大工资差距，才能维持其拥有的成本优势。这又恰与发展相悖。在自由贸易中还没有什么能保证穷国的技术能发展得足够快。最后，贫穷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对外国资本有很强的吸引力，后者的先进技术使它们能够充分地利用低工资。它们可能会改变运作方式，从而使富裕国家的工人失去一些工作机会；或者它们会创立新的企业。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们都会消除当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解雇许多工人。外资在此过程中一定会赢利，但它们创造的工作机会并没有超过其剥夺的工作机会。无论从哪方面看，这肯定不是它们的目标。

### 作为目的本身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声称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方式。但是它的教义根据虚假的概念允诺国际竞争将削弱强者、提升弱者。实际竞争完全不同：它奖励强者而惩罚弱者。由此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推动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可以被视为一个对富裕国家的先进公司最有利的战略。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西方国家本身，接下来还有日本、韩国与亚洲诸虎在自己攀上台阶之时如此强烈地反对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同样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理解在它们成功崛起过程中所实行的实际政策：将进入国际市场、知识与资源，作为更大的社会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目标不应是消除赛场差异，而应是提升那些劣势运动员的水平。就此而言，在贫困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是一场非常残酷的运动。

陈刚 译

## 参 考 书 目

1. Agosin, M. R. and Tussie, D. (1993) 'Trade and Growth: New Dilemmas in Trade Policy—An Overview', in *Trade and Growth: New Dilemmas in Trade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2. Arndt, S. W. and Richardson, J. D. (eds) (1987) *Real-Financial Linkages among Open Economi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3. Bhagwati, J. (2002) *Free Trade Tod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 Chang, H. -J.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5. Harvey J. T. (1996) 'Orthodox approaches to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a survey',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18(4), pp. 567 - 83.
6.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2001) *World Employment Report*. Geneva: ILO.
7. Krugman, P. (1987) 'Is Free Trade Passé?',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 pp. 131 - 46.
8. Magee, S. P. (1980) *International Trad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9. McCarney, M. (2004) 'Liberalis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Case of Labour Intensive Export Growth in South Asia',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23 (5) <[http://www. btinternet. com/~ pae\\_ news/ review/ issue 23. htm](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review/issue23.htm)>.
10. Milberg, W. (1993) 'The Rejec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Keynes and Marx',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11. Milberg, W. (1994) 'Is Absolute Advantage Passé? Towards a Keynesian/Marxi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 Glick (ed). *Competition, Technology and Money: Classical and Post-Keynesian*

- Perspective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2. Rodrik, D. (2001)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de: As if Trade Really Mattere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13. Shaikh, A. (1980)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 E. J. Nell (ed.) *Growth, Profits and Prop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Shaikh, A. (1996) 'Free Trade,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Policy', in John Eatwell (ed.) *Global Unemployment: Loss of Jobs in the 90s*. Armonk, N. Y.: M. E. Sharpe.
  15. Stiglitz, J. E. (2002)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16.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Geneva: UNDP.



## 第五章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

西蒙·克拉克

新自由主义把自己表现为一种建立于现代经济学不可改变的真理基础之上的学说。然而,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种科学原理,而只是一种很特定的社会理论的系统阐述。新自由主义的基础要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斯密的论述经过更为严格的分析已经成型并得到发展,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与根据,仍然是亚当·斯密的。(参见第三章)

斯密提供给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他对重商主义的寄生政府借助对贸易的限制得到岁入之批评。斯密主张自由的交换是一项交易,交易双方必须都从中受益,因为没有人自愿从事一桩他们会因之变得更糟的交易。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即参与一笔经济交易的双方都从中获益的前提是,该交易是自愿和信息充分的”(Friedman 1962, p. 55)。因此,对自由贸易的任何限制都会因否定了个人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而使福利减少。而且,斯密还指出,市场的扩张使专业化的加速和劳动分工的发展成为可能。通过交换而得到的优势不是一部分人以牺牲另一部分人为代价的那种优势。交换是手段,交易双方借助交换分享他们通过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得到的优势。斯密论述的直接含义是,对自由交换的任何障碍都会限制劳动分工的发展、国家财富的增长与

每一个公民的财富。

亚当·斯密并未指望他的科学论述有很大影响,因为存在着来自与重商主义政府相联系的既得利益的政治压力;但从19世纪起,斯密的学说从对一种寄生政府的颠覆性攻击转变为自由主义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Clarke 1988, ch. 1)。政府的作用不再是对贸易的限制和收税,而是运用其所有力量在其内部乃至超越其国界发展自由贸易。

### 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学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抨击。一方面,斯密的理想社会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追求他自己的自我利益(妇女与儿童仍依赖于家庭)——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甚受非议的宣言:“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存在单独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女人的自我》,1987;参见第十七章)。斯密的“浪漫主义”批评家指出这个模型忽视了人类社会的最独特的特征——道德、宗教与文化——它们所提供的价值高于个人,从而将人性提升至追求直接满足的动物之上。另一方面,经验也很快显示自由贸易的好处大规模地流入经济上更为发达或者政治上更为强大的集团(参见第四章)。在自由贸易把繁荣富足带给最先进的生产者的同时,它把赤贫强加给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人,并触发周期性危机,在危机中没有多少先进的生产者会破产,而人民群众则会失去工作,整个国家的贸易趋于停顿。这个经历产生政府保护小生产者以及欠发达国家的民族工业的要求。小生产者看到他们困难的根源在于银行家的强大,这些银行家拒绝为他们贷款,而这是他们维持生计所必需的;与此同时,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寻求为他们的民族工业实行关税保护。当然,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说,周期性危机与破产是市场健康运行的组成部分,胡萝卜加大棒提供给更有进取精神的生产者。市场并不

仅仅是一种经济力量，而且也是一种道德力量，它惩罚懒惰与无能，而奖励有进取精神和努力工作的人。

保守的自由主义批评家试图通过把时光回溯到中世纪社会的理想状态——在中世纪社会中，个人受制于共同体、民族与宗教的价值与制度——从而否定资本主义的罪恶。然而，资本主义为那些能够从其动力机制中获益的人带来的繁荣意味着，从政治上看，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反馈是不现实的，在中心地带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不是保守主义的而是改良主义的，他们试图在消除资本主义负面影响的同时保留其有益的内容。在19世纪，改良主义主要关注货币体系的规制，因为困境总是表现为一种货币的短缺，这种短缺由那些力图借助其对信贷的控制而建立自己的优势的银行家造成。在20世纪，改良主义开始更为关注政府在市场规制方面的直接干预，使其不再完全受竞争力量的左右。然而，改良主义的中心要旨始终如一：保留资本主义“好的”部分而去除“坏的”部分。自由主义对改良主义的回答也一直相同：好与坏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奖励成功不可避免地要惩罚失败。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罪恶”不能归之于资本主义，而反映了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够达到其标准的人的失败。因此，自由主义不是把资本主义当成神学的科学。上帝不可能因为罪犯进了地狱而受罚；避免入地狱的途径就是过有德行的生活。

从19世纪早期以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发展成一种对资本主义及其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更为激进的批判，该批判以其所潜含的预设即私有财产权的批判为基础。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并不只是孤立的个人，他们是财产所有者，正因为他们是财产的所有者，才拥有财产权，它体现为从其他人的劳动中获取利润的法定权利。社会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不平等不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是财产分配不平等的表现，“市场社会主义者”要求平等，或者以共同所有权为基础的私有财产社会化与生产的组织化，而这又以对信贷的自由利用为支撑。



## 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个人利益的社会决定

对自由主义最激进的批判来自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他们的出发点是对私有财产权的社会主义批判。马克思采取的进一步举措是指出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来自财产的不平等分配,而是来自私有制本身。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以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为基础,这些产品被当做商品出售。因此私有财产不是某些由人类本性和上帝恩赐决定的自然制度,而只是一种社会生产特定形式的表现,生产者的活动以市场为媒介并受其控制。而且,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并不表现为以一定数量货币形式出现的物权,如对价值的所有权。这些价值不是既定的,而是通过社会交换过程决定的,它可能因市场价格的起落而在一夜之间暴涨或暴跌。

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被抽象化了,不仅劳动产品可以作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而且劳动能力本身也成了商品。最大多数的人口并没有从事独立生产的生产资料,而被迫向少数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有足够多的钱去购买从事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作为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是所有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他们在市场上出售这些产品。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取决于他们驱使他们所雇佣的人去生产用于销售的商品并卖得高于生产投入的价钱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利润的源泉是剩余劳动,以及维持被雇佣者生存所需的产品,这是资本家从他们的劳动力中所能榨取的。这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洞见。(Clarke 1991, ch. 4)。

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非常不同于个人财产,例如房屋。这是社会财产——社会的生产资料与产品,它们被私人占有。而且,是他或者她

对财产的所有权,抑或对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的缺乏了决定个人对社会的参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不是单个的人或他们的家庭,他们是已被限定为特定社会阶级成员的个人,该阶级以他们所拥有的财产之性质与规模为基础,而财产仅仅是他们参与社会生产的方式和享有必要的生存资料性质之表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逆转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宣言:

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Marx 1973, p. 156, 黑体是本作者所加;中译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 102—103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在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中,马克思指出即使财产最初是平等的,市场过程也必然会产生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钱会积累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则会失去他们的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给他人。从那时起,少数人将进一步在占有多数人的无偿劳动的基础上积累他们的资本,所以贫富的分化也在加剧。财产的不平等分配并不是对正常的平等市场的一种扭曲,而是它的必要前提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大多数人挣钱至多能够勉强糊口,不指望能成为独立生产者而积累足够多的财富,雇佣劳动者被迫接受这种命运。与此同时,资本家的资本增殖来自雇工的剩余劳动所实现的利润,他们所榨取的剩余劳动愈多,利润就愈大。因此商品生产的抽象化不可避免地产生贫富分化、不平等的再生产和对大多数人规模日益扩大的剥削。

当然,阶级身份并不是社会成员的人生经历与前程之唯一决定因素,虽然它不可避免地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那些为了工资去从事

工作的人的命运是由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所决定的。身怀绝技的人能够比那些技艺平常、随处可见的人挣得更多和享有更为有利的工作条件,虽然这样的特权总是暂时的,也常常受到劳动力市场条件与生产变化的威胁。那些因为年老体弱或缺乏合适技术而不能满足资本需要的人,将会受到失业的惩罚,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其他人。并非所有的资本家都会成功。小资本家挣的也许只够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不能积累资本。小而失败的资本家也许会退出舞台,而加入工人阶级大军。因此,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都会分化,但是这样的分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损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阶级性质(参见第三章)。

类似地,资本家与工人个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是某个阶级的成员。虽然他们的社会身份客观上受制于他们的阶级成员身份,但是他们加入社会中以及作为个人相互发生关系,并总的说来具有一种社会的特点。对工人而言,他或她的工资依赖于其特殊技术,其职业保障依赖于雇主事业的持续繁荣。因此,工人也许并不认为他或她的利益与其他工人,或许还有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相一致,但却与他或她的生意、雇主,还有生产行业抑或“国家”与别国竞争的利益相一致。资本家依靠他的能力同其他资本家竞争,也许在这种竞争中通过运用垄断力量或财政特权和政府管制来确保优势。因此,资本家或许并不认为他的利益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阶层一致,而是与他自己的企业、他的行业抑或他的国家的竞争性利益相一致。类似地,资本家依赖他驾驭其雇员的主动性与忠诚之能力,最好的保证就是提供相对有利的工资与工作条件,这有助于促进雇员与雇主的认同。最后,无论社会身份会如何受到对经济利益的认识的支持,它仍然会受到其他因素如文化的与政治的认同之影响甚至支配。但是,无论成为资本家与工人身份认同基础的是什么,由其阶级地位客观决定的人生经历和前途,以及对立的阶级利益的根本客观性质不会有任何改变。



##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动力

亚当·斯密认为“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结局与目的”，他的格言声称“这是如此自明，以致企图证明它都会显得荒唐可笑”（Smith 1910, vol. 2, p. 155），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防线的一个信条。但是即使是对资本主义最肤浅的理解也足以显示，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格言可以作为人类理性行为的一个特征，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性是对资本主义非理性的不言自明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不是满足人类对物品的需要，而是对维持资本积累的利润的持久渴望。当然，资本家得为他的产品找到市场，但这远不是生产的目的，卖出产品对资本主义来说仅仅是资本进一步积累的一个障碍。

对利润的渴求并非资本家的自由选择，而是他们的生存条件。为了确保利润，以及为了维持他们作为资本家的地位，资本家必须经常革新与发明，以减少他们的生产成本。那些生产成本低于其竞争对手的资本家能够得到更高的利润率，从而把竞争者赶出市场，所以每一位资本家为了站稳脚跟都必须领先。

竞争不仅迫使资本家革新与发明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开发新产品，它也促使资本家追求工资的持续下降，增加劳动强度，减少雇员的数量。技术方面不太先进的资本家，在面对更为先进的技术竞争时，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日、减少工资和增加雇员的劳动强度、解雇富余雇工来使利润得以维持。更为领先的资本家也许有能力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但他专注于在他的竞争者赶上来之前最大地发挥他的优势，所以他增加劳动强度，最大可能地减少雇佣人数，哪怕支付给继续受雇的员工更高的工资。因此由竞争的压力赋予每个资本家的资本积累的内在趋势，是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与劳动力过剩。对工人阶级而

言,结果就是由于资本要求的变化而迅速增大的就业风险。资本要求的强化把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失业大军。资本积累必然导致过度劳动与失业、繁荣与赤贫的两极分化。这被马克思概括为“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Marx 1976, ch. 25)。

生产方法的改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竞争的压力迫使资本家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这些具有巨大竞争压力的手段导致生产的商品数量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又反过来使竞争的压力得到强化,它只不过是这样一种形式,在其中每个资本家个人都会面临生产过剩。因此,市场绝非乐土,在其中社会生产服从于社会需要,消费者能够进行自由选择;它是一个资本家能够在其中按一定利润水平独立处置剩余产品的领域。资本主义竞争并不是一副灵丹妙药,而只是生产过剩长期趋势的表现,它对于资本的进一步积累是障碍,一个只有通过创造新的需求、增加劳动强度、破坏生产能力与全球规模的劳动过剩才能加以克服的障碍(Clarke 1994)。资本主义的兴旺远不是回应消费的需要,而是经常产生未满足的需要;不是将繁荣抽象化,而是将需要抽象化;不是减轻劳动的重负,而是经常地加重负担,直到人口中日益增长的部分——老人、年轻人、体弱者,那些没有足够技能的人——不能够满足资本的需要并对命运发出诅咒。市场是一个“自然选择”的工具,判断的根据不是个人奉献社会的能力,而是以个人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作出贡献的能力为基础。这是表现在新自由主义陈词滥调中的道德法则。

新自由主义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绝对的和一般的规律”之分析,理由是被雇佣人口的生活水平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稳步上升,因此使“贫困化主题”得以破坏,马克思常对之作错误的概括。然而,该规律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是“如此自明,以致企图试图证明它都会显得荒唐可笑”。资本积累已经集中于中心大都市,在那里雇员的生活水平肯定会得到提高,但生产过剩的内在趋势使得资本主义把它的触角伸向了全世界,为了处理它过剩的产品而去开发世界市场。边缘地区的本



地制造者遭遇全球资本,以降低其产品价格的形式而展开竞争,这使得小生产者的收入减少,本地资本家大量破产,幸存下来的资本家只能通过强行减少工资与增加劳动强度来渡过难关。

甚至在大都市这个积累的中心,资本家积累的内在趋势仍不可否认。当实际工资上升时,资本所创造的新需求意味着人们由社会决定的生存需求增加得更为迅速,从而促使比例不断增大的人口寻找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满足那些需要。与此同时,比例不断增大的那部分人口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资本雇工需求,而已经受雇的人则面临日益增长的失去工作之危险。那些凭借雇佣工资无法维持生计的人只得依靠他人,依靠家庭的其他成员或全家,或是来自慈善机构、政府的集体救助。政府对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的养老金和救济金为资本积累的受害者提供了某种保障,但这不是资本的恩赐,它是通过工会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取得的。况且,与资本积累趋势相对立的社会供给成本上升促使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私人供给和保险制度来替代社会供给,它还提供了另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资本依靠强化对灾难的恐惧并从中获益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参见第十六章)。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资本主义并不完全是罪恶。无疑,它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水平。可是为达到这一目的,人类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我们还可以再加上环境代价)。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赞同自由主义者对于改良主义的评价:资本主义的代价与它的利润是分不开的。守旧的自由主义者相信每个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所面临的命运的自由,因此对市场的判断实际上是一个道德判断。辛勤工作、远见卓识、有创造力和进取心都会有回报,而懒惰和懈怠的人将会遭受应得的惩罚。那些以为关于市场的判断不会体现这种公平的自由主义者却相信:资本主义的好处超过其代价,那些代价也可通过补偿性的机制——“社会保障”来改善,通过它,受益者可以补偿受害者。这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完美无缺,但是他们相信它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再次引用玛格丽特·撒切



尔的话：“已经别无选择”。

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可以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在那里社会生产处于自由联合的生产者自觉的民主控制之下，组织生产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Marx 1962, p. 24）。他们相信资本主义通过把生产社会化和把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全人类的需求都可在一个民主化社会得到满足，从而正在为这样一个社会创造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虽然他们肯定低估了资本主义持续创造新的需求以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以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这样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已经被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政体严重损害，例如苏联；这些政体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拙劣模仿，他们把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不发达的生产力之上，并把社会生产置于一个军事化集权国家的官僚主义控制之下。

马克思主义观点能否被实现不是一个被苏联的实践所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理论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只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也不是一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问题，而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全人类问题。人类历史上社会发展由资本积累支配的时间不到 200 年，虽然积累也常被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大规模破坏性的武装冲突所打断。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为资本积累的复兴扫清了障碍，该复兴通过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扩张已经持续了 50 多年，但时断时续。只是在上个 10 年，资本的统治随着其向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扩展才遇到地理上的限制，为了克服对资本积累的障碍，资本如今不得不自我封闭。资本主义还未完全摧毁人性和环境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就不会如此，也不是说资本的扩张就会一直进行下去而不被资本所带来的全球性危机或战争再次造成的巨大破坏所遏制。资本主义不受约束的扩张是新自由主义所赞颂的人类未来。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全世界亿万人民中引起的反响是：“必须另有一种选择。”

## 新自由主义计划

新自由主义表现为对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本信念的再强调，自由主义在 19 世纪的美国与英国是居支配地位的政治理论。但是该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以直觉和独断而不是严格的分析为基础，它们的力量依赖于它们的意识形态诉求而不是其分析之严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至 19 世纪末伴随着组织化的工人阶级崛起所触发的“社会改革”呼声增长与对紧随其后因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之愈益清醒的认识而逐渐衰落。居支配地位的政治经济学不再拒绝在把市场置于首要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但是通过确认“市场的不完善”会导致现实的市场经济不符合自由主义的理想来定义和限定改革的范围。自由主义的社会模式仍然是理想，但是可以确认这个理想不可能单独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它还得以政府的指导作为补充。20 世纪上半叶零打碎敲的社会改革战后被“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更为系统的改革所取代，它的基础是系统地运用财政政策作为再分配与宏观调节的手段，来弥补市场的缺陷。

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是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之危机在思想上的回应，它受到与战后重建高潮结束有关的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推动，该危机因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美国对越南战争开支的逐步上升而达于极致 (Clarke 1988, chs 10 - 11)。这个危机在全球资本积累日渐缓慢的步伐中得以展现，与此同时还有通货膨胀的加剧和政府为预算赤字融资难度的不断加大，这些都推动政府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减少政府支出计划。被凯恩斯主义视为缺陷之标志而加以拒绝的东西却被新自由主义者称赞为优点，他们在 80 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期间就重申了传统自由主义有关市场有净化能力的教义，这种教义借由随后到来的全球资本在世界市场进一步自由化基础上的恢复性扩张而得到证实。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确有所长,但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它声称以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为依据。在扎根于一套有关市场性质和市场参与者行为的简单断语方面,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比它的19世纪前辈更为武断。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一再显示新自由主义模式赖以生存的那些设定是多么片面和不现实。然而,既然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并不着力于描述世界是怎样的,而是描述世界应当怎样,论证新自由主义模式不现实就有些不得要领。新自由主义的关键不是制作一个更加适应现实世界的模式,而是让现实世界更加适合它的模式。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幻想,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方案。新自由主义已经登临全球思想、政治和经济力量之巅,所有这些力量都可被动员起来去实现让全世界的人都服从资本的判断和道德的新自由主义计划。

陈海遥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Clarke. S. (1988) *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 Clarke. S. (1991) *Marx, Marginalism and Modern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3. Clarke. S. (1994) *Marx's Theory of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4. 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Marx. K. (1962)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in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2. Moscow: FLPH, pp. 13 - 37.
6. Marx. K. (1973)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7.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8. Smith. A. (1910)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London: Dent.



## 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政治学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学

罗纳德·芒克

当前,新自由主义无论对那些支持它们的力量还是向其挑战的运动而言,都支配着政治领域。它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模型(socio-political matrix),该模型勾勒出了遍及全球的政治转变的条件。本章将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影响,而且也将考察通常较少受到注意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学本身。第一部分先考察自由市场制度的政治设计,该制度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或许可称为“自然主义”的观点相左。继而对新自由主义**重组**资本主义政府的方式进行批判性的回顾,该方式再次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市场让政府靠边的正统观点相反。本部分最后将考察新自由主义所创造的新型政治模型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转向新自由主义政治学方案本身,以及通过政治方案的转变而超越它的可能性。民主作为一种流行政治而遭到“贬值”的方式,也许是 20 世纪最后 25 年中新自由主义霸权所产生的最有害影响。然而在最近几年,这种霸权受到了挑战,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TINA)的高枕无忧之自信已部分地消散。这种情形为“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创造了空间,对此仍有争议,最后一部分将考虑与之相关的不同变化。

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在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新自由主义与实际存在

的新自由主义之间作出区分。前者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在哈耶克著述中发展起来的观念及 20 世纪 70 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 1962)对这些观念的普及;后者的视野更为现实,关注的是宏观经济计划的稳定性、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的私有化(或非国有化)(参见第三章)。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实际的发展战略,它的倡导者通过某些辩解能够与哈耶克发起的所谓奥地利学派所发展的特定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保持距离。因此,实际上创造了“华盛顿共识”这个短语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曾经争论说,他从不认为这个短语“包含了诸如资本账户自由化……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或一种干预最少的政府这样的政策……我认为这些政策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观点”(Williamson 2002, p. 2)。事实上,除了在小圈子的右翼压力集团中,这些观点从未能够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达成共识。这是一项要予以强调的重要差别,这项差别经常被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性陈述混淆(参见第三章和第十二章)。

## 新自由主义和政治学

### 市场的设计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市场合理性的标志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政府干预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违背了这种合理性并力图反对效率和自由。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将培育个人的自由。但是,正如巴里·斯马特(Barry Smart 2002, p. 95)所评论的:“这种社会不是通过设计,而是通过市场及其交易过程,通过为他人提供商品和服务,与向他人寻求商品和服务而实现其协调一致的。”相较于任何非自由的或机械的社会组织形式,市场所创造的总体秩序就效率和公正而言被认为是更加优越的。正如博兰尼(Karl Pola-

nyi 2001, p. 60)所指出的,这种制度意味着“社会关系植根于经济体系中,而不是经济植根于社会关系中”,或甚至更为彻底的是,“市场经济唯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得起来”。市场持续不断地寻求以它自己的方式来塑造社会。

倘若我们不是采取一种理论的立场,而是采取一种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市场形成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与新自由主义的看法相反,市场的形成自始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自然事件。波兰尼在二战期间撰述了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首次“伟大的转变”,清楚地指出“国家市场的崛起决不是逐渐地和自发地将经济领域从政治控制中摆脱出来的结果”(Polanyi 2001, p. 258)。市场社会和市场规则并不是自然地或通过某个自我繁衍的过程生长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为何在最可能的意义上谈论市场的形成之缘由。相反,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市场乃是政府方面一种有意识的并常常是暴力干预的结果,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把市场组织强加给社会”(Polanyi 2001, p. 258)。政治总是“支配性的”,不存在一种所谓纯粹经济过程的东西,倘若我们透过政治说辞的表面而加以考察的话。正如马克思所言,“原始积累”对于资本主义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而市场和一个市场社会的形成通常是一起暴力事件,伴随着明显的胜负之分。

关于市场会自行调节的观念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时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中表现出来。确实,正如波兰尼曾经指出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真实意图如今已经一目了然了。唯有有一种世界规模的自行调节的市场才能确保这种庞大系统的运转”(Polanyi 2001, p. 145)。因此,自由主义唯有通过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过程才能在世界历史的当前阶段得以实现。为了实现这项计划,跨国资本家阶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一致宣布,要创造一种“非本土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话语与实践在 90 年代的胜利。资本的流动性得到了促进,自由贸易获得了认可,劳动变得更加“灵活”,宏观经济管理变得



彻底地听从于市场。当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市场能否“外在于”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而不至于产生社会分化和政治失序。

我们今天发现,现存的新自由主义并不真正相信政府会直截了当地“退却”(参见下一部分),也不理解市场持续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与驾驭它的规则。国际贸易机制——最初是 GATT(关贸总协定),如今是 WTO(世界贸易组织)——是主要的机制,通过它,全球市场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争议得以通过一种井然有序的制度来加以解决。准确地说是由于世界贸易量的飞跃发展促使 GATT 向 WTO 所追求的更加正式和“公平”的规则体系转变,尽管世界大国在实现与之有关的共识方面存在着政治障碍。在合同法、取得专利程序和仲裁程序方面,一整套的国际规则被建立了起来,以便规范猛烈增长的国际贸易。这套国际规则是支配多边经济组织的世界强国磋商而成的;它们不像新自由主义假定的那样是自发形成的(参见第十章)。

## 重组政府

我们已经看到政府的干预对于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然而新自由主义却把看上去矛盾的任务即“击退”政府干预作为一个核心信条。的确,按照昂格尔(Unger)的说法,我们可以说,现存的(或者如他所称呼的“运行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统一的主要源泉及其核心的政治信条是“关于削弱政治权力的消极统一:使政府无法干预业已形成的社会秩序”(Unger 1999, p. 58)。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家而言,这实际上代表了一项关键性任务。对于诸如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而言,攻击的靶子自始至终被看做“无节制的”或“膨胀的”政府部门,是它侵入和妄图统辖“自由”市场的行为,最终,是对于个人所享有的自由的侵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将导致某种放纵不羁的“集体主义”(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信条,乃是来自于共产主义的空洞目标),同时导致正如哈耶克最负盛名的著作标题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然而事实上,实际存在着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简单地致力于“收缩”政府或使得市场

脱离管制。

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最初阶段肇始于 1973 年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的军事政变和随之而来的“青年芝加哥学派”(Chicago Boys)(一些受教于芝加哥大学而服膺于一种宽泛的“弗里德曼”方案的智利经济学家)的方案。随着 1979 年后撒切尔在英国和 1981 年后里根在美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这种新自由主义呈现出了更加确定的形式。皮诺切特、撒切尔和里根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那里获得了信念,运用强大的政府权力以“削弱”政府干预并巩固了自由市场制度。此乃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以促使政府从凯恩斯主义和发展中的政府政治模型中努力后退为基础。劳动市场被“解除了管制”,劳动变得更加“富有弹性”了。资方的“管理权”极其显赫地得到了恢复,而市场是不容许受到“政治”压制之苦的。通往新自由主义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受到了历史环境和政治过程的塑造——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时,它显然已经变得霸气十足了,而先前的福利国家模式和发展中国家模式则似乎显得老气横秋了。这正是 TINA(别无选择)拥有令人敬畏的真理性的时候。

开始于 90 年代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第二阶段,致力于“大量颁布”新政策,而不只是政府的一次“退却”。正如佩克和蒂克尔(Peck and Tickell 2002, pp. 388 - 9)所争论的,一旦达到新自由主义否定阶段的自然界限,一种更加“积极的”或主动性的政策就受到了召唤;因此,“结果不是减少而是重建,这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方案自身也逐渐地被克林顿政府和布莱尔政府的第三条道路改造成更社会化的干涉主义和改良形式”。可以再举巴西的卡多佐(Cardoso)政府(1995—2002 年)为例,以揭示出新自由主义形态中并不仅仅拥有北大西洋国家的转变这种形式。通过自由化和商品化而简单地拓展市场的逻辑不再是充分的了,随着诸如福利制度改革、刑事政策、城市的重建和寻求避难者成为中心话题,新自由主义方案必须向社会领域延伸。它不再满足于削弱政府;如今诸如移民、单亲家庭、囚犯和“变态者”或受到社会“排斥”的社会成



员这样的桀骜不驯之徒,为了新自由主义**政治**进程的利益,必须受到控制和规范。这就是获得贯彻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规范。

因此,在重组政府方面,我们能够说新自由主义改变了政府,而不是像哈耶克所期望的那样削弱了政府。事实上,更为夸夸其谈的“撤销管制”政策(撤销政府管制体系)一直在运用新型的市场导向规则和政策来创造新的管理方式,以促进“新”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按照市场的景观而作出改变,政府自身如今“市场化”了,或者诚如塞尔尼(Philip Cerny)在展示其“竞争型政府”模式时所指出的,这导致了“政府的相应转变”,“目标在于使经济活动局限于国家领土之内,换言之,即增长国家财富,使其在国际发展方面变得更加富有竞争力”(Cerny 2000, p. 30)。这种竞争型政府模式不再适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适合于在一种全球化水平上提升新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政治舞台因此获得重建,而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古老区分则遭到了侵蚀。正如政府的功能获得了重建以适应于新的全球秩序一样,政府甚至开始更加清楚地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自身,而不是像在民族国家秩序中那样作为一个“干预者”而行动。规则被视为这样的东西:执行规则并非出于公共产品的考虑,而是有益于全球化方案本身。

### 模型的更新

人们通常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有赖于西方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和南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显而易见的失败。这些政治—经济范例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设想为一种社会政治模型,这种模型确立了整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特征。对于运用此种概念研究拉丁美洲的加雷顿(Garretón)及其合作者而言,一种社会政治模型(或者说SPM)

指涉的是政府、一种代议制结构或一种政党政治制度(凝聚了全球



化的要求并包含了政治化的主题)和具有文化倾向与关系(包括参与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的公民社会及其多样性)的社会活动者的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以政治体制为制度中介。(Garretón et al. 2003 p. 2)

为了达成我们的目的,我们将致力于考察新自由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新型社会政治模型,代表了对公共—私人领域和经济—政治—社会关系性质的重构。

按照博兰尼的说法,19世纪的国际体系依赖于大国、国际金本位、自我调节的市场与自由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体系,不过(他补充道),“这种体系的源头和模型乃是自我调节的市场”(Polanyi 2001, p. 3)。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发展起来的国际体系被以不同方式称之为“全球化”、“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不过它的源头和模型却毫无疑问地是全球市场。对于不同的社会层级和不同规模的人类活动中的“竞争性”之强调,从家庭直到世界经济,彻底地流行了起来。从作为发展过程之模型的国家到作为发展之主要载体的“私有化部门”,这种发展模式在转变中只伴随着微不足道的调整。这种现代性和文明模式在新的政治模型的影响之下转变着。个人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西方模式被认为是唯一的正确道路,而所有其他的模式无不遭到了轻视或贬低。政治可能性的视域显著地萎缩了。

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影响的分析大多集中于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传统关系作了决定性重塑,政治学也被以此方式“非政治化”。然而,新自由主义革命对曾经是社会主义或官僚社会主义体制的东方国家产生了一种更具破坏性的影响,不过在这里政府坚定地调控着市场力量的作用。甚至世界银行一度也不得不承认东方的“市场转型”所产生的灾难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然而在南方的穷国或“发展中”国家,这种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才最具灾难性。古典的和激进的发展理论被以同样方式弃置一边,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一体适用”(one size fits all)的新自由主义治疗方案(参见 Colcough and Manor eds 1993)。“华盛顿共识”把在南方国家中得到实际执行的新自由主义系统化了,并产生与该术语相关的新的发展争论。所有关于发展的争论都必须处在这个所谓共识的范围内。

一种政治模型的效果只是支撑和表述它的论述的效果,在这里,新自由主义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还是极为成功的。为新自由主义方案所发起的争取霸权的斗争,至少部分地是一场意义之争。因此“改革”这一词语终止了与土地分配或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而在新自由主义论述中变成了与开放经济和将市场从政治控制或规范中“释放”出来等类似的意思。新自由主义成功地运用一种关于政治自由的自由主义个人观念,表达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此,一种诸如新自由主义这种从不曾真正地存在于教科书之外的理论,正如布尔迪厄(Bourdieu 1999, p. 2)在分析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话语”的新自由主义时所指出的,在“使自身变得真实和经验上可证实”方面变得异乎寻常地有效。这正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方案所产生的理论力量,对此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加以讨论。

### 新自由主义政治学：遭到贬值的民主

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市场不仅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实现人类自由的最合适土壤(参见 Friedman 1962)。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说法,正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威胁着自由。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被看做是反对所有左翼“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必要基础。当然,对于在实践中支持皮诺切特将军 1973 年在智利限制政党政治活动与镇压工会,新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并没有看到什么矛盾,反而认为这是恢复他们所信奉的市场友好主张所必需的。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种从根本上保守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见解被成功地表现为进



步的甚至“革命性的”。基本的社会征服与劳动权利密切相关,例如,基本的政治自由表现为貌似倒退的无政府主义。未来属于新自由主义这种对于后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共识”(参见第二十章)。

### 新自由主义致力于把市民转变成为一个消费者：“我购物故我在”

古典民主理论中复杂而富有权利的公民观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被缩减为信用卡的力量和逛大型购物中心的乐趣。这种力量和乐趣实现与否,得根据人们在一个处于民族—国家之间及其内部急剧分层化的阶级结构中的地位。甚至公民身份的“政治”概念也变得陈腐不堪了,实际上萎缩成了对于投票站寥寥无几和象征性的访问——这无论如何是一种令人怀疑的民主参与表现,倘若考虑到在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的投票率显著下降的话。在新自由主义革命之前,公民身份被等同于政府和糟糕陈旧的方式。通过诉诸不言自明的理由,个人可以通过消费更好地表达他或她的身份。在以往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曾经是身份和阶级划分的标志,而如今却是消费走向了前台。显而易见,消费在新的全球化市场中成为一种关键性的经济需要,而且它也促进了一种对社会的文化重建。整个的消费过程——从概念到销售,经历广告、市场营销和时装商店环节——业已粉碎了身份,使它们更加变动不居,因为消费在不断地革命化。公共政治的空间被认为更加稳定,因为没有完成公民消费化的需要。

诚如昂格尔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所偏爱的政治形式是相对的民主:民主,但不要太多”(Unger 1999, p. 68)。这种新民主是脆弱而又贫乏的,它最好是有所限制和代议制的。迄今为止淹没于政府重压之下的个人自由获得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不过作为一种政治表现制度的民主却遭到了贬低。市场的规则也应用到了政治中。在对官僚机构所表达的敌意和对非职业化的政治所表达的向往之情背后,存在着一种深奥微妙的反民主意图。金钱前所未有地成为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政治就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打包待售了。不足为奇,



许多公民丧失了政治兴趣,对于整个政治运作过程,倘若说不是疏远情绪的话,一种普遍的不抱幻想的情绪变得司空见惯了。政治选择变得极其有限,以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成为大多数政党共享的基础,而政治差异则变得无足轻重了。

新自由主义也致力于颠覆诸如“公民社会”等传统的民主观念,而将“社会资本”等新的保守观念引入民主词典之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权威体制之下,正是在公民社会领域(按照葛兰西的说法,是一个介于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地带)里,公民们为了民主而组织和动员起来。自那时以来,在反对“大政府”的运动中,“公民社会”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动员。从非政府组织一直到工会,所有非政府的活动家都被鼓励去取代或抵制政府。特别是世界银行成为一种非政治化的“公民社会”的辩护者,理由却并非出于支持民主。接着,“公民社会”观念也被世界银行采纳,被编进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术语中,它一度被称为共同体组织。这个民主话语的吸收同化过程对于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合法化是一个关键性因素。

### 别无选择?

20 世纪 90 年代,别无选择似乎是一个貌似有理的论述,这时新自由主义霸权已显得无可争议。特别是,东方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设计师们成为新自由主义信条的狂热支持者,正如许多南方的政治领袖所做的那样,即使这是出于退而求其次的原因(*faute de mieux*)。在法国,作为信条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为卓越的思想,一种思想体系,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乃是从右翼到左翼的一切政党都赞同的,至少赞成该术语的基本含义。然而在 90 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已经在公开争论如何“超越”华盛顿共识。世界银行超越“制度问题”这一温和的新口号,似乎认识到从长期来看,新自由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统治的稳定性方面正在积聚重大的社会问题。是否博兰尼著名的“反运动”(counter-movement)说法正在走上舞台,而社会正在卓有成效地保护自己免遭

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的破坏？

首先，与任何“决定论的”政治理论相反，我们有必要理解始终存在着政治选择。在昂格尔涉猎甚广的政治哲学中有大量的政治选择可以帮助我们发展一种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更加微妙的设想，而不是当前盛极一时的“决定论”方法。例如，与他称之为民主“秘史”的东西相反，昂格尔要求我们认识到有多少与民主有关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是偶然的或至少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与为一切政治现象寻找隐秘原因的“深层结构”理论家相反，他揭示了“结构拜物教”(structure fetishism)的局限，即否定我们改变自己所处环境的能力。与所有隐藏在大量社会和政治分析背后的决定论假定相反，昂格尔矢志于“从这种类型的社会理解中解放出来，这种理解仅仅允许这样解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即把我们自己想象为我们所建设和居住的世界或假定产生了这些世界的规律般力量的无助玩偶”(Unger 1999, p. 7)。然而历史令人惊异，社会(再)干预甚至能够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出现。

甚至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方案的逻辑中，也存在着或许可称之为“快车道”和“慢车道”的东西。正如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资本主义一样，也存在着不同的通向新自由主义或甚至穿越它的道路。围绕着市场机制效率的基本共识不应该遮蔽当前在经济和政治权力走廊中正在进行的重大争论，这些争论关注的是市场和政府调节之间恰如其分的混合。与基于低工资/低技能模式的“慢车道”不同的是，存在着一条基于经济“公平增长”(growth with equity)的“快车道”。这种“公平增长”是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家们提出来的，他们有力地挑战了新自由主义霸权，尤其是在2002年阿根廷灾难性的经济崩溃之后。这个事件或过程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意义，也许堪比苏联崩溃对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意义。如今，即使仅仅为了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救赎，主要的论述也不是关于市场如何自我调节，而是社会和政治要更加深入地关注如何改善“治理”。

根据温迪·拉纳(Wendy Larner 2000)富有教益的类型学说法，我们要始终记住，新自由主义是一项政策(或者说是一套政策)，是一种意



意识形态(或话语),不过也基本上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相关。新自由主义也许提倡小政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不那么重要了;也许,正好相反。治理通常被看做是一种对于政治过程的“后政治”驾驭,这个过程更多是征求意见式的而非指令性的。治理术在福柯(Foucault)的最后著述中得到发展的是知识制度化及政治方案与新自由主义个人相联系的方式。为了设想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必须理解它的全部复杂性。新自由主义并不像它的批评者所集中关注的那样,只是一套经济政策或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个管理我们如今生活在其中的错综复杂的全球化世界的策略。任何的替代方案都必须回答21世纪复杂的全球管理问题。

### 超越新自由主义?

按照阿兰·图伦(Alain Touraine)的说法(Touraine 2001, p. 24),“资本主义的胜利代价如此高昂,令人无法容忍,以至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试图寻找一条超出‘新自由主义转型’的道路。”这段论述也许低估了新自由主义的易变性和适应性而高估了它身处其中的危机,不过确定无疑的是,如今关于“之后(after)”、“超越(beyond)”或者“后(post)”的新自由主义争论正大行其道。现在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正在对华盛顿共识作一番论证和修饰,这是心照不宣地承认现存的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业已失败。然而,与民主发展不同的是,如今备受赞美的“善治”标准在世界大部分地方依然没有独立发展起来。虽然认识到市场不能自我规范或自我合法化,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议程依然仅仅是建立规范市场的制度(如对付外部性)及把市场合法化(如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障)。

为了发展一种进步的和更加民主的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我们有必要超越如今被广泛接受的“市场并非万能”的老生常谈。在这些争论



中,民主自身的意义岌岌可危。问题在于,许多人叫嚷要有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而目前的建议却要么对市场淡然处之,要么是零打碎敲地抵抗。对于那些致力于表达一种进步的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替代方案者来说,主要议题乃是建构一种全球化的民主方案。这就同样需要避免相当空虚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民主”观念,避免地方主义的诱惑或简单拒绝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替代方案。任何政治经济替代方案都不能忽视全社会关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期盼与需要,也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导致社会灾难和政治不稳定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日子。

然而,面对这种争论和更新的过程,有必要考虑如何能够把新自由主义关于去政治化的审慎政策再翻转过来,唯有将政治恢复到代表人民利益并为政治未来而辩论的正确位置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在国际层次上,公共领域已有复苏的迹象,例如2003年的反战运动。新自由主义关于“参与”和“自我决定”的修辞能够被颠覆,并服务于更新了的积极公民观念和实践。无论是古典的社会民主还是新自由主义,看起来都无法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造成的不平等的激增提供解决方案。从公民社会内部即被描述为“社会”左翼的人开始,实践性的替代方案如今正在许多领域中兴起,从参与预算和地方性民主运动到全球社会运动的政治联合。

从狭义的“政治”公共领域到再政治化的公民社会之转变,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将会应运而生(参见第十九章)。世界银行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了在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方案赢得社会支持和为其赋予一种“社会”面貌方面,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如今危如累卵的是“自由”观念,它被新自由主义缩减为“自由”市场。波兰尼在他的时代指出“对市场乌托邦的抛弃使我们直面社会现实”(Polanyi 2001, p. 267)。分界线似乎是政治的——自由或民主的本质——而不是各种经济理论的相对技术价值。对社会的(再)发现标志着潜在的自由之再生。按照波兰尼的说法,复杂社会中的自由,唯有通过对一种截然对立的政治哲学之(政

治)调控,使之朝向“社会的市场观,这种观念将经济学等同于契约关系、将契约关系等同于自由”时才会来临(Polanyi 2001, p. 266)。

陆月宏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ourdieu, P. (1999)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 Cerny, P. (2000) 'Structuring the political arena: public goods, states and governance in a globalising world', in R. Pala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3. Colcough, C. and Manor, J. (eds) (1993) *States or Markets? Neoliber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Policy Deb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 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Garretón, M. A., Cavarozzi, M., Cleaves, P., Gereffi, G. and Hartlyn, J. (2003) *Latin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wards a New Sociopolitical Matrix*. Florida: North-South Centre Press.
6. Hayek, F. (1976)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2: *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7. Larner, W. (2000) 'Theorising neoliberalism: policy, ideology and governmentalit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63, pp. 5 - 26.
8. Peck, J. and Tickell, A. (2002)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34 (3), pp. 380 - 404.
9. Polanyi, K.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10. Smart, B. (2002)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1. Touraine, A. (2001) *Beyond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2. Unger, R. M. (1999) *Democracy Realised: The Progressive Alternative*. London: Verso.
13. Williamson, J. (2002). 'Di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Fai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williamson\\_1102.htm](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williamson_1102.htm)>.



## 第七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国际关系

阿莱让德罗·科拉

作为一种当代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一场标志性胜利是将“全球化”概念用做一个过程,此过程象征着在全世界的政府和社会再生产进程中市场的指令无所不在和不可避免。新自由主义既包含了一套理论原则,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实践,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服务于扩展和加深我们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参见第五章和第六章)。新自由主义对于“公共”观念及其相关制度的大量攻击,由于求助于全球化观念而得到辩护。这个过程总的说来显得不可避免,而且的确是反对贫困、不平等和经济落后的必不可少的万能药方。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从财政紧缩到反劳工立法都通过全球化这个“别无选择”的魔咒而被引进。这些政策也通常以这样的方式外部化,使它们承担适应“全球市场”看上去陌生和难以理解的力量的责任。

本章将质疑新自由主义关于全球化必然性的大多数论述。最近30年左右的时间里可清楚地看到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的一种重建和对于国际秩序的重塑。但是,这些变化并不必然地能通过“全球化”概念来加以解释,而且显然不能通过新自由主义对这一范畴的使用来加以解释。全球化是一个描述性词语,包含了不同的过程,其中一些必须不仅要借助全球经济的社会经济动力来加以解释,而且要通过参照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所实施的政治权威来解释。因此,本章的第一部

分将思考全球化的不同含意,并区分它所指涉的不同现象。新自由主义对于这个词语的运用规避了该过程的核心矛盾,亦即全球化,当它不是由政府实际发起时,仍受到政府的有力调节,这一点将变得显而易见。本章的第二部分拓展了这一最新论断,即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既作为概念也作为政策——事实上矢志于在全球范围重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基于此种诠释,新自由主义就完全作为一种政治方案而出现,它不仅给个人以特权,让市场经济力量凌驾于政府的公共权力之上,而且令人困惑的是,它是通过政府引导的对市场进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多方再调控来实现的。第三部分从国际视野出发,为此类新自由主义再调控提供经验性例证。在这里,我们的焦点将集中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再生产过程中跨国阶层的作用、社群主义的崩溃和国际多边机构——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或世界贸易组织。在认识到该机构向附属的政府和实体强加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此种权威的地区性源泉也将获得强调。因为最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如所有的社会现象那样——不是一些空洞、神秘和深不可测的外部力量,而是一种受到著名机构和社会集团援助、帮扶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就是资产阶级政府及其统治阶级。

## 全球化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描述国家之间日益加强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联系的英语词汇“全球化”风行世界。一种权威的解释认为全球化是社会关系中的“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而其他的解释则强调日益增强的高于和超出民族国家政治管辖的权力(例如,通过将政治权力移交给多边机构,或者欧盟国家对于主权的“共享”)。这样那样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化包括民族国家的相对衰落和伴随而来的跨国流动的增加,不管是麻醉剂、资金、人员、观念、音乐节奏还是有毒污染物的流动。一些人通

过指出这个星球的居民越来越强烈地分享着诸如普遍的人权、共同的社会政治标准或诸如电视“肥皂剧”这样的文化形式,从而在关于全球化的定量定义之上增加了定性的维度。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种情形使得“全球性”成为当代人类处境的鲜明特征。可是,倘若我们想要保留有关全球化的有用定义的话,这些论断就必须放在适当的情境中,必须受到限制,而在某些情形中则必须直截了当地予以抛弃。

我们首先应该拒绝全球化包含一种同质化过程或者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趋同化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一些更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提出来的。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非常不均衡的过程,倾向于再生产出新的和既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级。例如,外国直接投资(FDI)经常被用来作为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一个标志。确实,在过去的30年中,FDI的流动获得了显著的增长,然而它们过多地集中于欧洲、东亚和北美的核心资本主义经济体。

倘若我们把全球化看做政治过程,那么可以说,制度、标准和价值的一体化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想想民主化的例子吧。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曾经目睹拉美、亚洲、东欧和中欧的诸多独裁政体的崩溃。不过,这股(选举)民主化浪潮既不是不可逆转的,也不是无限制的。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依然受到并非自由选举的政体的统治,而许多曾经废除了独裁权力的国家又恢复了威权统治——尤其是在非洲和前苏联。因此,备受赞美的民主的“第三次浪潮”撞上了难以逾越的国家权威的樊篱。只有中国和中东国家的政体,面对政治全球化的力量岿然不动,因为它们的统治阶级能够把经济自由化与社会政治约束结合起来。

最后,文化的“杂交”(hybridisation)获得了全球化的深刻推动。根据一些观察家的说法,从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到曼联,从摇滚乐到《指环王》的文化参照物得到了如此普遍的承认,以至于我们今天得以谈论一种共享的“全球文化”。另一些人以类似风格指出,新的文化形式正在作为全球化的结果而兴起。因此正如人们所指出的,



观念、语言、图像、音乐形式或烹饪风格在世界范围的变迁，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全球化的，或者至少是跨国界的文化产品，例如这些无法被安置在具体文化边界之内的“世界音乐”、“烹饪杂烩”或“后殖民小说”。矢口否认国家之间和国家边界之内的文化形式的“杂交”是粗野无礼的。除却别的因素，这种杂交还受到了通讯技术巨大进步的促进，受到了在诸如东京、悉尼、纽约或伦敦等所谓全球性城市中不同文化集散地的推动。由于贫困、文盲和社会/地理流动性的欠缺等结构性障碍，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还未能分享到烹饪杂烩或后殖民小说的乐趣。

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通过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全球化既不是无限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些限制条件并没有否定一系列互动的存在，通过扩展其范围而跨越国家界线，这些互动能在“全球化”或确切地说是“跨国”的红字标题之下得到有益分析。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范围获得了显著增长，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业务得到了指数式的发展，而国际性多边组织的领域和权力也得到了扩张。因此，就经验上而言，很难否认过去 30 年中跨国关系获得了强化。然而同样的是，由于其固有的不平等的和等级化的性质，资本主义全球化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正在展现的**趋势**，而不是一种业已完成的状态。这种方法也允许对全球化的流行观点，即它不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趋势，作进一步的一般限定。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论述以二战后某段时间（通常是 1973 年）在社会经济组织和地缘政治组织的急剧发展为前提。这个“全球化时代”通常被拿来与先前的历史时期进行对照，人们认为先前历史时期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原则上是围绕着民族国家的权威组织起来的，是适应于地域性共同体的要求的。因此流行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的一个特征是这种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在过去 30 年中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

这里不是参与全球化新颖与否的激烈的历史争论之处（Held et al. 1999 对此作出了有益的概括）。坦率地说，大多数的跨国流动（资金、电信、移民）和超国家组织（国际组织、国际性的倡议性团体、泛民族

主义或地区主义运动)与二战前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至于说到文化“杂交”,就像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因此,也许可以有充分理由指出,一旦全球化被理解为一种趋势而非已完成的情境,那么就会出现更大的空间,以承认过去尤其在19世纪晚期的“帝国的年代”(1875—1914年)社会经济和政治强烈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类似时刻之存在。因此,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与其说是崭新的,不如说是重建的;与其说是一种质变,不如说是数量上的积累。简而言之,它指涉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亦即主要通过资本主义政府的介入,资本积累的普遍趋势获得了极为强烈的释放。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捕捉到的。

### 新自由主义、政府与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无不赞成以下说法,即全球化是一个受到资本主义无限活力推动的过程。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资本主义市场这种普遍的活力无疑是其巨大的吸引力之所在。因此,全球化被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视为畅行无阻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被视为从自由和公平交换的道路上消除了政府、政治利益或陈腐习俗所造成的人为扭曲之后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的积极过程。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诠释的主要假定是,世界是由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单位(一般是公司)组成的,这些单位通过自由和不受阻碍的交换来追求利润,最终产生了市场均衡。这个均衡点标志着最有效率地生产财富和配置有限的资源(不管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还是制造品资源)的方式,从而展示了“自由市场”和“比较优势”的价值。显而易见,正是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理解主宰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新自由主义把全球化看成削弱政府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所施加的人为政治限制,从而通过世界规模的竞争性



资源分配来确保全球财富创造和分配的过程。在这里，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被理解为一个非政治的、纯粹“经济”的领域。

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资本主义市场。他们从一群挑选出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包括马克思、葛兰西（Gramsci）和博兰尼那里获得暗示，将资本主义市场设想为充满必然性的王国而非充满机会的王国。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市场自从17世纪兴起以来，是如何通过暴力和强迫开疆拓土的，是如何逼迫巨大的世界人口通过市场指令来再生产自身的（参见第八章）。与新古典主义观念相反，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理解把商品交换异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我们当代的社会再生产形式在历史上是多么自成一格——它为了诸如食物、居所、教育或医疗这样的基本需要而多么奇怪地依赖于市场。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批评方式强调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再生产过程中政治和政府的关键性作用。他们不是仅仅以“经济”术语来看待资本主义的，而是把它看做一套社会关系，这套社会关系包括了政府的“政治”权威，也包括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其他“文化”或“意识形态”等方面。这种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至少可以在两种意义上得到理解。

首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的批评者指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依赖于政府的权威——它的合法的、强制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以保障“自由和平等”交换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市场交换远远不是一个摆脱了“社会工程”机制的自然的有机过程，而需要唯有现代政府才能提供的一定的社会基础设施、制度性管理和法制力量。用更抽象的语言来说，虽然资本主义的估价逻辑以对时间（劳动时间和资本的未来收益）的占有为前提，但它也需要在某个特定地方的积累。按照这种说法，不参照其“空间方位”（参见 Harvey 2000）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这就是说，不同的管制、控制和监视场所——从工厂围墙一直到国境线——这些经政府合法化的东西支撑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再生产。新自由主义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守夜人政府”（nightwatchman state）



之必需,甚至要求政府通过教育和培训来生产一些基本的“人力资本”。可是,他们特别把这种作用看做政治中立,看做一种制度性的附属物,其作用仅仅是保证市场更有效率。换言之,他们认为政府是一种完全脱离市场的自发力量。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评家通过经常关注支撑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再生产的对抗性社会关系,在第二种意义上强调了政治的作用。与新古典主义脱离现实的、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分析相反,对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强调任何市场交换不可避免的社会特征,进而强调其竞争的、剥削的和常常具有压迫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尤为特别地把资本主义全球化解释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阶级斗争的结果,如此一来,例如通过近来欧洲的《稳定协议》(stability pact)把预算赤字转移给欧盟的做法,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策略,它把国内的阶级对抗转移到国际性的从而政治上更加中立也更为遥远的地方(参见第二十四章)。同样地,正如我们接下来将很快看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把社会阶级本身看做全球化的载体,这些阶级以跨国的形式组织起来,并自觉地在全球范围内阐释自己的政策和方案。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些批评方式所指出的是这一事实,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受到可认同的机构和社会集团援助的过程,一般受到社会经济和社会阶级之间(通常是内部的)政治对抗的推动。

我们于是看到,新自由主义与其批评者不仅在其政策处方方面,而且在关于如何分析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基本假设方面都是不同的。前者认为政府和其他的政治权威是“寻租”机构,阻碍和扰乱了市场向竞争效率、繁荣和机会均等方向的自然进步;后者把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政治机构理解为阶级利益的社会仲裁者,其存在主要保障资本主义市场的再生产。从一种全球化视野来看,这些显著的理论差异传递出关于全球化性质的截然不同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者把该过程解释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最终按照其自然和健康的欲望追求国际贸易、全球经济整合和竞争性增长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批评者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

受到旨在使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更大领域依赖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政治抉择之促进和积极调控的过程。两个阵营都同意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心脏所在,不过他们在关于资本主义只是“人性”的产物还是与此恰好相反,是非人性的市场所依赖的产物方面,是根本不同的。接下来的部分将更加集中地关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晚近历史,目的在于阐释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原则是如何与作为一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关的。

### 世界如何及为何走向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不过它显然伴随和推动了这个过程。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既作为理论也作为政策——可以被解释为对于 1973 年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一种反应,而它又反过来加深和促进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跨国趋势。这次危机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经济性的。它质疑政府(资本主义的和革命的都一样)的合法性,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长时期的通货膨胀、衰退和大规模失业。它也通过国际债务规则使较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从属于新自由主义的重建。从这次危机中产生了一系列政策处方,它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这种新社会力量通过求助于本书前述和其他地方所描述的新自由主义原则,鼓励了我们今天目之为全球化的相互依赖和多边协调的机制。就像资本主义全球化一样,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个不平衡的、曲折的过程,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主张和意外事件的影响。一些像德国或日本这样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采纳了一种相当温和的新自由主义形式,而像印度或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则以它们自身的方式执行了这些政策,打上了国内的而不是国际政治和经济决定的烙印。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全球扩展中区别出不同时刻,辨别出国际地位和能力大不相同的国家执行这些政策时所



运用的不同方法。

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繁荣时期,不过早在70年代,皮诺切特的智利就展示了把自由经济与一个高压政府结合起来的可能性。通过对外资开放经济,将国内生产调整为出口导向,国有公司私有化,削弱社会性支出和就业权利,废除施加于财产和资本收益之上的税收,对劳工运动发动系统性的压制,智利成为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灵感的源泉。这种“反革命”也产生于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参见 Taylor 2002)。1979年撒切尔当选为英国首相和里根在198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着“新右派”的崛起。对于危机四伏的福利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心脏地带高涨的阶级对抗而言,“新右派”是一种替代方案。本书中的其他章节更为详尽地思考了这种政治右转的性质和后果,因此这里强调这种现象的三个国际性维度就足够了。

第一个维度也许可以更贴切地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跨国”维度。它指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在北大西洋两岸出现的情形,当时一些上层的观念创意者和实践者有意识地倡导了经济政策方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包括财政制度、金融和贸易自由、私有化和向外资开放(参见第十二章)。<sup>①</sup> 受到葛兰西著作激励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了“阶级分离”(class fraction)概念,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资产阶级部门业已通过私有的和公共的机构跨国地组织起来了,这些机构从三边委员会到七国集团(如今是八国了)不一而足,目标在于规范、加强和联合世界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sup>②</sup> 由于这个原因,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作为资本的自由世界之组成部分彼此强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全球化,并在管理这样一个全球化经济的过程中,通过与国内更为东方化的资本部分之对比,肯定了它们自身的中心性。一些“跨国历史唯物主义者”甚

<sup>①</sup> 术语“华盛顿共识”是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93)创造的。

<sup>②</sup> 关于这种立场的经典表述可以在 van der Pijl(1984, 1998)那里找到(也可参见 Gill 1990)。



至认为新自由主义以一种新的跨国政府和统治阶级的崛起为前提,该阶级“由重要的世界性生产资料的拥有者组成,而生产资料主要属于跨国公司和私营的金融机构”(Robinson 2001, p. 215)。不管人们是在经验上还是在观念上接受这些论断,很难对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化机制之标准检查、管理、审计、调控或质量保证的跨国化视而不见。就其通过商业学校、议会或软件包而标准化和普遍化的行为规范、“良好实践”和交流方式而言,新自由主义在这个方面可以被确切地称为一种全球化意识形态。通过时常出口反映“美国生活方式”的音像作品,它也复制了这些价值。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二个国际性维度存在于北方发达国家左派在政治上的衰落,南方不发达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危机,尤其是在那些受到苏联集团鼓舞和支持的国家中。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仅仅是“新右派”胜利的结果,也是左翼失败的后果。到了80年代,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左翼要么放弃了任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主张,要么面临着选举的败北。甚至南欧的共产主义政党和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选择了改革,而不是在各自向自由民主转变的过程中选择决裂。当面临实质上的政治分离之前景时,例如1981年法国的社会党—共产党政府,或者1986年的西班牙政府就北约成员资格举行全民公决时,左翼都屈服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在联合王国,一系列的选举失败和撒切尔对于1984—1985年矿工罢工的镇压,导致了劳工运动的意志消沉和混乱。到了80年代晚期,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所有社会民主党和大多数的共产党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它们牢牢地处于政治光谱中的温和中左翼位置。随着“第三条道路”荣登大宝,这股向右转的浪潮得以神圣化。“第三条道路”由克林顿(Clinton)、布莱尔和施罗德(Schröder)领衔主演,紧随其后的是姆贝基(Mbeki)和卡多佐(参见第二十一章)。

在外围地带,1989—1991年“现存的社会主义”的突然崩溃显然标志着后殖民革命政府合法性的长期衰落的终结。由于在扩展基本需求

与提升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方面——既在国内也在国际上——的进展,早在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前,第三世界革命国家就无力满足独立后出生的一代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期望值。70年代葡属非洲解放,与1979年尼加拉瓜和伊朗的革命胜利一起,对于全世界的左派而言,一时成为道德支持。而合乎逻辑的是,它在国际右派中引起了对它的充分注意,以至于它们重组为“新右派”。但是,非洲和中美洲消耗性的反革命战争,与后-革命的伊朗原教旨主义统治的巩固一起削弱了这些新革命国家,很快就打击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复兴前景。当80年代和90年代的亚洲、南非和美洲的独裁统治崩溃时,它们不再让位于社会主义,而是让位于自由民主制度。对于民主发展而言,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前景甚至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了。的确,在一些非洲国家,共产主义的外观变得如此破败不堪,以至于它们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只花了几个月时间就从往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粉墨登场为羽翼丰满的“新自由主义新兴市场”。在这种对于左派而言意识形态国际性溃败的气候中,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几乎不可阻挡地轻易横扫了政治领域。

对于国际体系中较为弱小的国家和经济体而言,新自由主义更加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外部力量,主要以国际金融机构(IFIs)的面貌出现。新自由主义扩张的第三个国际性维度主要是通过80年代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即《减轻贫困战略报告》)机制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机制成为获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一项条件。SAPs的历史是一部错综复杂和多样性的历史,不过在本质上,它们是作为80年代债务危机的结果而出现的。<sup>①</sup>80年代早期连绵不断的赤字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设计的方案旨在“重建”和“调整”负债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以便保障偿还贷款的能力。公共开支的削减、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开放贸易和资本项目、私有化和削减税收是这些结构调整计划的核心成分。它们获得了贷款组织——包括政府和多边组织——的强烈支

---

<sup>①</sup> 可以在 Mohan et al. 2000 中发现出色的概览。



持,这些贷款组织由新自由主义政府管理或代表着它们的利益。到了90年代,不再有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向那些无力承受结构调整的国家发放贷款。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的多边机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业已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载体。不过,注意到国内的社会力量有助于驾驭这个过程也很重要。一些更为强大的发展中经济,例如墨西哥、巴西和印度,业已经历了新自由主义调整,并非单纯地由于华盛顿经济学家告诉它们要这样做,而是因为其统治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通常紧接着选举授权之后决定代表集体利益这样做。其他的一些国家(例如津巴布韦)未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就进行了结构调整,而许多国家总是在重新磋商、中止或简单地废弃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议。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并不仅仅是全球新自由主义倒霉的牺牲品或被动的对象:它们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了具有自身利益和战略的阶级和社会力量的开发,其中大多数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是协调一致的。

### 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想到了五年前英国海军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事情)谈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力量,“其商品的低廉价格是用来摧毁所有中国城墙的重型大炮……它迫使所有民族在毁灭的威胁面前采纳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个过程进行了一个半世纪,不过随着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把世界转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过程日益明显地接近于成为现实。(虽然这次带来了中国商品冲击外国超市的代价!)

一些人认为,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中,一个认识到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作用的“后华盛顿共识”,如今支配



了全球的权力中心。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新自由主义不再像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那样具有昂首阔步的信心和所向无敌的气概。但我们不应该为表象所迷惑,因为声望的下降也在证明一场无声的胜利: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在转变我们的社会方面事实上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不再需要为其理论主张作辩护或者公开地捍卫其政策。诸如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货币主义经济学和对劳动力流动性的要求等新自由主义假设,20 年前在政治上看来极为令人不快,如今却成为了政治常识。包括降低收入税、公用事业的私有化或开放贸易和资本项目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今成为任何称职的中左翼政党的主要依靠。更多地加强这种“激进的中派”的做法,当然是全球化话语,而这正是我们时代一种不可避免的和无法阻挡的特征。

不过,既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由于“新右派”的凯旋而在政治上获得了精雕细琢,那么它在政治上也可能受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力量运动的抨击。最终,推动着我们世界具有深刻的的不平等、粗暴的不公正和变化无常的破坏之特征的力量,不是新自由主义本身,甚至也不是“全球化”,毋宁说,是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对于利润的激情造就了这种形势。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再生产机制,而是一套可逆转的政策。同样,很少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评者想要废除国家之间以及内部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相反,关键在于民主化和平等化这些全球化的积极方面。因此,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伟大的挑战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民主之挑战。

陆月宏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Harvey, D. (2000)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2. Held, D., McGrew, A., Goldblatt, D. and Perraton, J. (1999)

-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3. Gill, S. (1990)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Mohan, G., Brown, E., Milward, B. and Zack-Williams, A. B. (2000)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ory, Practice and Impacts*. London: Routledge.
  5. Pijl, K. van der (1984) *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 London: Verso.
  6. Pijl, K. van der (1998)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7. Robinson, W. I. (2001) 'Capitalist Globalis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isation of the State', in M. Rupert and H. Smith (e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sation*. London: Routledge.
  8. Taylor, M. (2002) 'Success for Whom? A Historical-Materialist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in Chil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2), pp. 45 - 75.
  9. Williamson, J. (1993) 'Democracy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Development* 21(8), pp. 1329 - 36.

## 第二部分 全景考察





## 第八章 新自由主义和欠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

特伦斯·J·拜勒斯

本章关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当代欠发达国家原始积累的过程及其意义。为了详尽无遗地分析这些过程及其意义——确实得掌握原始积累这一概念——我们需要将它们放在历史背景中：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背景、殖民主义背景和“发展主义政府”背景。我们将在前三个部分进行这些分析。

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过去经历了资本主义转型，资本主义工业化处于其中心位置。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用最简单的话说，我们可以把这种积累看做生产资料（厂房、机器、原材料、工具）的积累。

由于受到竞争的推动，对积累的渴求 is 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当这种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主导的经济之一种结构性特征时，我们就称之为资本主义积累。这样的积累是经常性的，具有在扩张基础之上向前推进的强烈趋势。不过，它并非没有矛盾（当它向前推进时，也许会包含使其放慢的趋势，例如利润率的下降）；它也许会屈从于长时期持续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是生产出的东西——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多过了消费者所能吸收的程度，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实现

危机)。

所有这一切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对其的分析需要论述与资本主义积累相联结的复杂机制。然而要让情况变成这样,以及要使资本主义工业化改变经济落后的状态,那么特定的条件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条件必须通过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历史地创造出来。

这些过程在原始积累这一概念中得到了把握。原始积累有别于资本主义积累,这个观念最初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Marx 1976, pp. 714, 775, 873 - 940)中发展起来的,他关注的是欧洲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出于两个原因,它被认为是必然的:首先,在资本主义利润微不足道的环境中作为使剩余产品得以成为早期积累形式的手段;其次,作为一种为资本主义商品创造国内市场的方法。

我们也许可以把原始积累定义为资产(多数显然是土地)的转移,这种转移是通过非市场手段从非资产阶级向潜在的资产阶级进行的,通常获得了政府的默许或调节:通过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不管是偷窃、抢劫,还是以象征性的价格进行收购。英国的经典例子就是圈地运动(通过地主将无主之地和公用土地占为己有,并以契约形式出租给大量资本主义承租人的方式进行)。

原始积累的核心特点就是将农民与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离开来:把资产转移给潜在的资产阶级。借此就创造出了资本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随着劳动力——无产阶级——生活资料的被剥夺,资本主义商品所需要的国内市场也就应运而生了。

### 殖民地的原始积累

马克思进一步主张,在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积累充分实现之前,积累是由于在它们的国家疆界之外的外围殖民地所发起的原始积累过程



而成为可能的。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殖民地原始积累,并将其与国内的原始积累区分开来。

从 15 世纪晚期开始,殖民地原始积累通过暴力拓展到了美洲、亚洲和非洲。其手段包括掠夺、从土著居民手中将土地占为己有并将所有权授予殖民者、奴隶制和奴隶庄园、不平等交换(有据可查,殖民地国家与宗主国之间产生的大量贸易顺差血本无归)。在殖民时代,原始积累的代价被野蛮地强加给土著居民,而显而易见地在经济上有利于殖民地国家和宗主国的统治阶级。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在其肇始的 15 世纪晚期与其终结的 1945 年之间,殖民主义以两种方式扩展其国内原始积累:首先,通过提升国内农业和工业利润的方式把殖民地的利润转移给宗主国;其次,通过把殖民地市场意味深长地附属于宗主国国内市场,而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两者一起使得国内资本结构获得比用其他方式远高得多的收益(在这个方面较出色的奴隶制研究,可参见 Blackburn 1997, pp. 509 - 80)。

正如欧洲的原始积累那样,殖民地的原始积累也经历了抵抗和斗争。但是就像在欧洲所发生的,它没有能够通过这些抗争阻断这条残酷无情的道路。然而深层的差异在于,那些被剥夺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人沦为无产阶级,很难在农业或工业中找到被雇佣的机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剩余劳动力困守于乡间。

比起西欧的国内原始积累,殖民地原始积累远远没有完成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开来的过程。它虽然创造了一大群剩余劳动力,不过也留下了众多拥有土地的贫农(大多数是佃农而且通常是分成制佃农)。独立为进一步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更大的空间,确实,倘若今天想要完成资本主义转型的话,欠发达国家中的原始积累就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说欧洲的经验提供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这样的转型既不是没有痛苦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 1945 年后的发展主义时代欠发达国家的国内原始积累

我们将对关于社会主义尝试性转型的讨论进行概括：十月革命后的苏联，1945 年后的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北朝鲜、北越和古巴。不过在这些国家中，也进行了类似的国内原始积累的进程。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在集体化之前进行了扩张工业基础的努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创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术语来描述这些过程(Preobrazhensky 1965, pp. 77 - 146)：苏联运用了超经济的权力从经济的前社会主义部分中将剩余占为己有。它们也在其他社会主义转型的尝试中发挥作用。

在非社会主义的欠发达国家中，独立并不意味着原始积累进程的任何停顿。不过如今“发展主义政府”时代的原始积累背景已完全相同。它如今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成为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其核心的国内资本主义转型的一部分。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积累的条件尚未具备，国内原始积累就是必不可少的。

如今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能够通过殖民地原始积累而大大地加强国内的原始积累，相比之下当代的欠发达国家却没有这样的资源可供开掘。通过多边组织而注入的援助和私人资本或许可以减轻负担，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形中，也无法与殖民地原始积累在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相媲美。除却程度上的差异，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在于，殖民地原始积累完全处于殖民国家的强权掌握之下，而当代的欠发达国家却受制于强大的经济力量。

在 40 年代至 70 年代早期的后 1945 发展主义时代，国内原始积累的进程是显而易见的。在发展主义政府的保护之下，出现了广泛的土地改革之努力，土地改革采取了两种主要形式：土地使用权改革和重新分配。土地改革大体上是一种通过非市场手段进行的资源（也就是

土地)转移尝试,在有限资本主义转型的情况下,它是原始积累的原型之一。在两种主要形式中,重新分配的土地改革明显是一种原始积累的机制,因为它孜孜以求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给小土地所有者或完全没有上地的人。土地使用权改革在此方面没有那么明显,不过就它通过推动富农以非市场手段获得更多土地从而鼓励了占有而言,它或许可以被看做原始积累。

重新分配改革大体上是不成功的,除了两个非同寻常的例外——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里,通过非市场手段,土地被转移给第一代资本主义农民,他们确保农业生产更有效率:一个将原始积累成功地与资本主义转型联系在一起的例子。在每个个案中,转型后的农业都卓有成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然而在其他地方,虽然重新分配土地的改革在实现其目标上鲜有成功,不过它却产生了加速剥夺贫农的影响:通常,他们由于法律的干预(比方说在印度)而遭到驱逐。不过包含一系列改善拥有土地和开发土地的条件(取消佃农制、控制租金、消灭土地的零散化现象等等)措施的使用权改革,对富农和中农而言获得了一些成功,但在根本上难以惠及贫农。恰恰相反,它加速了他们的被剥夺。

这与上面提及的例外一起,难以充分地乡村中产生资本主义转型,或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确,在欠发达国家的农业中出现了四处蔓延的停滞现象,出现了明显的工业化失败的现象。

到60年代中期时,一场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喷涌而出:本质上是一场有关积累的危机——一场并非过度积累而是欠积累(生产资料的匮乏)的危机。到了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于这场危机的回应。从60年代晚期开始,伴随其强烈的“押宝押强”(betting-on-the-strong)的偏向,在乡村中引进了“新技术”(将新型生物化学技术如新型高产种子,与新型的主要为拖拉机的机械投入结合起来)。到了70年代早期,它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在农村中产生了原始积累的一种强有力的集约化进程。它起始于亚洲(在印度更为轰轰烈烈),而传播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寿终正寝的是“发展主义政府”，新自由主义时代应运而生。

###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国内原始积累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样的非市场转移持久而有力，屡屡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主题。确实，随着“发展主义政府”的消亡，它们变得强烈了。但是它们如今性质截然不同，因为情况迥然有别。

我们需要区别出中国这个例子。确实，倘若原始的资本主义积累也在这里广泛进行着的话，那么，可以说它在类型上及意义上是不同于其他地方所进行的原始积累的。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予以探讨。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在某些方面，政府直接主导的原始积累减少了。因此，土地改革从政策议程中消失了。原始积累以其他方式向前推进着。其中一些来自直接的国家立法，其他一些则不是。随着政府的退却——新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政策处方，粗野的、通常非法的原始积累方式就粉墨登场了。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获得政府款曲暗通的支持。显而易见的是，新自由主义没有进行干预以阻止它们；同样，在它们的追求中，新自由主义政府倾向于成为同谋者。它们在性质上是形形色色的，在表现方式上是不一而足的。

在拉丁美洲，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农民难以保护其土地使用权和农庄平均面积持续下降的情形，迫使农民家庭从农庄之外，尤其是在农业劳动力市场上寻求收入来源”（de Janvry et al. 1989, p. 396）。一方面，政府退却了，新自由主义产生了一种自由经济，这种经济导致了主要产品价格的下降，特别是加重了小生产者的债务。另一方面，政府并没有退缩，不过它如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干预：“新自由主义的土地政策放弃了早先对于征用土地的兴趣，转而强调的是私有化、非集体化、土地登记和土地的所有权凭证”（Kay 2000, p. 129）。一种原始积累让位给另一种原始积累，引进了立法以加速本土共同体的瓦解，并鼓励

其土地的出售。这样的共同体遭到了超经济手段的剥夺,从而出现了明显的无产阶级化。对此的反应是出现了自下而上强有力的运动——土地侵占和占用——相应地由原始积累产生的关于剥夺的讨论脱颖而出。然而,这些运动尚未取得明显的成功。

彼得斯(Peters)指出,当代非洲“四处蔓延志在土地的竞争和冲突”,“使相对公开的、协商性的和有适应力的传统土地所有制和使用制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相反却暴露了掠夺的过程,加强了社会的分化和阶级的形成”(Peters 2004, p. 269)。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志在土地的竞争和冲突现象日益恶化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原始积累的惯用伎俩。在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时代的非洲国家,“当非洲政府对于土地和土地市场的控制被取消时,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积累的经典范例获得了意义”(Bryceson 2000, p. 55)。不过在这之前,既在殖民时代,又在紧随而来的后殖民时代,它已经获得了明显的意义。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它得到政府的明显庇护。然而如今,随着政府的退却,相当明显的是,贫农的土地使用权遭到了削弱,他们被迫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小商贩。至少在这个方面,非洲农民与拉丁美洲同行是并无二致的。这些贫农是原始积累铁板钉钉的受害者。

在亚洲,我们可以举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原始积累的极端个案:孟加拉国。例如:“甚至对报纸漫不经心的一瞥也会告诉我们,在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中,掠夺土地和‘非市场’地转移土地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处在一种财产权颇为不确定的处境中,大多数人无法保留他们的土地”(Khan 2004, p. 98)。在孟加拉国,“这种非市场的转移包括:过度地和处心积虑地利用警察、法院、土地登记办公室,频繁地操纵私人匪帮以伪造文件、建立虚假的档案,直接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为的是从政治上的弱势群体那里强取豪夺土地。”(同上)确切地说,比如在当代印度的比哈尔邦,在众多非洲国家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就发生着同样的事情。

这是最粗暴的原始积累方式。但是它真的滋养了资本主义转型

吗？它有助于为资本的形成创造资金来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添加燃料并且加强国内市场吗？

如果我们以此为例，也可把它看做展示了许多其他国家的范例，“在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中，原始积累（如市场）仅仅促进相对较小的农庄小块土地出现一个持续不断的‘搅动’过程”（pp. 98 - 99）。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持续进行和自我复制的过程，对此可被称为“不变中的变动”（p. 94）。在这种情形下，原始积累只不过是一种零和游戏：在经典的定义中，是一种“战利品”数量可加以确定的游戏；此一参与者赢得的东西只是彼一参与者失去的东西；并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社会或经济的进步。

有少数几个例外，资本主义转型的有力步伐不易察觉：最著名的例外存在于中国和“非社会主义”的东亚——中国台湾和韩国。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中考察中国。对于资本主义转型而言，原始积累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它不是充分的条件。在数量众多的欠发达国家中并不存在的其他必要条件是：数量充足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成长；在创造一种能够促进总体资本主义转型的意义上对农业问题的解决；一个能够进行果断干预的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遏制了任何朝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趋势，最为明显的是：阻止必要的政府干预，否定对欠发达国家的保护和挫败必需的农业改革。

因此，相对于原始积累的明显受害者而言，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中并不存在补偿，不存在清楚的资本主义转型，不存在最终将创造就业机会的成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进步最多也只是在痛苦中蜗行。但是，这就是人们从历史记录中所能期待的东西。

## 中国与原始积累

下面将要展示的是中国从社会主义出发所发生的重要转变。首



先,农业的非集体化(肇始于1978年而完成于1984年)打破了公社制,大量的农业部门私有化了,同时通过长期的承包合同稳定了家庭土地承包制。其次,在坚决保留城市工业部门的同时,中国于90年代小心翼翼然而相当明显地开始了私有化;另外,1991年建立了股票市场,在1988年立法之后崛起了股份公司。新型的私有化企业可以被看做至少在性质上是原资本主义的。第三,自从1978年以来,产生了对于市场的拥抱,而市场如今业已变得巩固繁荣了。在农业和工业中,引进了一系列的价格改革。大约到了1988年,只有约25%的价格是由国家制定的。此后,在稍作停顿之后,重要的价格改革一直在持续着。

进而,有一些特征可表明国内原始积累在进行着。首先是从1978年开始,在农村,有千百万的中国人离开了土地,也就是说遭到了有力的剥夺和无产阶级化了。布拉莫尔(Bramall 2000, p. 175)指出,“到了80年代末期,由于中国发展战略激进地再定位,创造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到了80年代晚期,临时迁移的“流动人口”介于5 000万至7 000万之间。其次,农村的工业化部分地获得了显然非资本主义来源的资金的支持。在80年代,乡村中私营的非农部门显著成长。地方政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它们将日益增长的农业部门的利润投入到了乡镇企业中(p. 397)。新的企业被租赁给私营部门进行管理。这些可能就是未来的资本主义企业,从不再是社会主义也尚未是资本主义的部门中获得了资金支持。第三,在城市中,雄心勃勃的资本家获得了资本使用权,通过贪污、侵吞国家资金,也就是说,通过获得非资本主义资源的使用权而建立私营企业(Holstrom and Smith 2000, p. 8),由此就推动了资本家阶层的产生。最后,大量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一个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部分被创造了出来。作为此过程的一部分,采取了砸碎所谓“铁饭碗”的步骤,“铁饭碗”就是“有保障的工作,政府提供的房子,免费的医疗”(同上)。

因此,非资本主义来源(不管是国有部门还是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对于资本形成的资助,农村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分

离，工人从国有企业下岗，这些都是一清二楚的。它们都是可确定的国内原始积累形式。

在所有这一切中，比起俄罗斯来，中国都要谨慎得多和成功得多，并且只产生了少得多的受害者。毫无疑问，中国正以非凡的速度成长着，其工业化正在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率和规模推进着。当然，中国经济在今天的世界上肯定是最有活力的。工业化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原始但富有启发性的方法来考察劳动力结构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农业劳动力显著下降了，从1970年的81%，降至1985年的62%，直至1998年的50%；同时，工业劳动力在以同样的速率上升，从10%、21%，上升到23%。基础在当前这个时代之前已经打好。不过似乎可以指出，一种原始的资本主义积累形式当前正在推进工业化。

### 结论：政府的重要性

在历史上，对于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最早阶段而言，原始积累是其中心，它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和社会浪费。然而，既然它对于成功的资本主义转型及与之相伴的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那么它就从不只是一种初步措施。这样的转型需要充分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一种改进的富有成效的农业；需要世代累积下来的资本主义积累。这些情形使得特定的阶级组成必不可少。所有这些相关的过程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受到了日益崛起的资本主义政府的调节。至关重要的是创造矢志于积累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农村的和城市的）——城市无产阶级通过使农民分离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而产生。

确实，通过加强和加快剥夺过程，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助于在欠发达国家中加快原始积累。但是，在缺乏名副其实的强大政府的情形下，这些因素并没有显著地加快资本主义转型的步伐。

中国的例子是富有教益的。中国没有采纳任何类似新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的东西。工业的私有化、对市场的利用等等都相对缓慢地进行着,并且小心翼翼。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后撤。它是一个积极的干预主义的、促进增长的政府。

陆月宏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lackburn, R. (1997) *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 1492—1800*. London: Verso.
2. Bramall, C. (2000) *Source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1978—19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Bryceson, D. (2000) 'African Peasants' Centrality and Marginality: Rural Labour Transformations, in D. Bryceson, C. Kay and J. Mooij (eds) *Disappearing Peasantries? Rural Labour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4. Holstrom, N. and Smith, R. (2000) 'The Necessity of Gangster Capitalism: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Monthly Review* 51(9).
5. Janvry, A. de, Sadoulet, E. and Young, L. W. (1989) 'Land and Labour in Latin American Agriculture from the Fifties to the Eightie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6(3), pp. 396 - 424.
6. Kay, C. (2000) 'Latin America'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Peasantisation and Proletarianisation', in D. Bryceson, C. Kay and J. Mooij (eds) *Disappearing Peasantries? Rural Labour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7. Khan, M. (2004) 'Power,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Issue of Land Reform: A General Case Illustrated with Reference to Bangladesh',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4(1 - 2), pp. 73 - 106.



8. Marx, K. (1976)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9. Peters, P. (2004) 'Inequality and Social Conflict Over Land in Afric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4(3), pp. 269 - 314.
10. Preobrazhensky, E. (1965) *The New Econom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第九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

雨果·雷迪斯

本章关注的是帝国主义的变动不居的本质，以及它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坦率地说，其中有着明显的矛盾。新自由主义自然主要着眼于运用自由市场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其中政府只有微不足道的作用；帝国主义传统则与一个政府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凌驾于其他政府之上行使权力有关。如此一来，这两者又如何能够统一呢？那么新自由主义者真的是伪善者或种族主义者——对富裕的白人北方发达国家是自由，而对贫穷的非白人南方不发达国家则是压迫吗？我们如今还有“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或内格里(Negri)与哈特(Hardt)简单地称之为“帝国”的东西吗？

答复这些质询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可以用许多种方式来定义帝国主义。主流政治学家大体上把它解释为一种政治统治方式，其基本因子在不同历史时代是不变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截了当地把它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性质联系起来：在资本主义的例子中是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帝国主义不断变化的性质至为明显地产生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在扩张和巩固作为一个基于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秩序的资本主义过程中，市场“经济学”与政府“政治学”是如何扮演互补角色的。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章要关注的是 1945 年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如何变化的。第一部分关注的是 1945 年后显而易见的“帝国的终结”、去殖民化和民族国家的发展时期。第二部分考察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所发生的战后秩序的变迁，及北方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与南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主义的寿终正寝。接着，第三部分关注的是当前时期的新帝国主义，一种基于跨国资本与南方不发达国家从属性主权的极为不同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式。

### 去殖民化——自由主义的终结，帝国的终结？

在现代，帝国主义概念极为频繁地与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45 年这个时期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时期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聚焦于主要帝国力量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之间的竞争。在列宁的经典分析中，殖民帝国主义与工业垄断以及与把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为新型金融资本的情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殖民地的外国投资意在榨取自然资源和控制新市场；它们由于领土征服和直接的政治统治而受到了保护并得以扩张。

对于列宁和大多数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种帝国主义形式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敌对帝国之间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反过来又导致了工人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及在帝国的核心地带对于资本主义的颠覆。虽然毫无疑问存在着连绵不断的战争，不过除却 1917 年的俄罗斯和 1949 年的中国，这些战争并没有引起社会主义革命。毋宁说，它们最终导致用以协调权力关系的国际秩序的建立，以及用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来取代殖民帝国的结果。可以在一战后的时期观察到这些新的发展，那时，曾经存在的老牌欧洲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为新的民族国家，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创立了起来，反殖民的独立运动在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蓬勃



发展。

二战以后，看来 1945—1979 年确实标志着殖民帝国主义的终结。联合国体系的结构，就像国际联盟一样，显然基于关于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内政的普遍原则之上——包括重要的补充即人权和民族自决权。美国和英国精心设计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仅基于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原则，而且基于解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国际金融动荡之集体合作（参见第十一章）。殖民帝国的瓦解，不仅由于轴心国的溃败，而且由于同盟国的胜利。这种瓦解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策略。在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家的重建和发展成为新旧主权政府的中心任务。

同时，自由资本主义及其主要意识形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由于 1914 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灾难而彻底声名狼藉了。在二战接近尾声时，经济史学家波兰尼（Polanyi 2001）、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975）和福利国家倡导者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1960）都同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所需要的是大量的政府调节和社会再分配，如果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的话。至关重要的是，凯恩斯（Keynes 1936）似乎泰然自若地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扫地出门，而提出了一种适合于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新观念。虽然这些作者中（除了熊彼特的早期作品）没有一个人在这时直接关注帝国主义，不过他们毫无疑问地有助于激励学者、活动家和政治家们参与到反帝斗争中来，以便为后殖民时代的经济发展设计政策和计划，治疗帝国主义剥削导致的经济创伤（参见第三章和第六章）。

如果说战后秩序看起来预告了一个充满政治自决和政府引导式发展的新时代的话，那么很快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并没有终结国际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发达状况。战后的繁荣没有彻底地遗忘新近冠名的第三世界，但是，贸易和外国投资的重心从殖民时期的“北方—南方”模式转变成了日益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北方—南方贸易

和投资模式与过去殖民时代的模式鲜有二致：焦点集中在榨取和出售为加快北方国家的工业发展和消费所必需的初级产品上。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和发展主义经济学家汉斯·辛格(Hans Singer)认为，初级产品生产者享有的贸易条件——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购买一定数量的北方工业品而需要加以出售的初级产品的数量——在1870—1939年日益恶化：虽然这种情形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为发展中国家寻求更为有效的工业化战略以减少对传统的殖民地型出口的依赖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两股其他潮流也变得清晰可见了。首先，第三世界在面临发达国家生产者竞争而缺乏重要保护期的情形下，想要建立新的工业是困难重重的：这种所谓的“幼稚工业”(infant industry)问题，在19世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面对英国的工业优势时，确实加强了保护主义。其次，虽然在战后的秩序中，对于国际金融的持续性控制废除了1914年前南方地区资助初级产品发展的“金融帝国主义”，不过却兴起了一种在北方—南方经济结构性联系中扮演类似角色的新型机构：跨国公司，将自己表现为渴望发展的国家所必不可少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机会等的源泉。

在正统(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日益兴起的新左派中间，从对这三种特征的批判性分析中，产生了关于“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论点。美国学者巴兰(Paul Baran)进一步识别出一项关于后殖民转变的重要政治限制：地方“买办资产阶级”的固有位置，该阶级的财富和权力与保持贸易和投资的殖民形式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批评被发展成为“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在其中，经济帝国主义被认为矢志于使对南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永久化，不过如今采取的不是殖民主义直接统治方式。但是除此之外，这个基于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之上的貌似和谐的新世界秩序，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首先，一种替代性的“世界体系”亦即苏联共产主义的存在，意味着一种总体化的“东—西方”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言而喻地



把第三世界内部的社会冲突“国际化”了。在这种处境中，对于直接政治统治的规避，绝没有废除直接干预，包括政治和军事上的干预，如果西方大国的利益受到威胁的话：在巴西、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刚果、埃及、伊拉克、伊朗、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只是一部分例子。在发端于 1956 年万隆会议的不结盟运动中，第三世界领导人联合起来挑战北方国家的主宰地位和干涉的努力，遭到了北方国家有系统的反对。

因此，1945 年之后的帝国主义呈现出了新的形式。“经济”手段一劳永逸地承担起了北方发达国家对南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初级产品生产国家无法产生足够的顺差以帮助经济发展；而跨国公司则充分利用其对资金、知识和市场的控制，搜刮了工业不发达国家生产收益的最大部分。与此同时，政治独立痛苦地维持着，屈服于新型“霸权”强加的限制。不过如今世界再次改变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结构在其中再一次得到了改变。

### 凯恩斯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失败

后 1945 秩序的三个特点，向在凯恩斯主义/发展主义国家模式支持下恢复资本主义好运的努力提出了严重挑战。

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工业化的北方出现了一种把高工资、高生产率和充分就业结合在一起的现象，成功地将北方的工人带离社会主义政治学，不过其代价是失去可用来执行资本主义纪律的传统惩罚——削减收入和失业。凯恩斯主义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替代方案有赖于国内社会共识的存在和国外经济机构的支持——主要是美国资本输出和在消除预算赤字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临时性资助。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和日本由于美国资本的参与而得以复兴，但是日益增长的贸易和投资无情地流向了更自由化的国家，因为其关税较低，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较弱。20 世纪 60 年代高涨的国际竞争，不仅破坏了布雷



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和美元与黄金挂钩——而且在工人们致力于保存和扩展其战后经济收入时产生了强烈的通货膨胀趋势。支持凯恩斯主义妥协方案的努力，集中在收入政策与财政、货币扩张方面，只是使事情变得更糟而已，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加剧及其通过贸易和货币的投机买卖而在全世界传播。1967—1972年见证了在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所发生的国内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集中在通货膨胀和就业方面，包括高通胀、货币调整、劳动者大规模不满与充分就业的终结。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提出对策，要求恢复自由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和强大的政府（首先集中关注于财政和货币原则）。保罗·沃尔克1979年被（卡特，而不是里根）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与1976年在联合王国执行的预算紧缩一起，导致这些政策在两个最重要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心的运用（参见第一章至第三章、第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

战后世界的第二个特点是，第三世界崛起为全球政治中的一股力量。尤其在70年代可看到发展中国家试图改变国际财富和权力平衡的新努力。对于北方的全球性主要大国的挑战，包括阿连德（Allende）在智利选举中上台、欧佩克石油价格的上涨、美国在越南的溃败、最后残存的殖民帝国（葡萄牙）的瓦解、在罗得西亚爆发的解放战争和推翻伊朗国王。在这种情形中，南方不发达国家呼唤一种代表战后繁荣昌盛的发展主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大声疾呼在全球范围内重建凯恩斯主义。然而在短短几年中，这些成就却戏剧性地逆转。

导致这种情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金融迅速全球化。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自从50年代中期以来，银行的海外贷款一直在稳定地增长着，从而导致了“海外”金融市场的兴起——特别是所谓的欧洲美元市场，依赖于对美国之外的人士所持美元的借贷。1974年欧佩克发动的石油价格剧烈上涨，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它们不可能立刻就花费的巨额横财；相反，这些收益存放在了北方国家的私人银行，这些银行又把这些资金借贷给石油消费国家，而更为普遍地是借给急需现金的第三世界。这

种情形一时间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接着，发展中国家就陷入了我们所看到的北方国家采纳的新的货币主义政策逆流之中。利率的急剧上升加重了偿还债务的代价，而国家支出和私人消费的削减则导致对第三世界出口产品需求的下降，从而也使得其价格下降了。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它不再偿付债务，从而产生了延续至今的债务危机。与此同时，在北方发达国家对南方不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进攻性。在非洲、中东和印度支那，美国领导了一场全球性的遏制战和消耗战，（偷偷摸摸地或大张旗鼓地）支持南非傀儡政权反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激进新体制；支持复兴社会党（Ba'athist）的伊拉克反对伊朗；支持波尔布特（Pol Pot）的柬埔寨反对越南。通过重建替北方发达国家收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公开磋商的峰会（五/六/七国集团会议），这类会议在1985年解决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紧张关系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s）上达到了最高峰，通过在数量和范围上迅速发展的政府间组织和程序，通过三边委员会与比尔德伯格和达沃斯会议更加潜移默化的努力，北方大国的共同利益得到了越来越有力的维护。

战后体系的第三块基石是资本主义西方和共产主义东方分裂的“两极”（bipolar）性质。在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关系经历了一段戏剧性的崎岖过程。越南战争的进行、俄罗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和非洲新的解放斗争，看来表明了核对峙的“第一次冷战”对西方而言进入了僵局。接着出现了趋向缓和的变化：勃兰特（Brandt）的东方政策追求改善与苏联之间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尼克松（Nixon）对中国的访问，关于欧洲相互合作和安全的赫尔辛基条约——即使这些受到了第三世界中持续不断的敌对关系的牵制。但是甚至在里根和撒切尔选举上台之前，一场新型的冷战就在形成之中了，特别是，美国政府偷偷摸摸地支持伊斯兰游击队抵抗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权，其目的明显是把苏联拖入一场代价昂贵和难以取胜的冲突。里根反对“邪恶帝国”的口号标志着一轮新攻势的开始，通过军事开支的急剧增长，重申技术和经



济禁运,进一步支持代理人战争与对苏联、东欧的异己运动的意识形态支持。由于“第一次冷战”——50年代和60年代的核对峙——结束于“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僵局,到了70年代,苏联集团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时期,这起因于内部民主和经济活力的匮乏: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加速了苏联集团的崩溃。

###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这三股重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秩序的浪潮当然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而新自由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框架。倘若我们不是把“帝国主义”这一词语联系于正统的殖民帝国,而是联系于一系列历史变化着的偶然结构和过程,它们再生产着全球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那么我们现在拥有什么类型的帝国主义呢?30年前,马克思主义者讨论了三种可能类型之间的平衡:列宁主义关于世界敌对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地竞争和冲突的帝国主义概念;考茨基主义关于大国共治的集体“超帝国主义”观念;或者战后美国霸权的“超级帝国主义”。然而从70年代开始,这种争论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日益崛起而变得不合时宜了。全球化主要关注贸易、外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这又大大增加了国家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凯恩斯主义隐退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显而易见的,而经济政策则明显转向了所谓关于货币和财政紧缩、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被普遍当做是政府的退却或弱化而受到关注;然而这样一来就在经验上掩盖了存在于北方/西方发达国家的“强政府”与南方/东方不发达国家的“弱政府”之间异乎寻常的差别。重要的不在于政府总体上变得“更弱小”——这是大多数全球化分析家的共识,不管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这种现象。重要的是,全球化并不仅仅是



一桩受到政府鼓励或阻碍的“经济”事务；倒不如说是政府自身变得全球化了（参见第六章和第七章）。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话说，理解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把资本主义政治看成一种制造同意的工具。

在新自由主义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统治标准围绕着国际竞争的意识形态而重新组织了起来。给予工人的信息是，只有通过低成本基础上获得世界市场才能确保就业和安全，那么既然唯有私营部门在做这些事情时是有效的，资本主义必定就会由于高利润和低税收前景的诱惑力而获得投资。这就是“别无选择”的国内政治：在每一个国家，同样的论点被用来削减福利补贴、私有化和劳动力市场管制。这是出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目标——代表资方的利益管理劳动力——而采取的新形式。

同时，全球化时期的帝国主义围绕着一种新的自由国际主义——或者说国际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重建了世界秩序。如果每个地方的工人都把跨国公司当成其就业的最终源泉和生活资料提供者的话，那么民族自决的竞争性意识形态就必须遭到废除。正如依附理论家们所争论的，全球化资本需要每个地方的精英和“中产阶级”的同意和支持，为此，就得更新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控制装备。全球化媒体兜售紧紧抓住了世界各地的社会阶级的空洞无物的消费主义；贫困到处被重新标识为由于个人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社会排斥”；政治萎缩成定期的选举，政见相似的政客团队们在选举中为了舒适安逸的生涯而竞争，把大众置于被剥削的境地。一旦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扎下根来，国家与新的统治标准的协调一致就会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的合力之保证，而两者最终都代表着资本的迫切需要。

不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精英在以这种方式更新其国内政治时都是成功的：他们遭到了国内的抵抗，面临着始终存在的在广泛国际竞争的世界中落荒而逃的可能性。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和国际机构把这个问题重新表述为“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与伦理、宗教或其

他“各个层面的”社会分离联系在一起，并且影响政府的基本运行，在此情况下政府权力的边界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它们可能由于分裂或合并而重新划定，或者可能遭到其他扮演地区性或全球性人权维护者的国家的侵入。同样的处理方式也适合诸如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的“流氓”国家，它们未能恰当地服从于新秩序。

另一方面，政府失灵可归因于“横向的”社会分化，归因于阶级斗争——例如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或者在最近的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精英们所偏爱的选择是谋求外国力量以及它们的国际机构支持，以确保他们的权力。他们会申请一笔临时性贷款或者一项贸易让步，并且将其国内对手描述为对这样的赏赐具有威胁；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那么全副武装的“自由贸易”就会以物质压制手段来支持他们。与此同时，精英们将毫不犹豫地历史中曾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中回撤，包括不知羞耻地运用种族和宗教的分歧来激励其公民在经济上与其他国家的工人展开竞争。

## 结 论

从历史观点来看，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总体上不外是一种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的“再植入”(re-embedding)。这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当即就成为了全球的和民族的。战后的秩序需要资产阶级作出重大的政治让步：为恢复世界经济，同时迫使共产主义国家陷入困境，它在北方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凯恩斯主义的福利政府，在南方提供了发展主义政府。但是，这些让步为进一步的政治挑战提供了基础：从北方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和南方不发达国家的后殖民政体，到帝国主义在国内外维持的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与此相反，这种全球资本主义的新秩序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全球的政治，以结束这些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作用就是为这种结束提供意识形态的

正当性辩护。那些依然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人们的反应也将日益变得全球化，把在过去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重要特征之一的国际主义，与地方和国家的政治行动结合在一起。

陆月宏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everidge, W. (1960)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A Report*, 2nd ed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2.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3. Polanyi, K.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4. Schumpeter, J. A. (1975)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第十章 国际贸易中的新自由主义：稳妥的经济学抑或信念问题？

索耐·德拉尼亚加拉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自由贸易中的新自由主义信念已经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正统。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正统业已被转化为政策建议。在它们那里，贸易自由主义是政策的主要焦点。发展政策的正统自 90 年代晚期以来颇有一些修订，而确信自由贸易会带来发展增长与繁荣却坚定不移。

本章考察的是自由贸易中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经验的基础。我们的意图是揭示出它建立在摇摆不定的理论基础与无说服力的经验支持之上。从根本上说，新自由主义关于贸易的立场似乎植根于对自由市场过程效率的信念，这是一种鲜有理论或经验根基的信念。

###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贸易：主要的命题

国际贸易中的新自由主义基于以下主张，即自由贸易将促进经济增长与全球繁荣（参见第四章）。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以来，国际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复兴给予自由贸易具有最大潜能、几乎公理般的地位，这种观点如今已代表贸易政策的常识和智慧。对自由贸易的信念

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部分，该共识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复兴的高峰时期颁布的。

国际贸易立场与贸易政策中的新自由主义包括这样一些见解：自由贸易将全球资源分配最优化；自由贸易将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将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与经济增长；贸易政策中的政府调节是扭曲的，会降低福利与生产率；有着自由贸易体制的国家比有着“封闭”体制的国家发展得要快；通过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而实现贸易自由化应该是贸易政策的焦点。

虽然这一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自 90 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些修订（参见第三章和第十二章），对自由贸易效率的信仰却基本上未受质疑。贸易政策中居压倒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以一套更新的贸易政策改革补充了早期的见解。贸易政策改革不再仅仅局限于降低关税，而且还包括广泛的制度、立法与政治的改革。这一观点在协调全球贸易政策的国际性组织亦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任务中昭然若揭。WTO 致力于通过诸多条约与标准，走向制度、规章与法律方面的国际性协调。因此，贸易政策如今延伸到先前被认为超出国际贸易领域的项目，诸如国内投资、知识产权与法律改革。然而，修正版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核心和明确特征依然保持了这种信念，亦即自由贸易与全球一体化是促进发展、减轻贫困的最佳道路。

### 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与贫困：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贸易理论中，自由贸易最优的结论来自于权威的赫-俄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这一模型在极其严格的假定之下提出，最优资源分配可以通过消除所有贸易限制来达到。根据这一模型，贸易应该建立在国家的比较优势之上，这反过来又是由生产要素的相对丰富决定的。然而，在过去的 20 年中，这些结论与假定遭到了众多理论

模型的质疑,它们指出国际贸易的复杂性并表明偏离自由贸易常常可以促进增长与福利(Krugman 1984)。尽管如此,国际贸易中的新自由主义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新自由主义关于贸易政策中的开放立场,强调了对经济增长、生产率与贫困的积极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这些主题的理论基础。

## 贸易与增长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用一些理论观点来支持这些预言,即开放推进了经济增长,较开放的经济比封闭的经济增长得更快。自由贸易被认为同时带来静态与动态的利润,其中,后者比前者意义更为重大。当资源在贸易限制解除之后从无效要素转变为有效要素之时,来自贸易的稳定而“一劳永逸”的利润就出现了。然而,毫无疑问,这种稳定收益的数额甚微。因此,开放促进增长的效果基本上来自于长期的动态利润。许多关于自由贸易长期利润的观点在文献中格外显眼。不过,其中的许多观点附加任意的假定,在理论上却显得支离破碎(Rodrik 1995; Deraniyagala and Fine 2001)。

来自于贸易的稳定收益通过并入政治经济学议题而获得了拓展,尤其是在寻租活动中。据称,贸易干预的资源成本因为寻租活动的存在而翻了几倍。我们看到,更为自由的贸易体制通过降低租金并增加促进增长的可获得资源而推进经济发展。然而,一些评估表明,受保护的寻租活动成本的数量应该是巨大的,它们的精确数字尚存疑问。(Ocampo and Taylor 1998)

日益增长的规模利润频频被引为来自贸易自由化的动态利润的重要来源。我们看到,中立贸易体制的诞生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出口与参与,使得公司从规模经济中产生更高的产量与利益,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全面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之上的,即自由化将必然扩大能够促进利润日益增长的活动(Rodrik 1995)。如果



规模经济集中于在自由化后收缩的被保护部门，来自于贸易的动态利润将不会实现。

因此，与开放和增长相关的许多理论争论依具体的假设和条件而定，这暗示着开放与增长之间积极的偶然的联系或许是例外而非模式。部分地出于此种理由，对于开放与增长的许多讨论基本上是经验性的。

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中的新自由主义复苏，强烈地受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崩溃的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直到那时还在遵循着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政策。这一崩溃被解释为直接由干涉主义贸易政策所引起(Balassa 1998)。然而，这一解释存在着一些问题。直到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保护之下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率，一些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出现在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一些进口替代政策体制的生产力发展，尤其在拉丁美洲，堪称强健。至于发展中国家在70年代中期之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低迷期，其更好的解释是外部的震荡(尤其是1973年的石油价格骤增)以及无法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适应这些震荡。因此，将70年代晚期的经济崩溃仅仅归咎于贸易政策，则是将宏观经济的失败与贸易政策的失败相混淆了。

在90年代，贸易自由化的正统立场从一些具有高度影响的评估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经济研究中获得强大支持(Dollar and Kraay 2000)。这些研究声称揭示了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种重大的积极的因果关联。然而，计量经济学与数据的问题导致一些指责性批评(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许多研究深受计量问题的折磨，而且贸易开放的措施反映的是贸易量而不是贸易政策的方向。考虑到更快的增长导致贸易增长的可能性，因果关系的方向很难确定。同样，考虑到有许多其他潜在影响，也很难将贸易政策对增长的影响孤立起来。

因此，与新自由主义阵营的宣言相反，对自由贸易推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的经验支持却是无说服力的。然而，对自由贸易推动增长的潜力之正统信念依然绵延不绝。正如温特斯等人(Winters et al. 2002, p. 10)在其概括贸易与增长的经验性研究中所指出的，“简单概括的吸

引力诱使人们把该行业的许多东西归之于认真采纳他们的成果。”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事例也集中于识别贸易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特定途径。关注的核心是生产力的增长。据称，贸易自由化将带来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尤其在工业上，不过也包括农业。假如来自自由化的稳定利润被公认为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生产力的发展便可视为自由化赖以推进增长的关键机制。然而，对这些论断更为详尽的观察表明，它们在理论上与经验上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长期的生产力收益将接踵而来，这是因为贸易保护通过为国内生产者提供一个受约束的市场而阻碍降低成本的技术变化。然而，在许多正统著述中，贸易自由化借以促进技术转变的精密机制从未遭到摧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统理论在这一问题上保持缄默。一些自由化的支持者认为更高层次的竞争足以促进所有部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转变 (Balassa 1988)。这些简单化的论断忽视了其他研究，如发现技术转变有时由垄断的市场结构所推动 (Deraniyagala and Fine 2001)。

经验研究主要考察贸易政策对产业和企业层面的生产率之影响 (Rodrik 1995)。大体上，这一研究提供的论据仍然是缺乏说服力的。虽然许多研究者发现在进口替代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生产力的加速在保护程度不同的部门中都可以见到。这些经验研究再次出现明显的缺陷。它们因疆域与贸易体制的界定而变化，从而难以归纳。它们中的很多研究不能充分控制其他影响生产力增长的因素，亦未能明确因果关系的方向。然而，这并没有削弱新自由主义关于开放对生产力具有积极影响的主张。许多分析家继续简单地“假定”这个积极的偶然联系的存在。

## 贸易与贫困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强调以下关于贸易的论断：更大的开放将促进贫困的减少。贫困通过贸易与经济增长相连接，促进与贸



易自由化相联的经济增长可视为减少贫困。虽然促进经济增长可能恶化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过看来这与来自更自由的贸易的增长无关。这样,更大的开放并没有带来收入分配上的急剧恶化,而且这还平衡了积极增长对贫困所造成的影响(Winters, McCulloh and McKay 2002)。然而,对贸易与贫困的正统研究再一次打上了理论不一致与经验缺陷的印记,这在很多新自由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文献中非常明显(参见第十五章)。

有一些机制通过开放减少了贫困已经得到确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中立的贸易体制意味着在资源由资本密集型进口替代活动转移出来时,增加劳动密集型生产。这增加了对劳动力尤其是非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这和非技术性劳动力工资的潜在上升的压力,很可能带来贫困率的缩减。然而,贫困率最终是否下跌依赖于非技术性工人的收入是否高于贫困线。而且,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出口部门所使用的最密集的劳动力有可能相对而言是技术性的。假如相对而言技术性的劳动力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减少贫困就不太可能了。

与贸易自由化相伴随的农业增长也被正统贸易经济学家视为能减轻贫困(参见第十四章)。人们期待,伴随着自由化而来的农业出口量增长将降低农村的贫困率。然而,如前所述,面对提价的刺激,人们期待中的农业供给的回应往往不会到来。而且,即使一小部分农民通过扩大出口来回应价格上涨,贫穷的农民还是会退出这一进程(假如他们从事少有余粮的自足式农业生产),对农村贫困的积极影响也就甚微了。人们预期,贸易政策改革将完成从粮食作物生产向经济作物生产的转变,为穷人带去增长了的收入。然而,尚有其他影响阻碍这一转变。如果经济作物价格趋于浮动,农民将不愿承担这种增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而且,经济作物的出口将不会增长。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还将依赖于农村的穷人是否基本上是农产品尤其是食品的净购买者。如果大多数穷人是食品的净购买者,食品价格



的上涨将会带来更严重的贫困。

据称，贸易开放通过对腐败与寻租行为的影响来减少贫困（参见第二章）。新自由主义假定自由化之后寻租行为将减少，而减少贫困的资源将随着改革而变多。且不管寻租行为的减少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贸易政策改革的资源与税收问题常常较为复杂。如果开放削弱了政府通过对流动因素如资本等征税来增加收入的能力，则有时可能会限制减少贫困的努力。贸易自由化也可以通过它对贸易税的影响间接影响贫困。事实上，在自由化的较早阶段，当一个国家从数量控制转向较高水平的关税之后，来自贸易税的收入也会增加。然而，接踵而来的是，来自关税的税收也将随着关税水平的下降而减少。收入的这种下降被视为在减轻贫困方面强制性的政府支出。不过，这一关联不是不变的，但是在分析开放对贫困的影响时，务必将其铭记于心。

## 新自由主义与政治哲学

本章的讨论已经表明，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贸易具有使增长与福利最大化之潜能的信念存在着理论与经验的缺陷。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虽然大量著作详释了这些现存的缺陷，新自由主义阵营对自由贸易并没有作出根本的反思。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过修正的正统学说中，对自由贸易的忠诚依旧未改，与此同时，贸易政策改革的成分在后 WTO 时代扩大了。

因此从根本上说，新自由主义对开放的支持看来建立在政治与哲学基础上，而不是健全的经济学基础之上。虽然经济理论并没有证明自由市场是更为有效的，新自由主义仍然更倾向于哲学基础上的自由市场而非政府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立场被拉尔(Lal)与拉贾帕西拉那(Rajapathirana)更恰当地捕捉到了，他们认为有必要拥护“对立官方的市场”。巴格沃蒂(Bhagwati)也提及，即使经济理论在对自由贸

易的支持上是支离破碎的，“常识与智慧却会压倒性地支持自由贸易。”

(Bhagwati 1980, p. 41)

## 结 论

这一章论述的是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贸易的局限。除去这里涉及的具体观点，开放一般来说是有益的主张仍受制于另外一个基本错误，即：“开放对增长与贫困有益”的论断在不同的体制与历史语境中同样适用。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有过一些修正，新自由主义对体制因素——它们往往介于贸易政策及其结果之间——却置若罔闻。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执行及其影响高度依赖于个别国家的具体的历史与政治因素。过去 20 年贸易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一套统一的“蓝图”往往在关键的指标如增长与贫困方面会有不同的影响。虽然新自由主义关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共识意味着自由或更自由的贸易如今很受经济学专业的宠爱，然而，它对加深我们对具体国家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因素——它们使得任何贸易的结果复杂而难以预测——的理解鲜有贡献。

高艳萍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alassa, B. (1988)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Uruguay Round', *World Economy* 11(1), pp. 39 - 54.
2. Bhagwati, J. (1980) 'Is Free Trade passé after all?',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25, pp. 17 - 44.
3. Deraniyagala, S. and Fine, B. (2001) 'New Trade Theory versus Old Trade Policy: A Continuing Enigm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 25(6), pp. 809 - 25.
4. Dollar, D. and Kraay, A. (2000)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king paper 2507.
  5. Krugman, P. (1984) 'Import Protection as Export Promotion', in H. Kierkowski (e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Lal, D. and Rajapathirana, S. (1987) '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 pp. 189 - 217.
  7. Ocampo, J. and Taylor, L. (1998) 'Trade Liber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dest Benefits, but Problems with Productivity Growth, Macro-Price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conomics Journal* 108 (3), pp. 1523 - 46.
  8. Rodriguez, F. and Rodrik, D. (2001)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keptic's Guide to Cross-National Evidence', in B. Bernanke and K. Rogoff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9. Rodrik, D. (1995)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Reform', in J. Behrman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3b,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0. Winters, A., McCulloch, N. and McKay, A. (2002)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Poverty: The Empirical Evidenc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CREDIT Research Paper 02/22.



# 第十一章 “常见的货币实践的避风港”：国际货币与金融的新自由主义之梦

简·托波罗斯基

跨界信用和货币资本转移、国际金融，在跨界支付的意义上，一直在经济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人们经常看到，国际货币与金融活动使贸易可以到达地球的任何角落，并到处培育资本主义商业企业，而无需任何政府与社会的指导。在这个世界观的背后是对金本位年代的怀旧之情，该年代大抵在 1870—1914 年之间，其时，世界通货以固定的比率兑换黄金。一战期间这一体系的崩溃是与国际支付和资本流动的中止相联系的。它于 1925 年的回归受到了奥利弗·斯普拉格(Oliver Sprague)的欢迎，这位美国政府与英国银行的顾问在如下段落中表达了他的欣喜之情：

这次常见的向货币实践避风港的回归，对以下广泛的信念意义重大，即金本位是维护国际稳定合理举措的核心因素，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行的替代物。(League of Nation 1930, p. 53)

财政的不稳定性曾经与货币和汇率的金本位的缺席相关。这种不稳定性引起并继续滋生着一种错觉，即国际金融体系可以提供一个处理经济问题的自动机制。纽约国家经济研究局在 1940 年如是报告：

在 1925 年之前，集中关注回归正常及实现固定汇率的目标，而 1925 年之后，固定汇率的光辉总的来说遮住了银行家以及整个世界的眼睛。经济失调应该通过自动力量来加以纠正这一幻觉在世界的金融思想中占有统治地位(Brown 1940, p. 801)。

国际金融对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方案至关重要，在该方案中，任何不平衡将通过保证供需平衡的市场力量而自动消除。任何金融的不稳定性皆归咎于国家或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而它可以在不挑战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下加以补救。在我们的时代，这个观点重新遵循着曾被否定的凯恩斯主义“大政府”体制与经济稳定政策(参见第二章)。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直接和间接管理经济的时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政策是在颠覆经济稳定性与资本主义事业。今天，政府服从于它们的经济政策以促进商业与财政。(100 多年前，霍布森谴责“为个人利益……而掏公众的腰包”，以及将“公众资源”用做“私人投机特权”[Hobson 1938, pp. 97 and 59].)凯恩斯主义稳定政策废除之后，经济不稳定性日增，要求对这种不稳定性作出解释并代之以增强稳定性的替换措施。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经济混乱来源，为资本主义辩护者们的改革热情提供了一个目标。他们坚持“金本位”信念，相信存在着某种国际货币与金融的安排，在此情况下资本主义的问题将会由市场力量自动加以解决。

## 国际金融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西方联盟的政治领袖在一次政府间会议上寻求“回到常见的货币实践的避风港”，这次会议于 1944 年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但是直到那时，还没有任何回到金本位的可能。

缺少黄金储备的中央银行无法回到金本位，苏联流失的五分之四黄金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协商的结果是一个间接的金本位。中央银行及它们的政府被迫对美元维持固定的汇率，而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受命将美元与黄金比价维持在 35 美元/盎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监督固定汇率制的实施而设立。未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允许，政府不得改变本国货币汇率。如果一个中央银行耗尽了用于维持其固定汇率的黄金或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出借美元。世界银行也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重建提供资金，随后又为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

从这个时期起，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霸权确立。这种通货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购买所有其他的通货或资产。其他的所有通货可用于发行国国内支付所需，但在这个国家之外很少被接受。然而，汇率的稳定性却不太容易维持。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美国平均每年出现 10 亿美元之多的国际收支逆差。这些美元很少流回美国购买美国商品或金融资产：美国的利率低，而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意味着任何国外的银行都愿意保存这种货币。这给予美国唯一的“帝王”特权：它的臣民可以拿联邦储备系统很容易印刷的美元为其净进口买单。事实上，所有其他国家必须通过紧缩需求来控制进口，以避免耗尽了外汇来购买进口货。美国在其代价昂贵的越南战争之后对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干涉，加剧了美元的持续外流。

在美国之外持有的美元主要出现在非官方的、非管制的美元市场上，首先是伦敦，然后是新加坡。这些市场中的利润较之美国管制下的市场要高得多。这使得在这些“欧洲市场”中储存美元更具吸引力，而其主要银行无论如何是美国银行。借款者也发现从这里借贷要方便得多，因为他们不必服从中央银行关于外币借贷的规定。这些规定是中央银行在布雷顿森林用以保持固定汇率的方法的主要部分，尤其是政府发现在欧洲市场借贷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受到的盘问要少。欧洲市场于是大量出现小的“海外”持有或在本国以外发行的“欧洲货币市场”，



以及欧洲货币债券市场。

一些外流的美元回归并兑换成黄金，因此这几十年的特点是黄金储备持续从美国外流。到 1970 年，美国在维持美元相对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的固定比价的黄金的可兑换性方面已经明显吃力。1971 年，美国政府中止了兑付黄金。1973 年，固定汇率制被取消（参见第二十二章）。

## 国际金融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于 1971 年崩溃以后，主要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物价上涨的经济不景气之中，也就是所谓的“滞胀”（stagflation）。原料的价格暴涨，原油尤其突出，它从 1973 年到 1976 年间上涨了 4 倍。发展中国家骤然经历了巨大的出口盈余（假如它们人口不多，而且拥有一种昂贵的商品例如石油出口的话），或是陷入贸易赤字（假如它们是石油进口国）。扩大了出口收入，尤其是在石油出口国，找到了通向欧洲市场之路。在那儿，主要的借款人就是那些有着难以忍受的贸易赤字的国家。出口盈余经国际银行体系流向具有长期贸易赤字的国家，这样的“回流”早晚会在债务危机中崩溃。

1982 年 11 月，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巴西政府、阿根廷政府和波兰政府很快加入了这一行列。（国内的债务要好办得多，因为政府可以提高税收或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偿还国债。）要是全靠市场力量，贷款给它们的银行早已遭殃、崩溃。债务一旦以这种方式“消失”，向挺过危机的银行申请国际融资的活动将更谨慎地重新开始。然而，当经济自由主义者对国际债务膨胀的 20 世纪 70 年代中占支配地位的美国国际银行欢呼之时，热爱市场的美国罗纳德·里根政府却在 80 年代限制市场与这些银行间的关联。这不是头一遭，30 年代经济萧条期间美国银行的错误曾魔鬼般地导致经济灾难，如果美国国际银行当时

被允许倒闭的话，“系统失灵”将导致这场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在 70 年代因为固定汇率的瓦解以及政府可以轻易地向欧洲市场借款而被边缘化，而今重新有所作为。它的新作用是通过向曾占支配地位的美国国际银行体系对政府的债权提供再融资来为其恢复名誉 (Strange 1986)。再融资的代价是严格紧缩财政的一揽子稳定方案，被称为“结构调整”。这貌似自愿，但是申请贷款的政府知道怎样才可以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 (参见第十二章)。向国际银行要更多贷款的请求，亦即 1986 年的贝克倡议失败了：大多数银行家足够精明地意识到，向不能偿还已有债务的政府提供更多贷款至少是轻率的。

1989 年的布雷迪倡议 (Brady initiative) 更为成功。这包括将外国银行的债务转换成以美国政府债券担保的债券，当然这一债券的估价得有些降低。担保这些布雷迪债券的美国财政部之介入表示这样一种责任，即美国政府如今致力于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或者表明美国利益插手国际金融之方式，随你怎么看。从另一方面来讲，美国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了美国银行的再融资工作，可见新自由主义不是很突出。它们对再融资的承诺与严格清理形成对照，后者是在 90 年代期间继出现市场危机之后强加给外国银行的 (Brenner 2000)。

## 国际金融的稳定

布雷迪倡议的成功得归功于长期债券市场的繁荣，这正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期间日本 (直至 1991 年)、美国和英国金融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使得进入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出售长期债券，以为银行与负债政府再融资较为容易也相对便宜。这些长期债券市场的繁荣有两个原因。首先，按照 1989 年的巴塞尔协议，国际清算银行可以规定额外的银行资本要求，用以应对持有外国资产或贷款的高风险。进



入流动资本市场的银行可相对容易地提高额外的资本要求。

北美与英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流动)的另一个影响是,其他政府想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建立这样的市场。这种市场为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提供了在国内发行债务的可能性,这易于管理与偿还,因为它是在本地流通的。80年代,这样的金融发展在债务国政府“结构调整”政策的名义下被设想出来。“结构调整”背后的理论是私营企业将在政府调节缺席的情况下自然地繁荣起来。然而,扩张私营企业需要金融资源的支持。这将金融自由化,或将“金融强化”——即如其倡导者所称——带入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前沿,使之成为将国内私人储蓄流动起来用于私人投资的途径,成为有争议的以外国存款来扩张国内存款与外国存款的方法。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鼓励金融中心与证券市场运作,金融自由化将获得促进。国内资金流通过直接将退休金注入市场获得保障。一旦股票市场兴起,国外有价证券投资便会被投机获利的可能性所吸引。这带来了国外货币资本,其向本国货币的转化有利于稳定资本流入国的汇率。这些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市场被称为“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表示它们从落后状态与政府管制(“金融衰退”)中诞生,进入现代、理性与启蒙的国际金融市场轨道。

然而,涌入新兴市场的资本会以比进来时更快的速度涌出。尤其是,金融通胀以及任何出乎于此的投资使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需求惊人地增长了。于是,较多的进口也进一步增加了资本流入的数量,这是维持汇率稳定所必需的。如果汇率下跌,那么,国外资本持有者的资产就会贬值(主要是北美与西欧的投资基金)。任何贬值的威胁将会引起资本逃离新兴市场。这样的贬值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它引起了金融市场的崩溃:1995年在墨西哥,1997年在东亚,1998年在俄罗斯,2001年在土耳其,以及2002年在阿根廷(Stiglitz 2002)。

一般规律是,每一次危机,从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到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后者的再融资成本是前者的两倍;同样,1995年墨西哥危



机的再融资成本两倍于解决 1982 年债务危机的成本；东亚(1997)两倍于墨西哥；而俄罗斯危机两倍于东亚危机。为避免国际银行与投资基金的崩溃而增加的费用，大部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人民承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贷款给新兴市场的政府，而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得不忍受经济衰退与公共服务的下降，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付的代价。到 90 年代中期，很明显，如果只有美国政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近 40% 的资金来源，而且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金钱来保障国际金融的稳定性，这个局面是撑不住的。

为了限制自己的金融义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90 年代末转而采用对政府的选择性自动支持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根据其成员国政府的财政稳定性作出报告，只有那些有着“强大”金融体系的政府才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支援。然而，新兴市场的政府意识到美国国际银行在华盛顿的影响。因此，维持这些银行在新兴市场的运行是一项保险政策，它在新兴市场经历危机时能保证华盛顿的支持。以同样的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勉强地于 2002 年帮助了阿根廷。

## 结 论

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对私利的毫无节制的追求应能够被遏制并通过自然出现的市场力量而转向总体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这一学说忽视了由金融财富赋予的政治与社会力量，要是这一学说被运用于国际金融，这种力量会变得格外明显。该制度远非如金融自由化的鼓吹者所向往的那样理性与纯洁，它仍然腐败，并且依赖于政府支持。只是腐败的受惠者有所改变。先前，贫困国家卑劣的官僚主义者将金融资源导向他们偏爱的项目。如今，国际银行家与基金管理者，以及他们在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中的支持者，将融资导向亲美政府和他们喜欢的伙伴。与此

同时,稳定性并未得到保障:对有着“合理”金融体系的国家的选择性援助只是意味着,若是危机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爱莫能助,除非这个危机恰好发生在一个在华盛顿拥有朋友的国家。

国际金融的批评者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以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并使其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最常见的建议是回到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存在的跨国资本控制。然而,国际银行存款与留在国外的金融资产而今如此巨大,以致很难加强控制。事实上,取消这些控制的主要理由恰恰是因为它们不能付诸执行。

托宾税(Tobin tax)是最著名的稳定化措施之一,它由杰出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作为稳定汇率的办法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这是一种在外汇交易上介于0.5%与1%之间的税收。这种税收的最近支持者建议将其收益用于支援贫困国家的金融发展项目。在那些为更国际化的秩序而战的人们那里,它拥有非常普遍的支持。然而,批评者,如美国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认为,它在国际金融问题上是无效的。苏格兰经济学家约翰·格拉尔(John Grahl)认为,它只会使得在美国之外发展金融市场显得格外棘手(Grahl and Lysandrou 2003)。剑桥凯恩斯主义者杰弗里·哈考特(Geoffrey Harcourt)建议征收投机税。无疑,来自这种税收的基金可以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进步提供资金。但是,从金融稳定的观点来看,凭借这种税似乎无法消灭投机现象。如果投机集中在回报最高的地方,市场会变得更加不稳定。笔者已经指出,中央银行应该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抵消投机影响,从而更有效地管理金融市场(Toporowski 2003)。但是这需要在中央银行运行的方式上做一个大转变。

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经历着贫困、失业与她或他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崩溃——由于其政府变成了外国银行和金融利益的收债人,因此该制度使经济恶化,即使该社会和國家的主要利益结构没有恶化,也得不到什么安慰。美国与英国的金融体系因资助养老金计划的强制性捐赠支撑的自由放任主义财政体系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业增长

缓慢,就业率低下(参见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它们糟糕的投资记录与新自由主义者的传统金融智慧相违背:鼓励投资的最佳方式是将更多的钱委托给投资银行或国际基金管理者。然而,只要从市场可以获得投机利润,反对为制度改革和使之更有效率所必需的国际合作就会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高艳萍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renner, R. (2002)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 Brown, W. A. (1940)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Reinterpreted, 1914—1934*.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3. Grahl, J. and Lysandrou, P. (2003) ‘Sand in the Wheels or Spanner in the Works? The Tobin Tax and Global Fina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7 (5), pp. 597 - 621.
4. Hobson, J. A. (1938)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first published in 1902).
5. League of Nations (1930) *First Interim Report of the Gold Delegation of the Financial Committee*.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6. Stiglitz, J. E. (2002)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Allen Lane.
7. Strange, S. (1986) *Casino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8. Toporowski, J. (2003) ‘The End of Finance and Financial Stabilisatio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29 Jahrgang, Heft 4.



## 第十二章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议程<sup>①</sup>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

最近 20 年,有关经济发展政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上。这个“共识”反映了设在华盛顿的三大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在发展政策上的汇聚点,是围绕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而为贫穷国家开出的政策处方。这个共识最终扩展到其他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

本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相关的理论与政策处方、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关系。本章结束时将对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一些反思。

### 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华盛顿共识

在解释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有关政策时,新古典经济理论

---

<sup>①</sup> 我要感谢本·法恩(Ben Fine)和卡洛斯·奥亚(Carlos Oya)允许我在写作初稿过程中阅读了一些他们还未发表的论文。

的三个方面非常重要。首先,在微观经济学层面,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是有效率的,而国家是无效率的。因此,应该由市场而不是国家解决诸如产业发展、国际竞争和创造就业之类的经济发展问题(参见第三章)。

其次,在宏观经济学层面,这种理论假设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资本流动性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参见第七章)。尽管这为吸收外国生产性资本和金融资本以推动本国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可能性,但这种增长只有在国内政策服从(金融)市场的短期利益时才能取得——否则无论是国外资本还是国内资本都将流向别处。再次,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是利率。“合适”的利率被假定能够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低通胀率、可持续的投资与消费,以及长期的高速增长。

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暗示,穷国依然贫穷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机器、基础设施或资金(这曾经被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而是因为错误的政府干预、腐败、无效率和误导的经济激励。新自由主义者宣称,应该让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而不是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假设暗示,特定的发展政策是一种“自然”需要。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当“收缩”,以便集中关注三个方面:防止外敌入侵、为市场运行提供法律基础和经济基础,以及为维持和扩展市场关系充当社会集团之间的中介(参见第六章)。随着政府的收缩,“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地扩张,相应的价格也由资源有效性和消费者偏好决定,而非取决于政治因素。自由市场的价格十分重要,因为它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正确”的激励。有助于产生上述结果的经济政策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和取消政府计划。

为消除政府预算赤字、控制通货膨胀和再次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原则必须得到强调。具体措施主要有:税制改革、削减开支和转移政府投资,即政府投资从直接的生产部门(如供电、电信)转向提供公共物品,尤其是卫生和教育。

新自由主义也建议对外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贬值,因为前者能使国

内企业在(假定更具竞争力的)外国厂商压力下变得更有效率,而后者能刺激出口和促进基于本国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收支的资本账户也应该自由化,这样就能利用外国投资流入,作为本国储蓄和投资的补充(自由化也将方便资本流出,但这也被假定增强了流入国的吸引力)。最后,为提高储蓄有效性和投资收益率,国内金融制度自由化也非常重要。

新自由主义者指出,为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也非常必要。这主要包括简化雇佣和解雇制度、劳工关系分散化、削减工会权利、取消集体合同和保护性规章,以及削减社会保障。

各种政策、制度和激励的共同目的是削弱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通过这些措施,使(金融)市场有能力决定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和经济发展的优先次序,它既体现在时间上(投资和消费水平),又体现在空间上(投资资金的分配和产品与就业人口的构成)。

那些国际收支由于债务或货币危机而严重失衡的国家,除非同意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的稳定计划和结构调整计划,否则不可能从它们那里获得贷款。“同意”当然是迫不得已,因为当这些国家急需外汇时,总是发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拒绝给它们贷款,除非它们实施新自由主义调整计划(Weeks 1991)。在过去的20年中,大约有100个贫穷国家被迫同意了一项或多项调整计划,从而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标签贴遍全世界。

### 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

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能给许多国家带来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但这并不能代表这些改革是合适的,而只是因为许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认为这些改革是“可信的”,相信他们能在对外资本流动中获利,尤其是资本流向那些中等收入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



哥、南非、韩国或泰国。如果这些国家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再加上富国相对缺乏投资机会,国外资本能在好些年内为这些国家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供给资金。但一般说来,那些低收入国家,如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巴拉圭、斯威士兰或坦桑尼亚,却无法得到这种收益,因为这些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缺乏吸引力,没有能力吸引资本流入。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果更加严重,它们的前景比那些中等收入国家黯淡得多。

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的批评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缺陷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经验问题。

### 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在这个方面,四个问题尤为突出。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市场信念甚至与新古典理论相矛盾。利普西(Lipsey)和兰卡斯特(Lancaster)所作的(彻底的新古典主义)次优分析表明,如果一个经济在几个方面背离了完全竞争的理想模型——就像所有经济总会发生的那样——那么去掉一个方面的不完全竞争(如国家石油垄断的私有化)并不能使经济更有效率。因此,每项政策改革都应该因时、因地制宜,而不是千篇一律。

在政治上,富国的新自由主义试图取消“凯恩斯共识”和收缩福利政府,至少部分如此。而在贫穷国家,凯恩斯主义和福利政府从未存在过,尽管政府干预经常是笨拙和无效率的,但对经济快速增长和维护社会公平仍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些国家华盛顿共识政策使政府没有能力解决一些迫切的社会问题,如贫困、失业和收入与财富的集中问题。

另外,尽管新自由主义者为了论证市场改革而经常计算政府干预的成本,但很显然,他们并没有系统地考察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由持续的低增长所引起的动态福利损失、高失业的

社会和经济成本、(自由)进口奢侈品和资本外逃引起的外汇浪费,以及建设新自由主义改革所要求的产业基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后,可替代新自由主义的事例并不鲜见。尤其是富裕国家,并没有因奉行新自由主义而变得更加富裕(Chang 2002);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的快速增长期都没有实行新自由主义,例如拉美(1930—1982年),东亚(1960—1998年)和中国(1978年至今),快速增长期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处方相抵触。

## 经验问题

经验问题可以分为五个部分。首先,华盛顿共识政策整体上有利于国内外的大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而以小资本和工人蒙受损失为代价。财富向富人的转移,以及由新自由主义的通货膨胀迷信所引起的增长减缓,几乎使每个国家都出现了失业剧增、工资停滞和收入集中(Milanovic 2002)。而且,变化莫测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使穷国频繁地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例如墨西哥 1994—1995年,东亚 1996—1998年,俄罗斯 1998年,巴西 1999年,土耳其和阿根廷 2001年)。

第二,解除经济管制降低了经济活动的协调性和国家制定政策的能力,妨碍了鼓励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例如,如果国家的运输网络分属于相互竞争的企业,那很难通过优化运输路线来降低产品成本。“市场自由”提高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更容易引发危机。

第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采用一系列相互强化的政策,来打破以往常被定义为无效率就业和传统产业的产业。但破坏的恶果很少为新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弥补,从而导致结构性失业、贫困加剧、穷人边缘化、原有产业链的断裂,以及国际收支更加脆弱。

第四,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战略朝着“商业信心”(business confi-

dence)大力调整。但这很难令人满意,因为信心既是无形的又是难以捉摸的,它受制于突然和任意的变化;而且,这个战略总是高估新自由主义改革所能达到的投资水平。

最后,新自由主义政策不能自我纠正。然而,它们的失败往往会引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进一步干预而超越经济政策的制定,在确保华盛顿共识政策实施的借口下直接进入管理和政治程序。

### 后华盛顿共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贫穷国家对华盛顿共识产生了普遍的不满,这种不满通过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主流评论得到了明确表达(见第十五章、第十九章和第二十七章)。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华盛顿共识不能解释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功,新自由主义政策未能在提高经济绩效方面有显著的成绩,以及调整计划中过于严厉的尺度对穷人极为不利。渐渐地,连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也开始承认调整计划不起作用。

对新自由主义正统的背离,在 1997 年斯蒂格利茨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了。斯氏是“新制度经济学”(NIE)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利用新职位阐述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尽管他在 1999 年离开了世界银行,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被抛弃,仍然在全世界保持着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竞争和市场,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重点转移到研究市场失灵的启示和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分析制度差异或变迁所造成的不同结果。这种理论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为细致的解释(Harris et al. 1995)。例如,发展不再像新古典经济理论那样,简单地归结为人均 GDP 或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是包括产权分配、工作方式、城市化和家庭结构等多方面的变化,而这些显然是发展的重要内容。新制度



经济学认为,穷国由于误导的经济行为准则、错误的产权界定和其他的制度约束,往往不能获得增长。在这些方面新制度主义比新自由主义更具优势。例如,它能为政府干预提供积极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不仅包括经济政策的转变,还包括详细的法律和司法改革建议(主要目的是保护产权和保障企业收益)、市场友好型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超越国有银行私有化的金融改革、反腐败方案,以及政治民主改革(这项改革由于涉及到自由和人权,因此不是直接的经济改革,但主要目的还是削弱政府权力和减少它们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力)等等(Pender 2001)。这套更广泛的政策建议被称为“加强的约束”(enhanced conditionality)。

### 对后华盛顿共识的批评

后华盛顿共识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发展过程的核心是深刻的社会关系变迁。因此,局限于宏观经济整体的分析既不充分又可能产生误导。这个结论也证实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政治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提出的一些批评。

然而,尽管有这些优点,后华盛顿共识仍具有与华盛顿共识类似的缺点<sup>①</sup>。特别是,它们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包括简化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把交易视为人性一部分而非社会一个方面的教条主义假设(Saad - Filho 2003)。因此,对后华盛顿共识而言,市场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造物,尽管在某些条件下市场的最优性能被怀疑,但市场自身是没法怀疑的。其次,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为穷国提供了非常类似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都非常保守,都支持“自由”贸易、私有化、自由化和解除管制。两者间唯一

---

<sup>①</sup> 参见以下精彩文章: Fine et al. (2001); Standing (2000)。

的重要区别是改革的速度、深度和方式，因为新制度主义认为局部的政府干预也许对纠正特定的市场失灵有效。

斯蒂格利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激烈的争论使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差别显得很大。然而，两个共识无论在基本的经济理论还是对穷国的政策建议上都是一致的，因为两者的理论相互兼容，而两者的政策建议在本质上并无差别。事实上，这两个共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策上的两个分支。

## 结 论

多年的实践证明，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处方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关键问题并不是在有无调整计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作比较，或者比较调整前后的增长速度，或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斯蒂格利茨追随者强加的政策改革中作出选择。

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两种版本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所推动的增长类型。由于这种增长方式使得收入和权力更加集中，使剥削永久化和阻碍人类潜能的发挥，因而并不令人向往。新自由主义的局限和不足使贫穷的大多数认为有必要为他们的国家选择替代政策，因为他们整整一代人几乎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受益。替代政策必须有助于实现平等、民主和社会公正，有利于经济增长、大众就业和社会包容，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为最大多数人创造福利。实践证明，这些目标只能通过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配套实施来实现。

换言之，贫穷国家经济体系的缺陷、失败和无效率本身并不是因为过度的政府干预。一个目标明确、内部团结的强大的民主国家，如果能够合法地控制那些经济强势群体的资源使用，那无论如何都比单纯依

靠市场更能实现民主经济目标。这种国家有可能调动经济和社会组织自觉地追求这些公共目标,而不是由政府命令或控制整个经济社会而损害民主。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重新认识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广泛动员民众反对新自由主义,明确自身的目标,坚持由最大多数人作出政治决定。

杨明辉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Chang, H. J.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2. Fine, B., Lapavitsas, C. and Pincus, J. (eds) (2001)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yon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London: Routledge.
3. Fine, B. and Stoneman, C. (1996) 'Introducti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2 (1), pp. 5 - 26.
4. Harriss, J., Hunter, J. and Lewis, C. (1995)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5. Milanovic, B. (2002) 'Tru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1988 and 1993: First Calculation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s Alone', *Economic Journal* 112, pp. 51 - 92.
6. Pender, J. (2001) 'From "Structural Adjustment" to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amework": Conditionality Transformed?', *Third World Quarterly* 22 (3), pp. 397 - 411.
7. Saad-Filho, A. (2003) 'Introduction', in *Anti-Capitalism: A Marxist Introdu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8. Standing, G. (2000) 'Brave New Words? A Critique of Stiglitz's World Bank Rethink',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1, pp. 737 - 63.
9. Weeks, J. (1991) 'Losers Pay Reparations, or How the Third World



Lost the Lending War', in *Debt Disaster? Banks, Governments, and Multilaterals Confront the Crisis*. Geonomic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dvancement Series, pp. 41 - 63.

## 第十三章 对外援助、新自由主义和美帝国主义

亨利·维尔特迈耶 詹姆斯·彼得拉斯

海外发展援助(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 ODA)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因为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推动,帮助它们促进产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这种发展前景已由发达国家勾勒出来,它们组成了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富人俱乐部”。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对外援助——把它当做一种提升援助国家和机构的地缘政治战略利益的手段,服务于捐助者而非受援者的利益。在 1971 年布雷顿森林世界经济秩序的顶点(但危机也即将到来),这种观点被表述在“帝国主义援助”(aid as imperialism)的概念中。

然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随着“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旧的世界经济秩序也几乎崩溃(参见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二十二章)。因此,整个“体系”需要重建——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扩张和积聚创造条件。但直到 80 年代才找到应付危机的战略措施,即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创建以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准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这种模式也被美国政府用来作为恢复世界霸权的手段。

这些变革的动态众所周知,鲜为人知的是海外发展援助(ODA)在此进程中的角色。本章的目的是对这种角色、尤其是对其涉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发展模式的方面提出一些批评。

###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援助：与共产主义的诱惑斗争

在沃尔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chs 1992)及其同事看来,发展是在 40 年代后期作为一种帝国主义用语而“发明”的——为那些争取从殖民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民套上新的统治关系。“发展”观念自身可以追溯到杜鲁门总统在 1949 年 1 月 10 日宣布的海外发展援助的“四点”计划(“Four Point”programme),但它的多边形式来源于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在 1948 年对智利及后来对巴西和墨西哥的资助计划。世界银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支柱,用于帮助恢复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和国际贸易进程。

就海外发展援助而言,美国政府是迄今为止的主要捐赠者,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考虑决定了它所采取的形式。这些考虑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从一开始就有关于“对外援助”可能用途的政策辩论。核心问题是如何扩张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就此而言,有人认为促进世界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把欠发达国家纳入西方集团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也无助于促进美国利益。但主流观点认为,海外发展援助是提升美国地缘政治利益(防止共产主义扩散)的有用手段,并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援助：改革还是革命？

在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重点是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和为国有及私有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帝国主义政策用语中所谓的“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然而,在拉美,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革命所带来的压力——防止出现另一个古巴。为此,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推动了



国家主导型改革，督促政府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

很多海外发展援助都采用了双边形式，但美国国际开发署日益把非政府组织作为自己的执行工具，绕过政府而更直接地资助当地社区（local communities）。这些非政府组织（美国的“私人志愿组织”）不仅为海外发展援助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通道，而且为捐助者提供了各种附加的“服务”和利益，包括加强寻求发展的地方组织和削弱具有反资本主义体系倾向的阶级组织。同时，非政府组织也附带地——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违背”许多成员的初衷——不仅用来避免革命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用来宣扬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优点，如政治上的选举制度、经济上的市场机制和社会变革的改良途径。

事实上，这些非政府组织充当了美帝国主义的执行工具，倡导为美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它们像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不断传播福音书的传教士那样，不断地传播改革、民主之类的漂亮口号，散布各种有关潜藏的“邪恶势力”（共产主义和革命）的情报。

新传教士和老传教士之间的差别——也许没有根本性差别——就是新传教士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介入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非政府组织不是传播福音书的空想家，它们通常由那些试图通过自己的帮助来改变他人生活的“热心人士”组成，它们为捐助者和受援者作中介时，很可能不由自主地宣扬取代革命变化的另一条政治途径——这也正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为它们提供资金的原因。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广大的捐助团体都把非政府组织视为“发展事业”的合作伙伴，共同帮助当地社区远离革命，促进其改良主义的变化。

### 体制转变中的对外援助：1973—1983 年

战后时期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但随着 70 年代初期长期危机的爆发和寻求摆脱危机的体制调整，“黄金时代”走到了终

点。调整的战略之一就是资本对劳动的直接进攻。其他的调整措施还包括创建更富有弹性的管制形式——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和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一系列政策改革(结构调整计划)。后福特主义是全球性的金融体制调整,最初以“官方”海外发展援助的形式提出,主导了当时南北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官方途径的国际资源转移)。

就金融资本而言,当时主要采用了海外发展援助的形式,用来作为刺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必需资金的补充。但直到1983年,这种官方的“金融资源”转移才开始投入到建设经济基础设施的工程中。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后,这种“官方”的资本转移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在发展中国家承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下才给予贷款。

也直到此时,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才取代海外发展援助,用来为发展中国家的“自有”发展战略服务。但在1983年以后,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接受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改革前提下才能获得银行贷款。与此同时,在全球性危机的警示下,美国和欧洲的商业银行推行了一项商业贷款政策,促使私人资本和债务融资迅速扩张,不但超过了“官方”的资本流动(ODA),而且在一些年度(7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超过了跨国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表13.1揭示了这种资本流动及它们的收益情况。

表 13.1 1985—2001 年南北国家之间的长期资本流动

(单位: 10 亿美元)

	1985— 1989	1990—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资本流入									
海外发展援助	200.0	274.6	55.3	31.2	43.0	54.5	46.1	37.9	36.2
私人	157.0	547.5	206.1	276.6	300.8	283.2	224.4	225.8	160.0
总计	357.0	822.5	261.4	307.8	343.8	337.7	270.5	263.7	196.2

续 表

	1985— 1989	1990—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资本流出									
外商直接投资利润	66.0	96.5	26.5	30.0	31.8	35.2	40.3	45.4	55.3
债务支付	354.0	356.5	100.8	106.6	112.9	118.7	121.9	126.7	122.2
总计	420.0	453.0	127.3	136.6	144.7	153.9	162.2	172.1	177.5

资料来源：IMF(2002)；World Bank(2002)；OECD(2000)

表中的数据反映了一些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1) 在 90 年代，海外发展援助逐渐让位于私人资本流动；(2) 商业贷款在 80 年代(因债务危机)和 90 年代(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两度锐减；(3) 外商直接投资日益成为资本流动的主流(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称的“私人部门外资流入的主干”)，主要用于收购私有化公司和兼并其他企业，这引发了全球范围内资产和收入的集中。

表 13.1 也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生产性资源和金融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巨大回流，这无疑使发展中国家元气大伤。如拉美国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各种投资收益形式的资本回流(利润、债务利息支付和股权投资)，估计超过了 7 500 亿美元(ECLAC 2002)。

这种“转移”意味着大量地抽干发展中国家能用于扩大生产的潜在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海外发展援助，也充当了资本“抽水机”：在 2002 年，发展中国家对世界银行的支付金额超过了世界银行为它们提供的金融资助。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报告(ECLAC 2002)，仅仅在一年之中，从拉美各地汇集到跨国公司和国际银行的美国总部的各种利息和利润总额就超过 690 亿美元。如果我们再把数以亿计的特许使用费、海运费、保险费和其他服务费，以及拉美国家特权阶层通过美国和欧洲的银行较为合法地转移到国外的大量资金计算在内，那拉美地区 2002 年被掠夺的资金总额接近 1 000 亿美元。而这仅仅是一年之中美帝国全球掠夺的冰山一角！



## 全球化时代的援助：80年代和90年代

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各国商业银行追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表 13.1 显示,在五年之中(1985—1989年),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拉美国家)的发展规划和项目中以各种债务支付形式转移到国际商业银行总部的金额超过了3500亿美元,这直接导致了拉美和撒拉哈以南的非洲国家“失去发展的十年”(decade lost to development)。就1995年而言,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收到商业银行的新贷款,但由于世界银行坚持要求进行政策改革,并把它作为进一步“援助”的条件,另一个8000亿美元“未能用于发展”。(参见第十一章和 World Bank 1998)。

90年代,一种破坏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首先侵袭了墨西哥,随后又在1997年年中袭击了东南亚。这场因解除管制的数万亿美元游资追逐短期利润所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摧垮了该地区一个又一个经济体,平息了任何有关世界体系的某部分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的言论(和许多作品)。

金融危机重新唤起了国际金融机构对更普遍的经济危机甚至整个经济体系崩溃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商业银行再次缩减贷款,只剩下少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又制造了一个“失去发展”的五年(ECLAC 2002)。同时,官方援助和较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尽可能地减少,而且主要是“非生产性的”(用于消费而非投资)。这种“发展”的结果不难想象,阿根廷的例子提供了很好的证明:这个拉美曾经最发达的国家如今(和过去五年里)仍然在贻害无穷的危机中挣扎。

## 可选择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1983—2003 年

海外发展援助最初就是用于满足美国的对外战略需要的。回顾历史,就能很清楚地看到,海外发展援助是为美帝国服务的帝国主义政策工具。后来,通过非政府组织的中介,美国把发展计划作为缓解受援国家革命压力的应急措施。美国对中美洲国家——美帝国主义势力介入较成功的地区之一——(政治和军事的)干预的历史证明,所谓的发展往往似是而非。该地区确实没有出现另一个古巴,但这并不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功劳,而是因为美国军事力量的威慑和为该地区的反革命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在 80 年代,由于以结构调整计划(SAPs)和市场改革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的推行,海外发展援助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参见第十二章)。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计划不是被放弃而是被重构了——设计成一种可选择的和更富有参与性的发展形式。这种发展以政府援助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为基础,以便在执行解决贫困问题的新一代发展计划时,由它们为捐助者和草根族(grassroots)作更好的沟通。援助资金主要通过非政府组织来转移,使很多非政府组织无意中成了新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执行人——传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福音。实际的援助资金流入是非常有限的(少于总额的 10%),但已足够使当地的公共部门放弃直接对抗而选择参与“地方发展”。这种“发展”的基础不是自然、物质和金融资产的积累,而只是“社会资本”的积累——它并不需要与原有的权力结构作政治对抗或有实质性变化。

### 对外援助是衰退的催化剂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海外发展援助一直是“国际资源流动”的主

要形式。海外发展援助的理论基础是假设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为经济发展筹集足够的资本。因此,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辅助资金似乎具有催化剂的作用,因为它为减轻贫困和刺激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然而,50多年的实践证明,援助实际上更可能为捐助国家的利益服务;海外发展援助和其他形式的“资源流动”一样,是盈余的转移机制,是发展中国家衰退而非发展的催化剂。

证据显而易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实现了20年的快速增长后,那些进行结构调整和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商业银行贷款和海外发展援助的地区,增长出现停滞。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确切地说,东亚和东南亚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然而,这些国家既没有奉行新自由主义模式,也没有实施结构调整计划。在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和海外发展援助导致了社会经济条件的明显恶化——包括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以及赤贫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

到90年代末,估计有30亿人,接近世界总人口的44%,被确认为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其中大约有14亿人处于赤贫状态,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参见第十五章)。有些人贫穷是由于长期的社会排斥结构,而大多数人的贫穷要么直接归因于海外发展援助所附加的政策改革,要么被这些改革所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援助的的确是欠发展和衰退的催化剂,而不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催化剂。

关于这点的史实再清楚不过了。在全球化和结构调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衰退是海外发展援助附加政策制约的直接后果。在一篇关于“公司全球化和穷人”的概述中,拉塞尔·莫克希伯和罗伯特·韦斯曼(Russel Mokhiber and Robert Weissman 2003)报道了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所作的一项研究。该项研究指出,在被调查的89个国家中,72%的国家在1960—1980年和1980—2000年两个时期内人均收入至少下降了5个百分点。其中,前一个时期这些国家主要遵循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后一个时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新经济



模式”则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些能在后一时期获得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忽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开出的政策处方。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估计,如果 18 个国家能坚持先前的发展路径,那它们的人均收入将实现翻番。

## 结 论

如果参照美国在战后提出的三项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规划,即国际开发、全球化和帝国主义,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海外发展援助的动态变化。在这些战略规划下,海外发展援助只是执行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工具,从而决定了它只能是发展中国家衰退的催化剂。虽然这种衰退不是刻意为之,但这是海外发展援助附加政策约束的必然结果。问题就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海外发展援助事业,都是以接受改革为基础的,但这种改革却用来服务于捐助者而非受援者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实证明海外发展援助和发展计划总体上都非常成功。正如海特(Hayter)在 30 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对外援助只是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仅此而已。

杨明辉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2)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ECLAC.
2. Hayter, T. (1971) *Aids as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3.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2) 'Recent Trends in the Transfer of Resourc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untry Tables, Washington, D. C.: IMF.

4. Krueger, A., Michalopoulos, C. and Ruttan, V. (1989) *Aid and Develop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5. Mokhiber, R. and Weissman, R. (2003) 'Other Things You Might Do with \$87 Billion', *Corp-Focus*, September 10<[lists.essential.org/pipermail/corp-focus/2003/000160.html](http://lists.essential.org/pipermail/corp-focus/2003/000160.html)>.
6. OECD (Organis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0) *DAC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Flows*. Paris: OECD.
7. Veltmeyer, H. and Petras, J. (1997)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Class Conflict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Macmillan.
8. Veltmeyer, H. and Petras, J. (2000) *The Dynamics of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Macmillan.
9. World Bank (1998) *Assessing Aid: What Works, What Doesn't, and W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World Bank (2002) *Global Economic Model*.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第十四章 给发展中国家农民的“胡萝卜加大棒”：新自由主义农业理论与实践

卡洛斯·奥亚

本章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农业理论的来源、基本原理和应用,重点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本章认为,由于不切实际的理论和经验性假设,新自由主义农业理论出现了严重偏差。而且,新自由主义农业政策的影响也极不均衡,从总体上损害了穷国的农业部门,并加剧了社会分化和穷人边缘化。在本章最后,我们将看到“农业新自由主义”(agricultural neoliberalism)的应用也并不对等,那些缺少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被强制执行自由市场准则,而那些强大的世界生产商在鼓吹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背后,却仍然坚持明显的市场干预政策。

### 农业新自由主义的来源及其基本原理：理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随着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经济和政治主导模式的转变,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学术界和特殊的发展政策辩论圈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参见第十二章)。这些政策制定机构包括鼎鼎大名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地区发展银行,以及一些特殊的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等)。



而且,美国政府对主要的多边组织和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影响力也为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基础。

新自由主义的假设也被应用到农业上:政府和市场一分为二,两者被认为制度上“相互独立而又互相排斥”;市场机制的效率与政府干预的内在低效相对立;政府干预往往造成寻租、技术落后和资源错误配置等扭曲后果。

这些假设在一些广为引用的新自由主义著作中十分明显。这些著作都是关于非洲国家对农业的干预,如世界银行 1981 年的“伯格报告”(Berg Report)和贝茨所作的研究(Bates 1981),它们为 80 年代初期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农业改革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基础。在拉美,新自由主义农业议程早在 70 年代就开始实施,尤其在智利,那里的独裁政权很快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改革(Kay 2002)。新自由主义农业政策根源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这种经济学又以理想化的农业家庭模型为基础。在理论抽象中,农业生产者被设想为理性的利润最大化追求者,同时也被视为“竞争企业”和消费者;农民被假设在有限的资源——劳动——约束下作出理性决策,并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同时也受制于其他约束条件(如气候、用水、道路和虫害)。

运用新古典主义家庭模型及其假设导致了一个误导性概念“中等农民代表”(average representative farmer)的出现,这个概念忽略了穷国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农业结构上重要的历史差异、不同的技术水平以及农村地区贫富分化程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先前的殖民国家和转型国家之间农业结构的差别,前者如非洲南部国家(津巴布韦、南非、肯尼亚)、撒哈拉地区国家(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科特迪瓦,以及拉美一些中等收入大国(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后者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亚洲的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面对如此众多的差异,把农民设想成“普通的”或者“同质的”简直无法想象。但新自由主义者却把农民视为典型的企业,认为如果没有政策干扰,农民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会像竞争企业一样行动。他们还

把这些农民组成了想象中的“农业部门”，从而虚构出一个原子化的农民所组成的“均质体”(homogeneous mass)。

在这些理论基础中，我们没有考虑理想化的普通农民代表所面临的约束及他或她对激励的反应。我们如果把各种约束分开考虑，就能集中考虑那些政府所能控制的东西。毫不奇怪，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会影响产品的价格，从而使经典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陷入困境(Schiff and Valdés 1992)。因此，定价权(getting prices right)成为新自由主义制定发展中国家农业议程的基石(Sender and Smith 1984)。新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取消价格管制，把那些遭受剥削和税收重负的农民的生产潜能激发出来。然而，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过于苛刻的假设，还是局部均衡分析法的有效性，以及用来证明论点的统计数据，都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无论从本质上，还是从理论上或经验上说，许多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论证都是错误和误导的。

### 华盛顿共识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实践

在创造“共识”的过程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尤其是对非洲贫穷国家的影响力，引发并转变了政策辩论，最终促成了发展议程的制定。许多政府和研究人员也积极地参与到发展议程中来。大多数分析，尤其是那些由世界银行资助的分析，都试图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描绘出资源有效配置、产量大幅增加和财政赤字减少的期望结果。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前，首先要对非洲国家进行政策评估，其中主要包括两项基本要素(Sender and Smith 1984, p. 12)：(1) 假设改革前的政策是“错误”制定的——掺杂着无知、政府无能或寻租——但这些错误可由多边机构支持的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组加以纠正；(2) 极力贬低这些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农业绩效，以此证明“错误”的政策导致了农业发展停滞。



从广义上说,农业调整被视为宏观经济调整的补充,以刺激积极的产品供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政策目标包括:第一,取消对农业投入和食品价格的补贴,即终止那些据说有利于城市消费者特权阶层的“廉价”食品政策;第二,通过强有力的贬值措施消除货币升值,以此鼓励农民出口农产品;第三,中止或彻底改革半国营的销售和加工机构,鼓励(据说是有利于小农的)市场竞争和私营商人,减少由半国营机构引起的财政赤字;第四,解除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使之自由浮动(或与世界市场价格接轨),从而有可能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鼓励积极的产品供给;最后,用“可替代”措施来取代补贴性农业贷款,以期建立“可持续”金融制度、稳定资本市场和减少坏账与财政赤字。<sup>①</sup>

在这个框架中,政府(大概)只剩下一些含糊不清的基本功能,如“保障市场运行”和“为私人投资创造有利环境”等。当前在农业政策文献中找到的有关规划十分含糊,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为扮演新角色该采用哪些特殊干预政策:如为农民和商人提供市场和价格讯息;推动私人经营和合作经营;建设市场基础设施;保证度量衡的正确使用;控制出口商品的质量;为加剧的市场竞争搭建法律框架;降低地区贸易壁垒等。

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包含了一套双重的、彼此矛盾的措施:一方面要求解除市场管制和自由化,另一方面又要缩减政府对农民的直接资助。这些改革对不同阶层的农民所造成的冲突结果很少为主流分析所重视(Gibbon et al. 1993; Kherallah et al. 2002)。虽然有关部门已努力去评估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但它们的评估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由于缺少数据的支持,它们的经济计量工作存在严重的技术问题。尽管新自由主义农业政策一般说来具有普遍性,但实际的改革措施却因国家而异。因此,如果不能充分把握改

---

<sup>①</sup> 除了政府主导的小额贷款计划,其他“可选择的”的农业贷款机制始终未能出现,从而加剧了由半国营企业改革所引发的贷款紧缺。



革措施在质和量上的差异,就无法正确的评估改革的范围和后果。

在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著作,如希夫和瓦尔德斯(Schiff and Valdés 1992)的作品出版以后,由于后华盛顿共识(PWC)的兴起,新自由主义农业议程的强势地位似乎有所削弱。后华盛顿共识要求扩大 90 年代所制定的农业发展政策的范围,不满足于停留在“定价权”和宏观经济调整上,不再一味地强调政府和政策失灵(参见第三章)。在后华盛顿共识中,对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认识更趋平衡,对市场失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认为制度建设和“好的”管理有助于世界银行更好地考虑农业问题。然而,后华盛顿共识仍然反对政府对农业的干预,保留了华盛顿共识(WC)中鼓励市场的措施。尽管后华盛顿共识没有承认市场自由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冲突结果,但显然已把重点转向了非价格因素。

除了这些方法论上的考虑,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农业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实践中的局限性也遭到广泛的批评。例如:

结构调整政策(SAP)极大地破坏了非洲贸易委员会(African Marketing Boards)和半国营企业的运作,而这些机构和企业曾经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农业投入,控制着产品标准和市场价格,提供单渠道的销售设施。取代它们的私营商人,尽管由于时空原因而盈利情况各不相同,但事实很明显,国际金融机构曾经给予他们的许诺并没有兑现。(Bryceson 1999 p. 7)

在新自由主义文献中,对“私人部门”在贸易、服务、金融、农业等领域中的迅速崛起和关于农民的供给反应作了过于乐观的预期。然而,由于低利润、高销售成本和缺乏营运资金,私营商人经常局限于产品市场或种子市场,而无力涉足投资市场,但新自由主义分析家总是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Kherallah et al. 2002)。另外,竞争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激烈,进入壁垒即使在产品市场上也仍然十分严重。这些因素再加上

农业公共投资的减少,往往使农民投资不足、债务缠身和效率低下,迫使那些破产的农民不得不去寻找其他非农业的收入来源(Bryceson 1999; Kay 2002; Oya 2001; Ponte 2002)。

总的说来,新自由主义农业政策对价格的影响是不平衡的,并且对不同阶层的农业人口也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农业投入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迫使农民减少使用那些有利于增产的生产要素,而出口产品的价格日益与世界市场的价格接轨,直接受到80年代和90年代后期形势日益严峻的国际市场的制约;进口食品价格的涨跌取决于货币贬值的净效应,但解除价格管制后,国内食品的价格出现上涨(Kherallah et al. 2002);解除价格管制也加剧了季节性和地区性的价格波动,价格的这种变化无常,无论对偏远地区的生产者还是贫困农民都是一种伤害,因为后者不得不在丰收后低价出售农产品。一般说来,食品价格的上涨和波动也不利于投资不足的贫困农民、无地农业工人、农村净食物购买者及贫困的城市消费者。只有那些富农和地方商人能够从价格的上升和波动中获利(Gibbon et al. 1993; Kay 2002; Ponte 2002)。

土地改革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平民主义农业思想之间的结合点,两者都支持小农经济的传统。同时,制度主义者所强调的合适的制度框架也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契约的履行,被视为扩大农业投资和实现农村公平的重要手段。另外,新自由主义作家还倡导市场导向的土地改革议程(自愿买卖),主张通过确定私有产权和发展土地市场来推动改革,并认为这种改革将极大地促进效率和公平。实际上,这些说法漏洞百出。首先,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小农田(就每公顷农作物产量而言)的优越性,由于技术水平、作物种类和农业生态的不同而无法得到证实(Dyer 2000)。其次,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贫穷国家的农民能在很不发达的农村金融市场上获得贷款,从而增加对农业的投入(El-Ghonemy 2003, p. 237)。第三,现有的一些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土地改革的实践表明,取消政府管制和支持,必然导致土地走向集中,穷人遭到排斥,农民纷纷破产。因此,从根本上说,以市



场化方式进行土地改革是幼稚、愚蠢和误入歧途的(El-Ghonemy 2003; Kay 2002)。

总之,从对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及中等收入国家实验的不同评价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农村人口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有人获利也有人受损。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加剧。改革的获利者通常都是小资本家和富农,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近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能针对新的市场环境作出调整,也就是说,他们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viable)的农民;而改革的受损者,要么是贫困小农,他们缺乏竞争能力,勉强糊口,要么是依赖工资收入的农场工人,他们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Bryceson 1999; Gibbon et al. 1993; Kay 2002; Oya 2001)。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悖论

尽管农业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和国际政策制定圈内具有主流地位,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的现实情况大不相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农业市场都采取了明显的保护主义措施,如系统的出口倾销(使产品价格低于国内生产成本),鼓励更多的农场闲置和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等(Berthelot 2001)<sup>①</sup>。欧盟和美国不改变农业保护主义政策的事实,早就被那些批评穷国的结构调整和自由化的批评家察觉,但直到最近才被世界银行注意并进行更为公开的批评(Schiff and Valdés 1998, pp. 26 - 30)。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不把农业调整政策应用到自

---

<sup>①</sup> 欧盟通常每年要花费 400 亿欧元用于农业补贴和农民收入补助,这占据了它预算中的很大比例。欧盟对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犹豫不决,它的目标是一些最大的农业企业,主要在英国(Berthelot 2001)。2002 年 5 月 1 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将在今后 10 年内为农民提供价值 1 900 亿美元的一揽子补贴(BBC, 2002 年 5 月 13 日)。所有这些最新发展显示,欧盟成员国和美国都几乎没有改变保护主义立场,而不顾在 WTO 协议中所作的自由贸易承诺。



己的国家？为什么美国和欧盟那些高“效率”、高科技的农民不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答案也许是因为在美国和一些有影响力的欧盟国家，农业部门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全国性的竞选中，历来都是进行政治斗争、游说和动员活动的重要场所。城市选民加上农民联盟及大型农场，往往在保护国家或地区的粮食安全、质量和权利的旗帜下对农业政策的制定施加很大的压力(Berthelot 2001)。“农业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文化和政治的结合体，它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已超越了技术效率的考虑。

现实是许多农业成功发展和转型的例子都证明，即使在不平等和受歧视时，农业发展仍然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政府支持或强制措施，要么是通过廉价补贴性投入、贷款、收入补助、产品价格补贴和价格稳定计划，要么是通过土地改革(Byres 2003, pp. 69 - 73)。非洲的农业被普遍认为缺乏竞争力，但成功的例子还是依赖于不同形式的政府干预，无论这种干预体现在投入品的销售和分配，还是对灌溉的研究和公共建设。资本主义农业在历史上就依赖政府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从政府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津贴与激励，无论在拥有资本主义农业的殖民经济中，还是在那些具有不同农业结构的国家。(Byres 2003)

与此同时，许多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食品，常常需要得到外资流入的资助，以此与长期结构变迁相适应(Sender and Smith 1984)。因此，通过坚持食品主权(food sovereignty)、食品安全的浪漫观念或一个亲近贫困农民的仁慈政府来反对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想法难免显得幼稚和短视。

## 结 论

农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因技术陈旧、易受天灾虫灾和缺乏农业基础设施，往往经营风险很大。正是由于风险很高而收益不确

定,农民通常被认为是风险厌恶者。在这些现实条件下,如果允许市场自发运行、价格自由波动和外国产品倾销,很可能迫使大多数小农和无地(或少地)的工人长期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最终,大量农民很可能放弃务农,而农场工人也是朝不保夕。因此,如果没有政府或其他合法机构的直接支持而想提高农业产量、增加技术改良投入和采用新技术,无异于天方夜谭。

如果将改善“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自动地解释为农业市场自由化,使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农民直接面对变化莫测的国际市场和操纵着农业产业链的大型零售商,自然会激起北方国家农业部门中小农的反对,也会引起南方国家生产和出口粮食的农民的反对。因此,必须重新考虑“市场准入”的形式和为保护穷国与富国的农民利益而在制度框架设计中的特惠安排。这是现实的政治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被重新赋予保护本国农民和采取选择性政策(如国内价格和进口)的权利,以此来提高本国农业部门的竞争力,而不是让城市和农村中那些净食物购买者受损。选择性的保护政策无论对于农业自立还是其他形式的农业发展都非常重要,因为这将极大地激发全国的发展潜力,并保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农业工人能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尤为重要,因为他们不相称地承担了错误设计的新自由主义农业实验所造成的恶果。

杨明辉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ates, R. (1981)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Berthelot, J. (2001) 'The Reform of the European Union's Farm Policy', *Le Monde Diplomatique*, April.
3. Bryceson, D. (1999) 'Sub-Saharan Africa Betwixt and Between: Rural

- Livelihood Practices and Policies’, ASC Working Paper 43/1999, Leiden: African Studies Centre.
4. Byres, T. (2003) ‘Paths of Capitalist Agrarian Transition in the Past and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V. K. Ramachandran and M. Swaminathan (eds) *Agrarian Studies: Essays on Agrarian Relations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Zed Books.
  5. Dyer, G. (2000) ‘Output per Hectare and Size of Holding: A Critique of Berry and Cline on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Working Paper 10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6. El-Ghonemy, R. (2003) ‘The Land Market Approach to Rural Development’, in V. K. Ramachandran and M. Swaminathan (eds) *Agrarian Studies: Essays on Agrarian Relations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Zed Books.
  7. Gibbon P., Havnevik, K. J. and Hermele, K. (1993) *A Blighted Harvest: The World Bank and African Agriculture in the Eighties*. London: James Currey.
  8. Kay, C. (2002) ‘Chile’s Neoliberal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easantry’,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 (4), pp. 464 – 501.
  9. Kherallah, M., Delgado, C., Gabre-Madhin, E., Minot, N. and Johnson, M. (2002) *Reforming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Af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0. Oya, C. (2001) ‘Large-and Middle-Scale Farmers in the Groundnut Sector in Senegal in the Context of Liberalis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 (1), pp. 123 – 62.
  11. Ponte, S. (2002)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anzania*. James Currey: London.
  12. Sender, J. and Smith, S. (1984) ‘What is Right with the Berg Report and What’s Left of its Critics?’, IDS Discussion Paper 192, University of Sussex.



13. Schiff, M. and Valdés, A.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icing Policy*, vol. 4: *A Synthesis of the Econo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4. Schiff, M. and Valdés, A. (1998) *Agriculture and the Macroeconom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967.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第十五章 贫困与分配：回到新自由主义议程？

黛博拉·约翰斯顿

对贫困和分配问题的担忧已经使许多学者、非政府组织和政策制定者联合起来，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后果都非常不满。作为回应，新自由主义者也在自己的政策框架内提出了贫困和分配问题。然而，本章将论证，改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并没有较大地背离先前的主旨，它们将继续阻碍那些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政策出台。

### 贫困、分配与新自由主义政策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受干扰的市场运行将最优使用各种经济资源（包括有形资产、金融资产和劳动力）。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获得最大可能的收益，而穷人被设想为拥有较少或者相对低效的资产。尽管教科书中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直接涉及到最初的财产分配，但确实能通过政府政策（如税收、土地改革和最低工资等）来改变现有的财产分配。这种政府干预被认为会扭曲市场运行和破坏经济效率。因此，新古典主义教科书警告读者，必须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作出抉择，试图改善分配必然损害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市场能产生更高经济效率的理论，为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对经济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引入简便的“滴入论”<sup>①</sup>概念，新自由主义者得出结论说，最终的经济增长将使所有人受益，总产出的增加将提高全体人口的生活水平，因为这种经济增长甚至将“滴入”最贫困人口。（见第三章和第二十二章）

新自由主义者将这种理想化状态和实施凯恩斯主义或政府计划的结果相比较，认为后者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持续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更为关键的是，新自由主义者指出，“人为地”减轻贫困或管束收入分配会和其他的政府干预一样降低经济绩效。公平与效率的抉择又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复活了。（见第二章）

在经合组织国家，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各种试图从富人到穷人的收入再分配钝化了经济激励，高边际税率已明显降低了各种收入获得者的经济激励，而高福利救济对穷人意味着工作“不再有利可图”。<sup>②</sup> 新自由主义者指出，再分配，以及具有明显扭曲后果的工会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管制，已经导致不正常的高工资、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因此，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具体内容各异，但它们通常都涉及到提高工作激励，如降低税率和削减福利，或者用来鼓励投资和促使劳动力市场“更富弹性”，如削弱工会权力和“减轻”政府管制。这些政策不仅试图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也希望提供工作激励来减少明显的福利依赖。<sup>③</sup>

虽然欠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并不完善，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那些旨在减轻贫困的政策已经扭曲了经济激励。许多国家都对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提供补助，公共管理部门也倾向于提供就业机会。新自由

---

① 一种经济理论，认为政府与其将财政津贴直接用于福利事业或公共建设，不如交由大企业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译注

② 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指出了这种观点的荒谬，认为它建立在十分可笑的假设之上，即富人不工作是因为挣得太少，而穷人工作是因为挣得很多。

③ 例如在英国，有人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不平等是必要的，因为它能提供必要的经济刺激。这种观点能找到更早期的共鸣者，如卡尔多(Kaldor)在50年代提出，如果资本家比工人储蓄倾向更高，那不平等可能有利于增长。



主义者认为这些措施和其他的政府干预政策一样，要为这些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遭受的低增长和国际收支危机负责。新自由主义政策通常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并作为拨款和软贷款的条件，虽然具体内容会有不同，但通常包括大幅削减公共部门和就业，取消价格控制和其他经济管制。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似乎能保证穷人在这类自由化过程中受益，因为移去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将增加对这些国家充裕而又低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见第十章和 World Bank 2000, p. 70）。而且，新自由主义者预计，贸易自由化和解除政府干预将共同激活农业部门。由于农村贫困人口被一成不变地看做是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者，人们忽略了贸易自由化对他们的影响。

最后，新自由主义者指出，贸易自由化将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趋同。新古典主义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 (Swan—Solow growth model) 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依赖于技术革新程度。如果自由市场政策能够促进更大的经济融合，并由此导致技术水平的接近，那最后将促使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一致。

### 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日益不满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和北方的许多国家都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反响不一。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将许多国家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低增长归咎于新自由主义，而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是由于改革不充分。有关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和自由化对贫困人口造成的影响的数据，引起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一系列的出版物开始论证各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穷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在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学术出版物中，科尼亚等人 (Cornia et al. 1987) 讨论了欠发达国家自由化的人力成

本。

科尼亚等人指出,由于政府补贴(尤其是对食物)的减少和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穷人的购买力在不断地下降。许多国家的公共部门就业(和工资)被大幅削减,而私人部门却未能相应扩张来增加就业。而且,由于废除了保障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法律,私人部门的就业往往是低工资且无保障。就业机会并没有如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所预计的那样得到增加,也没有和劳动力大军保持同步增长。另外,农村贫困人口也未能看到农业机会的普遍增加。许多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认识到了穷人所遭受的多重伤害,他们超越了简单的收入贫困问题,而进入了更一般的授权和保障问题(见第十九章和 Streeten 1994)。

在经合组织国家,学术界和社会活动家对福利水平的降低和低工资就业的产生日益担忧。在美国,许多人担心出现一个经济“下层阶级”,而在英国和法国,这种担心被归结到了“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问题。社会排斥的观念扩大了贫困概念的内涵,考虑了人们被“挡在社会之外”的各种形式,并把关注重点转移到了个人缺陷(individual inadequacies)(见第六章和 Atkinson 1998)。

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尽管缺乏有关数据,但仍能看出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收入不平等都出现明显增长。科尼亚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的改革,以及工会的衰落和劳动力市场解除管制。总的说来,资本所产生的收入份额出现增长,而劳动力所产生的收入份额相对减少,从而扩大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科尼亚提供了印度、土耳其、泰国、委内瑞拉和南非等国资本收入提高的证据。(Cornia 2003)

然而,担忧的对象不仅是国内收入分配,还包括国与国之间增长率差异日益扩大。许多学者得出和普里切特(Pritchett 1997)一样的结论,那就是这种分化已经发生“很长时间”了。普里切特估计,从 1870 年到 1990 年,最富国和最穷国之间人均国民收入比大约提高了 5 个百分点。尽管富国间的收入水平比较接近,但穷国之间的增长速度仍然

相异而且多变。例如，从 1960 年到 1990 年，欠发达国家的年增长率在 -2.7% 至 +6.9% 之间，其中，16 个欠发达国家出现负增长，其他许多国家增长停滞，只有 11 个国家的增长速度能赶上富国。尽管有关数据很少，统计方法也存在争议，但许多学者依然得出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结论。

### 一个回应：与议程相背离

对贫困和不平等日益增长的担心使新自由主义采取了许多新的行动。变化之一就是修改贫困的定义和监测方法。一些政府和机构采用了很多种贫困的定义（如 World Bank 2000）。而且，随着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sup>①</sup>的提出，也要求世界银行广泛收集有关贫困的数据。然而，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遭到猛烈抨击，以致被认为毫不可信（Reddy and Pogge 2003）。即使按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据计算，贫困人口的比例可能在降低，但一旦去除中国，90 年代贫困人口的绝对数依然出现增长（World Bank 2003）。

然而，不论贫困的定义和监测方法有什么变化，新自由主义者仍然坚信自由化对于减少贫困的核心作用。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认识到一些对早期结构调整和稳定政策的批评，但《减轻贫困战略报告》（PRSP）中新的贷款条件仍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基础。因此，尽管该文件试图强调政府支出和捐助资金应该优先用于扶贫，但仍被批评为简单的“新瓶装旧酒”（UNCTAD 2002）。

同样，尽管世界银行在《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向贫困开战》中就平等、保障和授权（empowerment）对于减贫的作用予以新的关切，但总

---

<sup>①</sup> 千禧年发展目标是各国首脑在 2000 年 9 月达成的、用于减轻贫困和提高福利的议程。对于贫困问题，该目标的任务是将每天生活费用不足 1 美元的人口数量缩减一半。



的聚焦点仍然是自由化。虽然世界银行曾经宣称不平等是对新自由主义议程的背离(World Bank 2000),因为对该行来说不平等不是自由化的一个结果,但它将不平等归咎于非经济因素。世界银行认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不利,因为它会导致社会动荡和不适当的政府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限制穷人投资教育或生产的能力。后者暗示,如果穷人不能从资本市场获得贷款来支付“大块”支出,那他们无论对资本品还是教育的投资都会减少。一旦穷人在金融市场融资失败,不平等将会与增长缓慢和持续贫困结伴而来。因此,世界银行建议,应在一个自由化的市场体系范围内进行某些资产的再分配,虽然这些资产被限定为土地和教育(“人力资本”)。

尽管世界银行现在也讨论授权和保障,但认为这些问题将随着经济增长逐步得到改善,从而将它们置于自由化进程之后。世界银行仍然坚信自由化对消除贫困的关键作用。<sup>①</sup> 这种信仰是建立在戴维·多拉尔(David Dollar)和阿尔特·克雷(Aart Kraay)在“世界银行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统计工作之上的(World Bank 2000, p. 66)。多拉尔和克雷调查了 137 个国家在 1950—1999 年期间人均 GDP 和 1/5 最穷人口收入间的变动关系,最后用数据表明,这些国家平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底层 20% 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之间有着紧密而又持久的联系。他们得出结论说,“滴入”确实发生了,由自由化引起的增长像有利于标准家庭一样惠及穷人。

对世界银行而言,结论就是促进增长的自由化政策应该处于任何成功的减贫战略中心。它也有限地承认有些国家的贫穷和不平等在恶化,这是由于回应新的刺激需要时间,或者那里的社会转型的成本都集中到单一的社会群体。在这些情况下,世界银行承认需要一些社会政策来减轻改革的负担(World Bank 2000, p. 66),但总的注意力仍集中

---

<sup>①</sup> 世界银行对自由化前提下的减贫重点存在争议,这导致关于贫困的世界发展报告主要作者的辞职。参见 Wade (2001)。

于让市场能为穷人做得更多。如增加获得小额贷款(micro-finance)、土地和教育的机会、减少和改善管制。

那些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经合组织国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例如在英国,由于穷人被认为缺乏获得合适技能的机会,因此那里的社会排斥问题往往被局限在解决劳动力市场排斥问题的有关政策上。

### 议程的一个变化？

改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缩减了关于贫困的内容。它认为,随着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更少的管制和某些资产的再分配,穷人将更有效地参与市场,从而导致贫困减轻和更大平等,这可能吗？

改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认识到了老式教科书上平等—效率抉择的不足。但新的平等—效率和谐观又过于简单化了。它从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学中断章取义,似乎是用来取悦那些喜欢友好型发展战略的人。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已通过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得到阐明。尽管多拉尔和克雷找到了一个中立的总平均数,但此数据中隐藏着巨大的多样性(Ravallion 2001)。而且,某种增长过程对特定社会群体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需要更好地考察。然而,新自由主义改良观点对这些问题似乎无能为力。

改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对解决贫困问题尤其显得不足。它强调资产的再分配(限于土地和教育及一些小额贷款),但这种再分配是以假设穷人能在自由化市场上挣得高收入为前提的。下面的例子表明,情况不容乐观。对于土地改革问题,第十四章得出结论说,通过市场途径进行土地改革是幼稚、愚蠢和误导的。对于教育,证据显示,如果缺乏就业或自我就业的机会,教育机会对于减轻贫困也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比内尔(Bennell 2002)指出,由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缺少就业机会,那里教育的收益大大降低了。另外,森德

(Sender 2003)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案拒绝考虑那些有可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投资,新自由主义者也避免讨论支持工人权利和工资的国家干预,如政府管制和对工会的支持,继续将这些政策支持排除在新自由主义议程之外。森德最后得出结论说,如果最有影响力的发展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只有解除市场管制或者政府放弃它们过时的制定产业政策企图时才能减轻贫困,那合适的部门政策和产业战略就无法得到制定。

结论就是,改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对自由化的迷信阻碍了那些有助于穷人的政策实施,贫困和不平等不可能得到改善,缩小上述全球差距的前景看起来非常黯淡。

杨明辉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Atkinson, A. B. (1998) 'Social Exclusion,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in A. B. Atkinson and J. Hills (eds) *Exclusion, Employment and Opportunity*. Centre of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paper no 4.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 Bennell, P. (2002) 'Hitting the Target: Doubling Primary School Enrollments in Sub-Saharan Africa by 2015', *World Development* 30 (7), pp. 1179 - 94.
3. Cornia, G. (2003) 'Globalis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etween and Within Countries', in H. - J. Chang (ed.) *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London: Anthem Press.
4. Cornia, G., Jolly, R. and Stewart, F. (1987) *Adjustment with a Human Face: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and Promoting Grow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Prichett, L. (1997) 'Divergence, Big Tim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3), pp. 3 - 17.



6. M. Ravallion (2001)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Looking Beyond Averages', *World Development* 29 (11), pp. 1803 - 15.
7. Reddy, S. G. and Pogge, T. W. (2003) 'How Not To Count The Poor', Discussion Paper, version 4.5, March 26, Columbia University.
8. Sender, J. (2003) 'Rural Poverty and Gender: Analytical Frameworks and Policy Proposals', in H. - J. Chang (ed.) *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London: Anthem Press.
9. Streeten, P. (1994) 'Human Development: Means and En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2), pp. 232 - 7.
10. UNCTAD (2002)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From Adjustment to Poverty Reduction: What is New?* Geneva: UNCTAD.
11. Wade, R. H. (2001) 'Making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 Attacking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29(8), pp. 1435 - 41.
12. World Bank (200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3. World Bank (2003)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第十六章 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

苏珊妮·麦格雷戈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思想是 20 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给出了“福利国家”最好的定义之一：

福利国家是指这样一种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组织权力(通过政治和行政过程)被审慎地用于修正市场力量的运行,这种修正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保证个人和家庭获得一份最低收入,而不论他们的工作或财产的市场价值;第二,减轻“社会意外”(social contingencies)的伤害程度,这些意外(如疾病、年老或失业)有可能导致其他的个人和家庭灾难;第三,保证每个公民不分地位、不分阶级,都能得到尽可能最好的社会服务。(Briggs 1961, p. 288)

在政治辩论中,进步人士主张政府由“守夜人”到公共服务再到福利国家的转变,有些人甚至把这种转变视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为实现完全的福利国家,有人认为,政府应当把教育视为一项关键性的社会服务,同时保障充分就业,制定经济增长政策和进行抑富济贫的收入再分配。

还没有一个社会能真正实现这些目标。在斯堪的那维亚,政策和

舆论倾向于认为社会政策应该做得更多。而在尚有一些福利国家影子的美国,却倾向于缩小福利的范围。大多数民主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世异时移,曾几何时,许多国家还热衷于伸长社会政策的触角,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政策和舆论走向反面,削减政府开支、把更多的问题交给个人和市场解决成为主导思想。

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激烈论战从 70 年代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结果如何?经常有人说“我们现在都是资本家了”或市场已经战胜了政府。但克林顿和布莱尔却看到过快过激地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破坏和两极分化,认为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因而提出了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把它当做资本主义一种更加完善和更加温和的形式(参见第五章和第二十一章)。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这场思想论战引起的?又有多少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到 20 世纪末,福利国家面临变革。这些福利国家是在经济稳定增长、男性赡养家庭及劳动力市场稳定的特定时期出现的。但到 20 世纪后期,出现了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既是财政危机又是法律危机。这场危机是从全球化到技术进步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家庭中离婚率的上升、大量单亲家庭的出现、人口老龄化、新的移民形式,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等。其他重要因素还有: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理念的削弱、欧盟的发展、德国统一、消费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妇女就业的增长。除此以外,还包括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失业人口的增长和低经济增长率。所有这些都需要社会政策做大量的变革。(参见第二十四章)

如果取国民收入中政府支出作为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可以隐约看出政府力量在收缩。一般说来,在发达工业国家,政府支出的份额通常占国民收入的 45% 左右(参见第三章)。但重要的是政府把钱用于何处?是用于国防还是用于卫生?是用于公共服务还是用于监狱?政府其实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加强社会控制,要么通过福利国家政策促进社会和谐,要么通过强制措施来解决两极分化。



许多研究者试图去解释正在发生的变化。但这些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所使用的数据的类型。依赖有关社会支出、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数据的研究,和那些更关注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的研究往往得到不同的结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政策,也就是说,它们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部门之间选择了不同的平衡,它们通过选择不同的政策措施来实现不同的定位。

尽管福利国家顶住新自由主义的压力而幸存下来,而且比预期的要好一些,但显而易见的是,福利国家的理想不可能在中低收入国家实现。许多全球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奉行新自由主义议程,它们将迫使其他的发展模式向它们的期望值调整。

新自由主义政策强调市场的作用,信奉“私人”优于“公共”的教义(认为这是提高效率的途径),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的理念和价值观。它们把社会保障法规视为贸易的间接壁垒,认为福利国家妨碍了经济增长,削弱了工作激励从而鼓励失业,并设置了贫困陷阱,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和国际竞争的障碍(参见第十五章)。

当然,福利国家制度对提供经济保障并非一无是处。一些作家已经提议使用“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提法来取代“福利国家”,虽然有点繁琐,但不无启迪。新加坡的等级官僚制度(hierarchical and authoritarian system)表明,公共社会管理并不一定需要公共基金。澳大利亚传统上通过补贴、强制性工资仲裁、移民管理以及维持高水平就业来提供经济保障。日本则通过企业与职工之间的互相忠诚来实现充分就业和失业保险。国家社会主义体系把工作视为一项基本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提供消费者补贴来实现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充分就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低效,但全面地满足了人民的基本需求。

世纪末的这场思想论战在后工业社会的新形势下有何进展?由于现实的纷繁芜杂,不同的社会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但新的政策范式保持了一些明显的特征。一个总的转变就是社会政策从以充分就业为目标转向积极政策(activation policies)——如使用失业救济来保证

强制性的培训或重新上岗,同时对低工资工作进行资助。例如在美国,有“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而在英国,有儿童税收抵免。这些改良措施有助于在劳动力市场边缘为低收入工人建立一个保护层,使他们依靠政府救济而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平。随着政策的转变,相应的文化也在发生变化,日益强调个人的责任(参见美国1996年出台的《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那些被纳入经济社会系统的个人,不得不为自己和家庭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对于那些排除在系统之外的人,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不像新保守主义或专制主义那样提供更多的政府干预和监管。

### 福利国家变革的影响

是否所有的发达国家在信奉新自由主义上已取得了最低程度的一致?迄今为止,能证明这种一致的证据极其有限。最近的研究表明,欧洲的福利国家基本上都运行良好、充满活力——比预期的要好。这些研究还提供了有关的论据和论证,列举了福利国家在四分之一世纪中的重大变革。如今,这些福利国家的福利支出仍在提高,舆论依然支持福利政策。然而,对于各国政府来说,为了保持经济竞争力,都非常重视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因此,许多国家似乎都日益注重控制福利支出和扩张私人部门。

在不同的国家,变革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面临更大的调整。如在英国,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的趋势最为明显,在那里,我们看到低工资、低保障的临时工作再次出现。同时,这些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美国和英国),不平等也出现激增,而在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则较为平缓。北欧的福利国家虽然受到挑战和削弱,但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幸存下来。

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彻底的地方,如英国,一些主要的统计指

标显示了相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增长。如在 1979 年,英国有 500 万人生活在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收入一半的家庭中。而在 1991—1992 年,有 1 390 万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从总人口的 9% 上升到 25%。“赢家与输家”的哲学得到证明,因为虽然整个国家在 90 年代实现了 36% 的平均增长,但最底层 10% 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17%,而 10% 最富人口的收入在扣除住房成本后仍获得了 62% 的增长。

休伯(Huber)和斯蒂芬斯(Stephens)指出:

英国不平等的激增是卢森堡收入研究(LIS)中的最高记录,这也使英国在 18 个国家比较中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不平等国家。(Huber and Stephens 2001, p. 325)

### 福利国家变革中的政治

福利国家的改革议程不可能简化为直接削减费用:“还没有一个国家通过自我调整将改革进行到底。”(Leibfried and Obinger 2001, p. 1)。与紧缩的巨大压力相抗衡的是民众继续要求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还有某些反对逆转的社会集团的意志和能力。

休伯和斯蒂芬斯回顾了福利国家在一些国家(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奥地利、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发展历程,考察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其他一些研究证据。他们发现:

福利国家变革的主要模式首先是扩张的减缓,随后是停滞不前,最后是全面的而又大体适度的,或者说至少不是制度转变的政府补贴的减少。只有在英国和新西兰才能看到大幅度削减和社会保障体系真正的制度转变。(Huber and Stephens 2001, p. 6)



这些作者解释说,由于“英国和新西兰拥有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使得它们能够以较少的支持推行不得人心的改革”(p. 7)。很有必要回顾一下英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时受到的多方阻力——那是充满骚乱和抗议的 10 年,地方当局、专业团体、投票者、社会运动组织、工会以及保守分子群起而攻之。但由于强大的中央政权和铁腕政策,再加上反对者内部的分歧,这些力量都被击败了。

因此,总的来说,只有英国和新西兰的改革迅速而猛烈。英国在这 10 年中由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奉行“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没有在欧洲大陆国家或斯堪的那维亚看到类似的剧烈变革?我们如何解释不同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政策?为什么有些社会更富同情心和更加团结,而其他社会则更加自私和分化?答案就在政治——政治体制和选民的价值观之中。

在社会政策研究文献中,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是一种主要的解释范式,它认为“以往的承诺、福利选民的政治分量和制度安排的惯性”有重要作用(Leibfried and Obinger 2001, p. 4)。选举政治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休伯和斯蒂芬斯(Huber and Stephens 2003, p. 3)发现,“虽然原有的权力关系、舆论、政策结构和制度安排对现任政府的作为会有一定限制,但政府仍有政策选择空间”,假以时日,它们仍能将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新的模式。

影响福利国家改革形式和方向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党派关系的复杂程度,工会和雇主的力量对比,利益协调的体制机制,以及福利国家的固有制度。报告显示,那些横向再分配和旨在保护中产阶级的计划之削减很可能遭到抵制。(横向再分配被视为从境况优者到境况劣者的人道主义资源转移,它是基于需要而非收入水平,如从健康者到病人,从中年人到老人和年轻人,从就业者到失业者,从单身汉和无子女者到有家庭者。这种再分配无需试验就能横向地在各个收入水平上进行。)

我们通常如何看待全球化？“福利国家所面对的许多压力往往被错误地归罪于全球化，但事实上这些压力来源于富足的民主国家内部。”(Pierson 2001, p. 4)因此，问题在于制度自身：同样的全球化力量作用于不同的福利制度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国内制度在协调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依然十分重要”(同上)。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权力体系中的“否决权”往往能阻碍或延缓改革。同样，有些重要因素能加快改革的步伐。休伯和斯蒂芬斯(Huber and Stephens 2001, p. 335)认为：“所有急切而全面的削减都是世俗的右翼政党实施的，因为这些社会中工会运动低落，缺乏基督教民主精神。”而在那些更讲究认同的政治体系中，往往具有合理的代表制度，然后政府通过与相关利益集团的谈判来重新达成共识(既适应新的环境又保留了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工会在社会政策机构中的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芬兰和瑞典，工会管理着失业救济。

有些研究报告认为，“政治问题”，即不能获得投票者的支持，非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过去20年中分析家普遍低估了福利国家的复原能力(Pierson 2001, p. 8)。例如在瑞典和芬兰，选民在经历了福利削减和进一步减少社会支出的威胁后，纷纷反对中央集权的政府。选民们对紧缩政策的不满导致了左翼政党的重新上台，它们继续实行紧缩政策，但在处理政治后果时比它们的前任狡猾多了。

总的来说，福利政策支持力量越弱的地方，改革进行得就越迅猛。对那些更直接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主要政策，尤其是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改革进行得最快。而那些中产阶级和中间力量所维护的公共服务，如卫生和教育，改革则进行得较慢。福利国家政策往往广受欢迎，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支持网络。各种福利国家受益群体之间的联盟也十分重要，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不同的联盟。例如，瑞典的福利制度中包含了妇女的权益，由此产生了强大的妇女和工会联盟，它们支持福利国家，反对各种缩减。

至于将来，我们应当注意到早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仅仅把社会政

策当成雇主的一种财务负担。而如今,它也被视为一种商业机会——社会服务的私有化,在医疗、卫生、养老金甚至教育领域,产生了许多商业机会,并且可能影响这些领域下一阶段的发展。

一些其他的重要变革,尤其是移民政策,自身就是经济和政治变革的结果,它们也可能继续提出挑战。移民经常是享受不到福利的。福利国家依赖于社会的凝聚力,而社会的凝聚力又有赖于社会的认同感和共担风险的责任感。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化趋势正在不断削弱这两者。

### 未来前景与选择

有些人认为,尽管根本改变的迹象还不那么明显,但较为明显的变化可以说无所不在,这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理念在一些重要国家如德国和法国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泰勒-古比(Taylor-Gooby)经过研究发现:

尽管福利政策的支持者已经较为成功地抵制了费用削减和彻底的改革,但随着体制结构的转变、福利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现代化,政策制定权发生了转移,从而有可能使欧洲福利国家步入新的轨道。当前(和近期)的实践显示,前景并不光明。(Taylor-Gooby 2001, p. 1)

本章重点讨论理念、制度和利益集团对于解释现实的重要性。目前,许多力量正在兜售“别无选择”的说法。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被宣布为非法。主流话语则贬低以政府为中心的解决方案。因此,迫切需要发动一场新的支持进步改革的思想论战。

迪肯等人(Deacon et al. 1997, p. 195)认为,社会政策分析的重点



应该从传统的对社会需要和社会公民权的关注转向寻求超越国界的公民权和国际公正。社会运动日益把追求跨国公民权作为自己的长期目标。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也计划建立全球性的福利国家——一个基于公平、平等、民主原则的国家，一个注重环境保护、权利与义务统一、利益共享的国家，一个根据世界公民权而非支付能力来满足个人需求的国家。

更直接、更有效的方法是在制度上支持那些反对激进新自由主义的组织，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工会，因为它们充当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堡垒，而且这也关系到欧洲公共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必须恢复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从那些接管和削弱劳工运动和劳工政党的破坏分子手中夺回主动权。这些行动也需要动员广大的利益群体，号召大家成为富有同情心和无私的公民，而不是利己主义的消费者，将大多数人的利益与一个更加仁爱、更加公平的社会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无论是民主理念的捍卫还是民主实践的坚持，也都非常关键。

所有这些都似乎可望而不可即。面对新自由主义的不停叫嚷和残酷无情的现实世界，很容易让人感到悲观失望。对进步政治力量而言，就怕无动于衷或愤世嫉俗。应该恢复政治行动的信心，创造可能性，重新夺回改革的主动权；尤其需要将这种斗争国际化，加强国与国之间工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的联盟（参见第十九章）。

杨明辉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riggs, A. (1961) 'The Welfare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2), pp. 221 - 58.
2. Deacon, B., Hulse, M. and Stubbs, P. (1997) *Global Soc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Welfare*. London: Sage.
3. Huber, E. and Stephens, J. D.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Leibfried, S. and Obinger, H. (2001) 'Welfare State Futures: An Introduction', in S. Leibfried (ed.) *Welfare State Fu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Pierson, P. (2001) 'Investigating the Welfare State at Century's End', in P. Pierson (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Taylor-Gooby, P. (2001)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in Europe', in P. Taylor-Gooby (ed.) *Welfare States under Pressure*, London: Sage.

## 第十七章 新自由主义、新右派与性政治

莱斯利·郝佳特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种新的保守主义政治派别,即所谓的新右派竞相登上西方世界的政治舞台。新右派与新自由主义关系密切,拥有许多与其他保守主义不同的政治主张。它与战后保守主义的区别之一,就是反对福利资本主义(welfare capitalism)(参见第十六章和Levitas ed. 1986)。新右派在许多政治领域都很活跃,有些甚至超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范围。然而,就大多数政治主张而言,两者的联系十分明显:两者都攻击由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所导致的“依赖性文化”(dependency culture);都尽力维护“传统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批评那些处在这种家庭之外(如单身母亲)和那些否定这种家庭模式的人(如女权主义者);两者大体上都关心所谓的“道德滑坡”问题,认为这种“滑坡”是由前20年(男女关系的)“放纵”所造成的,进而攻击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进步。

新自由主义和新右派把道德滑坡看做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本章将注意力集中在英国和美国,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曾大张旗鼓地提出约束性的道德政治学和保守的家庭政策,而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最初正是从这种政治右倾中汲取养分的(Hall and Jacques 1983)。后来,随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竞选成功,新右派迅速崛起。虽然在整个80年代,各种新右派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上大力扩张,但在英国和美国,试图



扭转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自由主义的各种运动依然十分活跃(参见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三章)。

本章首先探讨新自由主义和新右派之间的联系,接着讨论新右派在两个特殊领域内的政治主张:第一,新右派的家庭政策;第二,与新右派密切相关的性政治运动。本章最后将简要考察性政治中将政府干预的要求与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矛盾性质。

### 新自由主义和新右派

新右派与新自由主义一样,集中批判凯恩斯主义,通过政治运动否定战后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制度。它批评福利国家效率低下,并由此导致了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丧失。同时,它将道德焦虑(moral anxieties)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联系起来,攻击“依赖性”文化。它把道德滑坡视为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认为福利救济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它把公民视为消费者,排斥集体主义和社会责任思想,认为国家计划和公共福利剥夺了公民(即消费者)的选择权。新右派重申了由个人利己主义、家庭和自立的价值观所支撑的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Williams 1999),坚信政治自由和稳定的最佳守护者是市场而非政府(Lowe 1999)。

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是这种保守的新右派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两者还不能囊括新右派的全部。撒切尔夫人曾经宣称,战后保守党在支持福利国家时,对“社会主义”作了过多的承诺,因此她的使命之一就是纠正这种倾向。她认为“福利保障,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它们对行为造成的影响,结果鼓励非法行为,促使家庭解体,并且奖励懒惰和欺诈,取消了有助于工作和自力更生的激励”(Thatcher 1993, p. 8)

撒切尔夫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迫切社会问题是抑制工人运动。她发表演讲赞扬不平等,决心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且开始着手打击工会

运动。她非常成功地解决了 1984—1985 年的矿工罢工,从而为 80 年代末直接攻击福利国家的集体主义原则扫清了道路。

新右派鼓吹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立,唯一的例外是对核心家庭的维护。撒切尔夫人曾于 1977 年在保守党会议上宣称:“我们是家庭的政党。”这个宣言在随后 20 年的许多场合得到多次重复。1982 年,撒切尔夫人又将违法行为、离婚和少年犯罪的增长归于“放纵社会的诞生”(Durham 1991, p. 131)。

新右派对核心家庭的支持实质上是对 60 年代的“放任”政治的强烈抵制。这种抵制还包括许多相关的政治运动,目的是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抵制 60 年代和 70 年代前期的改革。在这些运动的背后,是新右派保守的家庭观念。

### 新右派与家庭政治学

新右派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但也是传统家庭的维护者,支持政府为维护传统家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为什么家庭观念在新右派的思想体系中如此重要?为何又与个人主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答案要追溯到哈耶克,他把家庭视为与个人同等重要的基本社会单元。因此,新右派维护家庭的目的是宣扬那些有利于在市场中取得成功的传统道德品质(Pascall 1997)。

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之一是认为它取代了家庭而成为福利的提供者(Glennister 2000)。相关批评也宣称核心家庭的衰弱导致了其他的“社会问题”:父亲弃家而去,男孩走向犯罪之路,女孩成为未成年妈妈。一些作者如查尔斯·莫里(Charles Murry 1990)也表述了家庭解体与犯罪之间的臆想联系。

在英国,各种维护传统家庭模式和价值观的力量都与新右派和撒切尔主义密切相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右派的思想库——经济事

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开始发表题为诸如《缺乏父责的家庭》、《家庭: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吗?》之类的文章。这些作品试图宣传核心家庭的观念,同时也是对女权主义者的直接宣战,因为后者认为核心家庭的制度和观念导致了妇女的从属地位。

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的家务负担导致了她们在就业中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因而她们反对按性别进行家庭内外的劳务分工。许多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如果没有“私人领域”中男女之间家务和抚育孩子等责任的分担,没有与这种责任分担相适应的弹性工作方法,就不可能在就业和政治等公共领域中有男女之间的平等(Rowbotham 1989)。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也呼吁许多被视为“私人”的事务,尤其是照料孩子,可以由集体或公众来承担。有些女权主义者提议,既然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纠缠在一起,应该把家庭视为公共的和政治的,而不是私人的。

与之相对,新右派重申严格按性别进行劳务分工的重要性:妇女应该担负养育孩子的责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应该严格区分。在美国,新右派是激烈的反女权主义者。美国关心妇女组织(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美国最大的女性新右派组织)的贝弗莉·拉海(Beverly LaHaye)宣称:“我认为妇女运动实际上伤害了妇女,因为它教育她们把价值观建立在工作而非家庭上”(Faludi 1991, p. 258)。同样,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康妮·马什纳(Connie Marshner)声称:“女人的本性就是为他人服务……女人命中注定要牺牲自己满足他人的需求”(Faludi 1991, p. 241)。新右派在政治上要求政府进行收缩,而让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责任。

在英国,许多措施被用来鼓励年轻人依赖他们的家庭。如1988年,收入资助方案(Income Support)减少了对16—18岁的年轻人的资助。许多人认为这种缩减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迅速加入到无家可归者的行列。1986年,对18—25岁的年轻人的资助又被削减,到1996年(该年“求职者补贴”取代了“失业救济”),这些年轻人所享有的福利下降了20%(Glennerster 2000, p. 196)。其他针对家庭的保守政策还包括《刑事审判



法案》(the Criminal Justice Act)中引入父母对子女犯罪负有连带责任的理念。引入对学生的贷款而收回对学生的资助损害了他们的经济独立性。约翰·梅杰(John Major)首相遵循了撒切尔夫人的路线,继续呼吁传统家庭观念的回归,结果引起了单身父母批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片抱怨声。

在美国和英国,新右派对单身母亲的批评与新自由主义关于福利依赖的立场和支持传统家庭的观点相呼应。未婚母亲,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未婚母亲,被描述成不负责任、乞求怜悯的“乞讨者”,她们依赖社会保障,并且加入要求获得福利住房的队伍(Murray 1990)。保守党对此的反击措施之一,就是试图强迫孩子父亲来支付抚养费,并且在《儿童抚养法案》(The Child Support Act 1991)中规定,所有享受救助的单身母亲必须授权儿童抚养代理机构(Child Support Agency)从孩子的父亲那里收回抚养费。该法案的最终修正案引发了观念革新,因为撒切尔夫人规定,必须从单身母亲的救助中抵扣掉从孩子父亲那里收到的每一分钱。结果,妇女认为与这些抚养子女代理机构合作毫无意义,而许多男士也尽力阻挠它们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各种关于家庭价值和性道德的院外运动也在80年代此起彼伏。这些运动的目标是保护那些与政府对抗的家庭,提倡性道德和反对性放纵。在英国,各种新成立的支持家庭组织呈泛滥之势,主要有保守家庭运动(Conservative Family Campaign)、家庭论坛(Family Forum)、关心家庭组织(Family Concern)和家庭与国家运动(the Campaign of Family and Nation)等(Somerville 2000)。其他的道德保守主义团体,如基督徒联合会(the Order of Christian Unity)、全国纪念圣光运动(the Nationwide Festival of Light)和责任协会(the Responsible Society)也纷纷行动起来。另外,全国观众与听众协会(VALA)于1964年在玛丽·怀特豪斯(Mary Whitehouse)的领导下发动了抵制色情运动。还有一些反对堕胎、珍爱生命的组织,如保护胎儿协会(SPUC)和生命组织(LIFE),也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堕胎的运动。在美国,各种宗

教和保守主义团体汇集到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领导的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中。

有些人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道德改革运动组织都拥护保守主义的政府(尤其在英国),而且性政治也未能成为新右派否定战后共识的主流(Durham 1991)。然而,这些运动都体现了对“自由放任”社会、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敌意,因而毫无疑问都是保守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时,性、道德和家庭都被视为左派和右派之间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新右派、道德运动与性政治

道德运动在许多领域都非常活跃。在英国,有关离婚、节育、计划生育、同性恋以及堕胎的进步改革都遭到猛烈抨击。在美国,道德多数派也注意到诸如离婚、色情、女权主义和同性恋之类的问题,而将自己限定为一个恪守《圣经》者联盟,试图挽救美国家庭(Somervill 2000)。美国新右派也发起对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并将其作为首要任务(Faludi 1991)。

堕胎问题曾经是,如今仍然是道德运动最最重要的问题。英国在1967年的《堕胎法案》以及美国最高法院于1973年裁决的《罗诉韦德和多伊诉博尔顿案》(Roe v. Wade and Doe v. Bolton 1973)都放宽了对堕胎的限制。结果这种堕胎的自由化招来了反堕胎组织的批评。双方围绕堕胎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斗争,斗争核心是妇女的生育选择权和胎儿的生命权之间的权利对话。赞成妇女生育选择权的运动与赞成胎儿生命权的运动互相对垒。那些反堕胎主义者认为,堕胎实际上是对无辜者的谋杀,并把胎儿视为虽来之于母体但又完全独立于母体的实体。

然而,堕胎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运动,更是深刻的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关系到家庭政见以及性的问题。就像



女权主义者早就阐明的那样，切断性交和生育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和人身自由必不可少的部分。妇女要想平等地与男人一起参与社会（先不管其他社会不平等），就必须进行生育控制。这也涉及到对以往家庭中的男女分工进行质疑，对性关系进行重新审视，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将妇女等同于母亲的政治主张进行驳斥（Luker 1984）。全国堕胎运动（the National Abortion Campaign）在 1977 年宣称：“争取堕胎权的斗争是妇女争取自由斗争的本质内容，也是她们反对在核心家庭中总是把她们的性与生育挂钩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①</sup>同样，对反堕胎主义者而言，堕胎的牵涉面也很广。他们设法将“母亲”确定为妇女的核心角色，尽管这个角色被许多女权主义者视为妇女受压迫的本质。在美国，堕胎问题的重要性尤为明显，反堕胎组织联合压力集团反对《权利平等修正案》<sup>②</sup>（Equal Rights Amendment）入宪，两者共同发起了大规模的支持家庭、反对女权运动。

在英国，维多利亚·吉利克（Victoria Gillick）发动了另外一场重要的性道德运动，对卫生和社会保障部（DHSS）所颁布的“节育可以无视年龄”的规定进行抨击。吉利克强调了纵欲的罪恶和破坏家长权威的危害，并且试图将它们与国家的衰落联系起来。这场运动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并被广泛报道。然而，最终英国上议院于 1985 年 10 月作出了有利于 DHSS 的决议。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保守党政府对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十分失望，同时也暗示着性道德运动和维护家庭运动并没有得到那些积极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人士的支持。

其他态度鲜明的性道德运动也是基于保守的家庭观和男女平等观。在这些运动中，有些要求修改英国的一项法案，因为这项法案反对“提倡”同性恋，即反对将同性恋作为“虚拟的家庭关系”来接受（第 28 款）。最终，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通过了这项《地方政府法案》（the

---

① 参见全国堕胎运动（NAC）为 1977 年召开的全国学生联盟会议所提供的宣传手册（当代医学档案中心，韦尔科姆医学史研究所）。

② 《权利平等修正案》提出，不应该因为性别而损害权利平等。



Local Government Act)的第 28 款,从而明确了政府所认可的性关系形式。实际上,关于第 28 款的争论只是整个性教育斗争中的一部分。在性教育斗争中,像关心家庭和青少年协会(Family and Youth Concern)之类的组织认为社会应该完全取消性教育(Durham 1991, p. 110),批评 DHSS 为计划生育协会和其他有关性教育和节育的机构拨款。他们认为性教育是破坏家庭的不道德行为,往往是鼓励性交,腐蚀青年。这些运动者明确表示,只有异性恋和家庭性行为才是正常形式,除此之外都是离经叛道。他们将艾滋病归因于性滥交和同性恋,并且通过出版机构将艾滋病大肆渲染成“纵欲的瘟疫”(gay plague)。

### 结论：性政治中选择新自由主义自由化还是政府干预？

本章考察了新右派的政治主张,讨论了它们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一些道德运动之间的联系。这些政见可以归结为反女权和极端保守。最主要的是,它们都试图保护和倡导“传统家庭”。就像马丁·德拉姆(Martin Durham)所指出的那样,不应该将新右派(甚至于道德运动者)与新自由主义等同起来,因为新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新右派则要求通过政府干预来管制私人生活中的性问题,两者存在明显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将新自由主义阵营划分为不同的派别。例如,像自由协会(Freedom Association)这种支持自由市场的压力集团,在面对由保守党政府来领导反对不道德斗争是否将不利于个人自由问题时,也出现了意见分歧(Durham 1991)。另外,尽管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都极力鼓吹“传统家庭价值观”,但一些维护家庭运动的领导人,如维多利亚·吉利克和英国的反堕胎运动,都对政府中的保守党党员非常失望,同时他们从这些保守分子身上得到的支持极为有限。

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保守势力都属于同一个政治阵

营。70年代的经济衰退恰好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右派攻击社会进步力量提供了机会。而且,许多热心的新自由主义者也涉及到了道德问题。如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不断地赞扬家庭生活,并试图把它称为保守党反对纵欲斗争的一部分。他还在《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撰文宣称:“我们认为,保护自由包括保护使自由成为可能的价值观,而不是让自由蜕变为无法无天,其他党派却不这么认为”(Durham 1991, p. 132)。在道德游说积极分子与右派势力之间,经常会出现政见的雷同。如在美国,道德多数派和其他保守势力都积极参与反堕胎运动,而在英国,保守党比工党更有可能投票反对堕胎。

新右派最关心的是保护核心家庭,而维护道德组织则试图将性道德问题推向这场争论的中心。一旦“道德”问题和新右派的经济政策、福利政策挂上钩,维护家庭的“道德”运动就变成新自由主义政治议程的一部分了。这种情况在大西洋两岸攻击单身母亲为福利的乞讨者时最明显不过了。

杨明辉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Durham, M. (1991) *Sex and Politics: The Family and Morality in the Thatcher Years*. London: Macmillan.
2. Faludi, S. (1991)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3. Glennerster, H. (2000) *British Social Policy since 1945*,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4. Hall, S. and Jacques, M. (eds)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5. Levitas, R. (ed.) (1986)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6. Luker, K. (1984) *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Lowe, R. (1999)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since 1945*,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8. Murray, C. (1990) *The Emerging British Underclas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9. Pascall, G. (1997) *Social Policy: A New Feminist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0. Rowbotham, S. (1989) *The Past is Before Us*. London: Pandora.
11. Somerville, J. (2000) *Feminism and the Family*. London: Macmillan.
12. Thatcher, M. (1993)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3. Williams, F. (1999) 'Good Enough Principles for Welfar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8 (4), pp. 667 - 87.



## 第十八章 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议程<sup>①</sup>

赖斯·莱维多

我们看到,教育正日益走向私有化,尤其是在中小学教育领域。在很多地方,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由私营企业承包。虽然这似乎有提高质量和效率的合理性,但实际上,这样的转变将导致教育降格以求,向商业价值和职业技能方向发展。

在大学,公开的私有化集中在非教育领域,如膳食和保安。总体来看,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与其说是私有化,倒不如说是市场化。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意味着作为公共机构的高等院校像一家工商企业那样运作,而人的价值观和相互关系也由此向市场化方向转变。

最近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学院资本主义”的趋势。尽管高校教师队伍仍然主要由政府出资供养,但他们不得不围绕着争取外部基金展开竞争,并且此风愈演愈烈。在这一压力下,教师开始进行“市场或市场式的活动以获得外部资金”。(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

这种活动不只是简单地为教师带来更多的收入,它还意味着高等教育领域已经成为市场化议程的一个场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世界的高校普遍开始鼓励采用知识、技能、课程、经费、核算和组织管

---

<sup>①</sup> 本章部分参考《高等教育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策略与应对策略》,参见 <http://attac.org.uk/attac/html/view-document.vm?documentID=138>; 或 <http://www.commoner.org.uk/03levidow.pdf>。

理的商业模式。从逻辑上说,它们不得不这么做,以保证政府的资金投入,并保护它们自己免受竞争的威胁。

这些压力是更大范围的新自由主义以市场模式重塑社会的战略之补充。19世纪的早期自由主义将“市场”理想化为自由王国,并视之为天然之物;其强硬派通过圈地和“自由贸易”推行这一理念,并粗暴压制任何阻碍和抵抗,将这些障碍都看成是非自然的“干预”(见第五章)。与此相似,当今的新自由主义方案破坏了以往的集体财富,将公共产品私有化,用政府支出对利润进行补贴,削弱国家管制,取消贸易壁垒,并因此加剧了全球竞争。通过将人分割为个别的买主和卖主,新自由主义对人力和自然资源进行了更大的开发。

### 世界银行的“改革议程”

世界银行在高等教育方面推行全球性的“改革议程”已有多年,这一“改革议程”的重要特征是私有化、取消管制和市场化。一份世界银行报告不无自信地声明了这些原则:

改革的议程……将倾向于市场,而不是公有制或政府计划与控制。决定高等教育市场方向的是市场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在几乎全世界的支配地位。(Johnstone et al. 1998)

这份报告认定,教师及其传统的保护主义思想是市场效率的主要障碍。在这份报告关于未来的远景方案中,高等教育将较少依靠教师的技能。学生将成为消费者或委托人。隐含之意是,私人投资者将更有可能从政府的支出中获益,并影响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工商业和大学的管理者将成为主要的合作伙伴,师生关系会得到重新界定。

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很快成为将学术自由重塑为对新自由主义未来之承诺的一个政治武器。在随后的提案中,大学管理部门将学术自由的特征概括为在“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是经济、资金和技术发展全球化的上升需求”之间“保持平衡”的一种责任。举例来说,在1998年的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这一矛盾通过宣称大学教师应享有“学术自由和自主,这种自由和自主被认为是一系列的权利与责任,与此同时对社会负有完全的责任”而被回避(转引自CAUT 1998)。

可以推定,大学管理部门所说的“负责”指向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议程,而不是指向其反对力量。确实,学术上的考虑往往从属于技术考虑。为应对这些进攻,教育专业社团将学术自由作为言论自由权之一来进行捍卫。

虽然世界银行议程在教育家中得到的支持非常少,但这一议程的一些关键要素还是得到了实施。通过结构调整政策,有附加条件的债务减免迫使南方国家实施高等教育自由化并缩小高等教育的规模(见第十二章)。不过,这一章将着重讨论北方国家的情况,在那里,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内部。

### 北美：作为教育商品的课程

北美有很多大学采用了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它们不仅仅是作为商业伙伴而行动,它们本身就是商人——它们通过大学的资源、教师队伍和学生劳动进行赢利活动。(Ovetz 1996)

在一项企业化议程中,大学发展了在线教育技术,即电子形式的课程。当然,正如欧洲的一些大学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这一媒介能够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面对面接触起到辅助作用,可以提高教育质量。不过,在北美,使用电子媒介的意图明显有所不同——其目的是将教育商



品化和标准化。

这些意图遭到了学生和教师的抵制。举例来说,199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了一个“加强教育倡议会”,要求将其所有的艺术与科学课程放到互联网上。它的目的是通过与高科技公司结成伙伴关系,将在线课程和赢利性的商业挂钩。约克大学类似的倡议活动导致了一场全体教师的罢工,并且这场罢工得到了学生的支持,他们打出“教室 vs 会议室”的标语(Noble 2003)。这些反对者集会并策划对抗战略。

新技术能用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大学的规章变为允许进行赢利活动之后,它们的科研角色被改变了。大量的资源从教学转向研究——后者是能够带来专利和版税的。教师投入教学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学生—教师的比率不断上升,这加重了师生双方的负担。高等教育赢利化的结果是教育的低效。

由这一立场来看,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将课程标准化,以此来提高效率。一旦服从管理者的要求,将课程发布在网上,这些材料就可能被其他大学购买。更妙的是,这些课程的讲稿能够通过合约的方式,被大学之外的人购买。通过将控制权转移至管理者手中,(远程教育)技术可被设计用于培训、取消和(或)取代教师的劳动。

这种方法也改变了学生的角色,他们成为教育商品的消费者。师生关系变成消费者与商品供应者之间的关系。这就弱化了他们之间作为人的学习伙伴关系。

学生轻而易举地变成市场研究的对象。举例来说,在加拿大,大学免费提供 Virtual U 软件,作为交换,使用者在其使用过程中向卖主提供数据。当学生注册课程使用这一软件时,就会被正式指定为“实验主体”,他们同意卖主接收其全部的“计算机产生的使用数据”(Nobel 2003)。这与欧洲的许多远程教育截然相反,后者强调的是对学生的教学辅助作用,并引导学生对课本进行批判性评估。

## 欧洲：弹性学习

在欧洲，公共服务和政府支出转而采用新自由主义方案，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工业界圆桌会议(ERT)开始的(Balanyá et al. 2000)。ERT 的议程被欧洲各国主要领导人者及欧盟官员接纳。他们特别谋求改变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ERT 将教育和培训视为“对工业的未来成功至关重要的战略投资”。欧洲工商企业对教育方案“明确要求加快改革”。然而，不幸的是，“工业对教学课程只有非常微弱的影响”，而教师们“对于经济环境、商业和利润概念的理解很不充分”。

他们进一步提出：“作为企业家，我们相信，教育者应当能够在没有外部干预或压力的情况下自主地进行关于效率的内部探索”。ERT 悲叹，欧洲工业界已对全球化作出回应，但“教育界回应迟缓”。作为补救措施，“学校与地方工商企业之间应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近来他们提倡把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作为今天学业和明天事业的一个基本的学习工具。其主要优点如前所述，ICT 打开了知识的世界，允许个体探索，并对学习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它与“终身学习”的联系，这对欧洲人在全球竞争所带来的变化中保住饭碗是必要的。

然而，有批评者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商业议程中 ICT 有着更为特殊的作用(Hatcher and Hirtt 1999)。首先，它推动个体化及弹性化的“学习”，这是现代工人所需要的，个人必须对管理其工作领域中的人力资本负责。其次，ICT 使教师的角色消失——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因为正如 ERT 所抱怨的，教师对于商业需要的“理解不充分”，也因为他们目前的角色阻碍了“内部对效率的探索”。

按照 ERT 议程表的安排，欧盟成员国开始促成建立“弹性的劳动

力市场”，以使欧盟能够“保持全球竞争力”。相应地，1997年欧盟委员会建议“对公共开支作限制性的重构……鼓励对人力资本及其研究、发展、改革、创新和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它鼓励旨在“提高工人就业能力”的“培训与终身学习”。

从那以来，官方文件提倡为未来的劳动者实行“公民教育”，以更好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它们预见甚至欢迎“教师作用的下降，这也为新的学习资源的发展所证明，该发展明显是由于ICT和人力资源而不是教师的作用”(CEC 1998)。成为业主和商业伙伴，对学生来说意味着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师生间的教学关系被潜在地替换为一种消费者—生产者的关系。

2000年里斯本峰会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它将欧盟的目标设定为打造“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型社会”。不久，这一目标被详细表述为要求“改造教育和培训，使其能够向个体公民提供适合其一生所有阶段的学习机会”。这一终身学习概念有很长的进步论的历史，比如说，提升公民作为社会成员的能力，而在近年它戴上了更适应于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人文主义面具。

在经济合作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的政策文件中，终身学习成为增强个人、地区和国家竞争力的手段。与不断变化的就业压力相一致，个体的学习责任变成对自己进行适应性再培训的责任，同时也是使自己能够为社会所接纳的一种手段。虽然“积极公民资格”仍被鼓吹，但它已降格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Borg and Mayo 2003)。随之而来的关于终身学习内容与目的的争论应被看做反对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一场斗争。

### 英国：作为没有边界的企业的大学

作为欧洲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拓荒者，英国成为高等教育市场化之



压力的缩影。政府推动学生人数大幅增长,而资金投入却没增加多少。在研究评估规划的压力下,许多大学院系将活动重点从教学转向研究,以便从实业界获取更多的资金。因此,为师生联系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少,而课程标准化和评估标准的压力则不断加大。类似的压力还来自正式的评估训练,它要求教师能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与结果”。

学生越来越以商业化的算计眼光来看待教育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取消了大多数学生的助学金,并开始收取学费。由于这些变革,学生较之以前负债更多,于是他们不得不选择那些对将来能够找到高报酬工作有帮助的课程,而不是诸如艺术或人文那样的课程。

学生对当局收取学费这一举动提出抗议,他们将该负担同对私人资金更为普遍的依赖联系起来。“通过提供这种资助,商业试图对我们的教育体系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学生不应被迫选择那些预期能够获得回报的[课程]。”免费教育运动如是说。

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糕,也就是说,大学自身越来越表现得像工商企业。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议程将新自由主义关于弹性的两种含义联结起来:首先,学生——消费者(或他们的商业赞助者)追求能够弹性地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学习。其次,全球竞争者根据顾客要求,弹性地设计并出售课程,所以大学必须要参与并应对这样的竞争。这样的语言就像一个能够自我应验的先知预言,能够通过协助创造市场关系而起作用。

与此相类似,英国的大学管理者们想消除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界限,以及教育商品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壁垒。他们改进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传输技术,作为变成“一个没有边界的企业”之关键手段(Universities UK 2000)。比ERT诊断更进一步,他们已经将大学当做企业,虽然是一个有缺陷的必须用公司章程来加以控制的企业。

一些机构结成联盟,成立了电子大学(e-university),作为打开市场的一个重要武器。2003年5月,国际研究型大学网络(UNIVERSITAS 21)从其在新加坡的总部开通了一个在线的MBA课程,从而开始了在

线学习(e-learning)的业务。其发布的新闻称,这标志着“从砖瓦教育模式到进军约1110亿美元需求的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范式的转变”。

推动这一议程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服务商业化,而大学被指派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们期望在几个层级上展开竞争——譬如在面向劳动力市场增强学生技能上,在教师队伍(如通过与完成任务相挂钩的薪金)相互比较上,在分配研究基金以加强“竞争型、知识型社会”方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扩展为科研服从私人基金提供者的需要。这样,英国大学就为向全世界出口“教育服务”做好了准备,并藉由自由化获取优势(Nunn 2002)。

类似的市场逻辑成为每所大学都应被授权设立“附加学费制”<sup>①</sup>之提议的基础。这一政策被鼓吹为是一种增加低收入学生津贴的方法,然而,实际上它将带来等级分化的加强。分化的学费将强化一种成本效益观,在这种观念下,学生将工具性地算计他们从特定的课程——正是这些课程使他们在学生时代背上了巨额债务——中将来能获得多少经济回报。教育风气的这一变化无疑是对全面商业化议程的补充。

### 结论：全球应对战略之我见

可以把新自由主义议程广义地描述为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即根据市场模式,对高等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调整。虽然只是市场化的某些形式使教育成为商品,但它们都把商业的算计标准强加于对教育及其人文产品的评估。“投资”从隐喻变成白纸黑字的事实:对于大学及其教师来说也许得从量化的角度算算他们所提供的效益。

要对付新自由主义议程,需要进行大量的努力。首先,必须厘清各

---

<sup>①</sup> 指各大学不需要按照国家的统一标准收取学费,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师资条件等相应地确定自己的学费标准。——译注



种类型的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市场化方式有各种微妙的形式——如意识形态话语、投资优先、公共—私人伙伴关系、学费、成本—收益分析、绩效指标、更改课程、新技术、学生成为预先包装好的商品的消费者等等。批评者需要说明为什么所有这些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如何改变学术工作和学习的内容，以及作为全球议程的一部分，它们是怎样从为资本训练劳动力的努力中发展起来的。

其次，跨阶层和跨地区的反抗必须联合起来。新自由主义策略将我们全部变成一个商业计划的碎片，如竞争者、合伙人、消费者等等。作为回应，我们需要一个涵盖多种领域的跨国网络：为了有一个多样化的未来，要联系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攻的所有目标，将所有单个的反市场化斗争连结起来，加强团结，将我们自己变成抵抗和学习的集体主体。这样的网络需要横跨所有相关的民众（教师、学生、非政府组织），以及被认为是互相竞争的地理区域。

第三，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必须非实体化。ICT 可以被设计用于促进市场化议程，例如将师生关系物质化；也可以阻碍市场化，如促进学生和教师中的批判性辩论。在这一思路下，为将 ICT 作为社会关系非实体化，我们需要对 ICT 的各种潜能作出区分。虽然互联网被广泛应用于对批判性分析的传播，但我们需要确保这些分析能够涵盖且能够被应用到可靠的路径上。

最后，必须开发其他的可供选择的途径。简单地反对市场化，或与任何以前存在的东西相对立，都是不恰当的。反抗可以通过发展不同的教学方式得到加强，它将增强公民的批评权、文化丰富性和社会享受。这些努力还能激发那些争论，即如何界定我们共同的问题与期望，而超越对我们劳动的更为便利的剥削。以这样的方式，学术自由就能与那些关于潜在的和令人向往的未来之公开辩论联系起来。

李宁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lanyá, B., Doherty, A., Hoedeman, O., Ma'anit, A. and Wesselius, E. (2000) *Europe Inc.: Regional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see Corporate European Observatory, <<http://www.corporateeurope.org>>).
2. Borg, C. and Mayo, P. (2003) *The EU Memorandum on Lifelong Learning: Diluted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vailable from peter.mayo@um.edu.mt.
3. CAUT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1998) 'Unesco Declaration Puts Academic Freedom at Risk', <<http://www.caut.ca/English/CAUTframe.html>>.
4. CEC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8) 'Education and Active Citizen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http://europa.eu.int/comm/education/citizen/citiz-en.html>>.
5. Hatcher, R. and Hirtt, N. (1999) 'The Business Agenda Behind Labour's Education Policy', in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New Labour's Education Policy*. London: Tufnell Press. <<http://www.tpress.free-online.co.uk/hillpubs.html>>; see also <<http://users.skynet.be/aped>>.
6. Johnstone, D. B., Arora, A. and Experton, W. (1998) *The Financing and 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 Status Report on Worldwide Reform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Departmental Working Paper, <<http://www-wds.worldbank.org>>.
7. Noble, D. (2003) *Digital Diploma Mills: The Auto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8. Nunn, A. (2002) "GATS, Higher Education and 'Knowledge-Based Restructuring' in the UK", *Educ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4 (1), pp. 32 - 43.

9. Ovetz, R. (1996) 'Turning Resistance into Rebellion: Student Struggles and the Global Entrepreneurialisa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Capital and Class* 58, pp. 113 - 52.
10. Slaughter, S. and Leslie, L. L. (1997)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1. Universities UK (2000) *The Busi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UK Perspectives*, <<http://www.universitiesuk.ac.uk>>.

## 第十九章 新自由主义与公民社会：计划与可能

萨波·辛哈

新自由主义,我们这个时代宏伟的政治计划,表面上是将政府的作用收缩到最低限度,并将政府职能重新分配到市场中去,但它同时又包含了一种尊重公民社会的政纲。“公民社会”的复苏与新自由主义势力上台是同时发生的,并且它被整合进新自由主义借以扩展自身、使自身合法化的话语与组织中。因此,要批判新自由主义,就要对这一计划中的公民社会的定位进行分析,还要分析那些复杂的、动态的和跨国的进程,通过这些进程,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其他“公民社会”形式也在形成。

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程度不同地散布在一个范围广阔的理论、政治和政策领域,涵盖国际组织、政府、跨国公司、学术立场与发展干预(见第五章至第七章)。由于它在设计全球和国家的管理日程表方面有关键性的影响,并且因缺乏其他选择而在许多领域被接受,因此它有取得霸权地位的野心。这一野心遭到了两个问题的挑战:新自由主义计划如何设计一种新的有关公民社会的策略?它在控制重塑公民社会的进程方面有多成功?这一章将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审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 新自由主义与世界秩序的构造

在学界,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对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影响。弗莱堡学派提出,“政府”、“经济”和“市场”不是天然的而是建构起来的。它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资本有独立的“逻辑”或产生危机的天然趋势,或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有任何不可避免的矛盾。它将经济竞争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的最高表现,并赞成政府对社会、政治和立法的监管——朝着鼓励竞争的方向对制度进行改革。芝加哥自由主义者则反对弗莱堡学派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相对自治领域的设想。他们提出,在所有的行为和制度中普遍存在“效用最大化”这一独一无二的合理性:“人的行为的总和……特点在于通过竞争进行稀缺资源的配置。”(Lemke 2001, p. 197)他们试图使行为的所有形式和“非经济领域”都能够用这一合理性的术语来解释。“效用最大化”成为理解并重组政府与社会的原则。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的是,“经济人”不是关于政府行为,而是关于一个“行为可控的存在物”(p. 200)之限定。新自由主义理念和策略的目标是创造出理性个人。

这些理论上的建构是如何转变为政治权力的?奥弗比克和冯·德·皮埃尔(Overbeek and van de Pijl 1993)提出,当一种计划获得支配性地位的,其核心概念可以被用来分析不同的情形,它们能够创造不同领域的政策,并且能够产生普遍化的制度形式。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的自由国际主义旨在创造一个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服务的跨国体系。在战争年代国家垄断的反自由主义阶段,国家托拉斯和卡特尔、国家“社团”和劳工运动是组织的核心形式,追求一种狭隘的“国家利益”。战后几十年的社团自由主义把政府控制与侵入私人生活以管制劳动的“标准化的干预”和福特主义合为一体。其核心的制度形式是跨国公司、某些社会民主形式、日常生活的官僚化,以及植根于冷战

“集团”政治中的“国家利益”政策框架。

新自由主义,过去 20 年的“新常态”,被建构为一个对付企业自由主义“常态危机”的方案,它产生于劳工斗争和新的社会冲突,是越战和当时通行的模式走到尽头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政治结合了各种要素:个人主义、自由选择、市场社会、自由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的最少干预、在非经济领域内的强政府,社会专制主义、纪律社会、等级和服从,以及对于国家的膜拜(Overbeek and van de Pijl 1993, p. 15)。这一结合在有新自由主义改革经历的国家中形成了对主要议程的“政策支持”。

区分这些形式和历史时期对于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历史是有益的,但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的语境却没有明显的关联。社团主义,战后时期在拉美比在亚洲和非洲更为普遍,它比欧洲的福利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更为平民化及推崇社会的权力。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团自由主义核心的跨国企业形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被带着怀疑的目光来审视的。国有化、国有化的威胁、庞大的公共部门,以及公正和利润返还(profit repatriation)的名义,是控制它们的重要政治模式。社会通过等级、地域、种族群体和政党等形式与政府相结合,而不同于 OECD 社团主义的三方安排。此外,作为一种发展思想和提供帮助之来源的共产主义集团的存在,限制了社团自由主义模式输出的范围。

这些随着新自由主义占据优势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政权令人沮丧的记录,计划结构调整,新政治格局的出现,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变迁,孕育了创造和产生新模式的契机。发展中国家政权将(后)华盛顿共识标记为新正统派的形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将其传遍第三世界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还深深影响了双边机构的发展—干预政策(见第三章和第十二章)。新的理论建构的核心建立在效用最大化是合理的行为、资本是至高无上的目标这一假定以及资本应当不受约束并能够自我调节的观点之上。这些原则现在既用于对政府和社会进行分析,也用于对它们进行改造。单一民族国家今天



采用新自由主义的不同版本,取决于它们与国际组织、国内政治集团的权力和利益、消费者文化的传播(及消费主义逻辑)之间的权力对比,以及对国家管理议程其他要素的兼容性。

## 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与发展

这一部分将探讨新自由主义计划中公民社会的地位,并对用来重构问题和信息干预的分析范畴,及这一理论和政策改革实践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效果进行简要回顾。

新自由主义关于发展失灵的解释,主要是对政府的批评,这也为公民社会敞开了空间。它们不关注“国家”而关注“政府”,政府在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方面的失灵,被认为是政府机构寻租行为、官僚作风的痼疾、交易成本的难题以及国家的监管和公共部门对市场不起作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希望通过善治(good-governance)议程对政府进行改革,包括去中心化、参与、问责和透明。在市场尚未充分得到发育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提出,政府的社会职能应分散到“公民社会”中去。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机构将“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体,试图通过向其提供巨额发展基金、将它们整合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去等方式,来重新界定其形式和职能。

在新自由主义计划中,分派给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发挥了作用。它正在履行的从政府那里争取来的职能,包括分权、两性政治、可持续发展、能力构造、制度设计、参与、评估等等,从而影响了非政府组织活动新领域的拓展。如果说以前非政府组织与这些活动领域只是有所关联的话,现在它们则是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中逐渐向其接近。考虑到非政府组织开始更多地与国内和国际机构进行合作,它们所声称的“与人民密切联系”就难以为继了。国际发展机构资助的契约性工作,对一些非政府组织恢复为私有并提供专业化、赢利性的发展咨询服务起到了刺



激作用。它使整个公民社会新正统派的发展分散化,包括解决发展问题的新制度方法的运用、政府行为的理性行动者模式,以及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受益者等等。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新自由主义者们就将其关于公民社会的概念扩展到包含“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涉及信任、规范、互惠和社会网络,它被新自由主义者们提高到解决公共问题、创造公民社会以及对民主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重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福山(Fukuyama 1999)将这一概念与对市场理性的归纳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合作对于实现自利的目的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信任的缺乏,合作很难成功。他援引囚徒困境问题——理性行动者之间交互干扰作用——以解释信任的产生过程。他认为,自由市场是生产出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的完美领域,也是创造公民社会、民主和善治的关键要素。

新自由主义鼓吹“善治”,这一概念重新界定了政府及其角色,创造并扩大了公民社会的空间。在新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理想的政府是去中心化和可参与的,它对官僚机构进行精简,实行新的公共管理方式,变得更为负责和透明。它集中其核心职能,在执行生产、再生产和再分配职能时,为私人(包括国际的)资本和非政府组织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空间。同样,非政府组织在培训、管理和评估新的管理制度方面被赋予一定的作用。

除了把公民社会的形式和角色制度化的这些模式外,新自由主义的目标还包括限制那些与公民社会相反的形式。比如,它试图通过将劳动力转换为“人力资本”概念,将其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种自然遗传特征的结合体和作为“投资”结果的技能而非生产商品的独立要素来考虑,从而使其非政治化。于是,“劳动者是……对其投资决定负完全责任的独立企业主……他们是自己的企业主”(Lemke 2001, p. 199)。由于劳动者成为其个体谈判的代理人,集体劳工政治就变得多余了。新自由主义通过断言工会非法,并通过由独立的达标、考核、工

资和奖金、业绩等等组成的弹性劳动关系，削弱劳工的斗志（Bourdieu 1998）。

同样，新自由主义者们先发制人，应付其政敌，对“环境”和“资源利用”进行了重新定义。他们援引“产权”和“新制度学”方法来阐释这些概念，提出：从私有财产中获益的权利，应与加于享受这些权利的其他人的成本之全部责任相称。这就避开了诸如污染等外部问题。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与他人权利的理性行动者、适当的信息、管理及批准资源使用的公共机构，也会防止资源耗尽。使这些概念制度化的一个途径是，通过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寻求一种方式，既能够将“环境”保留为“资本统治”的一个领域，又能够扮演抑制过度使用和污染环境的理性行动者角色。另一个途径是“污染许可”原则，这一方法建立在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经由京都议定书得到了全球性的推广。在农业领域，新自由主义者创立了新制度，以便由理性个体组成的“使用者群体”能够在其资源利用中使成本效益分析内部化。

新自由主义在创造一个对其起支持作用的公民社会方面是否获得了成功？在非政府组织方面，虽然它提供了新的逻辑和操作准则，但新自由主义没能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其计划中。非政府组织在过去的150年中获得了国际化的发展，并始终保持独立。像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那样的非政府组织，虽然与新自由主义代理机构如世界银行进行合作，但是却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其他的，诸如“布雷顿森林观察”，对新自由主义的多国机构进行监视；如“反匮乏组织”或“第三世界网络”等非政府组织，则支持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

新自由主义承认公民社会的作用之一是使政府为保证发展和服务负责。但是对于不同形态的公民社会，有不同的关于“负责”的政策。印度的“信息权运动”所要求的信息，不仅是为了敦促政府为善治负责，“信息权”本身就是公民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负责”这一概念已从



管理中溢出,涵盖了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普遍关系。在阿雷格里港<sup>①</sup>,参与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s)与工党的一项支持政策及其对于新的国家计划的要求全面捆绑。在喀拉拉邦<sup>②</sup>,去中心化与左翼党派政治的复苏紧密相联。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不仅将负责政治拓展到新自由主义阵营——如世界银行、跨国公司,还进一步将其拓展到新自由主义试图将资本统治延伸到的那些领域中去。

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反自由和排他主义形式有所认识并有所警惕,他们的表述仍然忽略了受社会阶级及其固有地位影响的限制,而这些依然是在所有社会中对社会力量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援引囚徒困境”的交互干扰,从这一观点看来,是在抽象的、平等的个体之间创造社会资本。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干预,是围绕诸如“股份持有者”(stakeholders)和“用户群”(user groups)等非政治化的集群构建的,并成为创造社会资本的关键代理人。但是这一理念化的理想模型没有勾勒出这些群体所处的位置及其固有的力量:有产者,男性,官僚主义者,资本家,统治阶级,种族等。新自由主义那些关于社会资本的观点,由于忽略了集群的力量,因而限制了其政策干预的成功。由民族和地区传统形成的自发联合与社会运动,常常反对各种力量之间稳固的联系,使形势更为复杂。这些在过去历史中通过利益关系形成的集群所产生的多种“社会资本存量”(Bourdieu 1998),是新自由主义“有步骤地破坏集群的计划”所要应付的对象。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正式员工,尤其是公共部门的正式员工,所得保障减少;无权利、无保护的“非法”劳动者被大量雇佣;“纪律严/工资低”的血汗工厂和“非正式部门”大量繁衍。但是新自由主义的个体化倾向面临着反向的运动。由于新自由主义对工会构成威胁,并且威胁到整体的公共部门,劳工政治的目标是重组一个新自由主义

① 位于巴西南端。——译注

② 位于印度西南部。——译注



思想的对立物——一个能起到调节和重新分配作用的政府(Bourdieu 1998)。新自由主义将生产过程视为反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关键点,从而对生产过程造成了直接影响(Giu 2000)。新劳工组织对资本统治提出挑战(van de Pijl 1993),并通过新的方式进行这一挑战,即经由特殊的企业(可口可乐、安然公司)、部门(渔业、农业)和两性政治建立起国际化的联系。它们与跨国农业工作者运动、激进民主者、消费者团体、大专院校学生及政党结成联盟。旧的联盟形式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产生出新的政治形式,并且围绕“自由化”和私有化形成了独立的联盟。近来,面对政府和经济的崩溃,阿根廷的工人们组建了一个新型的自由经济合作组织,并运作了一段时间。这一组织既是政治层面的又是经济层面的:工人组织接管了食品生产项目,并通过商店(也被工人组织接管)对其进行再分配。新自由主义在推广与人力资本有关的理性个人主义和使劳动从属于资本统治等方面的胜利,由此就被打上了问号。

近年来出现的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无论与新自由主义的财产权逻辑还是与资本统治的格言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全球渔业工作者联合会反对跨国资本利用解除管制和自由化所资助的大规模捕鱼方式,他们把这种方式与自身低强度的工作方式相对比,指出后者能够为海洋生物的再生留下广阔余地。全球渔业工作者联合会由此向资本的统治提出质问,要求工作权,并要求保护海洋资源、使其有再生的空间。环境不能被囊括进产权逻辑中,它只能在与产权逻辑相反的议程中得到多样性的表述。与此类似,“原住民”运动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联系。女性主义者将性别与获取资源的路径和权利相联系。美国边缘群体将环保问题与种族主义的历史图景相联系。对转基因(GM)农作物的抵制运动将消费者权利、食品安全、农业工作者权利和企业权利相联系。这样,有多重表述方式的“环境”就为一系列折中提供了接合点。

## 结 论

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好前景及其必然性鼓与呼，它承诺了一条不同于先前“发展危机”的道路。东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鼎盛期呈现出空前的发展水平，尽管这种成果不一定是由于它们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在拉美以及其他一些东欧、亚洲国家，新自由主义有臭名昭著的危机倾向。虽然一些国家的一些社团从中获益，但新自由主义时期长时间的不稳定性和发展的不均衡限制了其成功：它已经占据优势地位，但还不是支配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拥趸宣称，任何对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的反对形式都是非法的——而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曾经详细剖析与反对的——正如我们在从西雅图到热那亚的警察对反全球化抗议者的镇压中，在新自由主义者将他们的年会后撤到更受支持也更为遥远的地方所见到的那样。这些新的国家—资本结构所具有的高压政治的本性，我们能够在伊拉克战争及伊拉克经济迅速私有化中看得很清楚。在迈阿密，警方动用了“反恐战争法”来对付那些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示威者。现在被宣布为非法的联盟，还包括革命左翼及伊斯兰广播网。为应付反对者，政府自称扫除了新的强制性力量，但它们仍然屈从于政治压力而采纳了最为普遍的保守主义政策。这个宣称对市场和公民社会怀有敬意的政府表明，将政府权力重新分配给市场和社会行动者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还处在变化之中。

李宁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ourdieu, P. (1998) 'The Essence of Neoliberalism', *Le Monde Diplo-*

- matique*, December.
2. Fukuyama, F. (1999)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MF Conference on second-generation reforms, Washington D. C.
  3. Gill, S. (2000) 'Towards a Postmodern Prince? The Battle in Seattle as a Moment in the New Politics of Globalisation', *Millenium* 29 (1), pp. 131-40.
  4. Jenkins, R. (2002) 'Mistaking "Governance" for "Politics": Foreign Aid, Democra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S. Kaviraj and S. Khilnani (eds) *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Lemke, T. (2001)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Michel Foucault's Lecture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on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Economy and Society* 30(2), pp. 190 - 207.
  6. Overbeek, H. and Pijl, K. van der (1993) 'Restructuring Capital and Restructuring Hegemony: Neoliberalism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Post-War Order', in H. Overbeek (ed.) *Restructuring Hegemon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Neoliberalism in the Nineties*. London: Routledge.
  7. Pijl, K. van der (1993) 'The Sovereignty of Capital Impaired: Social Forces and Codes of Conduct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H. Overbeek (ed.) *Restructuring Hegemon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Neoliberalism in the Nineties*. London: Routledge.



## 第二十章 新自由主义与民主： 市场力量 vs 民主力量

亚瑟·马克伊文

曾经有个时期，富人们在为他们的经济特权及其对政治权力控制的合法性辩护方面不会遇到什么麻烦。被关于高贵血统的各种废话所支持的神圣权利理念，为富人们的富有及其统治提供了全部理由。当武装力量为权力和特权提供最基本的保护时，一种鼓励平民默默顺从的意识形态也是稳定精英统治必不可少的基础。

对于今天的精英来说，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随着民主思想的崛起，有产阶级日益面临来自下层的挑战。这个挑战颇有一些讽刺意味，今天的精英——资本主义精英——在欧洲和美国的上台，部分是通过要求旧的精英——僧侣和贵族——让出一部分政治控制权而获得的；而使这些要求得以明确化的意识形态就是民主。

这个问题——如果不是讽刺的话——对那些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参与重新修订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因提供了现代民主的思想支持而声名卓著的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是通过暗中限制参与民主化进程的人数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当洛克在其《政府二论》(1690)中说“人民应该判断”政治权威的行为是否正确时，他所界定的“人民”只包括有产的白人男性。

18世纪末，美国进行关于宪法的辩论时，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宪法的首席作者——在他那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1787)中遭遇了这一难题。麦迪逊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即随着政府民主体制的建立,派系将会得到发展,并且“无论是成为全体中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会导致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产生派系的最为普遍和持久的根源在于财富多样化的和不平等的分配。那些有产者和无产者的社会利益总是有着显著的不同”。他的意思很明白:在对抗那些“对财产、取消债务、财产的平均分配,或者任何其他不适当的或病态的计划的狂怒”的同时,保持政府的自由原则及其全民性不被改变。麦迪逊的解决之道在美国宪法中得到了具体表述,即共和政体或曰民主政体,是民主形式(form of democracy)而不是“绝对民主”(pure democracy),尤其不是充分的广泛共和。因此,首先,应当彻底取消普通百姓对管理事务的直接参与。其次,他们应当被分化为无法有效结合的多个派系,以免对财产特权构成威胁(见第五章和第六章)。

麦迪逊开出的“分而治之”以及使大众远离权力的处方,一直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而在其他国家,也有相似的政治结构履行着同样的职能。但在当代,对经济特权和精英权威的挑战不断增多,麦迪逊式的方法遭到了暗中破坏。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资本积累趋向于消灭手工业者、小农场主和小作坊,因此,作为资本主义获胜的一个后果,工人生活状况日趋同质化,并产生“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现实的和潜在的选举优势”(Bowles and Gintis 1986, p. 55)。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的根本原则——一人一票——对于有产阶级的地位日益构成威胁。

当然,现代的资本家们有很多方法对付这一威胁。比如说,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金钱对代表制选举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外,通过媒介——学校或其他场所——财富成为影响意识形态的主要因素。另外,政府武装也常常被用来镇压对现状构成威胁的群体。不过,只有市场对社会的控制——这一领域的规则是一元一票——才是对民主最有效的限制和对资本家继续掌权的最有力支持。

## 社会和市场

市场是非常有用的制度，它提供这样一个机制，通过这一机制，人们相互作用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然而，正如卡尔·博兰尼所指出的，支配或“通过市场对经济体系进行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组织有压倒性结果：它意味着社会的管理仅仅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植根于经济体系中，而不是经济植根于社会关系中”(Polanyi 1944, p. 57)。

历史地来看，市场实际上是植根于社会关系中的——市场受到社会习俗的限制，受到社会对于公平的要求的约束，并且至少是部分直接为社会目标服务。虽然几十年来的变化一直趋向于市场有更大的支配地位(博兰尼所谓“大变革”)，但它并非毫无阻碍地前进。福利国家是对市场进行社会控制的现代尝试，而东亚国家近年来通过对市场进行监管来达到社会目标，也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案例中，市场结果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但这些经验表明市场需要的作用不在社会关系之外，也不会完全支配社会关系。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将进一步促使社会经济生活特征向市场方向转变。通过呼吁在经济生活管理中尽可能的“小政府，大市场”，新自由主义提出了行动议程，因为——用博兰尼的话说——“当前社会只是市场的一个附属物”。通过尽可能取消政治活动，以及在经济和政治之间设置高壁垒——以保护私有财产的名义——新自由主义纲领所实现的民主是把政治领域限制于对经济事务的依赖。民主在普选权和相伴随的政治参与权的意义上可能存在，但是政治权力领域，即选举运作的领域，并不包括人民生活的主要的物质层面。

然而，使经济事务与政治权力绝缘，并不意味着“弱政府”。相反，新自由主义要求一个能保证私有财产首要地位、保证市场超越于社会



控制之上的强政府,而这就限制了民主力量的活动。新自由主义为了其观点得以贯彻,也常常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有时候独裁专制的政府(见下文)。

## 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宣言中最为明确的政纲莫过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近几十年来它已经从政治领域的运动转为市场领域的运动。私有化产生了民主问题,尤其是涉及那些针对公共或私人利益会作出不同决定的企业时更为尖锐。比如说,在公用事业中,大众感兴趣的是限制收费,以保证与满足基本需要和特定行业、特定地区发展相关的分配。然而,公用事业的私人管理者只有一个兴趣——利润,这就容易与对收费进行任何限制的方案产生冲突。

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sup>①</sup>事件,是一个围绕公用事业发生冲突的明证。2000年,科恰班巴的供水私有化引发了重大的、普遍的政治抗议(Finnegan 2002)。抗议既针对现实的不公——水费的大幅上涨——也针对一个抽象的观念,即用水应该和用氧一样,是基本的人权。而在科恰班巴斗争中的基本议题——其之所以突出是因为这一事件最终以私有化的逆转了结——是这一重大经济活动到底是该用政治程序调节,还是该由利润驱动的市场调节。“政治程序”不一定意味着民主程序(见下文),但一旦某一活动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民主程序就丧失了一切可能性。

教育私有化的举措也强调政治决定与市场决定之间的冲突。在智利,皮诺切特独裁政权所施行的政策,使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拥趸将这个国家作为展示他们议程的窗口——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超过40%

---

<sup>①</sup> 玻利维亚中西部城市。——译注

的初中生进入私立学校。许多政府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削减政府基金的压力,向公立学校收费,这是事实上的私有化。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在教育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样式,这些样式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由私人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来运作形式上的公共教育体系。

与这些最近的变化相反的是,社会有教育体系的长期计划,以适应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需要——包括创造社会平等、社会凝聚力以及普遍价值和共同语言。当学校被私有化,教育成为商品,这些社会需要就会被私立学校经营者赢利的需要和个人为满足特殊需要而购买教育的决策所取代。由于变为商品,教育“产品”的本质改变了(Leys 2001, ch. 4)。学校事务的民主管理即使不是完全被取消,也是大幅减少。

当然,不是所有的私有化都是同样的。比如说,制造业的私有化在一些国家可能是合理的步骤,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个企业的商品/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能够限制对非直接参与企业市场交易活动者的冲击,则这个企业转入私有领域可能就是适当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类情况下,公共决策与私人决策之间似乎没有分歧。<sup>①</sup> 甚至诸如发生在私人领域的供水或教育这样的活动,也不一定就逾越了公共管制的范围。

###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解除管制

然而,公共管制正如公有权一样,是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首要对象。当前阶段的全球化区别于先前国际经济联系浪潮的一个明显特征,是

---

<sup>①</sup> 私有化不顾及公共领域的活动向私人部门的转移,因而往往是一个高腐败的过程,比如像在墨西哥和前苏联发生的。这是一个重要论题。不过国有企业也可能充斥腐败。而私有化往往也是消灭工会的一个手段。私有化对工会的破坏,与效率和削减成本——它对这一行动的通常解释——无关,而只是把成本转嫁给工人的手段。

强调在解除控制状态下的全球空间的规划。事实上，当新自由主义鼓吹解除管制时，他们实际上鼓吹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管制。新自由主义将“管制”界定为保证市场脱离社会控制，以此取代政府对市场活动进行限制的“管制”。

然而，新自由主义主要在意识形态及语辞上的鼓动，变成反对几乎所有政府管制经济活动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政府都宣扬取消国际贸易管制之福音。它们还对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譬如最低工资法），并反对将贸易协议与环境保护或劳工权利挂钩。

新自由主义提出，解除管制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即，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市场标准的（market-measured）产出最大化。这样，解除管制就获得了合理化。不过，解除管制合理化最主要的意义，是将社会目标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这比实现市场标准的产出最大化更为重要。举例来说，一旦取消了管制，公用事业的“基本需求”目标或地区发展目标就丧失了价值。或者再举例来说，私营企业从某个工资相对较高的地区搬迁到工资较低的地区，可能会涉及社会分化与贫困问题；但是，一旦取消管制，企业不会将这些社会问题放在考虑范围之内。同样，利润最大化往往与环境保护相冲突，而没有管制，就无法保护环境。经济活动不同目的之间的平衡，只能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来实现，但是，在这些活动被解除了管制的情况下，该政治程序不可能发生，平衡也就不可能实现。

解除管制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也是一种误导，因为它的假设处于经济活动的时代特点之外。私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是在特定的时期追逐利润最大化。它们衡量收益与损失的特殊方式在不同时期随各种因素而变化——比如，通货膨胀将导致企业相对而言更重视当下收益而不是未来所得。然而，公众总的来说可能会认同、也可能不认同私营企业关于该时代经济活动特点的看法。经济控制的一个目的是使企业活动与社会长远利益保持一致，对于环境的考



虑就是一个明显的和重要的例证。同样,在国际性的商业活动中,保护主义管制所造成的短期低效,对于通过技术革新产生的长期效率来说也许是必需的。这就是保护主义经典的“幼稚工业”提法。这一更高层面上的社会利益,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对私人活动进行管制来得到促进。

减弱社会对市场控制的每一步骤,都给予企业对实施新的管制进行逐渐破坏的权力。当行政手段进行——或威胁要进行——与私营企业利益不一致的活动时,企业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暗中破坏这一活动,直到它们的利益受到维护。举例来说,对企业实施新的税收政策、新的劳动保护政策或新的环保政策,可能会导致企业作出减产、裁员或搬迁到其他地区的决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无穷动力使得它们采取这样的应对措施,而这将使新的管制措施被迫中断。于是,无管制的市场授予了企业一种政治权力,该权力凌驾于民主程序之上。

### 新自由主义 vs 民主

新自由主义将社会与民主相分离,其支持者往往辩称这是促进民主的一种方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程序是非民主的,并且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被用来创造和保护精英阶层的财富与特权时,则解除管制——新自由主义——就与民主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在历史上,民主(尽管是有局限性的)曾经与市场一起反对由僧侣和贵族强加的社会管制。而当今时代,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高度腐败的集权政体也会利用经济管制保护其财产和权力地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到苏联,到杜瓦利埃政权统治下的海地。在这些例子中,经济自由(新自由主义)能够与民主结成反抗同盟。新自由主义在特定情况下与民主是一致的,这是新自由主义有时能获得普遍支持的首要原因。

的确,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实施主要依赖于权力,军事的或是金融

的权力。在智利，由枪杆子撑腰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新自由主义通常由高压政权强制执行，尽管它们通常是作为民主政治来运作的。外部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动用其财力迫使一些民族国家转向市场主导的经济系统。在这些情况下，由受国际信贷机构施压与指导的专制政权强加的经济方案会引发大规模反抗，就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了。“反全球化运动”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许多民族运动，是这一反抗最为显著的形式。尽管如此，虽然政治和金融力量是新自由主义方案实行的主要基础，但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流行也因为它能够给社会提供在传统的（即反民主的，通常是腐败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

因此以民主制度反对新自由主义之努力，依赖于一个有效权力的论断与二者择一的选择观之表达，该观点认为民主制度是一个在传统的政府控制和市场控制之间二者择一的政治过程。问题是，应当为社会利用市场而不是社会被市场支配找到出路。现代很多欧洲福利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其局限性，为找寻这一出路提供了有益的指引。同样，在很多正在经历民主化进程的低收入国家，在那里群众运动能够促进社会福利的立法，以保护工人免受市场兴衰变化的影响。在地方的层面上，印度南方的喀拉拉邦政府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对市场的限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案例（见第十九章）。

不过，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个仅仅在国家 and 地方政府层面上应予解决的问题。反抗私有化并对公共机构进行民主管理的群众运动，能够在局部层面起作用。学校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在这里公众参与不仅服务于一个更大的政治目的，同样也可能改善学生条件。相似地，有关医疗的群众运动也是民主运动的方式之一；如同教育一样，喀拉拉邦事件显示，这样的斗争在局部有积极的影响。科恰班巴的斗争则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例证，在这个例子中，局部运动显示了反抗

新自由主义方案并建立民主管理的潜能。农业合作也为局部实现对市场进行限制和利用而非受市场支配提供了一条道路。此外,应对咖啡贸易市场崩溃的国际努力也沿着这一方向进行。这些情况下的抵抗运动,都将反抗市场对社会的支配,转变为民主实践活动。

国内和国际的行动仍然是反抗新自由主义议程并建立起民主政治的基础。如果没有发达的基础设施与外围服务以及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低收入国家的农业合作就不可能兴盛。如果中央政府将公用事业承包给跨国公司,正如在喀拉拉邦发生的那样,对公用事业的地方控制就不可能实现。没有政府资助,学校和医疗机构的地方管理不可能成功。国内和国际规模的传统政治斗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努力的一个必要部分。而当它以平行的地方力量为基础时,这个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最有效率。两者都是同一个民主运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李宁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owles, S. and Gintis, H.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2. Finnegan, W. (2002) 'Letter from Bolivia: Leasing the Rain', *The New Yorker*, April 8.
3. Leys, C. (2001) *Market-Driven Politics: Neo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Verso.
4.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第二十一章 新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

菲利普·阿莱斯提思 马科姆·索耶

这一章涉及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基础之经济分析(尤其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性质。这里所讨论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1997年英国“新工党”政府、德国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当选及美国克林顿的“新民主党”计划密切相关<sup>①</sup>。与“现代化推行者”(Giddens 2003)、“现代化中左派”(Rutelli 2003)和“改革管理”(这是2003年7月在伦敦组织的一次会议的标题,出席者是一系列现任和前任中左派政党领导者,如布莱尔、施罗德和克林顿)等术语一样,“第三条道路”这一术语现在出现的频率不那么高了。

第三条道路被看做是一种介于右翼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左翼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存在。比如说,托尼·布莱尔声称:“新工党既不是旧左翼也不是新右翼……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它引向中道,但是在变革方面要激进、深刻得多。”(Blair 1997, p. 1)吉登斯以相似的风格通过参照其他两条道路,即“古典社会民主”与“新自由主义”,来对第三条道路进行定位。他在将“现代左派”与“传统左派”相比较时写道:“换句话说,未来属于现代左派而不是属于那些抱着传统

---

<sup>①</sup> 这里有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其他例子。比如,战后的瑞典社会民主、南斯拉夫的自治,就是被描述为第三条道路的两个例子。显然,它们与这里所讨论的第三条道路区别很大。

的左派信仰不放的人。”(Giddens 2003, p. 38)

第三条道路被描述为“具有一张人性化面孔的新自由主义”(见第二章和第二十三章)。它与新自由主义都承认市场对经济生活的支配,并将市场延伸到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市场以及对利润的追求被视为组织经济的最佳(或者也许是唯一的)路径。但是第三条道路明确承认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中的作用:如下面将要讨论的,第三条道路认为,应当有管制政策或反托拉斯政策来防止垄断情况的发生,并且政府应当介入诸如教育和医疗等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但是在政府提供的服务如教育中,应有一些类似于市场化的运作,比方说,学校之间为争取资金和学生而展开的竞争。

虽然第三条道路在经济分析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Giddens 1998, 2000),但它很少有明确的分析为自己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尽管布莱尔(如 Blair 1997)和布朗(如 Brown 2000)的一些演讲与文章给出了一些材料<sup>①</sup>。

在题为“第三条道路的本质”的那部分,我们将勾勒出可以看做为第三条道路思想提供支撑的市场经济分析的大致轮廓。我们的观点是,新工党和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学植根于“新凯恩斯主义”,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接下来的部分标题为“新自由主义与老社会民主党”,这是在新自由主义和老社会民主党之间作出区分的尝试。

### 第三条道路的本质

我们认为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分析可被视为“新凯恩斯主义”,这从它对由供给决定的失业的均衡水平(“自然”或平稳的失业率,即 NAI-

---

<sup>①</sup> Arestis and Sawyer (2001a)是对一系列国家(及欧盟)实行的第三条道路政策的批评性评价。

RU;见第二章)的强调,对总需求或有效需求及财政政策之忽略,对货币政策的重视及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关注中可以看出(如 Brown 2000)<sup>①</sup>。更重要的是,新古典主义关于“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观点,能够被理解为支持政府在“市场失灵”——“市场失灵”被认为是由于外部性、一些物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和垄断的存在而引起的——扩大时采取干预措施。

理解了下列八大要点,就能为理解第三条道路经济学打下基础,而这些要点将被证明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变种(Giddens 2000)。这八大要点是:

第一,市场经济被认为本质上是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自由决定的财政政策)将对市场经济起到良好的稳定作用。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能够在稳定的经济政策基础上作出信息灵通的判断,特别在当前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与金融市场更是如此。

第二,能够用货币政策满足低通货膨胀率的目的(它通常是令人向往的,因为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有利于健康的增长率)。然而,货币政策不应被政客操纵,而应由专家(无论是银行家、经济学家还是其他专家)以一种“独立”的中央银行形式来运作。因为政客在运用货币政策时会经不住诱惑,而以长期损失(较高的通胀)为代价获取短期的利益(较低的失业率)。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也具有更高的信用,它在保证低通胀方面比政客们更为坚定。唯一可信的政策是在未来的发展方面不给当局留任何发挥作用的自由空间;在这一模式中,即使短期来看总需求政策较为重要,但它更青睐一种不干涉的政策。

第三,经济活动水平围绕自然失业率或非加速通货膨胀率(NAIRU)波动,而 NAIRU 是一种与劳动力市场运转紧密相关的供给现象。国内通货膨胀(相对于预期通货膨胀率)是由失业率降低到 NAIRU 以

---

<sup>①</sup> 虽然这个路径被贴上了“新凯恩斯主义”标签,但它与凯恩斯的基本洞识即经济活动水平由有效需求水平决定并不一致。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介绍可以参见 Hargreaves Heap(1992)。



下所引起的,而通货膨胀被假定为一旦失业率低于 NAIRU 就会加速。不过,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不能互相替代,如果要避免通货膨胀加速,经济就必须在平均的 NAIRU 水平上运转。从长期来说,通货膨胀被认为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速度与利息的增长率相关。因此,货币政策就被中央银行的人所控制。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实际不是关键,因为货币需求不稳定,这使货币供给变化的影响成为非常不确定的影响途径。

对经济政策的关注于是变成了改变 NAIRU 的尝试,这种尝试通常通过使劳动力市场“更具弹性”的方法进行。举例来说,

欧盟国家有超过两千万失业者,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劳动力市场几无改革的所有社会。使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不是解决高失业率的唯一政策途径,但它是一个关键的途径。(Giddens 2003, p. 38)

还有相似的论调:

我们必须继续走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道路。我们必须增加可变性和弹性:但是它们必须与新的、现代的保障形式——那些关注有活力的劳动力市场的政策,特别是再培训与终身学习:这一理念被形象地表述为“弹性保障”的观念——相结合。(Rutelli 2003, p. 33)

第四,萨伊定律认为,有效需求水平并不独立地对经济活动水平(长期)的决定起作用,只有供给才能对经济活动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它本身与 NAIRU 是一致的(见第三章)。需求的变动会被为抑制通货膨胀而进行的利率的调整抵消(如果失业率降到 NAIRU 以下)。预算赤字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财政政策扮演的只是消极被动的角色。

预算(至少是在经常账户上)能够也应该在经济周期过程中保持平衡。

第五,市场体系包含“市场失灵”——在这一术语的新古典主义意义上。由于外部性、公共与准公共产品(即在使用方面不具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以及垄断等情况的存在,市场不能达到最优。政策的解决方式是简单直接的,即政府通过适当的税收、补贴和管制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无论是其自身供给还是通过向私人部门付费间接供给——试图对外部性进行纠正。竞争政策也能用来削弱或限制垄断情形的发生。这种思想当然不是第三条道路的独创,它是传统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要素。

市场导向意味着我们要保证市场自身运转正常。我相信经济的自由调节、竞争、消费者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化推行者应当支持公共政策、个人激励以及取消保护壁垒。  
(Rutelli 2003, p. 34)

第六,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依赖于投资决策,其中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尤其重要。由于公共部门是教育的主要提供者,而教育被归入人力资本,因此,公共部门被认为对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假定有总体规模报酬递增,但它包含非私人所有的一些生产要素<sup>①</sup>,比如说,被归入生产潜能的知识与信息,但这通常不是私人能占有的。这些“公共产品”(在技术意义上来说就是非竞争与非排他的)由私人部门提供的话,通常会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而公共部门就必须在提供这些产品或鼓励私人部门提供充分供应方面发挥作用。实际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倾向于承认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供给或补贴“公共产品”方面,研究和开发、教育与培训是主要的例证。

---

<sup>①</sup> 对内生发展理论的全面审视,参见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

第七,第三条道路的经济理论更为关注结果的不平等,而不是可能性(机会)的不平等(例如,参见 Giddens 1998)。结果的不平等(如在收入方面)能够通过革新税收体系和再分配、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改变。可能性(机会)的不平等能够通过教育和培训(初始禀赋),通过“就业能力”政策(针对劳动力和雇佣市场),以及通过改变市场提供的报酬等方法来解决,但除了国家对最低工资的规定外,很少有尝试改变市场决定的报酬之努力。如吉登斯(Giddens 1998, p. 101)指出,“赢家通吃”原理在劳动力市场这方面来说,意味着巨大的不平等。但是吉登斯也注意到,“激励机制对鼓励那些有才能的人积极进取是非常必要的,机会平等通常会产生更高而不是更低的结果不平等”(Giddens 2000, p. 86),尽管机会的不平等被认为会阻碍许多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按理受到更好教育的人应得到更高的回报,但由于许多不利因素的存在,使得它的实现遇到了困难,但并没有因为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就使人们放弃了对高等教育的追求。预期有更多的机会使受到良好培训的人才增加,他们的报酬相对于未受过培训的人来说会降低。减轻机会不平等方面的压力,使得政策尝试着改变竞争能力分配以及使教育更为平等。但是这些政策承认,竞争将带来收入、财富和结果的不平等。

最后,以日益增长的跨国贸易形式出现的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的国外直接投资起到更大作用,以及在整个交易领域活跃程度的提升,为第三条道路所信奉。第三条道路常常认为全球化实质上取消了产业政策(除了竞争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被认为能够防止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这些方面独立。然而,单一民族国家仍然在发挥作用,虽然单一民族国家有取消管制的趋势——有时是向下的去中心化(比如说,向一个国家中的各地区),有时是向上(比如说,向欧盟)。但是政府的作用发生了转变,即向着为跨国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环境方面转变,无论是通过对利润实行低税收政策、对内部投资进行补贴的方式,还是通过打造高技术的劳工队伍的方式。



全球化对于政策前景的影响,是产业政策和“老”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凯恩斯主义需求观念的转变,以及从管制向解除管制和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自由主义方面转变的综合。“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保持低通货膨胀,限制政府借债,使用积极的供给政策鼓励就业率的高水平增长。”(Giddens 2000, p. 73)布莱尔和施罗德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提出:“在一个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日益迅猛的世界,我们需要创造这样的环境,即在其中现有的工商业能够繁荣和适应新时代,而新的工商业能够建立与发展。”(Blair and Schröder 1999, p. 163)。赫姆巴赫(Hombach)补充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不仅是全球化的力量要求我们的公共机构和政治纲领现代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在就业形式、价值观、人口统计以及社会结构方面也有同样的变化。”(Hombach 2000, p. 31)

现代左派能够或应该对他们期盼创造的那种社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其经济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同时又保持凝聚力、包容性和平等性。要造就一个这样的社会,就意味着我们要在社会发生巨变——不仅仅是知识经济的涌现,还有全球化和日益壮大的个人主义的冲击——的时代与潮流共舞。(Giddens 2003, p. 38)

### 新自由主义与老社会民主党

第三条道路在其政策上是如何区别于“老”社会民主党的?这个问题要通过以下方式来解答,即,正如“新”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例如,参见 Arestis and Sawyer 2001b)不能用单一模式概括,“老”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也同样如此,并且它必然会随着时间及国别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举例来说,英国“新工党”政府的政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就

不一致。例如,可以说前者比后者更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若以总体简化为代价(无疑还有其他代价)的话,那么以下所述在“老”社会民主党政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涉及英国),即对凯恩斯主义一些核心理念的承认,尤其是能够用预算赤字维持总需求,以及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每个战后的工党政府和其他“老”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国有制方面都有一些拓展。对经济“失灵”的认识比对“市场失灵”要更为宽泛。这些失灵包括经济缺乏规模性开发、管理较差,以及投资不足等等。地区和产业政策对失业的作用要大于劳动市场政策。譬如说,通过产业政策的三种方法安排及运用收入政策等,社团主义的一些形式通常会得到应用和发展。

可以肯定,第三条道路与新工党政府是沿着完全不同的路径从“老社会民主党”发展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属于“新凯恩斯主义”类型,它强调的是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以及对降低失业率和确立金融市场信誉之需的理解。“独立的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仅与通货膨胀相关。财政政策被赋予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将宏观经济政策描述为涉及对“市场失灵”的纠正:这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创造好市场的政策,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能够通过适当的政府行为得到改善。对私有化的公用事业的管制代替了公有制。新工党政府对以前的撒切尔政府以私有化取代国有化进行了肯定,并且走得更远,在个人金融计划的伪装下进行“暗渡陈仓”的私有化。第三条道路表现出试图通过培训和教育来提高个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最后,我们同意察卡洛托斯(Tsakalotos)的说法,这些特点显示“对社会民主党关于经济、政治和哲学的许多思想的一种明确拒绝,更不用说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了。”(Tsakalotos 2001 p. 43)

李宁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Arestis, P. and Sawyer, M. (eds) (2001a) *The Economics of the Third*

- Way: Experience from Around the Worl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 Arestis, P. and Sawyer, M. (2001b) 'Economics of the British New Labour: An Assessment', in P. Arestis and M. Sawyer (eds) *The Economics of the Third Way: Experience from Around the Worl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3. Barro, R. J. and Sala-i-Martin, X. (1995)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Hill.
  4. Blair, T. (1997) 'Introduction', in *New Labour: Because Britain Deserves Better*. London: Labour Party.
  5. Blair, T. and Schröder, G. (1999) 'Europe: The Third Way/Die Neue Mitte', in B. Hombach,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Centre*. Oxford: Polity Press, 2000.
  6. Brown, G. (2000) 'Conditions for Growth and Stability',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13 July.
  7. Forder, J. (2000) 'The Theory of Credibility: Confusions, Limitations, and Dangers', *International Pap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7 (2), pp. 3-40.
  8.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Polity Press.
  9. Giddens, A. (2000)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Oxford: Polity Press.
  10. Giddens, A. (2003) 'The Challenge of Renewal', *Progressive Politics* 1 (1), pp. 36-9.
  11. Hargreaves Heap, S. (1992) *The New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12. Hombach, B. (2000)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Centre*. Oxford: Polity Press.
  13. Rutelli, F. (2003) 'Beyond Division', *Progressive Politics* 1



(1), pp. 27 - 35.

14. Tsakalotos, E. (2001) 'European Employment Policies: A New Social Democratic Model for Europe?', in P. Arestis and M. Sawyer (eds) *The Economics of the Third Way: Experience from Around the Worl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第三部分 **新自由主义实践**





## 第二十二章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诞生： 资本主义的一次重组

阿·坎姆贝尔

对新自由主义的脉络进行梳理，一开始要考虑四个基础性的问题：它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以及现在何处？（1）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将新自由主义与以前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区别开来的是什么？（2）为什么资本要对资本主义进行这次重组？考虑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资本利润率——这是资本的核心要务——较 50、60 年代的凯恩斯妥协时期普遍下降，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3）这一重组是如何完成的？政策、实践与制度发生的何种变化造成了这次改变？（4）新自由主义现在何处？

这一章将讨论第三个问题，即以美国为例，探讨资本主义的这一重组是如何完成的。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政策、实践和制度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这些变化对劳工阶级的影响。这里首先必须简要地对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即“是什么”与“为什么”，作为进一步讨论“怎么样”这一问题的背景。

要对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进行准确的把握，有必要先了解四点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评判。第一，新自由主义不是全球化，不是作为技术进步尤其是通讯技术和交通技术发展必然结果的生产国际化，也不是激烈国际竞争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次重组。在资本主义的

新自由主义重组中有重要的国际性的一面，正如资本主义此前的每一次重组都有重要的国际性一面一样。然而，这些国际方面与其国内方面一样，只有按照资本主义自身的目标和目的，才能进行恰当的理解。

第二，如同在这一章的阐述将展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诞生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只有在这一语境中，新自由主义的诞生才可以被追溯到 1979 年。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所有条件均随这一“诞生日”而立即出现，从此视角可把其看做某一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见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七章）。

第三和第四，本章认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激进分子所认可的两个“程式化事实”（stylised facts）常常被误解：即新自由主义代表金融资本霸权的回归；凯恩斯妥协的资本主义组织，实质是一次劳资和解。虽然这些概述方式在涉及特定的关系时可能有用，但在这里将要展开的讨论恐怕得按相反的方向对这两个问题加以理解。这些问题对于解释这一章的切入点——作为资本主义重组的新自由主义——非常重要。

###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以及为什么它会被资本主义采用？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在程式化事实“新自由主义代表了金融资本霸权的回归”中存在着一个危险。这一简略表述对很多人而言暗示金融资本将其自身、其意志和纲领强加于非金融资本。在美国，利润从非金融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移，在新自由主义治下确实有大幅度增长。这一观点引发了如下问题：在新自由主义上台前金融资本在美国总资本中所占的比率约为 15%（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增加到大约 25%），这一少数派是如何做到将其意志强加于资本的多数派之上的？为什么非金融资本，作为资本中的大多数，会允许那种牺牲自己向资本少数派低头的情况发生？有必要了解，绝大多数金融资本从不承认凯恩斯妥协主义，并且常常鼓吹要尽快向经济自由主义回归。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应当承



认,为反驳“金融资本霸权回归”这一观点,有必要弄清:为何二战后生产资本服从于凯恩斯妥协主义,并且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几乎对其完全放弃?这一路径厘清了以下事实:“金融资本重新占据霸权地位”这一观点,不是关于金融资本能否支配非金融资本——这一点总的来说并非如此——而是关于为何资本的主要部分即生产性资本,转而(部分地)承认被凯恩斯妥协主义拒绝的、作为少数派的金融资本一向所倡导的理论。

相似地,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允许数量可观的国家财富真正地“滴入”劳动者的劳资和解主张,是凯恩斯主义妥协方法的本质(Bowles et al. 1983, 1990),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摈弃这一和解主张。然而,历史记录并不支持劳资和解的神话,虽然这需要非常仔细地进行审视。一方面,持续贯穿后二战时期的阶级冲突,是劳动者获得补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补偿不是福特主义资本主义自觉自愿地提高工资的“恩赐”,而是资方为了其自身利益不得已而为之的。另一方面,由于认为劳资之间持续的阶级冲突行将结束,所以认为存在着“社会和解”、社会和谐、一般(但不是普遍)承认的社会规范,而当前情况如何(虽然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发生着变化)是不言自明的。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就是对这种社会和解或和谐的终结。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次重组。二战后,资本决定对个别资本的行为进行一系列特殊的约束,使其有利于资本一贯的目标——积累。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一个原因是畏惧。尽管美国的资本家从来没有经历过在自家被推翻资本主义的严重恐慌,然而,阅读他们1945—1955年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就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苏维埃式经济关系在欧洲的扩张所感到的深深恐惧,因此也就能理解这样的恐惧对于美国资本家支持上述措施——如资本控制——的重要意义。但是,认为可概括为凯恩斯妥协资本主义的那些政策、实践和制度的产生原因,仅仅是因为资本害怕自身被推翻,则是过分的夸张。同样重要的是,资本家之所以会采纳凯恩斯主义的理念,是由于他们相信在那个特

定的历史时段,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控制对资本积累过程是有利的,特别是将其与没有这些限制的大萧条时期——当时最新的经历——糟糕的积累记录作比较,这一点就会非常明显。而新自由主义则否定了众多的约束和管制。

必须强调的是,新自由主义不是指“让市场自由放任”,或要求全面取消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市场从来没有完全自由放任过。断言它们曾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运转,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市场自身与它们在其中运行的环境,往往都是政府管制所产生的结果,并且不可能脱离政府管制而存在(参见第六章)。

为什么资本主义会采纳新自由主义?泛泛而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结构性危机。即,曾经能够很好地为资本积累这一资本主义目标服务的政策、实践和制度,现在不起作用了。确切地说,资本主义是在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放弃了凯恩斯妥协主义,它相信新自由主义能够提高其利润率,并完成资本积累。

这些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简略综述,为思考新自由主义这一工作构建了框架。讨论现在转到这一章的主题,即这一重组是“怎么”完成的:构成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实践和制度有哪些变化?

凯恩斯妥协式的资本主义,是作为解决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对策产生的。它由政策、实践和制度这三大新类型组成。第一个类型构成了对一些资本——首先是金融资本的某些行为,既包括国内行为也包括国际行为——的特殊限制。第二个构成了刺激经济的宏观经济干预政策,既包括货币政策也包括财政政策。第三个构成了某些劳动政策和福利政策。作为对这些政策的否定的新自由主义的诞生,是持续几十年的一个长期的过程。

### 国际资本管制的取消及“全球金融的重现”

对国际资本活动的资本管制,在二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无论



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是普遍现象。一个特殊的例外是美国，除了 60 年代一个很短的时期外，它对国际资本活动的管制非常少（见第三章和第十一章）。

要理解为何二战后资本的这一主张迅速席卷美国资本界，就要了解：资本家之所以要提倡资本管制，其出发点与以往一样，乃是为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资本积累创造最佳环境。那一历史时期，正如当时的资本家所意识到的，受到刚过去不久的大萧条的强烈影响。广大的生产部门坚持金融自由主义与生产、增长所需的稳定环境相悖，而稳定的环境是积累优化所必需的。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国际投机资本造成国际收支危机和价格不稳，因此对国际贸易逐渐造成损害，而这又成为造成大萧条和生产性资本利润下降的重要因素。

银行和金融资本（当然还有一些生产性资本的代表）从不认同对自由主义和 90 年代开始广为人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广义拒绝，也不认同涉及资本管制的狭义拒绝。简单地说，生产资本要求一个适合于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环境，而金融资本却要求一个允许它进行一切可以牟取利润的活动的的环境。有这样一种逻辑可能性，即，金融资本的行为可能会损害生产性资本生产与销售的环境以获取利润。这也恰恰是生产性资本所认为的大萧条产生原因。与生产性资本相反，大萧条后，金融资本基本上还是继续留在自由主义阵营，即常常能够成功解除市场管制——包括金融市场管制在内——的阵营。

新自由主义诞生的第一场重大运动，是对几乎普遍存在的资本管制的大规模取消，而本来人们认为这一取消是不会发生得那么突然的。1958 年，欧洲国家认为它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国际储备——主要是美元——从而能够恢复货币自由兑换。纽约银行界为此欢欣鼓舞，它们现在能够扮演比世界债主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它们自 1945 年后一直为之奋斗的。当时，生产性资本也支持这一变化。它们所关注的一向是创造适合于交易的环境。投机资本惯于袭击背后没有足够储备支撑的货币，造成贸易的瓦解，就像实际上发生在 1945—1947 年期



间的那次构思拙劣的尝试一样——当时纽约银行推动欧洲立即实现货币自由兑换。正如在布雷顿森林已经充分讨论的，对资本的管制要求货币管制充分有效，若非如此，资本就能够在经常账户交易的伪装下逃避管制。但是货币管制本身有害于交易，因此，只要有预防破坏性投机货币攻击所必需的储备，这些国家的生产性资本乐于见到货币管制的取消。而长期的资本管制没有被取消。

与此同时，英国经历了英镑收支差额的困境，因此在1957年通过英国银行对英镑区外的金融交易进行管制。作为应对措施，银行开始利用从国外消费者那里赚取美元拓展美元信贷业务（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金融创新”）。当该管制于1959年被解除时，银行决定继续进行这一有利可图的生意。意图促使伦敦重建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英国政府，允许欧洲共同市场进入伦敦，并对其免除了大多数的英国金融限制和管制。欧洲美元市场诞生了。1963年英国允许其拓展至债券发行。

欧洲共同市场无疑是一个妥协的产物。1958年对交易管制的取消，虽然在取消资本管制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并削弱了那些剩余的管制），但它远非终结了管制。欧洲共同市场正如金融资本所期盼的那样，为国际资本交易提供了一个没有管制的广阔舞台（并因此为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所支持），但与此同时，它在欧洲如凯恩斯主义者所期盼的那样，保留了资本管制，即关注一个国家调节国内经济的能力（常常涉及“政策自主权”）。

美国银行不断增长的贷款，在其已经存在的国际收支赤字达到顶峰时形成国际收支问题——如果说它还不是危机的话。随着国外持有美元数量的不断上升，1960年10月发生了美元的第一次挤兑。美国被迫提高利率以吸引国际资本。这给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外政府甚至公民个人带来了巨大压力，并且欧洲共同市场的扩张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随着美国的国际收支一年又一年持续不乐观，从1963年开始，美国转而实行各种资本管制。这当然大大增加了

欧洲共同市场对美国金融资本的重要性。该资本在 1960 年大举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使这一无管制的市场进入了取代纽约成为国际资本交易中心的时代。

随着大量资本现在相对而言已无管制,美元的压力持续加大。但是美国拒绝改善其国际收支困境问题,黄金持续从美国流出,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1 年 8 月美国宣布其终止以黄金为美元的发行准备后,围绕国际汇率体系应如何重建的问题,各方展开了为期两年的谈判。欧洲和日本提出,应将汇率调整到实际水平,并依靠基于国际合作的增强的资本管制,重建固定汇率。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一方案,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方案:取消一切资本管制,并使汇率浮动。由于 1973 年遭遇了一场通货膨胀危机,美国宣布将在 1974 年终结所有的资本管制,而实际上它发生在 1974 年 1 月。

这一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生产性资本的力量被相对削弱,这在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中表现得很明显。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决定动用其世界金融市场上的持续优势,将其赤字维持在一个可承受的水平上。此外,对这一转变产生影响的还有两个因素。第一,由于在 60 年代美国海外生产能力的极大扩展,生产性资本出于其自身运转的原因,强烈反对所有的国际资本管制,包括国内管制和国外管制。约翰逊(Johnson)总统于 1968 年实施了第一个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管制措施,试图减少持续的国际收支问题,而工商界利益集团作出的反应是在大选期间对尼克松进行“院外活动”,以取消资本管制。第二,1973 年后,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突然有了一大笔资金,因而有投资意向。欧洲、日本和阿拉伯国家都想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入这笔资金,以减轻由于世界范围内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赤字。美国以自由金融市场的名义阻止了这些努力,直到这笔资金只剩下一个地方可去:美国金融市场(包括欧洲美元市场),从而保证了美国继续运作其赤字的能力。



## 国内金融资本限制的减少

政府对金融资本有四种基本的管制：欺诈，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资产以及竞争。只有最后一种管制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攻击。由于在凯恩斯妥协时期的开始阶段，仅有微不足道的商业借款在商业票据市场进行，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将只集中在对银行的管制上。

有四种限制竞争的主要管制方式：“Q 条款”，将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没有一般银行业务）相分离，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相分离，以及对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除了一个（而那一个已被碎片化）之外，其余都败给了新自由主义。

Q 条款的约束，为储蓄银行给存款提供的利息数额设置了一个“天花板”。其目的是保证生产性资本贷款的利率保持低水平，以促进生产和经济增长。当然，与之相反的是，金融资本希望能从贷款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回报，以及市场对贷款活动尽可能多的支持。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市场利率通常与 Q 条款所设的限制大体相当，所以没有产生取消它们的有力动机。但 1966 年发生信用危机之后，由于名义利率经常上升，情况发生了变化。

有两条基本路径能巧妙绕开 Q 条款。第一条路径是简单地直接将钱借给需要贷款的公司。1960 年商业票据仅占短期商业融资的 2%，但是它在 1970 年攀升到了 7%，1980 年达到 10%。第二条路径是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开发了过多的金融工具，它能够像受 Q 条款限制的那些方法一样运作，但由于技术上的区别，它实际上是不受限制的。举例来说，投资公司开发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在消费者看来，它等于储蓄账户，但它实际上包括公司联合小型投资以购买数额巨大的商业票据和短期国库券。70 年代末，这些基金达近 2 000 亿美元，约相当于当时商业银行全部资产的 15%。到了 1980 年，Q 条款对于保证



低利率显然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1980年的《存款机构解除管制及货币控制法案》授权对利率的上限进行全面的逐步淘汰,直至1986年完全取消。

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相分离,同样也是想要限制金融资本的力量,并且限制其迫使生产性资本支付更高利息率的能力。关于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有大量的规章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有两个规定非常关键:投资银行不能使用任何形式的准备金;商业银行不能包销公司有价值证券(或甚至不能持有任何未经管制准许的公司有价值证券作为它们的资产构成)。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限制大多被取消。

Q条款以及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相分离,两者都是1933年《银行法》(通常被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一部分,它是凯恩斯妥协时期整个国内金融管制的根本法。1999年《格雷姆-里奇-比利雷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止了绝大多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遗留下来的限制,并且保证了当时已占上风的新自由主义国内金融秩序的存在。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没有被废止的一个限制是,禁止单个企业同时经营银行业及商业,即“全能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限制同样被废除。汽车公司被允许运用大型信用证服务(credit services)去购买汽车,“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成为一个大型金融机构。不过,总的来说,对全能银行的限制仍然存在。

由于担心规模较大的国家银行地方分行不能为小规模的地方生产性资本提供便利的贷款,为保证地方生产资本能够方便融资,1927年《麦克法登法案》禁止银行设立跨州的分行。一方面,这些管制在整个凯恩斯妥协时期被部分地改革;另一方面,创新从来没能取消对金融资本以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追求利润的主要领域之特权所施加的限制。1994年,《瑞格-尼尔州际银行业务及分支银行效率法案》规定用三年时间逐步取消直到完全废止对设立银行分行的管制。

## 新自由主义财政与货币政策

正如本章开头所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发现,建立一个“自由市场”制度并对货币价值进行保值,是资本最佳积累的关键。新自由主义关于货币政策的基本理论即由此发展而来。政府支出应仅针对那些市场做不到的事(而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个名单不会很长),而政府所征收的税也是应该被用来为这些活动买单的。新自由主义的财政政策没有为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理论提议的增加就业和促进增长)留下发挥的余地。

实际上,1979年之后美国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财政政策往往是非常非新自由主义的。这并非由于里根政府和乔治·布什政府军费开支的大幅增长:一方面,这些增长部分地被政府缩减公共服务开支所弥补;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得到弥补,军费支出是只有政府才能做的事,所以,任何被认为是在必要范围内的军费开支,与新自由主义思想都没有冲突。财政政策之所以是非新自由主义的,是因为税收填补不了支出:政府有巨额国内赤字,而这与新自由主义要求货币保值的目标通常难以协调。在里根时代,流入美国的巨额国外资本冲抵了其赤字,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但同样有巨额赤字的布什政府能否有同样的结果,就很难说了。

在凯恩斯学说中,货币政策的首要作用是通过保持相对较低的实际利率,促进生产和增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实际利率在1%和2%之间,并且70年代大多为负数。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上台,它们跳到了近4%,而80年代则更高。

70年代后期,有三个事件共同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地位的最终巩固,而货币政策是用来制定新政策的手段。首先,经济领域的利润普遍持续下降。其次,通货膨胀再次发生。商业社团和卡特政府在劳工报



酬方面对此进行了谴责,自1973—1974年的经济不景气之后,甚至在生产增长率降到零的情况下,通货膨胀还是以每年实际增长约2%的速度持续上升。他们还可以把通货膨胀归罪于美元贬值——如下面将要讨论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第三,随着国际收支持续赤字的增加,如上所述,国内通货膨胀率不断增加,美元价值持续下跌。尽管沙特阿拉伯在整个70年代一直力挺美元,但它现在也开始抛售其美元储备,并威胁说,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措施制止美元下跌,沙特将会提高石油价格。最重要的是,规模巨大且实质上无管制的私人资本市场,开始兑出美元的大规模转移。美元面临着自由落体式的下跌。

1978年末,卡特政府进行了急剧的政策转变。其执政头两年所关注的中心——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被与通货膨胀斗争所取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一变而为紧缩性的。利率被提高了,但是在提高劳工报酬、通货膨胀或美元币值等方面只有很小的影响。卡特政府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但这必将导致经济的显著不景气,而这是卡特不希望看到的。

1979年8月,卡特决定通过任命一个著名的“硬通货”汉子——保罗·沃尔克主管联邦储备系统,向外界,特别是向国际货币市场,放出一个信号。10月6日,美联储宣布实行严格的货币供给紧缩政策。利率随之大幅跳升,如所预期的那样,1980年经济进入不景气。但结果只实现了部分目的,对美元的信心增加了,美元停止下跌,而通货膨胀没有得到遏制,并且在1980年实际上升到13.5%。实际劳动力成本开始下降,但这更多是由于持续加速的通货膨胀造成的,而不是通过名义报酬增长率的下降获得的:单位劳动力的名义报酬在1978年上升到8.9%,而在1980年下降了逾10%。

不管怎么说,紧缩货币政策最终遏制了通货膨胀。经济短暂好转之后,利率创了新高,经济进入“二次下滑”。1981—1982年发生了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不景气,1982年生产率下降2.2%,而失业率达到9.7%。通货膨胀率则从1980年的13.5%降到了1983年的3.2%。



随着通货膨胀在 1982 年 7 月降到几乎为零，美联储放松了其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几乎上升了 4 个百分点，但是随后稳定下来，并且在此后 20 年中再也没有超出这一水平。

由于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保持低通货膨胀方面只需作很少的努力，美联储主要的行动主题，又一次与其推动资本积累的目标相一致，即，通常通过扮演不同形式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迅速解决发展资金短缺的危机。这是美联储自己从大萧条时期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它在 1966 年信用危机、1970 年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事件 (Penn Central)、1974 年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案中，已经扮演过这一角色。而新自由主义巩固时期，在 1982 年宾夕法尼亚广场银行 (Penn Square Bank) 和墨西哥债务危机，特别是具有潜在经济崩溃危险的 1987 年股市大崩盘之时，美联储也继续成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

### 新自由主义劳工政策及福利政策

在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劳工政策前，有必要先了解两种不同的关于凯恩斯妥协主义劳工政策的错误观念。其中较为激进的是“福特主义”观点，即资本认识到，它面对一个永恒的“变现难题”（需求不足），因此自觉地提高劳工报酬以（暂时地和部分地）解决这一难题。而不那么激进的观点则认为，劳资和解协定是凯恩斯妥协主义的一个核心要点。

实际情况是，二战后一种广泛的恐慌迅速蔓延，即担心随着军事开支的大幅削减，政府需求减少，将导致经济回到战前的萧条状况。这一观点在政府规划部门占据上风，并且得到了学界的有力支持，同时还从 1945 年 10 月 30 日杜鲁门号召增加工资的广播讲话中得到反映。但是 1945—1946 年的大罢工浪潮显示，工商界从总体来说，既不赞成增加工人工资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观点，甚至也不承认有劳资和解这回事。相似地，1947 年国会通过了 20 世纪最严厉的反劳工法案，即《塔

夫脱-哈特莱法》(有趣的是,国会击败了杜鲁门的否决),其本身就是劳资和解并不存在的证明。与这一法案未颁布时劳工所得相比较,这是一个确保削减劳工分享生产所得的法案。(见第二章)

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生产、销售与发展对于利润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二战后的形势保证了对美国生产的需求,生产的“稳定”被认为对利润来说至关重要。罢工,甚至不那么剧烈的劳资冲突,对产出都会造成影响,也就意味着利润的丧失。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出现了跨年合同的雏形,并出现了资方为延长它们而进行的斗争。1957年经济增长进入缓慢期,所以罢工的代价暂时不那么高,资本利用这一机会,加强其在工资、机械化和工作强度(通常被婉转地称做“工作环境”、“劳动生产率”或“人力利用率”)等方面与工会的对抗。但是,在贯穿这段时期的整个时间段中,他们在这些议题上一直有不同程度的争执。60年代中后期创造了巨额利润,但资方不会自动与劳工分享。确切地说,罢工运动还要大幅度增加,才能使利润的一部分向劳工“滴入”。在这整个时期,资本竭力阻止工会在地域和人数上的扩张。通过资本的不懈努力,工会工人在劳动大军中所占的比率逐步下降,从其高峰期1945年的35%,到1955年的33%、1960年的31%、1970年的27%和1980年的23%。无论是福特主义的宣言,还是劳资和解协定,都没有准确地指认出凯恩斯妥协主义劳资关系的实质,倒不如说,确实有这样一个劳资协定,它(通常)由两个基本方面组成:在已成立工会的地方不努力将之公开破坏(即使在工会活动受到重大挫败,如1959年反对通用公司的罢工之后);劳工有权分享部分生产收益。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变化是对利润和资本积累关键问题的解答。新自由主义认为企业利润的关键是削减成本,而不是生产的规模和增长及其所包含的稳定性。这可以通过提高机械化程度与管理水平来达到,但也包括降低劳工报酬或加大劳动强度。从70年代起,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巩固之后,有政府政策支持的资本,引进了大量的策略和实践,目的是削减甚至是绝对地减少工人的实际工资与福利的增长。



70年代和80年代,资本至少发动了六次对劳工的具体进攻,从而决定了劳资关系旧形式的终结与新形式的产生。首先,资本大幅增加其在海外的生产,并购买国外生产的产品。这一方面带来了国内失业率的增加,并由此降低了工资和福利支出的压力,但其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它能对劳工关于增加工资或工会化的要求构成威胁。第二,资本采取工资冻结与直接减薪。这在1980年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随着1981—1982年经济不景气的到来,它们突然到处都是,就像雅典娜全副武装地从宙斯头上生出来一样。1982年,有44%的参加了工会的工人为新合同上写明至少在合同的第一年工资削减或工资冻结而与资方谈判,1980年时则没有这样的合同。第三,新自由主义时期一开始,生活费用调节条款(COLA)就在大多数合同中被迅速取消。仅1985年一年,就有40%没有COLA的工人更新了合同:1983年的新合同中有50%有COLA,1984年是40%,1983年是30%。第四,二元工资结构(two tied wage structures)的出现,使做同样工作的新手不得不拿比熟练工低得多的工资。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汽车工人,这些工人中的新手在一年后能达到与熟练工的同等待遇。这已经和已有的大多数合同中的试用期低工资没多大区别了。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新工人的起薪只有熟练工的一半,并且要用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同等待遇。至于政府,如下面将要讨论的,里根通过在美国邮政服务中设立二元工资体系,给予这一做法以有力认可。第五,全职工人被“临时雇员”(或“零工”)取代,这样做通常会在医疗、退休金和其他福利上省下一大笔钱。第六,“规避工会”在新的路径上得到了发展。前面已经提及,资方在整个凯恩斯妥协时期与工会的扩张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新自由主义时期这方面唯一的变化是资方与新工会的斗争更为紧张(以资方花在与劳工斗争及违反劳动法上的金钱与精力来衡量)。资方“规避工会”的新途径是对工会进行广泛分裂活动。还有,里根政府在其执政的第一年,以取缔PATCO(专业空运管理组织)这一著名的行动,对此予以许可。虽然有时资方只是对工会进行简单破坏,但他们更多是运用关闭一家



工厂并重开一家没有工会的工厂(在海外或国内其他地方)的方法来消灭工会,有时也通过破产的方式(将资产卖给另一家公司,后者在无工会的情况下运作这一资产)。

政府至少通过五种方式支持这一对劳工的进攻行动:

1. 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放慢——与凯恩斯妥协时期相比——增长,以此削弱劳工反击资方进攻的能力。

2. 允许最低工资降到实际价值之下。

3. 以对资方有利得多的方式重新解释劳动法。里根任命与劳工对抗的人到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并在80年代颁布一系列法规,它们明显减弱了劳工组织新工会、就工人工作强度问题与资方谈判及组织罢工的能力。

4. 作为一个信号,它直接参与了上面提及的私人资本发展起来的两项活动:分裂工会和二元工资制度。

5. 它削弱了福利保障网络。在这方面,它动用了很多手段。它削减失业保险救济金,此行动肇始于卡特时代,里根时代尤甚。又如从里根时代开始减少贸易调整补助。里根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减少了309 000个公共服务职位,并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补助(AFDC)进行了削减。在卡特执政时期,福利的实际价值降低了。在里根执政时期,它们持续下降,并且由于符合资格条件的改变,约50万家庭被从福利方案中排除。

## 结 论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次重组。它的诞生,是此前资本主义组织对自身进行重组的结果。在凯恩斯妥协主义主导下,私人资本及其集体代理——政府,都集中关注这样的条件存在,即对生产的规模与增长作最低限度的干预,以此作为优化资本积累的关键。这一资本主

义组织方式,曾在二战后重建欧洲和日本的 20 年特殊历史时期收到良好效果,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陷入了困境。利润率的下降,是资本积累发生危机的一个重要证明。新自由主义从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私人资本和政府的政策作了被认为最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改变。保证现有资本不贬值,并且——对资本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大大推动削减劳工退休金及劳工对劳动产品的分享,是新自由主义在当前情况下资本最佳积累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李宁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Armstrong, P., Glyn, A. and Harrison, J. (1991) *Capitalism Since 194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 Block, F., Cloward, R., Ehrenreich, B. and Piven, F. F. (1987) *The Mean Season: The Attack on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3. Bowles, S., Gordon, D. and Weisskopf, T. (1983) *Beyond the Waste Land*. Garden City, N. Y.: Anchor Press/Doubleday.
4. Bowles, S., Gordon, D. and Weisskopf, T. (1990) *After the Waste Land*. Armonk, N. Y.: M. E. Sharpe.
5. Duménil, G. and Lévy, D. (2004) *Capital Resurgent*.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Duncan, R. (2003) *The Dollar Crisis*.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Asia).
7. Harrison, B. and Bluestone, B. (1988)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8. Helleiner, E. (1994) *States and the Reemergence of Global Finance: From Bretton Woods to the Nineti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9. Kochan, T., Katz, H. and McKersie, R.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 of American Industrial Relations*. Ithaca, N. Y.: ILR Press.
10. Meeropol, M. (1998) *Surrender: How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Completed the Reagan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1. Rosenberg, S. (2003)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45*. London: Palgrave.
  12. Wolfson, M. (1994) *Financial Crises: Understanding the Postwar US Experience*, 2nd edn, Armonk, N. Y.: M. E. Sharpe.



## 第二十三章 英国的新自由主义经验

菲利普·阿莱斯提思 马科姆·索耶

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大选中获胜,从而取代了1974—1979年的工党政府,这可以被看做是英国政治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这一转折发生的确切日期及其程度的指认,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难题,何况如货币供给控制及货币主义者关于通货膨胀的主张(实际是某种程度上的私有化),已经被前任政府部分采纳。更主要的是,作为撒切尔政府一大特征的不平等现象恶化(见下文相关阐述),在英国出现与消灭不平等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总趋势之前几年就已露出苗头。1990年,约翰·梅杰取代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1997年工党政府赢得大选,从而带来了政策和政策用语的微调(特别是关于欧盟的政策),不过新自由主义仍然获得了全面推进(参见第二十一章)。这一章将涉及以下论题:私有化、产业政策、不平等及宏观经济政策。

### 私 有 化

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对市场优先于政府、私有权优先于公有和社会所有的信仰,被私有化方案所证明。在过去20年中,私有

化主要采取两种方式：直接出售公有资产，以及在私人融资计划（即此后的 PFI，而它又是公私合营即 PPP 的一部分）推动下更为渐进的私有化。第一种形式主要是出售许多大型的公用事业（肇始于 1984 年的电信，接着是供气、供电、供水和铁路）。这一私有化方式表明了对此前政策的重大突破（虽然此前也有为数不多的私有化，如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钢铁非国有化，以及 70 年代早期希斯政府出售了像托马斯库克那样的公司）。二战后，1945—1951 年的工党政府有力地推动了国有化进程，那一时期，煤矿、铁路、部分的公路运输（后被非国有化）、供气、供电和英格兰银行等都被国有化。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国有化集中于周期较长的工业（如钢铁、造船和飞机）。而个人企业如英国利兰（Leyland）和罗尔斯-罗伊斯的部分企业成为国有只是偶然，而不是有意为之，它是政府对这些纷纷破产、面临灭绝威胁的企业所采取的拯救措施。

多方面因素推动了私有化进程，而私有化作为一项政策符合多个目标。这些因素包括：限制政府对工业的干预；提高私有化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效率；通过出售公共资产所得，减少公共部门借款需求（PSBR）；削弱工会在公共部门工资谈判中的权力；通过推动小额股票出售，扩大股东范围；鼓励员工持股并获得政治利益（特别是那些购买私人公司股份的人得到的原始股的收益，该收益也来自出售股份时的刻意偏低定价）。

每一项被私有化的公用事业都要受一个新成立的管理机构的监管，主要是价格监管及其他政策。私有化方案使得几乎所有的重要公用事业都由公共部门划归私人部门（除了邮政服务），包括出售如英国石油公司、美洲豹汽车公司和国家运输公司这样的企业。出售公共资产的获利每年有所不同，但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总计达 50 亿英镑或更多。公共机构的雇佣人数从 1981 年的 1 867 000 降到了 1991 年的 599 000，2002 年更是进一步降到了 379 000（*Economic Trends*, September 2003）。

过去 10 年的公用事业私有化案例比较少,主要是因为已经没剩下多少可卖的了。邮局是唯一保留的公用事业,尽管它也面临一些威胁。1997 年以来的工党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反私有化的措施(而在 1987 年和 1992 年的竞选纲领中它承诺要这样做),并且继续进行零星的私有化,如国家航空运输部门(NATS)的部分私有化,其中政府保有 49% 金股(golden share)。反私有化的机会被轻易放过:铁轨线路公司(顾名思义,它主营轨道、车站和信号系统)的失败没有导致它的国有化,而是走向另一种私有化的形式,即组建“网络铁路”(Network Rail),一家不是由股东而是由成员担保的有限公司,其成员来自铁路行业、公共权力部门及个人,他们不拿红利或股息,所得利润将用来对铁路基本设施进行再投资。

在 1997 年后的工党政府执政期间,私人融资计划(PFI)是一种盛行的私有化方式。这是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典型例证。私人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类型,以及公共领域“内部”产生的类型,当然会随时间与国别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在过去 20 年或大约这个时段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特征是,由公共领域从“内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后者),转包给私人领域。这些变革有助于改善政府向公众提供的服务,但这些服务本身是由私人部门而不是公共部门的雇员提供的。

PFI 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为公共领域募集投资资金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公共领域将其应提供的服务转包给私人领域的程度也在变。就公共领域利用私有财产和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来说,PFI 象征进一步的私有化。PFI 的一般特点是私营公司承担一个资本投资项目(如某个学校的建筑设施),它自己解决融资问题。资本项目出租给公共领域(通常是 25—30 年),而私营公司比较典型的是向公共领域提供与这一资本项目相关的服务——从资本保值到相关建筑设施的保洁服务。

PFI 更多参与的是为公共部门提供此前由公共部门雇员承担的私



人服务。这是一种渐进私有化的方式——由此,公共服务实际上就由私人部门来提供了。这种方式还包括私人拥有如学校和医院等以前属于公共部门的设施。据说,PFI使得投资水平更高、支出降低并转移了风险,但就像在别处显示的那样(Sawyer 2003),这个说法无法被证实,也不能证明 PFI(在公共领域)的资金运用更为高效(与另一种选择相比)。PFI意味着政府承诺未来偿付由 PFI 支付的资产租金,这是未来公共支出的结果。

## 产业政策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成分是鼓吹(可以说是崇拜)私人市场高于其他经济组织形式。这就要求取消被认为妨碍了市场运转的一切障碍,尤其是要取消限制进入市场或产业的管制措施。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无论是对产业进行结构调整还是运用指令性计划),提倡市场和竞争。这在政策方面表现为从战后到 1979 年,保守党和工党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的产业政策退却。这些政策包括:使用指令性计划(如在 1960 年国家计划指导下),社团主义的“社会股东”主张(如国家经济发展部),对产业的重构(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纺织工业,促进在社团领导下的行业重组合并与大规模生产,钢铁与造船业的国有化),以及 70 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委员会。相反,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产业政策远不是干预政策,其产业政策可以被概括为发展竞争政策以及提倡外国直接投资(FDI)。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如果市场在竞争过程中运转良好,为什么还需要有竞争政策?竞争观所依据的竞争模型(如理想化的竞争)肯定没有包含任何关于竞争不是自我维持的暗示。竞争过程会导致中央集权与集中化的思想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新古典主义或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竞争概念!然而,竞争政策的基础(垄断与合并政策)是针对垄断

地位的形成、限制其他企业进入、合并与形成市场霸权等企业行为而制定的。

自1948年以来,竞争政策在英国以某些表现形式大行其道(并延续到1956年的限制性措施、1965年的合并,以及1973年公平贸易办公室的成立),而在1979—1997年的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没发生多少变动。当前的工党政府更为重视竞争政策,1998年颁布的《竞争法》在英国竞争政策的表现形式上作了很多重要调整,包括成立了改进并增强了职能和权力的竞争委员会(CC),以取代此前的垄断与合并委员会(MMC)。这部竞争法带来了显著变化,它使英国的政策更接近欧盟政策。1998年竞争法有两套禁令,即禁止协议(无论是书面的还是非书面的)妨碍、限制或扭曲竞争及企业占据市场垄断地位。2002年的《企业法》对英国并购管制的框架进行了修正,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改变是:一般而言,合并的评估按是否有利于加强竞争力的标准,而非以前所适用的按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标准进行;以及,一般而言,管制合并的决策权属于公平贸易办公室和竞争委员会,而以前则属于贸易和工业大臣。政府的如下声明清楚地揭示了它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

在国内,DTI(贸易和工业部)已经通过《竞争与企业法》使英国的竞争力结构现代化。摆在前面的挑战是,要通过撤销不必要的管制、消除卡特尔并大力发展公平市场等方式使其有效运作。此外,我们还将通过降低进入门槛的方式,鼓励新企业的成立,它们是革新的重要源泉。(DTI 2003a, p. 21)

要打上问号的是,竞争政策的使用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绩效:比如说,在审查中被否决的并购计划所占比例很少(约3%)。竞争的相关管理部门每年进行调查的数目也很少,并且很少会导致产业结构和市场垄断程度的重大调整。然而,竞争政策的变化至

少是政府转变立场的一个预兆。产业政策显然从干预的方向(几乎是完全)偏离开来,并倾向于促进竞争。更重要的是,除了英国政策与欧盟政策的结盟,竞争政策的变化还包含一系列关于特定行为类型的禁令。2002年企业法对判断合并的标准的改变也很重要。以前的合并效果(实际上是垄断地位)是依公共利益标准判断的,尽管对何为“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它常常被阐释为按合并与垄断地位对雇员、产业活动的地区分布等等的冲击来进行评估。这些现在都被囊括进竞争标准之中:公共利益实际上已经变得与竞争一致了。

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大多来自美国)的接受大户及其他国家许多投资的来源。在许多时候,关于FDI的相关表述包括外国投资的规模及国内投资转移程度。英国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净“输出方”。2002年末,流入投资达到6385亿美元,流出投资达10330亿美元<sup>①</sup>。然而,过去20年政策的重心是逐步转向提高对内的FDI,而不是尝试限制对外的投资。贸易和工业部总结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总的看法:

国际贸易与投资对英国的繁荣十分关键。有国际贸易活动的工商业比没有国际贸易活动的工商业更具创造力和竞争力。它们发展得更快。它们在革新上的投入更多。它们集中的资本越多,其产出也越多。这也就是大不列颠国际贸易部所做的工作至关重要之原因所在。通过在英国国内的网络与合作者以及海外的外联部职员队伍,大不列颠国际贸易部每年帮助上千家公司打入全球市场,并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国外投向英国的直接投资,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还带来技术、技能的转移,以及有助于英国增强

---

<sup>①</sup> 数据来自UNCTAD(2003)。流入投资2000年为1300亿美元,2001年为620亿美元,2002年为249亿美元:这几年中出现了全球范围的FDI下滑,但在英国尤为显著。相应的流出投资数字,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2498亿美元、680亿美元和175亿美元。



竞争力的良好经验。(DTI 2003b)

此外,《英国公共服务协议》的主要投资目标是“保持英国在欧盟外国直接投资中第一名的位置”。这是按英国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趋势来衡量的,被记录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世界投资报告记录的外国投资存量名次表上<sup>①</sup>。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份英国贸易投资表:

英国工商业及工人对技术、培训与工作特有的灵活态度为一个管理良好的劳动市场所加强:具有高竞争力的人力成本,欧洲社会保障费用最低的地区之一……一支真正国际化与多元化的劳动大军……具有高竞争力的工资支出……工资单上的社会支出处于西欧最低行列……最低的公司税率使英国工商业长期从中受益,使英国成为最具竞争力与吸引力的商业区域之一……英国具有弹性很大的劳动市场,它使得国外投资者在雇佣和管理职工队伍时有很大的伸缩余地……在英国,雇员习惯于为其雇主努力工作。2001年,按全职工人平均每周工作小时计,男性为45.1小时,女性为40.7小时。而欧盟平均水平分别为男性40.9小时、女性38.8小时……英国法律并不强制雇主提供书面雇佣合同<sup>②</sup>。

竞争政策的加强本身并没有表现出与1979年前的政策有显著的区别,虽然对竞争而不是公共利益的着重强调,是政府观念发生转变的一个显著标志。同样,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变化也不是突然发生的,外国接投资进入英国一直没有受到过阻碍。但这些政策确实因为放弃了以前的行业干预和区域政策形式而引人注目。

---

<sup>①</sup> 参见 DTI(2003b),特别是导言部分,“促进与维护英国贸易及投资”。

<sup>②</sup> 参见 [www.uktradeinvest.gov.uk](http://www.uktradeinvest.gov.uk) (2004年3月链接)。

## 宏观经济政策

在 1979 年以前,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财政政策——尽管这样说简单了一些——虽然 20 世纪 70 年代货币政策的地位开始变得重要。当然也不能忽视收入政策,尤其是后来众所周知的 70 年代“老”工党政府执政时期所订立的社会契约。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常常被书面表述(至少是在教科书中)为创造充分(或高水平)就业、低通货膨胀、可持续发展及国际收支平衡。政府对充分就业的承诺可追溯到 1944 年的白皮书(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 1944)。很明显的是,随着整个 70 年代失业率的不断攀升,并且在进入 80 年代后依然如此,寻求实现充分就业的任何大话都被放弃了,同时被放弃的还有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能够创造足够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在 70 年代,由于那个贯穿十年的通货膨胀导致财政政策的让位、货币政策地位的上升以及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化,这一路径的要旨曾被质疑。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时代的结束,常常与工党首相詹姆士·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在 1976 年 10 月工党会议上的演讲联系在一起,他当时指出:

我们曾经以为可以利用拉动消费走出经济不景气,并且通过减免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提高就业率。我坦白告诉你,这条道现在行不通了,而就其曾经行得通而言,它仅仅……通过往体系中注入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来起作用。

总的立场在一份白皮书中得到了详细阐明,它指出:

关于失业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需求并非与此无关。在过去两年,需求每年都以约 8% 的速度递增,为高产出和更多的就业机

会提供了充分的空间。问题是,这些发展大多被更高的价格和为此付出的更多的代价所抵消,而就业机会并没有因付出这些代价而增多。(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1985, p. 12)

它还指出:

失业反映我们的经济在适应当今环境和机遇、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方式、适应新的海外竞争、适应革新与技术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压力等方面的失败。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的国家,是那些具有高效率、竞争性、革新意识、可靠的劳动力与商品市场的国家。尤其重要的是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就业机会应被创造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人们愿意接受的工资,是雇主能够承受的工资……我们高失业率的最大原因是我们就业市场的失灵,这个缺陷又与我们的经济关系相联系……(虽然)劳动力被设想为市场的一个部分,但这不是对他们进行贬低;要知道现实经济生活无法逃避正是因为构成因素是人而不是物。(pp. 1,13)

1980年“中期金融战略”的出台,是信奉货币政策(其实质是货币供给)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它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目标——以及调整财政政策以实现货币目标(受预算赤字与货币储备之间有密切联系这一错误观念的影响)的标志。货币主义者提出了一条相对容易的降低通货膨胀的途径:降低货币存量的增长率(见第二章和第三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完全无痛的:一旦发出货币存量增长有下降趋势的宣告,人们将会很快调整其通货膨胀预期,并且,任何失业都是暂时的,伴随着经济迅速反弹会回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来。而且,削减失业救济金和边际税率,取消工会的“特权”,将会使“自然失业率”下降。货币主义者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预言家”:随着货币供给调节失败,失业率大幅上升,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但对货币政策的重视、关注重心从充



分就业转向通货膨胀等方面则保留了下来。事实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工党政府执政的今天:即我们在其他地方称之为“新货币主义”的那种东西(Arestis and Sawyer 1998)。货币政策的重心,从针对货币供给转向中央银行决定利率:这一“回购”利率现在由“独立”的中央银行(“独立运作”被当前的工党政府于1997年5月设为首要条件)设定。“独立”的中央银行意味着在作重要的经济决策时,“专家”(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的作用超过了政客,并且,追求低通货膨胀成为宏观经济主要目标。

## 不 平 等

不可否认,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不平等现象在英国日益严重,并且这一恶化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发生于撒切尔时代(1979—1990年)<sup>①</sup>。在家庭方面,10%的最高收入家庭所占的份额,从1979年的20.4%增加到1990年的26.0%、2002年的27.8%,而最低收入家庭所占份额从1979年的4.2%下降到1990年的2.9%、2002年的2.7%<sup>②</sup>。在个人收入方面,男性第10百分位与第90百分位间的收入比,从1979年的2.38升至1989年的3.08,再到2002年的3.51,而女性相应的数字分别为2.29、2.86和3.15。国民收入中,工资所占份额在1980年为超过68%,但1990年降到65%,1996年再降到61%,不过在此后逐年增长。也许唯一没有增加的不平等指数是女性收入对男性收入的比率,女性平均小时工资对男性平均小时工资的百分比,从约70%上升到了2002年的82%。

撒切尔时代及其后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是造成这些不平等现象恶化的主导者。市场和奖金激励机制的推广,使不平等情况的恶化获得

<sup>①</sup> 详见 Goodman et al. (1997), Gottschalk and Smeeding (1997), Sawyer (2004)。

<sup>②</sup> 基于住宅支出前收入,引自财政研究机构网站。

了合法性。市场得到收益被视为正确的和适当的,而为增强市场力量而付出代价的人却一无所获。对激励的过誉使高收入者的收入上涨,并减少了所得税(见第十五章)。撒切尔政府尤其对社会保障体系作了重要改革,比如说,它以养老金与物价的挂钩取代养老金与收入的挂钩,而这一改变必然的结果是造成相对于收入的国家基本养老金下降。税收体制从直接税收向间接税收的转变,尤其是累进税率的显著削减也对不平等的恶化发挥了重要影响。对工会力量的进攻和集体议价作用的减弱则是更进一步的影响因素。

不平等现象的恶化在撒切尔时代表现突出,并大体稳定下来,但仍然使英国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以前它位于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地区的行列。当前的工党政府采取了一些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步骤,尤其是规定了国家最低工资,部分恢复养老金与收入的挂钩,以及设定了减少贫困儿童数量的目标。它设定的目标之一是在1998—1999年和2004—2005年将贫困儿童数量减少四分之一。2004年3月对财政研究机构的评估,就是政府完成这一目标的步骤之一(Brewer 2004)。但是,当前的工党政府能否如其预期的那样减少不平等现象,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 结 论

本章对经济政策的变化进行了勾勒,从撒切尔政府取代“老”工党开始,然后是梅杰政府,更近的是托尼·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政府。本章还讨论了诸如私有化、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不平等等问题。本章表明,这些问题与“老”工党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存在着明显背离,后者1979年5月以来就被取代了。

李宁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Arestis, P. and Sawyer, M. C. (1998) 'New Labour, New Monetarism', *Soundings: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9, pp. 24 - 41.
2. Brewer, M. (2004) 'Will the Government Hit its Child Poverty Target in 2004 - 05?', *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Briefing Note No. 47.
3.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1985) *Employment: The Challenge for the Nation*, Cmnd. 9474. London: HMSO.
4. DTI(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03a) *The Strategy*. London: HMSO.
5. DTI(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03b)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London: HMSO.
6. Goodman, A., Johnson, P. and Webb, S. (1997) *Inequality in the U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Gottschalk, P. and Smeeding, T. (1997)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arnings and Income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 (2), pp. 633 - 87.
8. 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 (1944) *Employment Policy after the War*. London: HMSO.
9. Sawyer, M. C. (2003) 'The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D. Coffey and C. Thornley (eds) *Industrial and Labour Market Policy and Performance*. London: Routledge.
10. Sawyer, M. C. (2004)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n M. Sawyer (ed.) *The UK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UNCTAD(2003),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Annex. Geneva: UNCTAD.



## 第二十四章 作为新自由主义霸权载体的 欧洲一体化

约翰·米留斯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欧洲盛行的 25 年,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大多数欧洲国家福利事业私有化,政府缩小化,新形式的社会歧视,失业率上升和工资的两极化<sup>①</sup>,医疗、教育的“自由市场”体系以及福利的变化,不仅对经济产生了影响,也影响到欧洲社会的政治。

按照官方思维的惯常意识,这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等到利润的增加与投资的增长比翼齐飞,新的良性发展循环就会形成,收入也会随之增长。然而,尽管在利润水平、公共赤字及通货膨胀率下降方面有明显恢复,但在全欧洲,无论是投资还是经济增长率都没能接近就业和生活水平恢复所要求的水平。相反,广大社会阶层的经济状况在恶化。凭借私人利益和市场畅通运转的名义,社会事务被放到了第二位。

---

<sup>①</sup> 工资两极化加剧,具有代表性的是,在 10% 的上层与 10% 的底层之间工资分配比率的上升,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很明显。美国和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由于这一比率在二战结束后的 30 年中是下降的,哈里森和布罗斯通(Harrison and Bluestone 1988)将其定义为“U 形大反转”。在工资不平等和两极化方面最新的数据,参见 Borjas(2000, ch. 8)。

由于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欧洲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尽管价格下跌、财政稳定,而新自由主义“通货紧缩”经济策略仍不断“卷土重来”。在这一构架中,一切不合用和边缘化的东西都被当做“负担”。甚至所谓进步的社会党,也认为为了社会团结需要付出的代价高得令人难以承受。

这一章将集中讨论的是: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政治力量,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确保并复制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思想在欧洲国家的霸权地位之载体开辟道路的。结论部分将探讨,到底是什么确保了新自由主义持久的霸权地位,以及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

### 不同的政府,同一种政策

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早期,保守党在许多欧洲国家赢得了中产阶级的支持,并凭借一个鲜明的“自由主义”政治口号赢得大选:“让市场力量自由活动;反对一切形式的官僚作风、社团主义或对市场机制的垄断扭曲,曾经的高增长率将再度出现。”这一观念其后被具体化,即出台了一个关于缩减工资和社会开支、取消市场监管——包括劳动力市场——以及将公用事业私有化的限制性经济方案。

然而,随着保守党政府承诺的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现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公众中的认同度下挫。大多数保守党在一段时间的执政后——在英国和意大利时间较长,在法国和希腊等国为期较短——在90年代中后期的大选中普遍败给中左翼政党。

尽管政权发生了移交,欧洲的经济社会政策却没有因此而产生多大变化。新政府实行的是仍然是以往的保守政策,只不过有时会稍稍受到保护某个边缘化群体活动的影响。实际发生的是(当权)左派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与思想幻象消失,他们固步自封于对一个

简单的主导思想——完全的无监管从不存在，因此中左政府比保守党政府更有效——的持续重复中<sup>①</sup>。

中左政府坚持把降低失业率或通过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考虑重心，相反，它们把重心放在稳定价格、减少公共赤字、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以及公用事业私有化等方面。所以它们似乎是保守政策的“中道”典型，即“具有一张人性化面孔的新自由主义”（见第二章和第二十一章）。这些政策在过去的20年中使大多数欧洲国家提高了利润份额。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81—2003年期间，利润份额的增长数字分别为：意大利，从23.3%到32.3%；德国，从26.9%到33.6%；法国，从20.6%到30.7%；西班牙，从25.4%到34.5%，美国，从25.6%到26.5%。（*European Economy*, Statistical Annex, Spring 2003, pp. 94-5）

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及理念的坚持，通过关于促进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货币与政治一体化的官方政策得到了体现。它实际上似乎是宣称：欧洲一体化方案是实现与维护新自由主义策略的先决条件。因此它们声称，为了促进欧洲一体化，新自由主义策略必须不受任何反对声音的影响，也不能作任何局部的修正或改变。通过将其与欧洲一体化相等同，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势力将新自由主义奉为不可侵犯的禁忌。

关于新自由主义合法化为欧洲一体化的最佳方法，欧盟成员国之间有三个重要协议：1992年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6—1997年稳定与增长公约（SGP），以及最近（2003—2004年）由欧洲大会详细拟订的《欧洲宪法》（草案）。

---

<sup>①</sup> “在进行战略选择、特定领域的组织稳定方面，市场从来不能取代政府，尤其是在制度化的市场中……政府仍然是**引导与驾驭市场力量**的最有力的机构”（Boyer 1996, p. 110, 108；黑体是本作者所加）。



### “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和《稳定与增长协定》

1992年2月,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签订的条约中系统阐述了明确的经济“趋同标准”,即低通货膨胀、低利率、汇率稳定,以及最主要的是,公共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60%。这一标准被设想为是使欧盟进入货币联盟(MU)及发行单一流通货币的第三个也是最后阶段的前提(Council 1993)。

在1996年12月签署于都柏林的SGP(《稳定与增长协定》)的基础上,欧元开始流通并成为永久性共同货币(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在此之前,欧盟国家采用的是限制性的“通货紧缩”政策。公约重申,由于政府预算赤字不应超出该国GDP的3%这一固定上限,限制预算仍应作为经济政策的重点。不能将公共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下的国家将面临惩罚性措施——比如说,超过该国GDP的1.5%以上的罚款。这样,SGP成为后欧元时代新自由主义削弱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以及按有利于资方及高收入群体的方式进行财政调整的重要手段。(European Economists 2003)

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政策,经常在广泛经济政策指导纲领(BEPG)中不断被重新评估。比如说,“工资增长应保持适度”(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p. 5),以及“货币政策、预算政策和工资增长”应总是与“价格稳定及短期内增加买卖双方信用的要求相一致”(p. 16)。稳定价格常常被减免税收、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劳动力市场监管的取消和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从公共领域的量入为出方案转变为由私人资助的资本市场方案——所补充。(见第十六章)

然而,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证明对自2000年以来冲击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停滞危机效果不明显。大多数在指导纲领的指引下采用了限制性方案的欧洲国家,突然面临经济被卷入通货紧缩旋涡的危险。2000年5月里斯本峰会上所作的宣言——欧盟经济应在十年

内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在当前十年保持 3% 的平均增长率——被以下事实推翻：欧洲地区 GDP 增长率从 1991—2000 年的年均 2.1% 降到 2003 年的 0.4%（欧盟委员会评估），而投资增长率（国内总资本构成）从 1991—2000 年的 2.0% 降到 2002 年的 -2.6%（*European Economy*, Statistical Annex, Autumn 2003, p. 87）。

虽然对失业救济和社会福利进行了削减，但在增长微弱、停滞危机，公司所得税、资本收益率以及高收入税都在减少的形势下，事实证明，公共赤字不能超过 GDP 3% 的限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由于葡萄牙没能实现赤字目标，2002 年 11 月，欧盟财政部长会议投票对其采取了惩罚措施。然而，与此同时，德国财政部长警告委员会，该国 2002 年也不太可能达到 SGP 的赤字目标要求。事实上，德国公共赤字从 2000 年占 GDP 的 1.4%，上升到 2001 年的 2.8%、2002 年的 3.6%、2003 年的 4.2%，并且预期直到 2006 年以前都会保持在 GDP 的 3% 以上。欧盟的第二经济大国法国的情形同样如此，2003 年，该国公共赤字超过了 3% 的限制，达到 GDP 的 4.2%。由于两个主要的欧盟经济大国无法遵守 SGP 规则，2003 年 5 月委员会宣称，由于伊拉克战争，欧盟的赤字限制破例网开一面。然而，在欧盟一些较小的国家提出抗议说，如果不被所有的国家遵守，“强硬的”政策将失去公众信任之后，委员会开始了对德国和法国的制裁过程，这意味着将对它们各课以该国 GDP 0.5% 的罚款。但是，这一方案最后被欧盟财政部长们否决，2003 年 11 月的布鲁塞尔会议拒绝了委员会的建议，即法国和德国应立即作出承诺，加强对支出的削减以遵守 SGP 准则，否则就会面临制裁。欧洲中央银行立即谴责了财政部长会议的这一决定，声称它是“冒破坏制度框架的可信度和对（欧洲国家）坚定公共财政的信心的风险”。

稳定与增长公约没有被正式放弃，它只是作为由限制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停滞的结果被违反。通过放弃对法国和德国的惩罚措施，欧洲国家重新强调了对本国预算的权力。不过，它们仍然坚持新自由主义道路，尽管事实已经证明，这条道路使停滞危机加剧，并成为提



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 欧盟扩大及“宪法草案”

2004年5月,有十个新的成员国加入欧盟,包括塞浦路斯、马耳他及八个中欧和东欧国家(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后,这些国家采用与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及SGP有关的限制性政策,尽管其中一些国家面临严重的宏观经济不均衡和高失业率(如斯洛伐克共和国达到19%,波兰达到20%)。此外,还有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计划于2007年或2008年被欧盟接纳。

为团结有25个(很快就是27个)成员国的扩大了欧盟,欧盟主要政治势力组成了一个“代表大会”,并详细拟订了《欧洲宪法》(草案),这一草案最近被欧盟成员国批准(2003年欧洲大会)<sup>①</sup>。宪法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十年内“完成”欧盟的制度建构,这样将会“更深地”推动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一体化进程。然而,不难看出,宪法实际上意在使新自由主义议程在扩大的欧盟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宪法将“宪法规则”奠定在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支柱之上:第一,无监管的市场。I—3章称“联盟目标:一个自由竞争和非扭曲的单一市场”。第二,超越人权和社会权利之上的国家安全及“军事实力”的优先权。I—40章声称:

公共安全与国防政策……应使联盟具备利用和运作军民资产

---

<sup>①</sup> 除了涉及欧洲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投票加权条款外,宪章草案被所有成员国接受。2003年12月,欧洲委员会的领导们没能讨论出一个最后章程,西班牙和新加入的波兰坚持保留2000年的投票方式,给每个国家和德国一样多的选票。然而德国比其他国家的人口多很多,于是德国和法国要求重新修改投票方式。最终在2004年6月出台了一个折衷的方案。



的空间,以便联盟依照欧洲宪法的原则,在联盟之外执行保卫和平、防止冲突及增强国际安全的任务<sup>①</sup>。

在宪法第一部分关于欧盟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一些“进步的”简要陈述之后,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论述更为明确,这些看上去像是 1948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共同意见的翻版<sup>②</sup>。抑制通货膨胀这一所有新自由主义政策背后的支柱性理念,被作为“强调性”的宣言在结束语中提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目标应是保持价格稳定。”(I—29 章)

如果注意到在欧盟 15 国中通货膨胀率(CPI)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平均 10.6%降到了 80 年代的 6.5%,以及 2000 年的 2.1%,并且自此之后几乎保持不变——就能够得出以下结论:通过选择进一步抑制通货膨胀,欧洲政府宣称它们坚持同样的新自由主义限制性政策,使大多数工人最近陷入困境,而其他目标,如提高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改善福利制度等等,在“合并”扩大的欧盟整个历史时期被束之高阁。

## 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可能性

新自由主义既不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正确”政策,也不是某

---

① 在同样的文章中进一步重申(就像宪法条款!)“将建立一个欧洲军事装备和军事能力研究局以确定运作所需要的条件,采取措施来满足这些需求,帮助确定哪里适合,哪里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巩固这些防御地区的工业和科技基础,参与制定欧洲军备能力政策,并且帮助内阁评价军备能力的改进”。

② 例如,在草案I—3 章中:“这个联盟将为欧洲的可持续发展工作,主要基于经济增长的平衡、社会市场经济、高度竞争,以及针对充分就业、社会进步和环境质量的高度保护与改善。”但总的说来,《欧洲宪法》(草案)在大部分社会福利和人权等方面明显落后于 1948 年的宣言。例如,在重视“工作权利”方面,我们在这个草案中看到:“每个人有工作的权利,有权寻求一个双向选择的职业”(II—15 章)并且“对于不公正的解雇,每个工人有权依照联盟法律和国内的法律惯例获得保护”(II—30 章,黑体是本作者所加)。为方便对照,我们引用了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每个人有工作、自由选择职业、公正和有利的工作条件以及针对失业获得保护的权力”(第 23 章,黑体是本作者所加)。

个政府的“错误”政策——如果仅仅是“错误”，那还可以通过合理的争论与讨论来对其进行修正。它是一个阶级政策，其目的是，在所有社会层面上按有利于资本的方式来改组劳资之间的力量关系。它是资方对劳方发动的一种阶级进攻。

迄今为止，资方对劳方的进攻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它成功地削减了劳工对于净产出的分享：在欧盟 15 国，从 1971—1980 年期间的平均 73.9% 降到 2001—2005 年期间的平均约 68.3% (*European Economy*, Statistical Annex, Spring 2003, p. 94)。换句话说，它将力量对比关系转换为对资本有利。而事实上，这是在劳工阶级承认了资本主义观念和目标的的基础上产生的特殊类型的社会共谋。当工会承认社会对话的一个关键的议题是如何增加利润率，或怎样保护国家或欧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地位时，难道这不是共谋？这就是共谋：在“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共谋。

出于同样原因，后二战福利国家在力量均势不再存在的历史背景下，造成了阶级分化。在这一情势下，有利的工资再分配政策，大众阶层对需求的刺激作用和社会公民权的增强，并不代表可靠的民主和社会普遍进步，它只是资本在一个相对不利于其自身的历史时期保证其统治的另一种方式。显然，一个反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只有在当前劳资之间的力量均势发生激进变化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然而，为了实现社会力量均势的重新分配，劳工阶级必须再一次详细拟订他们自己独立的、区别于资本家关于劳动纪律的指令和利润最大化的阶级目标。为此，劳工阶级必须重新制订其关于社会变革的反资本主义战略。这是近年来在全球各地的实践中迅速发展的“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在当前正在面对的巨大挑战 (Saad-Filho 2003)。

此外，前一部分显示，欧洲的社会、政治主流势力设法将新自由主义政策合法化为两个具有同等优越性的方案，即“经济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欧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具体化为“欧洲共同政策”、“一体化标准”和一个共同的欧洲“宪法”框架。

欧洲一体化进程就这样被转换为欧洲资产阶级在其与劳工阶级冲突中所使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武器：它被当做新自由主义的载体，因为它认同关于紧缩、私有化、市场无监管和剥夺权利的经济社会政策的阐述与实施。尽管这一结论并不导向“反欧洲”等议题，但它确实再一次强调在全欧洲明确阐述另一种策略将能够增进欧洲劳工阶级利益的重要性。不仅是反欧洲主义，还有反新自由主义和反资本主义，都提出了彻底重写欧盟反民主的通货紧缩制度框架与政治议程的要求：社会变革、民主化和形成一个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激进变革战略，而代之以一种平等和人道的社会秩序——亦即共产主义。

李宁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orjas, G. (2000) *Labor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Irwin.
2. Boyer, R. (1996) 'State and Market: A New Engagemen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 Boyer and D. Drache (eds) *States against Markets: 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3. Council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3)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Brussels and Luxembourg: ECSC-EEC-EAEC, 1992.
4.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n the Broad Guidelines of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the Community (for the 2003—2005 period)*. Brussels, 8 April.
5. European Convention (2003) *Draft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Brussels, 20 June.
6. European Economists (European Economists for an Alternative Economic Policy in Europe-Euromemorandum Group) (2003) *Full Employment, Welfare and a Strong Public Sector Democratic Challenges in a Wider Union*, <[www.memo-europe.uni-bremen.de](http://www.memo-europe.uni-bremen.de)>.



7. Harrisson, B. and Bluestone, B. (1988)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8. Saad-Filho, A. (ed.) (2003) *Anti-Capitalism: A Marxist Introdu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9. Pelagidis T., Katseli, L. and Milios, J. (eds) (2001) *Welfare State and Democracy in Crisis: Reforming the European Model*. Aldershot: Ashgate.
10. Rhoads, C. and Mitchener B. (2003) 'Germany and France Dodge Effort to Rein In Spending; ECB Warns of Consequences', *Wall Street Journal*, 25 November.

## 第二十五章 新自由主义：东欧新边界

简·托波罗斯基

在东欧，新自由主义以政府政策面目出现是共产主义国家金融危机的结果，而这造成一种依赖于西方金融机构资金流入的局面。在经济和金融危机过后的一段时间，经济稳定下来甚至开始有了增长的态势，当然仍伴随高失业和日益增长的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后共产主义国家被分化，有些被拉入特定西欧式新自由主义，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候选人；有的则在西欧和后普金时代俄国的商业寡头政治模式间游离。

博兰尼在他的经典著作《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谈到，作为让市场自发力量自由运行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在减退。正如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认为的那样，只要市场充分协调，那么这个体系就会有效运行。但是博兰尼指出，如此吸引像哈耶克或波普尔(Karl Popper)这样的右翼理论家的“自发秩序”之出现，有赖于十分脆弱的国际金融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些支撑着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制度没能阻止它倒退到野蛮和战争(参见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它在战后倒塌了。

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东欧，防止这种倒退的整合因素是政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统治没有野蛮事件。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体系相当稳定而延续着这样一些政治暴行，如：乌克兰饥荒，30年

代和 50 年代的政治清洗,1953 年柏林、1956 年匈牙利以及 1956 年和 1970 年波兰枪杀工人,1968 年和 70 年代后期的反犹太运动,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入侵。一幕幕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场。七八十年代,渐渐被熟知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苏维埃影响的国家中确立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整合,它重新分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以保证其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经济一体化包括苏维埃国家和加盟共和国协调的大型共同投资项目,以及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 或 Comecon)在这些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最低生活水平在西欧周边地区相对较高(例如东德、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亚美尼亚地区),因为那里有民族主义传统或对比较先进的邻国(西德、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地区或土耳其)的嫉妒,因而需要加强控制。

## 共产主义的衰落

该制度的衰落乃是因各种因素的结合。美国军事家们津津乐道由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起的军备竞赛所扮演的角色。在军事装备和机构设置上,大概苏联被迫投入了相当多的财力,尤其在阿富汗,苏联军队与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阿富汗民族主义者作战,保卫友好邻国的政权。不过还有其他的情况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拿他们不恰当的消费水平和西欧、北美的中产阶级作了比较。新中产阶级因此不情愿满足于“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这种政治制度对每个人只保证个人消费的最低水平。一旦与低生活水平相关的不满蔓延到以共产党名义进行统治的工人阶层,共产主义政体的命运就成为定局了。

在国际上,这些国家为了获得技术进步而对西方资本主义银行欠下的债务在 70、80 年代有了显著的增长,造成这些国家的经济困难达到极致。为了努力改进工业产品的水平,一些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借



了许多钱来购买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还债计划书主要依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增加出口来完成。1974年石油价格出现波动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不景气之中，利率在70年代末上升了许多，波兰和匈牙利被迫加入到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寻求重订它们1982年底的债务计划。事实上它们在重排时间表期间得到了较优惠的条件，因为苏联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伸出了援助之手。

共产主义体制走向消亡是在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时期，他不仅揭露腐败，还提出重构和透明(“改革”和“公开性”)的主张，他的苏维埃政府也责成盟国政府相应地承担各自的外债。援助的其他来源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开始这个组织还努力保持它的援助功能是纯技术的，与债务国的政治属性无关。但是随着80年代末期共产主义体制重振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思想以及外币偿还外债均告失败之后，谁能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好待遇已很清楚。于是，新自由主义在东欧产生了。

东欧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是外贸壁垒的拆除和强制紧缩财政，以保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减轻后共产主义政府严重缺乏西方货币压力的支持。这一措施迫使政府收回能有效保护这一地区国有工业的金融安全网络。消费需求长期被生活消费品的缺乏所抑制，低劣的生活消费品质量使这些东西改从西方进口，消费品工业面临市场瓦解，与此同时投资工业失去了由国家投资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协同保证的市场。但是，保证收入(guaranteed incomes)和福利作为共产主义相当显著的特征之一被保留下来，废除它们的企图对新的民选政府而言相当不受欢迎而未能付诸实施，这样的结果就是工业生产一落千丈和恶性通货膨胀。这一时期的统计表因结构变化速度太快而不可靠，一些行业接连崩溃：让人不禁想起东德的却贝特(Trabant)汽车，因为可以买到更好的西方款式的车子，没人再想买它，所以它停产了。

另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通过外国消费品进入市场、通过“内部人士”同意接管国有经济资产所有权并转售、或为他们

的管理者保护境外资金,财富在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这种被称为“盲目私有化”的做法最终导致后来逐渐盛行于前苏联的所谓“黑帮资本主义”。而另一个极端则是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因国家和当地企业没钱支付工资而陷入贫困。随着工业生产一落千丈,维持共产主义工业体系正常运转的行业交叉补贴的复杂体制被废除,失业人数增加,常会出现差不多一半的省城和乡下的劳动力远离新兴行业,政府不再支持那里的工业了。

### 东欧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就成了东欧的一种政策选择。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的启发下,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探讨了所有权的确定、合同强化、使政府脱离经济活动从而使其经济“正常化”并产生经济复苏。不同的是,他们只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家中的少数,他们忠于芝加哥的新自由主义,热衷美国的经济模式,这其中隐含着对美国政府、华盛顿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他们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就是效仿美国成功的经济模式——所有权、私有化、低税率,但是低通胀的政府预算平衡是一种非美国的方式——这样给许多后起的商业精英以支持。这种模式毕竟是一种自助式的资本主义,它向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一个在现有全方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自由的政治选择,它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和对历史的扬弃。这种“自愿主义”基于需要创建一个新体制的信念之行动,是一种政治抉择,它已经深深植根于东欧。自18世纪以来,一种革命的乌托邦传统就在反对东欧落后的独裁主义斗争中形成。这种乌托邦传统迫切要求建立西方制度以使东欧走入现代化(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之中。

20世纪90年代早期波兰财政部长巴塞罗维茨(Leszek Balcerowicz)和当时的匈牙利首相米克劳斯·耐美斯(Miklós Németh)引领大家



突然跨跃到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政策之下，在最初造成了经济活动大大紧缩和较高的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者们已经期待一个动态的“自发秩序”和企业家资本主义的出现。在国民经济和它们的外贸伙伴之间至关重要的相互关系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正常化。以前的外汇危机通过当地的货币贬值已经被克服，而这苦了当地的居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国外进口过度需要消除和外国资金流入才有所好转。然而其他地方的经济除主要的商业中心之外，经济活动已经倒退到生活必需品的实物交换阶段，这种情形在前苏联地区尤为突出。

建立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关键是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股票市场很快被引进这个地区的主要首都，连同出现在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金字塔式结构的银行业计划一起，沉溺于迅速的投机泡沫与破灭之中。越来越多的正式银行网络被发展起来，但是在家庭和公司间信贷支付的迅速膨胀掩盖了银行资产负债表，它已经被无力支付或重新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的债务压垮了。小一些的银行倒闭了，大一点的不得不重新国有化，比如捷克正是这样，以防止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私有化仅仅是一定意义上的成功。转售规模小的企业提供了一些出路，它的资本值相对较低，这些企业不是已归个人所有就是很快会被卖掉。更赚钱的或有赢利潜力的国有制造企业则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才被出售，这些企业历经多年的投资不足，对于能负担得起重新装备工厂设备费用的西方企业而言，通常以底价成交，转变成私营。重型的采掘企业例如俄国和中亚诸国的石油和煤炭企业，有效或完全合法地把所有权转让给了与西方跨国公司有非公开联系的管理者。这个地区的左派政府为了共产主义工业化，曾以拥有重型工程设备为荣，但从70年代以来大多没再引进新设备了，政府预算由于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高额支出被压低，没有更多的钱维持国有企业，于是这些行业接连不断地倒闭了。车间最初都建在劳动力过剩地区，这些企业的倒闭加剧了这个地区的失业，这是过渡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人口全面增长，但东欧的用工人数仍没有超过1980年的顶点水平（参见第二



十章)。

新自由主义在东欧的失败缘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ános Kornai)所谓的“刚性预算”,它强制商业和工业放松它们的安全阀门,给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以灵活性和推动力,也就是这些企业积累的流动准备金。这些积累是公司为了预防亏损所准备的钱,来自它们的净利润。现金或类似的现金储备可以偿还贷款或为新的活动买单,能让它们在某个行动蒙受损失时得以渡过难关,自由地借贷或花费。东欧的新型企业进入到一个没有金融储备(共产主义工业交叉补贴的体制下不需要这些)的无情的资本主义世界,由此影响了它们的信用,增加了它们对与政府、各方债权人和西方企业的暗中腐化关系的依赖。长期缺乏流动资金的企业不会大量投资于厂房和设备,而开始致力于投机行为:买进便宜的资产,高价卖出。然而投资或固定资产的积累才是保持资本主义增长的关键。

### 新自由主义之后

东欧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结束了,它被 1996 年的亚洲危机和 1998 年的俄国金融危机彻底葬送了。这说明没有强大金融制度为基础的任何资本主义都是不堪一击的。不过,这一地区的政府在那个时候开始与欧洲委员会和西欧政府进行谈判,着眼于让大量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当地政治和整个地区人民的情绪使波罗的海诸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以及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在 2004 年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随后也进来了。西欧的政治和经济还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即使这样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和英国)的政府在为新自由主义鼓与呼。西欧有着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这里的人民深深怀念福利国家的供给,这在民主国家是很难被忽视的。欧盟的一些新制度已经受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影

响,比如禁止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还有1992年的《稳定与增长协定》限制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与新成员国之间的财政赤字。不过,西欧已经具备了现代经济另一个替代模式的某些制度,它有别于芝加哥和华盛顿所散播的新自由主义。这个替代模式的关键要素在于政府支持社会稳定制度,减少由资本主义的税收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等造成的严重不平等,提供比美国品质更好的公共服务。对于缺少现金的东欧政府,最重要的是,它的课税基础已经被失业所造成的收入下降、违反常规的商业活动以及吸引资本输入的国际“税率竞争”所削减,进入欧盟的通道提供了布鲁塞尔对较穷国家的地区性援助。对东欧政府来说,要优先按照西欧模式而不是芝加哥的小政府模式制定贸易和法律制度(以所谓“共同法”为由,新成员国必须在此之前加入)(参见第二十四章)。

不过,进入欧盟的通道最终使东欧带着债务加入了欧洲货币联盟,这样降低了政府的借贷和财政赤字。这使得东欧在该货币联盟之下对新自由主义观念拥有尝试的基础:当然这个货币联盟的缔造国尤其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已经让它们政府的财政政策避开这个货币联盟的约束,而对东欧新成员国则不允许这么宽松。

欧盟开放新的经济和政治的可能性使东欧前共产主义阵营分化成两个部分。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具有成为欧盟成员这种预期的国家,在西欧式的资本主义中看到自己经济和政治的未来,这种资本主义面临高福利国家供给的弱化,同时又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地区性援助。剩下的没有这样一种直接前景的国家则要么是退回到虚弱的民主政治(比如俄国、乌克兰),要么是新中亚诸国或白俄罗斯臭名昭著的腐朽专政。它们的经济也倒退了,占特殊位置的日用品生产濒临崩溃。为了增加财富,原材料的出口和奢侈品的进口维系着这些首府和周边相对有活力地区的外贸活力。但是它们剩余的国内经济已经分崩离析成物质产品的实物交换,并出现了当地的非官方货币(使用公司或政府的白条),如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俄罗斯。

近来的东欧,日益高涨的新自由主义与在这些国家建成强大的民

主政府的迫切需要相比显得不合时宜。其实,如果只是允许揭露腐败,坚持合法的所有权和契约,而不是通过人为或金融高压政策,那么民主制度是需要新自由主义指导的。没有稳定的金融体系所支持的法律、政治制度,“自发秩序”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就不可能出现。

进入欧盟的那部分东欧国家,所有权基本上得到了保证,金融体系也稳定了,新自由主义被局限在对付中欧商业圈目前阶段的萧条上。在此,它的代言人们已经回应了英国和西班牙政府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官员,他们责备中欧的经济消沉和劳动力市场僵化、高税收和政府的财政无序。不过,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商业投资而不是财政政策或符合雇主需要的劳动力,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如果不能重新获得商业投资,那么财政紧缩和“弹性”(比如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将只能因经济消沉而形成更加糟糕的局面。如果商业投资增加,那么就不会有劳动力市场僵化、税收或政府开支阻碍经济繁荣。

朱珊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Andor, I. (2000) *Hungary on the Road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stport, Conn.: Praeger.
2. Brus, W. and Laski, K. (1989)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 Kregel, J., Matzner, E. and Perczyński, M. (eds) (1994) *After the Market Shock: Central and East-Europea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Brookfield, VT: Dartmouth.
4. Kowalik, T. (1991) 'The Polish Postscript, 1989' in M. Mendell and D. Salée (eds) *The Legacy of Karl Polanyi: Market, State and Societ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5. Kowalik, T. (1994) 'Reply to M. Glasman' *New Left Review* 296, pp. 133-44.



6. Milanovic, B. (1995) *Poverty,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53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7. Polanyi, K.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 第二十六章 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

本章考察拉丁美洲从进口替代产业(ISI)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并且简要评价在这一地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绩,特别以这个地区最大的国家作参考: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

这个地区有四大特征为此研究提供了背景资料。首先,拉丁美洲一直是个排外社会,收入、财产和权力有着深度的不平等。其次,尽管内部要求调整变化的呼声不断,但强大的寡头政治在过去五百年一直统治着这一地区。第三,拉丁美洲政府的设立乃是为了支持社会排斥、寡头统治和少数人对多数人无情的剥削,其中包括本地人、奴隶、贫穷的移民还有近年来的农民、正式与非正式的工人。当不平等和特权在日后受到挑战时,这些政府的反应强烈;相反,当游戏规则受到部分精英挑战时,它们普遍反应含糊和平淡。第四,拉丁美洲国家为了促进和调控经济活动,一直在做深度干预,包括产权的执行、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出口优先和劳动力供给。它们也在社会工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通常成为促进它们所挑选经济活动能力的组成部分。但是精英之间的冲突和分化使这些政策的功效大打折扣,导致出台了一系列不协调的经济战略。

---

\* 我很感激英格兰学院资助这个项目,它构成了本章研究的基础。

本文回顾了 ISI 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一致的两个例子。可以由两个层面分析它们的不一致：一是“内部”微观和宏观经济的限制阻碍这些政策实现它们既定的目标；二是现存的社会矛盾恶化所强加的“外部”限制。

### 进口替代产业化战略和它的局限

ISI 是拉丁美洲在 1930 年到 1980 年间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政策，ISI 是基于制造业有序扩展的经济策略，目的在于替代进口。这种制造业的国内本土化有代表性地发端于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加工食品、饮料、烟草制品、棉纺织品等），后来扩展到耐用消费品（尤其是家用电器和汽车装配）、简单的化工和药品（比如炼油和某些药品）以及非金属矿（尤其是水泥）。在较大的国家中，ISI 步伐能够迈得更远，包括钢铁产品和资本品（诸如工业机械和电子发动机）以及更复杂的科技产品（电子设备、造船、航天设计和装配）。

这种经济战略与一种特殊形式的资产关系——一种“社会劳动分工”相联系。通常国内资本不承担非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生产，同时耐用消费品也由跨国公司（TNCs）生产，国有企业（SOEs）负责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资料（钢铁、电子、电信、水和卫生、采油和提炼、航空、公路、铁路、港口等）的生产。国有银行在提供这些信用担保尤其是工业发展和经济多样化方面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可否认 ISI 在某些领域是成功的，比如，在 1933—1980 年间，巴西和墨西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是 6.3% 和 6.4%，这个显著的成绩可以和号称东亚“奇迹”的韩国与中国台湾媲美。<sup>①</sup>

---

<sup>①</sup> 1954—2000 年间，韩国年增长 5.2%（1963—1996 年间是 6.6%），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在 1952—1998 年间年增长 6.1%（1953—1997 年间是 6.8%），数据来源于 Cepal(2003)和 World Bank(2003a,2003b)。又见 Weeks(2000)。



尽管有这些重要的成就,拉丁美洲的 ISI 还是存在严格的局限性,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缺少克服外汇短缺的能力,导致长期国际收支的困难,这是 ISI 战略实施期间经济动荡的主要原因。其次,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和低效率,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长期的财政支持,因此制造业的投资基本靠外国直接投资、国外贷款、国有银行、国家补贴或公司自己的资源。财政来源的这种整合最终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见下文)。第三,财政疲软,因为 ISI 提出激进主义工业政策的预算要求,它和年度可支配的税收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社会分化和精英对税收的抵制(冒昧地说,穷人无能力作充分的贡献,而富人又不愿意这样做)。拉丁美洲政府没有能力实现其产业政策目标,同时维持收支平衡造成了持久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相当大的债务积累。第四,通货膨胀一方面是 ISI 战略下分配矛盾的产物,社会利益集团通过较高的价格、税收和工资要求等为国内收入的份额而斗争。另一方面,它是储备战略局限性,尤其是政府和私有企业长期资金困难的结果。特别是,税收不足迫使政府通过赤字预算来弥补它们的支出,同时脆弱的金融致使企业通过增值和保值来进行投资。最后,缺乏配套政策。拉丁美洲国家缺乏发展目标所需要的经济活动协调能力。它们受制于精英的内部矛盾以及精英与大众间的冲突,它们由于自己国家依赖于国外资本和技术而受挫,政府逐渐陷入缺乏协调的经济部门的痛苦争斗之中。大多数政府最终不堪 ISI 战略形成的人口、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之重。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经济已经显露出增长的迹象,但是 ISI 战略的脆弱性在 1982 年的世界债务危机之中被充分暴露出来。这次危机集中体现了干涉主义者的工业政策、短期投机的金融体系、疲软的税收体制和激烈的社会动荡,政府已经难以为继。这些不安定的经济征兆包括金融危机、资本外逃、经济停滞不前和恶性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国家还带来了严重的政治上的不稳定。

## 新自由主义过渡

20世纪80年代早期拉丁美洲的危机是全世界向新自由主义转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次危机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经济减速所释放出来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推出的外债阻滞了危机，但当美国惩罚性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抬高借贷利率时，新的危机爆发了，成了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一部分。

债务危机的影响相当具有破坏性（参见第十一章）。1972年拉丁美洲的外债总额是313亿美元，超过尼加拉瓜、秘鲁和玻利维亚GDP的33%；80年代后期，债务高达4300亿美元，超过这一地区所有国家GDP的33%（尼加拉瓜1988年的债务最高时相当于GDP的1200%）。债务的增长和较高的国际利率使支付利息激增，1972年大多数国家债务利息从平均为GDP的1%增加到1983年的5.4%（哥斯达黎加在20%以上），拉丁美洲外债在世纪之交时达到7500亿美元，利息支出就超过几乎每个国家GDP的2.5%，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处在了相当不利的地位。

这次危机之后经济增长停滞、薪酬一路下滑、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参见下文），ISI战略的失败显而易见，它被新自由主义替代尽在情理之中。这是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拉丁美洲有地位的精英分子宣扬的观点。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危机的凶猛最终在这个地区造就了新的精英舆论，拉丁美洲的精英确信他们自己的“民族发展策略”、以ISI为中心的战略应该废弃，经济活力理应恢复——同时保留现有的社会形式和经济独立——接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sup>①</sup> 这个宣

---

<sup>①</sup> 在拉丁美洲有两次自由主义改革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由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触发的，它被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军事专政利用。在经历了严厉的去工业化、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以及巨额外债和深刻的经济危机积聚之后，它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很不光彩地结束了。（见Díaz-Alejandro 1985）。第二次浪潮就是下文要分析的。



言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ISI 战略在全社会是不公平的,本身有局限性,结构上也很脆弱,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危机不应当归咎于 ISI 战略的缺陷,完全是外界因素施加的影响。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不能要么数落 ISI 战略的缺点,要么就只和从前的增长业绩相比较(参见下文)。

新自由主义过渡的有效性,就其对通货膨胀强制控制而言,可以说间接得到了证明,这是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一个特别之处。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对而言常以“技术性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作伪装,这种内外不一致是由拉丁美洲 ISI 战略的失败促成的。财政、金融和工业危机因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常浮出水面。例如在尼加拉瓜(1988 年)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14 000%,玻利维亚(1985 年)达到 12 000%,秘鲁(1990 年)达到 7 000%,阿根廷(1989 年)是 3 000%,巴西(1994 年)是 2 500%。稳定通货膨胀迫切需要模糊新自由主义过渡的广泛性和长期性。由于未能赢得这场思想之争而饱受合法赤字之苦,新自由主义精英们一致发现,为了让它的政策更容易执行,有必要放弃其行动议程。

整个拉丁美洲,金融、贸易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国有生产和金融企业全盘私有化或关闭,还有沿着新自由主义这条主线进行的意义深远的金融与劳动市场改革,这些都在意料之中,它们对短期经济整体稳定(比如控制通货膨胀)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都非常重要。同时,在 ISI 战略指导下制定的工业政策及配套制度被系统地废止,抑制外资的管制也放开了。为了推动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最明显措施要算阿根廷可兑换项目(1991 年)和巴西的里亚尔计划(1994 年)。这些反通货膨胀战略是从 ISI 战略到新自由主义积累的制度转变的前提(参见下文)。<sup>①</sup>

---

<sup>①</sup> Inigo Carrera (2005) 以及 Saad-Filho and Mollo (2002) 对此加以批评的鉴定。



## 新自由主义的冲击

有五项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过渡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首先,进口自由化。为了帮助本地企业(包括在这个国家经营的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ISI 战略要求强硬的进口抵制。但是,没有国外竞争的受保护企业有更强大的市场力量。它们享有更多的提价自由,适应更灵活的薪酬要求,加大了对通货膨胀的经济进攻。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因为外国竞争者限制国内商家的定价——否则它们的市场将会被进口所占领。同时它限制工人的薪酬要求,因为支出增加会使本地商家丧失竞争力。更进一步,新自由主义者们宣扬贸易自由化迫使本地商家与“价格最优惠”的外国产品竞争,有助于提高整体的生产效能。不成功的本地产品最终将会停产,它们的资本和劳动力有可能会在别处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其次,汇率太高(也就是超过适当限度地持续抬高本国货币价值)。太高的汇率会人为地降低进口货物在当地的货币价格,增强贸易自由化在通货膨胀和竞争力方面的影响。进口的自由化和汇率的过分抬高结合起来会对抑制通货膨胀有很大的作用,它很受顾客欢迎,进口的日用品既合用又便宜。不过,它们在国际收支和地方工业以及劳动力就业方面会有灾难性影响。例如,阿根廷的进口在 1990—1992 年间从 68 亿美元暴涨到 193 亿美元;巴西 1992—1995 年间从 280 亿美元涨到 633 亿美元;墨西哥 1987—1990 年间从 241 亿美元升到 519 亿美元。大凡这些国家在这一时期内都遭遇了通货膨胀。

便宜的进口货严重地损害了本地工业。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的产值分别占 GDP 的 31% (1989 年)、35% (1982 年)和 26% (1987 年)。2001 年这个比率已经下降到 17%、21%和 19%。产业部门的从业人数也下降了,尤其在阿根廷,1991—1996 年劳动力从 33%

跌至 25%。在巴西,1989—1997 年有超过 100 万的工业岗位消失了。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整个拉丁美洲的失业人数平均从 5.8% 递增到职工总数的 10%——这其中不包括不充分就业和非正式雇佣的工人,否则的话可能达到劳动力的一半。最终,1994—2001 年间阿根廷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了 16%,巴西为 8%,墨西哥为 45%。

第三,国内金融的自由化。人们曾经期望金融部门解除管制有助于增加储蓄和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事实正相反:储蓄和投资比率都降低了。阿根廷 1989 年后的十年间,储蓄从占 GDP 的 22% 降到 17%;巴西 1985—2001 年间下跌了 8 个百分点,仅占 GDP 的 20%;墨西哥从 80 年代早期占 GDP 的 30% 下降到 2001 年的 18%。投资方面,阿根廷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后期从占 GDP 的 1/3 到不足 20%;巴西 1989—2001 年间从 25% 降到 20%;墨西哥 1981—2001 年间从 26% 落到 20%。

第四,财政改革(增加税收和削减支出),以解决困扰拉丁美洲的政府预算赤字和早先一段时间诱发性的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多数国家达到了预算平衡。不过,因为国内利率已经大幅提高,国债的支付费用急剧增大,政府正在从预算中挤出些非财政支出,这种现象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尤其明显。

最后,国际收支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放松资本境内外进出流动管理的规定)。本质上,这项措施想吸引国外存款和现代化技术,其实还有更多可做。贸易自由化、货币升值、较高的国内利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结合是一种自我防护的策略,可以在减少通货膨胀的同时锁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允许便宜的进口货进入,同时高利率、外债、大规模私有化和国内企业由跨国公司接管,这些做法带来了外资。通货膨胀下跌,同时消费者沉溺于奢侈的汽车、计算机和影碟机,热衷于在便宜的国外人造景区大把花钱。阿根廷和巴西日用品进口 1985—1998 年间平均从 2.42 亿美元和 6.06 亿美元增长到 50 亿美元和 82 亿美元;同

期，阿根廷国外旅游赤字从 6.71 亿美元增加到 42 亿美元，而巴西也从 4.41 亿美元增加到 57 亿美元。心情愉悦达到极致。新自由主义贿赂了那些不太信服的人，证明它不可能是错的。

愉快的态势没能持久，这几项改革未能克服 ISI 的缺点，正如第一部分所阐释，它们还产生了新的经济问题。它们没能减轻外汇管制，增加了对外国短期资本注入的依赖。金融改革减少了对储蓄的利用，对改善投资基金的分配也无所助益。财政的疲弱很快因支付利息在政府预算中的比重而重新凸显出来。经济调整最终因专家政府制度的废除、在 ISI 期间建立的产业链的铲除以及工业生产量在当地的减少而遭受磨难。工资和利润因进口竞争而下降；国内收入中利息比重上升；发展新型竞争产业相当困难；结构性失业开始出现。总之，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动摇了国际收支平衡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生产系统：新自由主义摒弃进口替代工业化措施，代之以推进由外资供给的“生产替代”。

1990—2001 年间，拉丁美洲吸收了 1 万亿美元的国外财政资源（负债净额、外国直接投资、债券和股票）。不过，资本流出（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和利润返回）也在上升，使净流入减至 1 083 亿美元。<sup>①</sup> 这些注入对于补偿紧缩的政府投资和降低存款利率是不足的，投资在下滑，增长的迹象逐渐消失。1981—2000 年间，阿根廷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 1.6%，巴西为 2.1%，墨西哥为 2.7%（在 ISI 之下比率更高些，见上文）。甚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债务危机发生很久以后，这种比较仍大多对新自由主义不利。阿根廷每年增长 4.5%，巴西 2.7%，墨西哥 3.9%，它们的经济也遭受了多次严重危机的重创：墨西哥和阿根廷在 1995 年，巴西在 1999 年，阿根廷在 1998—2002 年。

最近阿根廷经济崩溃终结了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必胜主义”阶

---

<sup>①</sup> 在债务危机期间资金的流出是无法补偿的。1980—2002 年间，拉丁美洲转移到国外的资金为 700 亿美元。



段。由于改革对经济无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民众抵抗力量在增长。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新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向新自由主义霸权挑战,并向一种民主经济替换方案的公众意愿迈进。

## 结 论

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常会产生一个宏观经济稳定以及由国外资本推动的消费引导型增长的有效周期。这种态势可能会变得相当流行,尤其在那些财富和特权受到保护而远离失业、债务和经济不安全等灾难的人之中。

尽管存在成功的可能,新自由主义仍有相当的局限性。如果所需求的资本注入未能到达,正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和 2000 年那样,许多国家将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和以“信用”的名义削减政府开支来吸引短期资金。这种经济同时受两面夹击,最终难免崩溃,正如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那样。

新自由主义的脆弱性不仅因为它固有的局限性,还由于改革未能克服 ISI 最严重的缺陷。虽然严重的通货膨胀被消除,但是国际收支仍然脆弱而难以应付国际资金流量的变化。拉丁美洲的外债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储蓄和投资却下降了,国内金融体系仍然不能或不情愿引导储蓄来支持经济发展,尽管激烈地改革税收和支出,但财政赤字仍旧持续。这些赤字不再归咎于缺乏资金来资助主动发展,而是归咎于支付国内公债的高成本——然而,在分配关系中,利用国家预算从纳税人到食利者的资源转移完全是一种倒退。最终,政府比 1929 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没有能力谈论工业协作和增长问题。ISI 没有克服的弱点以及新自由主义缺陷之结合注定使经济停滞,并且缩小了拉丁美洲贯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范围。

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日益高涨的抵制情绪表明对这个政策的替代已迫在眉睫(参见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这种挑战并不限于这些当选政府有计划性地寻找一个选择性的经济模式。在经过几个令人困惑的胜利之后,必须承认把新自由主义改革“投票出局”的企图是行不通的。毕竟这些改革并不局限于意识形态或政策选择。在这次致力于构建拉丁美洲经济的转变中,它们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国内、国外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劳动力三重分离已经拆除。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国内和国外资本跨越大多数市场分割,在公司层面建立了合作。ISI 时以高昂代价建立的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产业链已经不存在了,拉丁美洲金融已开始融入全球资本流动,政府已经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精英舆论的有力翅膀。

新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的构建是昂贵和旷日持久的。它有可能在一个地区层面甚至在全球出色地实现,前提条件是优先与亚洲和非洲中等收入的经济相联系。要想实现它,就必须有充分强大和坚定的群众动员,它不仅要求政府有所变化甚至有根本改变,而且还要从政府内部加强公众组织以及保持他们政治整合、群众基础和对绝大多数人的责任。这种群众运动新浪潮的构建是未来 10 年拉丁美洲左派面临的最重要挑战。

朱珊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Abreu, Bevilacqua and Pinho (2000)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Growth in Brazil, 1890s—1970s', in E. Cárdenas, J. A. Ocampo and R. Thorp (ed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Latin America*, vol. 3. London: Palgrave.
2. Cepal (2003)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Latin America*. Santiago: Cepal.
3. Díaz-Alejandro, C. (1985) 'Good-Bye Financial Repression, Hello Fi-

- nancial Cra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 pp. 1 - 24.
4. Iñigo Carrera, J. (2005)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rough Political Crisis in Argentin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thcoming.
  5. Saad-Filho, A. and Mollo, M. L. R. (2002) 'Inflation and Stabilisation in Brazil: A Politican Economy Analysi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4 (2), pp. 109 - 35.
  6. Weeks, J. (2000) 'Latin America and the "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 Growth and Deb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2, pp. 625 - 54.
  7. World Bank (2003a)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CD-ROM).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8. World Bank (2003b)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CD-ROM).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第二十七章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新自由主义：从结构调整到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帕里克·邦德

对资本积累形式的扭曲和与新自由主义相关联的阶级构成继续加深了非洲联合的危机和发展的不平衡。一个新的土生土长的战略——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顺应了新自由主义,并依赖于温和的非洲政客。由“后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者所推动的温和的全球范围行动并没给人带来多少希望——例如,更低的美和欧盟农业补贴,少量债务负担减轻,很少有较好的机会使用对付艾滋病的品牌药物——而越来越多的非洲精英却对让这块大陆贫困下去的权力结构依然持默许态度。新的战略和战术可用术语“去全球化”和“去商品化”来概括,它对于非洲与不发达的制度决裂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大陆最主要的群众运动正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非洲政治经济与知识分子互动的传统以及激进政治的源头长期以来被归结为这个大陆后殖民时期的危机,既有外部(帝国主义)特点,也有阶级构成的内部动因。这群作者是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与政治危机相关联,包括:阿克(Ake)、阿明(Amin)、比科(Biko)、卡夫拉尔(Cabral)、法农(Fanon)、菲尔斯特(First)、卡达列(Kadalié)、卢蒙巴(Lumumba)、马谢尔(Machel)、曼德尼(Mamdani)、姆卡德瓦尔

(Mkandawire)、纳布德雷(Nabudere)、恩克鲁玛(Nkrumah)、尼雷尔(Nyerere)、奥廷加(Odinga)、奥尼穆德(Onimode)、罗德尼(Rodney)、卡拉(Sankara)和希瓦吉(Shivji)(参见 Arrighi 2002, Saul and Leys 1999)。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新自由主义没有给非洲提供发展的空间,因此旨在增加整合的改革战略只会适得其反。能证明这两个主要观点的途径很多,请注意这些基本经济范畴的主要趋向:资金账户(包括债务、金融证券投资、援助、资本外逃)、贸易和投资。

非洲的**债务危机**在全球化时代加深。从1980年到2000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外债总额从600亿美元升至2060亿美元,债务占GDP的比率从23%涨到66%。因此,非洲目前的债务偿还多于所得。1980年有96亿美元的贷款流入,比流出的32亿美元债务偿还款项要高得多,但是到了2000年只有32亿美元的资本流入,而偿还则高达98亿美元,留有62亿美元的净资金流赤字。

非洲主要通过**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渠道、依靠“热钱”(通过私人部门投资者的投机)的形式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的进出来筹措资金(还有哈拉雷、奈洛比、哈博罗内和许多其他的场所)。例如,1995年国外的购买和销售虽然占约翰内斯堡一半的贸易份额,但这些量就足以对南非的货币市场产生破坏性的影响,1996年初、1998年中和2001年底在几个星期之内分别有超过30%的下跌。在津巴布韦,1997年11月热钱的流出在仅仅四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内使其币值下跌了74%。

同时,作为西方冷战胜利的余波,捐助者对非洲的援助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40%(参见第十三章)。大多数这样的援助预先就被官僚们在本国的企业所调用,或是用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不是迎合民众真正的需求。以哈拉雷为基地的非洲债务与发展网络主任说:

这些援助国的债权人应该维持他们的援助,一笔勾销非洲

贫穷国家的所有债务……这个底线将会消除既有援助又有债务的情况，因为那样会加大力量双方的对比，造成世界的不平衡。  
(Kapijimpanga 2001)

非洲扭转资金账户外流的重要因素是资本外逃。撒哈拉以南的主要非洲国家外债为1 780亿美元，它们已经经历了 25 年的精英资本外逃，总数超过2 850亿美元(包括应付利息)：“把资本外逃当做私人外部资产的尺度，用私人外部资产减去公共外债来计算对外资产净值，这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对于世界其余部分似乎成了净债权人。”(Boyce and Ndikumana 2000)

贸易的不平衡是造成非洲不发达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块大陆的外贸份额在过去近 30 年里下降了，只是出口量在增加。因此非洲被边缘化的发生不是因为无效整合，而是因为世界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制造品出口的变化，同时非洲由于过分的非常规的结构调整迅速地去工业化了。正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2003)所承认的，在这一进程中，迅速的贸易接轨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非洲和其他世界的“贸易谈判”因八国集团人为压低了农作物价格而恶化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认为如果自 1980 年以来的贸易关系是一个恒量的话，那么非洲的全球贸易份额应该是 2000 年实际情况的两倍，人均 GDP 应该高出 50%，每年的 GDP 应高出 1.4%。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从 70 年代占世界总数 25%的最高点跌至 90 年代末的不足 5%，而且这很小的数目也主要被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这些极端腐败的政权用在矿石开采和石油提炼上，跨国公司的行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仅有的量比较大的外国投资是在南非，主要用于电信的部分私有化和在全球装配线中汽车零部件分厂扩张活动。外国直接投资大大抵消了南非自己的资金外流，如伦敦最大公司的金融总部的摘牌和挂牌，更不用说利润的回流和跨国公司支付特许开采金。而且，官方统计忽略了转移定价



(transfer pricing)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外国投资者在非洲通过不开发票入账、然后从国外提现的方式逃税。

## 结构调整和债务

新自由主义在非洲最初以法律形式成文是在世界银行 1981 年的伯格报告中(由顾问艾略特·伯格撰写)。反对国家很少,结果相当一致。削减预算降低了经济的有效需求,导致衰退的出现(参见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通常,这种由政府支付对生产投资的“排挤”实际上不是投资不足的原因,因此削减预算不是对私营成分的补偿。私有化不区分哪个国有企业性质上可能有战略意义,它更多地与腐败有牵连,国内工业时常遭受国外的接管;在维持当地就业和生产水平方面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有时动机仅仅是赢得准入市场的机会)。

一份十分有说服力的文件表明,最易受到攻击的人们——妇女和孩子、年长的人、伤残者——是基本的受害者,在经济危机期间,社会补贴较少,家庭压力较大,结构调整政策的保障体系被撕破,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造成损害,他们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幸存(Tskikata and Kerr 2002)。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也没有试图确定国家中介机构提供服务来增加“公共产品”(和有价值物品)。

当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工作有欠缺,但他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主张在更大范围内构思改良的新自由主义特征,比如免除债务、结构调整和制度管理等。尽管制度不完善,但新自由主义仍是非洲居统治地位的政策范式,这一事实证明了它们的成功。《重债穷国动议》(HIPC, 1996 年草签)1999 年被补充为《减轻贫困战略报告》(PRSPs),它是结构调整哲学的一种纯粹重命名。这些东西均被证明在非洲是很不充分的,受到公民社会团体的一致责难(参见

第十五章和第十九章)。

多边机构间力量分布不均也是一个原因,包括美国的否决权(占这个协会15%以上的权利)。在布雷顿森林组织24名成员中只有1名非洲人。内部改革提议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从39%升至44%,并且增加一个新的非洲人做理事,不过在2003年中期,这个动议被美国否决了。就在这个月,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iles Zenawi)强烈地恳求召开非洲经济委员会,“当我们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贵宾席时,我们至少应该在可以做决定的房间里。”

### 面向新自由主义援助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鉴于非洲愤怒的幸存者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骚乱”的一致反映,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经历一场危机就在所难免了。这个地区需要一个土生土长的版本。2001年初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在一个正式场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介绍了一个长达67页的文件的要点: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2001年11月,NEPAD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正式出台<sup>①</sup>,2002年,这个计划被非洲的掌权者们带到加拿大八国首脑会议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及联合国的首脑峰会,得到认可(Bond 2002, 2004)。

在经济改革这个领域,比如资金流量和外国投资方面,NEPAD摆出现状,提出如下策略:“支持多边合作参与减贫”,包括《重债穷国动议》(HIPC)和《减轻贫困战略报告》(PRSPs),以取代取消债务。2003年中期,《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这份杂志引用了美国政府主要非洲事务官员沃特·康斯丁纳(Walter Kansteiner)的话:“NEPAD是贤明达观、恰到好处的。”

---

<sup>①</sup>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23 October 2001.

相比之下,非洲民间社会的信息反馈又怎样呢? 2001年末 2002年初,事实上每个主要的民间团体、广播网和进步的名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攻击 NEPAD(Bond 2002)。到 2002年4月为止,没有政客或专家、政论者向工会、民间社会、教堂、妇女、青年、政党、议会或在非洲其他民主进步的潜在力量咨询过关于 NEPAD 的问题。2002年中期,知识分子们(如 Adesina 2002)联合了非洲社会发展研究理事会(CODESRIA),开始猛烈抨击(引自 Bond 2002)。首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构架是这个计划的核心,它再现了前 20 年结构调整政策的完整体系,忽略了这些政策损失惨重的后果。第二,尽管它宣称承认非洲人民在这个计划中的主要角色,但从 NEPAD 的设计和明确表达之中没发现非洲人民在其中担当任何角色。第三,虽然它涉及到社会和性别平等,但它采用的社会和经济措施已经将妇女边缘化了。第四,尽管声明起源于非洲,但它的主要目标却是外国捐助者,尤其是八国集团。另外,它把民主的图景界定为创造一个功能化市场的需要。同时,对非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外部条件也强调不够,因而没有宣传任何有意义的措施以限制非洲发展中对环境的影响。相反,它寻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以及科托努协定等一致的制度和步骤,进一步锁定非洲经济在这个环境中的不利地位。最后,资源调动的方式进一步瓦解了我们所看到的结构调整和 WTO 规则控制下的非洲经济。

### 结论：非洲的抵抗

因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的知识分子的这些经历,债务大赦组织(Jubilee)激进分子和在非洲社会论坛的下设团体已经变得和世界激进分子一样极端,他们逐渐形成应对国际经济关



系的策略(参见 Bond and Ngwane 2004, Ngwane 2003, Zeilig 2002)。比方说,他们不仅想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踢出国门,而且还游说他们的财政部长拖欠不合理的外债;他们下定决心战略性地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发展一种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战术:世界银行债务联合抵制。<sup>①</sup> 以美国为基地的团结组织例如经济公平和全球交易中心与南非的债务大赦组织以及巴西无土地运动合作,向它们北方的同盟询问:社会上有意投资于世界银行的人购买了债券(负担该机构 80% 的资金来源),然后抽走代表该经济苦难果实的股息,这是道德的吗?

另一个策略被称为“反全球化”,非洲贸易网和非洲性别与贸易网对这块大陆的代表施加强大压力,使其抵制世界贸易组织 2003 年的坎昆提案。当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集团集体退席结束坎昆会议的时候,它们成功了。一个由中等收入的农业出口国组成的 20 国集团(G20)成立并开始更快地促进解除贸易管制,同时提升比勒陀利亚在这个团体中的地位,以此突出南非与其他非洲国家的不同(Bond 2004)。美国和欧盟在特别重要的问题上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例如西非棉花出口的十分之一的补贴,或农作物倾销的缺陷),而是强硬地坚持用另外的所谓“新加坡”论题改变这个团体议程。由此双边或地区性的贸易协定——比如欧盟和美国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注定也会受到公民社会与明显受损的非洲国家的抵制。

在一个更为地方化的层面上,可称之为“去商品化”的令人鼓舞的

---

<sup>①</sup> 2003 年,不在压力之下出售世界银行的债券,也不承诺未来将购买它们,这样的机构包括:世界最大的养老基金(TIAA-CREF);主要的宗教社团(the Conference of Major Superiors of Men, Pax Christi USA, the Unitarian Universalist General Assembly 等);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基金(Calvert Group, Global Greengrants Fund, Ben and Jerry's Foundation 和 Trillium Assets Management);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捐赠基金;美国城市(包括圣弗朗西斯科、密尔沃基、玻尔德和剑桥);主要的工会养老金/投资基金(比如说运输驾驶员、邮局工人、服务人员的国际性组织,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码头工人、美国通讯工人,联合电力工人)。参见 <http://www.worldbankboycott.org>。

反新自由主义斗争在非洲盛行,尤其是南非。在那里,独立的左派运动在基本需求转变为真正人权方面取得部分的成功:免费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类药物和其他的保健服务;免费的生活用水保障线(至少每人每天50升);免费的用电保障线(至少每天每人1千瓦时);全面的土地改革;禁止雇佣中断和驱逐;免费教育;甚至实行一种“基本收入赠给制”,这是教会和工会所提倡的。由于在南非一切皆商品化仍存在,这只是一种潜在的一体化议程,它可以作为更大范围民主社会变革运动的基础。

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首先必须强调,许多政治经济职责转变了。这些问题如今正由不太成熟的世界政府机构来处理,而这些机构又深受颇具进攻性的新自由主义美国当局过分影响。对知识产权(比如抗艾滋病药物)的借用、反对基因改变的非洲农业保护制度、工业和公用事业国有化,或缺乏弹性、令人绝望的劳动力市场,无论借助何种形式,非商品化原则对它们的利益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要实现任何进步,就需要对最具破坏性的全球资本流动实行反全球化。那些流动——金融、直接投资和商业——主要依赖三个多边的机构,因此迫切要求有一个战略战术来推动关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除此之外,该挑战对非洲进步力量而言仍然需要确定“改良主义者的改革”与更加激进的战略之差别。某些越来越明显的斗争有可能提上“非改良主义”的议程,比如很多强调非商品化的社会政策、允许对金融和生产本身民主控制的内在导向的工业战略。这些非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加强了民主运动,直接给生产者以权利,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开启与资本主义竞争的大门,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当代症候而已。

朱珊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Adesina, J. (2002) 'Develop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Poverty: NE-

- PAD,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Beyo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uncil 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search in Africa, Senegal, <<http://www.codesria.org/Links/conferences/Nepad/Adesina.pdf>>.
2. Arrighi, G. (2002) 'The African Crisis: World Systemic and Regional Aspects', *New Left Review* 15, pp. 5 - 36.
  3. Bond, P. (ed.) (2002) *Fanon's Warning: A Civil Society Reader on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Trenton, N. J.: Africa World Press and Cape Town: Alternative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re.
  4. Bond, P. (2004) *Talk Left, Walk Right: South Africa's Frustrated Global Reforms*. Pietermaritzburg: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and London: Merlin Press.
  5. Bond, P. and Ngwane, T. (2004) 'African Anti-Capitalism', in R. Neumann and E. Burcham (eds) *Anti Capitalism: A Field Guide to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 New York: Norton Press.
  6. Boyce, J. and Ndikumana, L. (2000) 'Is Africa a Net Creditor? New Estimates of Capital Flight from Severely Indebted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1970—1996', occasional pap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7. Kapijimpanga, O. (2001) 'An Aid/Debt Trade-Off: The Best Option', in G. Ostravik (ed.) *The Reality of Aid: Reality Check 2001*. Oslo: Norwegian Peoples Aid, <<http://www.devinit.org/jpdfs/jok.pdf>>.
  8. Milanovic, B. (2003) 'Can We Discern the Effect of Globalisation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Budget Survey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876, April.
  9. Ngwane, T. (2003) 'Interview: Sparks in Soweto', *New Left Review* 22, pp. 36 - 56.
  10. Saul, J. and Leys, C. (1999) 'Sub-Saharan Africa in Global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51 (3), <<http://www.monthlyreview.org/>>



799saul.htm》.

11. Tskikata, D. and Kerr, J. (eds) (2002) *Demanding Dignity: Women Confronting Economic Reforms in Africa*. Ottawa: The North-South Institute and Accra: Third World Network-Africa.
12. Zeilig, L. (ed.) (2002) *Class Struggle and Resistance in Africa*. Cheltenham: New Clarion.

## 第二十八章 新自由主义与南亚：一个狭隘话语之例证

马修·穆卡特内

自由主义最早出现在南亚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各种激进的经济改革明显失败之后。直到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一直影响着经济学说。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激进主义的“成功”被贬损,而自由化被潜在地认为是唯一的可选择方案。在这里,新自由主义的学说被当做是基于一种假设,即自由市场的任何发展就其本质而言一定是高效的。于是政策改革只需考虑实施自由化,而经济分析只需衡量实施的程度。本章认为,这样将改革的理论狭隘化从根本上是不正确的,改革持续性的理念被严重削弱。一些非常切实的替换方案,通过对南亚发展的更进一步分析就能明显得出,然而结果却被忽略了。

### 南亚：从激进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印度在独立之后奉行的是贸易、投资和技术方面的自给自足政策。民族主义运动普遍认为,自由贸易是殖民地时期英国对印度进行剥削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0—1971 年,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的独立运动也同样受到这个观点的推动。20 世纪 70 年代初,孟加拉

国政府迅速没收巴基斯坦侨民的财产，由此产生一个干涉主义的政府。在巴基斯坦，激进主义是后来才出现的。50—6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基于大型私有企业、贸易保护和政府补贴之间的密切关系。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察觉到不平等现象在迅速扩大，成为其社会主义言论中一个颇具号召力的观点。在他当政时期(1971—1977年)，大规模的国有化被宣布为打破私有企业与支持排外式增长的银行业务之间联系的必要补救。

在这些发展模式明显失败之后，自由化作为一种补救手段出现。尽管实行自由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增长，如自给自足、平衡地区发展和取得技术独立等，但到80年代“成功”的标准从一个非常狭隘的新自由主义视角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中居支配地位的是外资数量的多少，而不是国内工业的技术能力。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优先的解决方案，重点应放在减少政府干预上，而不是改革或者改进它。

在印度，自由化起初意味着逐渐减少为达到自给自足所付出的努力。以前的计划经济通过政府投资引导发展进程，限制私人垄断的发展空间，都让位于日益增长但不受欢迎的私有经济。巴基斯坦在1977年齐亚(Zia)将军政变后，发生的变化则是更微妙的调整，包括有选择性的非国有化和对私有经济进行鼓励，最主要的是摒弃了激进的言论，并对私有经济提供政府支持。孟加拉国的工作进展最大，在拉赫曼(Mujibur Rahman)执政下(1971—1975年)的激进主义后独立时期，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深切影响到国内工农业，因此经济回升相对容易，并能迅速全面展开。自1975年开始，作为GDP一部分的外贸开始稳步增长，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型企业的私有化较早地得到了普遍认可。巴基斯坦紧随其后，而印度则尚未启动。

新自由主义改革在9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印度的债务危机在80年代逐渐露出端倪，随着预算和贸易赤字的加剧，终于在1991年爆发，时值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油价飞涨，从海湾地区外



派工人汇款中获取的收入也中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贷款，条件是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那些改革在直接危机消除之后仍然延续了10年。需要说明的是，它们之所以能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批有影响力、暂居在印度的经济学家很久前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此外国内商业领域的发展和对外国技术与国际合作的偏爱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的官样文章和糟糕的基础设施所能提供的。最后，不断成长的国际化中产阶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有着同样国际化标准的消费需求。

相反，随着1989年苏联—阿富汗战争的结束，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也没有了，巴基斯坦经济的依赖性彻底暴露。巴基斯坦从来就不会调动储蓄和税收<sup>①</sup>而只能一直依赖外资到本国投资。这种依赖性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占据极大优势，在此后的10年中控制着巴基斯坦经济政策。

最引人注目的那些改革是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策略。在进口关税、配额和许可证要求以及外国投资方面都进行了重要的自由化改革。改革的狭隘聚焦可以追溯到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独有特点，这些特点系统地并通过假设排斥其他选择方案乃至有意义的辩论。（参见第三章和第十二章）

### 有效增长(假设)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个人是理性的，交易是自愿的。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消费会在各个时间段得到有效的分配，公司也会最优化地利用可用资金进行投资。这样增长的路径会反映个人行动者的偏好，

---

<sup>①</sup> 1989—1990年期间，印度的储蓄达到GDP的22%，巴基斯坦仅有13%。

因此可以假设一定是高效的、没有政府干预的空间(参见第五章)。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就是基于这个有效增长的假定。稳定性通过减少通货膨胀、政府预算赤字和任何贸易不平衡来得到持续。因此改革的过程(也就是自由化的过程)只不过是个加速器。不存在驾驭经济的问题,只不过是加速(“深化”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比喻)或是减缓向自由市场转变的过程。

### 自由化：手段与目的

有效增长这一假设已经将新自由主义的话语狭隘化了。南亚大量的主流分析几乎都集中于自由化的深度、进展幅度和实施过程。新古典主义反革命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武器源于对战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那些国家的深入研究。<sup>①</sup> 他们发现工业花费很大,资本密集,就业却不多。这些国家远远没有达到自给自足的工业化,继续依赖资本的进口和输入。这种分析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外向型导向的战略转变提供了重要前提,这些战略往往是结构调整计划固有的一部分。

然而,新自由主义议事日程的广泛应用却没有看到一种相匹配的分析范式。有代表性的“改革”成功不是从就业、不平等和增长的角度来衡量,而且:

问题在于这些政策许多本身成了目的,而不是达到更平衡、更持久发展的手段。这样做使得这些政策被执行得太远、太快,而排斥了所需要的其他政策(Stiglitz 2002, p. 53)

---

<sup>①</sup> 了解印度的原因,请参见 Bhagwati and Desai (1970), Bhagwati and Srinivasan (1975)。

阿鲁瓦利亚<sup>①</sup>(Ahluwalia 2002) 和 巴基派<sup>②</sup>(Bajpai 2002) 给出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印度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化的评价。阿鲁瓦利亚(Ahluwalia 2002, p. 69)声称,“我们考虑的是十年渐进主义的累积性结果,来评价改革是否已经创造出一种环境,可以支持 8% GDP 的增长,这是政府的目标。”

其实,阿鲁瓦利亚不过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典型的双重分析。首先,他考虑在纯经济的意义上是否能达到持续性发展,探讨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和外汇储备的趋势;第二,衡量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自由化、关税减少了多少、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程度(GDP 中进口与出口额度可以体现这点)、外国直接投资的程度,以及取消价格控制和消除违反经济规定的行为。<sup>③</sup>

巴基派采用同样的方法。他编写了一篇对自由化政策改革的评论——货币贬值、经常账户的可兑换性、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注入,向证券投资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国内企业进入外国资本市场。巴基派只是在印度与世界经济接轨导致变化这一背景下分析这些“改革”的影响,没有顺便提及其他。他指出,在 90 年代,加权平均值的关税从 90% 降到不足 30%,外国投资从占 GDP 的 0.1% 增长到占 GDP 的 1%,贸易的份额从占 GDP 的 18% 增长到 30%。

强调自愿交换和合理追求最优结果的个人,这些假设意味着这样一种界定,那就是增长的水平反映个体的偏好,因此在一个自由市场,要实现利益最大化。改革成功的结果和实施自由化的程度被当

---

① 1991—1996 年国会内阁的财政部长,他发起了第一次自由主义改革。

② 在美国工作的非常驻印度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在整个 90 年代竭力把自由化提上印度的议事日程。

③ 在这里仅仅关注了基础建设和教育,但不损害基本的要点,这就是关注自由化的实施和可持续发展。



成一回事，它们都被一个先入为主的假设任意消解了。<sup>①</sup>

## 可 持 续 性

可持续性的概念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被严重削弱。首先是政治的可持续性，无论自由化是否被“锁定”。在这些关注中重要的是基于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贸易联合<sup>②</sup>、中央银行的独立、当然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条件的贷款。这个概念仅仅进一步围绕一个狭义的金融（财政和贸易赤字）概念进行拓展，没有考虑到不同的增长路径对于长期的发展会有不同的含义。

萨克斯等人(Sachs et al. 2000)认为，更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有助于将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提高到每年 100 亿美元，因此可以让印度仿效亚洲其他那些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更成功的国家。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实际的差别：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的性质（而非数量）。比如，多数外商向中国的直接投资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未开发地区的投资，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口增长的大部分来自外商独资或是合资企业（见 Chandra 1999）。相反，印度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都是投向针对国内市场的销售。印度的合资企业只是昙花一现，外国投资者很快就将当地的合作伙伴收购。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了当地的“帕莱”品牌，目的是使用当地的流通网络，百事可乐公司同样收购了“公爵”品牌。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带来一种充满活力的以出口为龙头的增长，也没有带来技术的更新。印度的出口结构仍然是以技术含量很低的产品为主，集中于发展缓慢的市场。“如果充分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将有助于体现

① 因此不需要考察自由化对这样一些事情的影响，如投资水平和生产力、社会凝聚力程度、政治和社会稳定、消费水平和发展研究，或更动态的产业部门出口多样性。

② 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墨西哥加入到 NAFTA。

现有的竞争优势,引导经济活动向最高水平靠拢以取得提升并进入国际市场。但出口增长不可能靠自身赋予活力。”(Lall 1999, p. 1784)

## 其他方案

改革是“自由化”的同义词这样一种假设,其所关心的可能只限于贯彻的程度,而忽视现实替代方案的存在:根据假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承认替代的可能性。对南亚更深入的观察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的狭隘话语妨碍了对改革进程和政府有益干预的全面分析。

孟加拉国由于纺织品出口使经济持续增长。这个产业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到 1986—1987 年占全部出口的近 30%。到 90 年代,这一产业雇佣了 150 万人,其中 90% 是妇女。这一成功证明了扩大和深化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这个主要部门的可持续性肯定出了一些问题。孟加拉国没有受到发达国家纺织品配额的影响(尤其是多种纤维协议, MFA),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填补了一个空白。随着从 2005 年起,取消配额提议的实行,孟加拉国将会面临来自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新竞争。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这一产业是否会成功提升它的生产能力和技能,还是要强化工作状况或压榨工资,这仍悬而未决。政府干预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一进程,推动这一领域朝向更理想、更稳健和更有活力的竞争道路发展。政府是否具备必需的能力,它是否会被新自由主义话语在深化自由化方面唯我独尊而搞得焦头烂额,这是现实的疑虑。

印度在日趋调和的基础上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阿鲁瓦利亚 (Ahluwalia 2002) 将其归因于一个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官僚机构的缓慢运作。即使是没有正式实行自由化的领域,如受到严格控制的劳动力市场,也在实践中通过越来越多地普遍转包合同给不受调控的非正规部门来避免调控。比如,在 90 年代,备受赞誉的软件部门出

口大约从1亿美元增至80亿美元。但这个部门对于经济总量影响甚小。许多时候,昂贵的培训不过是让移民更有能力在国外找到高薪工作。伊文斯(Evans 1995)指出,现在这种大量出口计算机编码生产线、进口昂贵品牌软件和硬件的模式令人不快地想起19世纪那种备受嘲讽的殖民地贸易模式,其特点就是出售棉花(价格低廉),然后买进布料(价格昂贵)。

巴基斯坦无论在制定政策还是实施政策方面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在制定方针方面居于支配地位。其他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如克什米尔冲突促进了国内国防政治经济的发展,以此与印度在军事力量方面保持平衡。国防开支的负担与越积越多的国内外债务利息占用了大量本应用于发展的开支。集中利用资源的工作被自由化降低关税的行动破坏。高额的预算赤字加上经济的自由化抬高了实际利率并损害了私营部门的投资。这些深层的矛盾揭示出自由化方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内在的政治经济约束没有得到现实的回报。一个相关的例子就是,尽管经常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承诺,但未能改善资源(税收)的利用状况,也未能弥补预算赤字。

罗德里克(Rodrik 2000)认为,与国际经济接轨不能取代发展战略。发展越来越被看做意味着与全球经济融合,而贸易和投资被用做评价政府政策的尺度。事实上,“接轨”可能会排斥其他的解决方法(见第五章和第十章)。罗德里克建议应当从发展需要的角度去评价全球化,而不是逆向而行。

很明显,尽管人们对开放和增长的积极关系达成近乎一致的观点,但“在国际贸易分析中却有一个小秘密,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可衡量成本——即由于关税和进口配额造成的实际收入减少——根本没有那么多”(Krugman 1995, p. 31)。

还有一个经常被忘记的事实。自由化和与国际接轨并不只是包含消除各种控制手段,减少政府干预。有时可能会有免费的午餐,但不会有自由市场。事实上是有一些很严格的制度化要求。罗德里克指出,



要履行 WTO 的全部各项义务(进口税、卫生条例、植物检疫条例、知识产权等),一般不发达国家需付出 1.5 亿美元。克鲁格曼注意到从贸易中获取的微小收益无疑会被一个替换方案的巨大潜在收益所抵消——例如对女孩的基础教育(见 Sen 1999)。南亚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发展程度非常低的地区,只有斯里兰卡令人惊讶地成为例外。2000 年,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非文盲率都是 40% 多一点。相比其他地方,这一地区性别导致的差异也相当明显。尽管这一地区的人均所得接近中等收入程度,但 1999 年只有 28% 的女性在各级学校中就读——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处于相当落后的水平。

## 结 论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先前的假设导致了一种狭义的话语。仅仅权衡政治、金融持续性和执行程度的一种话语是不会关注持续增长这个更广泛的定义和现实替代方案的存在。

朱珊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Ahluwalia, M. S. (2002) 'Economic Reforms in India Since 1991: Has Gradualism Work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3), pp. 67-88.
2. Bajpai, N. (2002) 'A Decad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India: The Unfinished Agenda', Harvard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89.
3. Bhagwati, J. and Desai, P. (1970) *India: Planning for Industrialisation, Industrialisation and Trade Policies Since 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Bhagwati, J. and Srinivasan, T. N. (1975) *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a*.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 Chandra, N. K. (1999) 'FDI and Domestic Economy: Neoliberalism in Chin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6 November.
6. Drèze, J. and Gazdar, H. (1996) 'Uttar Pradesh: The Burden of Inertia', in J. Drèze and A. Sen (eds) *Indian Development: Selected Regional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Evans, P.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 Krugman, P. (1995) 'Dutch Tulips and Emerging Market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9. Kumar, N. (2000) 'Economic Reforms and Their Macro-Economic Impac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 March.
10. Lall, S. (1999) 'India's Manufactured Exports: Comparative Structure and Prospects', *World Development* 27 (10), pp. 1769 - 86.
11. Rodrik, D. (2000) 'Can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Substitute for a Development Strategy?', World Bank EBGDE European Conference, 26 - 28 June.
12. Sachs, J. D., Bajpai, N., Blaxhill, M. F. and Maira, A. (200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ndia: How Can \$10 Billion of Annual Inflows be Realised?',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11 January.
13.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Stiglitz, J. E. (2002)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Penguin.

## 第二十九章 日本新自由主义评价

伊藤诚

日本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转向新自由主义至今已有 20 多年了。最初新自由主义是以行政改革的形式出现的。铃木首相于 1981 年成立了一个特殊委员会,目的是平衡国家预算,应对政府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提议进行旨在缩小政府规模、削弱政府职能的行政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减少公务员人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众多领域的解除管制,这些改革举措以后一直都进行着。

自由与竞争的市场规则提供了最有效最合理的经济秩序,这是这场改革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基础。在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指导下,资本主义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可以通过雇用更廉价的非正规工人,更简便地进行贸易、筹措资金、投资、使工资开支“合理化”。同时这也促进了日本工业公司的跨国化,美国和欧洲跨国企业也增加了它们在日本的销售和投资。在许多方面,日本社会经济秩序是美国模式的翻版。日本商界认为有必要继续获得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商机。

然而,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已经恶化,且更加不稳定。随着其组织率从 1970 年的 35.4% 降到 2003 年的 19.6%,日本工会不断失去其权力。其力量也由于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受到重创而削弱。1985 年,三家国有企业——日本国有铁路(JNR)、日本电报电话国营公司(NTT),及日本烟草盐业国营公司——实现私有化之时,据说当



时政策的目标是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通过出售私有化企业的股票为政府筹集资金,并提升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但是,此项私有化政策一个重要的实质性结果是削弱了工会好战派的力量。举例来说,在将 JNR 私有化成六个 JR(日本铁路)公司的过程中,无情的“合理化”过程发生了,1987 年,工人从 1982 年最高峰的 400 000 人减少了一半。在此期间,由于选择性地解雇了一些工会激进分子和会员,加之其余工会会员的偏见,使得 JNR/JR 工会会员从 200 000 锐减到 40 000。到 1996 年为止,39 个地方性的劳资关系委员会对涉及 14 000 个工人的 131 个案例提议采用应急法则,国际劳工组织对此也比较关注。然而,日本铁路公司不理睬这些提议,它们有政府和法院撑腰。

二战之后,日本的工会总会(Sohyo)曾一直是国内强大的左翼劳工组织,其根基主要在 JNR 和其他国有企业工会。私有化使这些工会受到冲击,对 Sohyo 来说更是重重一击。日本工人运动未能有效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新自由主义侵袭下的私有化。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 Sohyo 和 Domei(日本工人联盟)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后者的根基主要是在私有企业这一块。Domei 与政治中心紧密结成联盟,更倾向于与商业合作。结果导致了日本工会运动的主流转向了 Domei。1989 年,Sohyo 解散,并入了 Domei,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工会组织 Rengo(全日本工会联盟)。

Sohyo 的解散和日本工人运动左翼的衰败,加上苏联的解体让日本的社会党(JSP)震惊不已。这就是为什么 JSP 改变立场从社会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现实主义者”的原因之一。1994 年它和保守的自由民主党(LDP)一起临时加入联合政府,这更淡化了它的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政策。1996 年,社会党将名称改为日本社会民主党(SDPJ)。尽管 JSP 过去曾拥有议会三分之一的席位,但在整个 90 年代它失去了部分席位,选举制度改成小地区选举后,更加速了它衰落的过程。2003 年 11 月举行的众议院普选中,日本社会民主党只赢得了 480 个席位中的 6 个。而 90 年代只能从 JSP/SDPJ 缝隙间获得选票的日本共产党

(JCP)获得的席位从原先的 11 个减少到了这次的 9 个。日本民主党获得了 177 个席位,一跃成为日本两大政党之一,其声望大有替代前社会党的势头。因此,日本政界保守倾向及意识形态越来越明显,这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盛行。

日本资本主义的财政危机、国家重建所需要的资金逐渐转移到工人和缺少社会保障的人士肩上。尽管生产力不断提高,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减少工资开支的“合理化”过程在多数工厂变得轻而易举。从 1989 年开始征收 3% 的消费税,到 1997 年提高到了 5%。个人医疗服务税在 1997 年从 10% 提高到了 20%,而到 2003 年则提高到 30%。集体税率则从 42% 逐渐下降到 30%,最高边际收入税率(the highest marginal income tax rate)从 75% 下降到了 37%,遗产税率也大大降低,迎合了比较富裕的群体。

1998 年劳工保护法普遍放宽。职业介绍所业务自由化,越来越多的职业向它们敞开大门。工人在没有任何规定的情况下加班,并且为了让更多的兼职妇女长时间工作,撤销了兼职年度时间的限制。很明显,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让资本主义公司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从而选择使用更廉价的工人。

### 一次辩证的转折与一个恶性循环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日本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日本经济的活力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才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它从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中恢复过来,尽管在此期间日本的增长率不到先前 25 年间的一半,它始终保持着比其他多数经济发达国家(1974—1990 年平均为 3.9%)更快的增长率。尽管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日元普遍升值(从 1971 年的每美元兑 360 日元到 2004 年 6 月的 110 日元),但是日本的企业管风格,包括终身雇用制、基于资历



的工资体制和基于公司的工会组织积极有效地提高了工人的忠诚度，加强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终日本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到1987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美国，使日本在世界上留下了“第一”的深刻印象。

然而，日本经济在我们现在称之为90年代“失去发展的十年”中始料不及地急剧恶化了，经济增长率下滑到平均每年不到1%，在某些年甚至是负增长。“失去发展的十年”的影响延伸到了新世纪。由于8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的成功重建，发生日本经济的急剧恶化是辩证的。以合作的工人和工会为基础，通过引进不断成熟的信息技术和工厂的自动控制系统，加上使用廉价的兼职工人和非正规工人，日本大型企业一直在不懈地增强它们的竞争力。在我看来，日本新自由主义不单是对凯恩斯理论失败的反应，也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信息技术恢复劳动力和其他市场的竞争，具备了物质基础。

众多日本大型企业在80年代都能还清以前的银行债务，它们倾向于通过存储闲置资本的方式积累盈余，而不是去做相应的实际投资。他们还在国内和国外资本市场上增加直接资本，通过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来获得资本金。相反地，日本银行过去依赖该国相对较高的家庭储蓄率（80年代超过了20%），直到70年代都一直贷款给大企业。而随着此类可靠的贷款客户不断丧失，银行发现自身必须要开发新的商业领域，它们开始贷款给中小型企业或房地产代理商和建筑公司，同时还提供住房信贷。

1985年，为了缓和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旨在重定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广场协议签订不久（见第九章），日本利率的下调大大地拉动了内需。日本大型企业积累的闲置资本很快被调动起来，用于国外投资及国内投机投资。日元的增值刺激了日本制造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特别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日本大型企业还通过购买外国股票和债券增加了国外证券投资。同时，日本大商行的闲置资本、日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涌入日本的房地产投机买卖及东京证券交易所。在1986年到80



年代末的几年间，它导致了日本房地产业和资本市场巨大的投机泡沫。日本国内经济繁荣，明显表现出了新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功，但是90年代初投机泡沫的破灭使得到90年代中期，其资产价值损失达1 000万亿日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4倍，和1929年后美国大危机造成的资本损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9倍相比，日本的损失巨大。

资产价值的巨大贬值导致了日本银行及其他金融公司严重的呆账问题以及家庭财产的负增长。而且，1987年国际清算银行(BIS)达成协议：1992年后从事国际商务的银行，其自有资本对总资产的比率一般应在8%以上。此举反映了西方银行家对日本银行快速国际扩张的日益关注。此协定签署时，日本银行相信，只要其股票升值(也就是股票现价和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实现的潜在资本收益的45%被计算为自有资本，那么此规定要求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事实证明，这很难做到，因为随着东京股票市场的衰退，银行的潜在资本收益化为乌有，甚至成了负值。

为了刺激内需，克服银行的财政困难，日本银行逐渐将官方1990年时的6%的利率下调到2001年9月时的0.1%。但是，考虑到银行自身的资产由于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下滑以及其他原因，已经几乎连续缩水，对银行来说，要利用这些扩大信用条件发展借贷是很难的。相反，银行本身不能不减少贷款以符合BIS的规范。日本银行此时的主要商业顾客是中小型企业、房地产代理商和建筑公司，而日本银行面临的困难以及由此造成的银行信贷的限制则进一步打击了这类商业部门。因此，企业倒闭的年均数目也比较大：从1992—1995年的14 000家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19 000家。

由于超过三分之二的日本工人由中小型企业雇用，这些企业的倒闭成为失业率不断上升的最重要原因。此外，随着日本公司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加速了跨国化，日本制造业的工人绝对人数1992年后开始减少。结果日本的失业率从1990年的2%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5.7%。考虑到日本对失业的范围定义相当窄，普遍认为日本官方的

统计数字应乘以 2 才可与西方国家的数据具有可比性,那样的话,日本的失业率赶得上萧条时期的欧洲经济了。

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奖金和加班工资的减少、廉价兼职工人的雇用导致了家庭收入的严重缩减。而 90 年代初国内消费需求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考虑到闲置生产能力的存在,投资需要也停滞不前,因此,日本银行的呆账无法清理,反而导致了经济紧缩的螺旋式上升。银行因呆账和资本基数缩水面临困难后,中小型企业因为信用危机陷入困境,由此引发的工人就业情况和工资收入不断恶化更是导致了消费需求低迷以及房地产和股价的不断下跌,这一切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 混乱的经济政策

当前日本内阁首相是小泉(Koizumi),他于 2001 年 5 月上台。小泉的基本态度是新自由主义,为了支持市场的健康运作,表面上他注重消除政府干预和官僚作风。例如,他宣称对日本来说邮政系统的私有化是“必要”的。同时内阁保证从 2002 财政年度起,国家债券的年度发行量不得超过 30 万亿日元,并保证在 2—3 年以内解决银行呆账问题。

无论如何,这些政策是建立在对日本经济恶性循环不乐观的分析基础之上的。投机泡沫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金融市场的违规行为与劳动力市场重建之间的联系被忽视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倾向于将日本社会变革为一个更以企业为中心的秩序,加大收入和财产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日元增值使得日本面临周边国家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从而使日本制造业的根基逐渐被掏空,而家庭收入不断减少导致消费需求的低迷,这些都没有引起政府的关注。不过,只要日本民众还担心当代日本越来越萧条的经济前途,那么就很难说服他们将积累的金融资产(总计 1 400 万亿日元)用于消费。

从 80 年代起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不成功,而且前后不一



致。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政府通过征收和提高消费税来增加普通百姓的负担。政府以强调“个体责任”的方式取消了国家对医疗和教育的扶持。对养老金的关注也很有可能转向更大程度的“个体责任”,也就是私营保险业或证券投资。为缓解建筑公司的困难以及减缓土地价格下滑提出的应急经济政策,如由政府投资修建道路和公共建筑,主要是为了帮助资本主义公司和银行。1992—2000年经济恢复期间的财政总支出达120万亿日元,且不包括国家投入银行的资金,而这笔资金从1998年算起已有30万亿左右。同时,公司税率和边际收入税率大大降低。因此,国家税收收入的情况不令人满意。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标是减少财政赤字,但有待偿还的公债从1980年的70.5万亿日元增加到2001年的389万亿日元,到2004年底将达到489万亿日元。2001年末,国债(包括地方政府的公债)总计666万亿日元(国内生产总值的134%),且仍在增长,到2004年很可能会达到719万亿日元(国内生产总值的147%)。

自相矛盾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日本政府一直在运用一个类似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见第三章)。而为了政治上支持执政党,这种类似凯恩斯主义的通货再膨胀政策被以应急经济政策的名义执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接。一方面,日本投机泡沫的破灭并未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强大的财政刺激,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国家资金注入银行,失业率也只是在逐渐增加。最先发生在日本的全球性大危机迄今已得到缓解。而另一方面,日本的通货紧缩被延长,巨大的政府开支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看起来并不十分有效。

与传统的凯恩斯学说不同,政府财政开支所涉及的内容并不重要。在当前的日本经济体系下,财政支出的构成不足以消除工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抚养子女、接受教育、医疗服务、赡养父母的经济负担未能由政府解决,而且随着国家财政赤字的不断加深和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实施,这种负担也在日益加重。它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日本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急剧下降,从70年代初的两个多到2003年的1.29个,使



整个社会快速老龄化。消费税和养老金及医疗保险费的增加是近期的一个政府议程。因此,政府财政危机既是日本国民差异日益加深的结果,也是其原因,它消极地影响了经济福利指标,以及工人和弱势群体的安全感。在这种环境下,低迷的消费需求很难恢复,这与政府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形成了恶性循环。

小泉首相未能遵守其将政府债券的年度发行量控制在 30 万亿日元以内和在 2—3 年内解决银行呆账问题的诺言,这不足为奇。尽管他于 2003 年 9 月再次当选为自由民主党领袖,但他的经济政策遭到自由民主党内部和商界的反对。日本的悲剧是没有一个强大反对党来代表工人利益,并能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出批评意见和替代政策。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左翼政党集团甚至更弱,且四分五裂。无论何时,如果能让日本工人拥有更好的未来,那么与欧洲左翼国家的国际合作不仅值得也是必要的。

朱珊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方括号中的标题原为日文)

1. Itoh, M. (1990)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2. Itoh, M. (2000) *The Japanese Economy Reconsidered*. Houndmills: Palgrave.
3. Miyazaki, G. (1992) [*Complex Depression*] Tokyo: Chuo-koron-sha.
4. Tachibanaki, T. (1998) [*Japanese Economic Inequality*] Tokyo: Iwanami-shoten.
5. Takumi, M. (1998) [*The Depression of a 'Great Crisis Type'*] Tokyo: Kodan-sha.

## 第三十章 东亚及东南亚资本关系的 新自由主义重组

达优泼·常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劳资之间全国性以及地区性社会关系重组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为达到该目的,本章探讨了东亚及东南亚国家融入由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的过程。本章揭示,即使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缺陷在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它依然通过国家和资本的不断努力,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来重振资本家的竞争力,而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为自己的权益反击了。

### 东南亚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开端

资本主义发展是以生产过剩及个人资本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为显著特征的。事实上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为社会需求进行生产从属于赚取利润这个基本目标。在市场竞争中,设法在不降低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保持价格竞争力的企业就能够对那些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拥有优势地位。即使明显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能取得这些优势地位并且成功经营其业务,个体资本家还是期望并尝试赢得竞争支配市场。然而,与此同

时,越来越多并不赢利的生产能力被创造出来,造成了生产过剩的问题(见第四章)。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之发展反映出资本克服积累问题的努力。这种发展涵盖了少数几个基本的政策方法。首先,通向商品及金融市场的通道无条件自由化;其次,将人的需要全面整合到谋求利润的过程中,例如,把更多的公共设施私有化;最后,对劳动力全面解除管制。

东亚及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被排除在全球化趋势之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些国家放弃了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逐渐融入到由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80年代起,发达国家不断向欠发达国家施压,要求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市场。这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为自身发展投资的方式,官方贷款及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支持的发展计划越来越不现实,跨国公司扩张到亚洲发展中国家,给关税壁垒以及其他贸易规则增加了压力。尤为突出的是,缺乏金融资源、国际收支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它们渴望快速发展资本主义,最终放开对资本流动的限制。

泰国的经济发展从80年代中期起经历了一场转变。其早期发展是基于农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以及鼓励进口替代工业。制造商拥有受保护的国内市场,还可以从国内银行获取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些银行分别同制造商相互联系并吸纳了绝大多数国内储蓄。直到80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货币升值及国际收支问题使经济倒退,泰国才重新确定其战略。它不再寻求依靠工业生产满足本地需求的工业化道路,而是开始鼓励如电子产品和服装业这样的出口产业,主要通过赚取外汇的方式推动国民经济。这种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EOI)的转变遵循了亚洲第一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NICs)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模式,通过采取货币贬值及对出口工业免税和削减关税的方式得以实现。然而,同第一代相比,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产业大部分是由本土特别是在本土的外国私人投资资助,而不像第一代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那样由官方提供贷款,反映了全球投资涌动的新气象。泰国政府推出对外国



直接投资(FDI)出口产业有利的政策,允许外国公司拥有土地所有权并向其提供全免及减免税收的政策。此外,在90年代早期对利率及外汇交易的开放也鼓励了外国投资。不断涌现的行业除商业银行外还有其他各种资金来源,由此传统的金融资本家逐渐失去了他们的主导地位,泰国的国内资本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外国资金也大量涌入该国(Hewison 2001)。

其他东南亚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印度尼西亚的早期发展开始成型于苏哈托政权新秩序政策的出台,该政权于1965年通过展开对印尼共产党(PKI)的猛烈攻击得以稳固地建立起来。政府本身成了对石油化工、原油提炼及钢铁制造这些战略工业的最大投资者。资本主义的发展采取政府和国内资本家紧密联合的形式,政府直接向由苏哈托家族及其他支持该政权的强大家族企业分配资源、加以鼓励并在它们与外国资本在国内市场竞争过程中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国有经济、特别是出口行业几乎全部由自然资源所推动,特别是石油。80年代早期开始,原油价格下降瓦解了印尼的经济增长并使其转向出口型工业化的道路。到80年代中期印尼卢比大幅贬值,1986年底跌至最低只有原来的45%。对贸易和投资的大规模限制解除以及鼓励出口的政策随之而来,放开境外投资出口行业,给主要的出口商提供无限制的进口免税。不过,这种重大的转变并没有削弱现有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相反,亲苏哈托联合企业利用外国资本激增和国有企业私有化(SOEs)的机会,使由国家机器集中掌控的能源平稳过渡到它们手中。

马来西亚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型于70年代早期出台的新经济政策(NEP)。该政策出自1969年解决国内种族暴力的政治决议,它强烈显示贫困激增以及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该政策有强烈的政府经济干预色彩,尤为突出的是一种在马来人、华人及其他外国资本之间的经济上的平衡。这些计划旨在利用明确的差别待遇来鼓励马来人参与经济生活,其中包括只给予非马来人参与马来人资产和雇佣最高

30%的配额(Khoo 2001, p. 185)。同时,政府收购外国资本拥有的公司以加强马来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此外,政府还在保证廉价劳动力供应以及在《公务保密法》和《内部安全法》基础上压制政治和工业冲突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国还设立了出口加工区来调解外国资本和廉价的马来打工者间的矛盾,这些区域依照《工业关系法》享有全免或部分减免税收以及不受条规约束的权利。《工业关系法》保护雇主的利益,确保劳资双方议定工资待遇五年不变。由于包括原油、锡、橡胶、可可豆以及棕榈油在内的主要出口产品的价格急剧下滑,马来西亚的经济自80年代中期就面临严峻的挑战(Gomez and Jomo 1997, p. 77)。该国的应对策略就是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并在1991年的《私有化总体方案》中正式确定下来。另一方面,《投资促进法》通过向外国资本提供免税期,并恢复出口导向型投资的先锋地位,鼓励了国外投资。

### 面对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资本关系重组

向出口型工业化及自由化转型的10年的确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发展。随着出口制造业逐渐成为东南亚国家发展的支柱产业,这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得到迅猛发展。在泰国,制造业1995年雇佣了13.4%的劳动力,而1981年只有7.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85—1995年间增长了两倍多,到1995年达到2800美元;在印尼,1990年制造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了农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85年的大约500美元增加到1995年时的1000多美元;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在该地区最快,该国的制造业到1995年约提供了雇佣劳工总量的26%,而1985年这一数字为15%。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1995年超过了4000美元,是1985年的两倍。

表 30.1 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单位：百万美元)

	1980	1985	1990	1995	1997
印度尼西亚	180	310	1 092	4 346	4 677
马来西亚	934	695	2 611	5 816	6 324
泰国	189	164	2 562	2 068	3 626
菲律宾	-106	12	550	1 459	1 249
亚洲	396	5 110	24 251	75 217	105 828

资料来源：UNCTAD 数据库

快速工业化把相当多的人口卷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给当地资本及寻求赢利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异常廉价的劳动力。在此期间,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后来的中国和其他最不发达的如柬埔寨这样的国家都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这样,针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由 1980 年的 3.96 亿美元增加到 2001 年的 1 020 亿美元(UNCTAD 2002)(见表 30.1)。注入这些国家的投资在 1980 年仅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 0.7%,到 1996 年,这一投资额占到了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 24.1%,这表明亚洲成为跨国公司的主要目的地。

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的吸纳国加快对劳工标准的放宽、解除劳动法的束缚。支持这些做法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投资者的信心”:经济如果让投资者失去信心,将会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事实上,正是开发的社会低成本增强了这种信心。发达国家自由化的资本和南部不发达国家解除管制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工业化进程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了,它把这些发展中国家整合到一个特殊的全球商品或价值链中。这条价值链由资本输出国所谓的高附加值生产过程如研究与开发、核心技术与高科技部件的生产过程,以及资本输入国诸如组装及最终加工之类所谓的低附加值(或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构成。结果,尽管外国直接投资以超过以往的速度激增,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量工人却并未得到合法的有组织的保护,由此证明这一发展违反劳工利益的



本质。这种现象可以在出口加工区找到,跨国公司享有可以忽略劳工权益的自由,包括各种形式的出口加工区在内,如中国的“开放地区和城市”及“经济技术开发区”,亚洲的出口加工区的数目远远超过了1 000个(Chang 2003)。各公司可以自由地迁到其他地方的出口加工区,这一事实成为组织劳工的最大障碍。

东南亚这种特殊的发展模式与亚洲第一代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服装和制鞋厂的有利条件开始从中国台湾和韩国消失。在中国台湾,工人反抗的增多最终使制订劳动法的议题政治化,而执政党(国民党)的绝对统治也遭受瓦解;同样,韩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也面临着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爆发。在外部环境方向,美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压力也减缓了出口的增长,而要求开放商品和金融市场的压力却在增强。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资本的重新配置。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很大程度上由于日元对美元的升值而遭到破坏,继该国之后,第一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把制造业转移至东南亚国家及后来的中国。不计日本这个亚洲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在内,其他亚洲国家输出的对外投资由1990年的114亿美元增长到了1996年的521亿美元。亚洲直接资本投资很大一部分都流向亚洲内部。由亚洲起家的劳动密集行业的各企业在西方的商业资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之间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旨在利用该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其结果就是劳工标准和工资待遇降到底部。跨国公司仅仅威胁要重新配置资本就可以重组当地的劳工关系,并从这种增强的权力中获益。所以因地方投资之需而引进灵活的劳动力模式是正当的。

### 亚洲经济危机及其后续影响

就资本积累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的经济繁荣

期、自由化及解除劳工管制似有成效。然而，亚洲的经济危机表明这种发展模式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泰国因资本大量流失成为亚洲危机的发源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推动的发展导致了泰国以出口为主的工业化进程，然而它并不能克服与投资国尤其是日本间反复的贸易逆差，政府和本地寻求建立合资企业的资本十分欢迎它们的投资。由此反映了价值链的本质，在这个链条中泰国仅能通过从投资国进口最关键的部件及生产资料(工厂、机器、工具等)来推动其出口产业的发展(Burkett and Hart-Landsberg 2000, pp. 170 - 1)。这个问题对于日本的汽车制造和电子组装来说尤为明显，加剧了贸易的不平衡。泰国必须借助外国直接投资来弥补外汇的不足。更糟糕的是，工人连体面的工资和权益都得不到，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从其周边国家特别是缅甸来的上百万打工者工资被任意克扣、压得很低。最终，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激烈和集中流向中国，使泰国转而吸引风险资金，主要是证券和货币市场上的证券投资，而风险基金的暴跌导致了1998年的经济动荡。外国直接投资推动的经济发展大大增加了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它却被为数不多的国内和外国投资者操控在手中。印尼和马来西亚几乎经历了相同的困难，造成了危机中大规模资本的瓦解和失业人数的上升。

韩国在90年代后期的经历展示了摆在第一代新兴工业化国家面前的挑战。面对来自东南亚经济体以及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韩国的对策是加强劳工政策的弹性。一方面，依据新的人事管理和越来越不稳定的雇佣状况灵活处理劳工关系。另一方面，积极重新安置劳动密集型企业，引进有效的生产资料。然而，在内部，韩国资本虽不断试图以牺牲工人利益来克服经济萧条，却不能制止工会工人运动，加速的自由化也使得无竞争力的资本有可能借助高风险短期贷款的方式得以生存。结果，在亚洲经济危机中资本积累全线崩溃。

尽管亚洲危机明显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基础上的地区性发展存在固有局限，但亚洲发展中国家各政府和资本还是加速新自



由主义政策的推行。作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性援助项目的回报,泰国、印尼和韩国推出了全面的结构调整计划。这些改革一方面是稳定政策,包括缩减政府开支、保持高额利率;另一方面是结构调整政策,包括立即关闭不良的金融机构,承诺金融流动的自由化,加快私有化进程以及加强雇佣的灵活性。马来西亚政府虽然没有完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推出了类似的措施,包括缩减政府开支和增强公司信用。稳定政策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是灾难性的,那些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格改革的国家表现尤为突出,由于亚洲公司依赖外债换来投资和短期的资本流通,对公司、特别是那些在金融压力下存活能力比大公司弱的中小型公司而言,它们的不断破产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还会被视为“必要的”解救良方。面对短期还债及外债越滚越多的日益严重的困境,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使得据估计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印尼公司在此次危机中破产,而在1998年韩国总共有22 828家公司破产,幸存的公司仍需削减投资和生产。结果所有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在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印尼-13.1%;泰国-10.5%;马来西亚-7.4%;韩国-6.7%。直到大量的资本冻结、金融机构停业,紧缩货币政策才开始放松。

与此同时,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被进一步推动,允许外国资本拥有当地公司并且放松了对外国银行运作的限制。韩国在国内进行了最大的改革,过去一直维持相对更严格的外国投资规章,现在拆除了外国直接投资、土地购买、外国投资者的吞并和购买企业等诸多限制。对国有企业的保护也放松了,允许外国和国内的私人资本接管这些企业。现在跨国公司可以购买以前被当做“公共部门”加以管理的企业,包括像电力、燃气、水、公共交通和通讯这些国有公共事业。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1998年计划使160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因而最大的国有银行被私有化了,紧随其后的是第二大通讯企业——印度尼西亚人造卫星公司被新加坡的科技电信媒体公司所购买。泰国的经济危机也为国外资本购买陷入困境的当地企业开启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上百家泰国企业被这



样卖给了跨国公司。同时泰国政府把主要的金融机构、与基础设施/能源有关的企业也放在拍卖之列。韩国政府对公共部门进行无情的重组,为政府消肿。中央政府 2001 年底减少雇员约 16%(26 000 人), 109 个企业和 20 个公共机构在 1998 年私有化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像韩国电信、随后的韩国电力公司、韩国国家铁路和韩国燃气公司在 2003 年的最后阶段被私有化了。相当多数量国有企业的出售直接影响了这些企业中的工人。管理者为了吸引买家常常要重新组织现有的全部劳动力。有一点是相同的,所有新雇主都要重新调整雇佣关系,包括大量裁员。在韩国,这个重新调整进程的结果就是 41 700 个国有企业工人在 2000 年失业了。

新自由主义全面改革的最终结果已经重组了劳动力和资本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关系,成千上万的人被踢出劳动力市场,说明这样的结构调整缺乏社会安全感。更糟的是,新自由主义推动的改革已经造成了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安全感,它既没有让工人们享受到制度的权利,也没有充分发展社会保障网络。不通过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不采取正规合同和保障劳工权利的方式使把从前失业人口重新整合到劳动力市场,因为它们可以采用日益多样化的非正式雇佣形式,而把周边广大地区的劳动力非正规化,比如短期合同、递送、内部协定和家政服务等等。不过因为不是正式职工,成千上万以此形式就业的工人就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 结 论

以牺牲工人阶级利益为代价由外国直接投资推动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该地区社会关系进行重组的主要形式。即使不计重组带来的人力损失之代价,亚洲危机最终仍表明,这种发展模式在东亚无论对地区还是国家而言都不是可持续性的。然而,该地

区对将大多数人置于苦难之中的新自由主义重组并没有重新加以思考,反而在危机中加速推广。不过,该地区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坚定了工人们以各种形式将自己组织起来的决心。该地区工人对进一步重组的抵制不断涌现,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推动第二轮重组的不确定未来将拭目以待。

朱珊 译 陈刚 校

### 参 考 书 目

1. Burkett, P. and Hart-Landsberg, M. (2000) *Development,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Learning From Japan and 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 Chang, D. O. (200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Union Busting in Asia', *Asian Labour Update* 48, pp. 1 - 8.
3. Hewison, K. (2001) 'Thailand's Capitalism: Development through Boom and Bust', in G. Rodan, K. Hewison and R. Robiso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Conflicts, Crises and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Gomez, E. T. and Jomo K. S. (1997)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Khoo, B. T. (2001),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in Malay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 G. Rodan, K. Hewison and R. Robiso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Conflicts, Crises and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UNCTAD (2002)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撰 稿 人

**菲利普·阿莱斯提思(Philip Arestis)** 纽约利维经济研究所教授、剑桥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中心研究主任。最近的研究论题有：美国经济的现状、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金融问题、通货膨胀(以1520—1640年间“严重的通货膨胀”为目标)、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以及与欧洲货币联盟有关的问题。他的作品已经发表在许多杂志中,包括《剑桥经济学》、《东方经济》、《经济探索》、《经济》、《应用经济学国际评论》、《信用与银行》、《后凯恩斯经济学》、《曼彻斯特学派与苏格兰政治经济》。

**帕里克·邦德(Patrick Bond)** 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教授、多伦多约克大学客座教授。他热情投身于南非、津巴布韦和国际社会、劳动力和环境运动,包括世界银行债务的联合抵制。最近的著作有《反对全球种族隔离》(London: Zed Books, 2003)、《津巴布韦冲击》(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with Masimba Manyanya)、《难以持续的南非》(London: Merlin Press, 2002)等。

**特伦斯·J·拜勒斯(Terence J. Byres)**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退休教授,《农业变化》杂志编辑和《农民研究》杂志前编辑。他有很多关于印度的著述,特别是农耕问题。他是《资本主义的上上下下:一种政治经济的比较》(London: Macmillan, 1996)的作者,《印度的政府、发展计划与自由化》(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以及《再分配的土地改革》(Oxford: Blackwell, forthcoming)的编辑。



**阿·坎姆贝尔(Al Campbell)** 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当代资本主义行为、社会主义替代理论和古巴经济。

**达优泼·常(Dae-oup Chang)** 香港亚洲资源指导中心研究协调员,最近正在从事一项有关亚洲跨国公司的研究和战略计划。获沃里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题有关马克思主义对政权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之批判。他也曾著文讨论韩国劳动力关系和经济危机,还有亚洲其他与劳动力有关的论题。

**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 沃里克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写过很多关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新近研究俄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特别是俄国与国际工会、劳工组织。他著作甚丰,包括:《马克思、边缘化与现代社会学》(London: Macmillan, 1982 and 1991);《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与政府的危机》(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88);《马克思的危机理论》(London: Macmillan, 1994)。

**阿莱让德罗·科拉(Alejandro Colás)** 在伦敦大学柏克贝克学院教授国际关系。他著有《国际公民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社会运动》(Oxford: Polity Press, 2002),并且是《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编委会成员。

**索耐·德拉尼亚加拉(Sonali Deranyiagala)**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经济学讲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工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与贫困、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动态。

**杰拉德·都曼尼(Gérard Duménil)** 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和经济学家。著有 *Le Concept de Loi Economique dans 'Le Capital'* (PARIS: Maspero, 1978), *Marx et Keynes Face à la Crise* (Paris: Economica, 1977), 与莱维合著《利润率经济学》(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3) 与 PUF 出版的三卷 *La Dynamique du Capital: Un Siècle d' Economie Américaine* (1996); *Au-delà du Capitalisme* (1998); *Crise et Sortie de Crise: Ordres et Désordres Néolibéraux 2 000*, 英文版《资本的复兴: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根源》(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与莱维合著新书*Analyse Marxiste du Capit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3)。

**莱斯利·郝佳特(Lesley Hoggart)** 伦敦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目前正在制定单亲与就业的评估方案。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再生产选择政治学、青年女性与性选择、青年的安乐与冒险。最近出版的著作有：《英国女权主义为生育控制权而战》(Lampeter: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伊藤诚(Makoto Itoh)** 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也是东京大学的荣誉教授,曾在英、美等国八所大学任教。他的著作有：《日本经济再思考》(London: Palgrave, 2000);与拉帕维萨斯合著《货币与金融的政治经济》(London: Macmillan, 1999);《社会主义政治经济》(London: Macmillan, 1995);《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资本主义》(London: Macmillan, 1990)。

**黛博拉·约翰斯顿(Deborah Johnston)**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发展经济学讲师。她从事劳动力市场与贫困的研究,并承担英国、俄国与很多非洲国家的顾问咨询工作。最近,她与他人合著论文《寻找北非乡村大生产的武器：不令人信服的土改理由》(*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004 )。

**考斯塔·拉帕维萨斯(Costas Lapavitsas)**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货币与金融、经济思想史与日本经济。他的最新著作是《市场、货币与信用的社会基础》(London: Routledge, 2003)。

**赖斯·莱维多(Les Levidow)** 开放大学研究员,自1989年以来一直研究农业生物工程的安全控制与革新。此项研究围绕欧盟、美国和它们的贸易冲突。从1987年创刊以来,他一直参与编辑《作为文化的科学》,并是《基础科学杂志》的前任编辑。他还与他人合著《科学、技术与劳动过程》、《反种族主义科学教程》、《电子人世界：军事信息社会》(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3, 1987, 1989)

**多米尼科·莱维(Dominique Lévy)** 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和经济学家

(CEPREMAP)。合著《利润率经济学》(1993)、《资本的复兴：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根源》。他最新的著作是与杰拉德·都曼尼合著的*Analyse Marxiste du Capit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3)。

**亚瑟·马克伊文(Arthur MacEwan)** 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教授经济学。他的最新著作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经济战略、市场与 21 世纪的选择》。他是《Dollars & Sense》杂志的创立者，经常为该杂志撰稿。

**苏珊妮·麦格雷戈(Susanne MacGregor)** 伦敦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公共卫生与政策系社会政策教授。她研究与撰写的论题有贫困与社会排斥、吸毒、城市与社会问题和政策。她还参与组织了环境科学与工程(ESRC)研究班，系列讨论欧洲跨国研究与政策。

**马修·穆卡特内(Matthew McCartney)**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南亚经济学讲师。他作为海外发展研究所(ODI)的一名研究员曾在赞比亚财政部工作，出版了很多关于南亚经济发展的著作。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南亚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后发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府作用。

**约翰·米留斯(John Milios)** 雅典国立技术大学经济思想史副教授。他是经济与政治理论季刊《论点》的编辑部主任与海外科技咨询年鉴*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的编辑部成员。他发表了 150 多篇相关论文(希腊语、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土耳其语)和 10 本专著，其中最新的是一篇合著论文：《卡尔·马克思与阶级：论价值、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Aldershot: Ashgate, 2002)。他还合作编辑了《福利国家与危机中的民主》(Aldershot: Ashgate, 2001)。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价值理论、资本国际化与帝国主义理论。

**罗纳德·芒克(Ronaldo Munck)** 利物浦大学全球化与社会排斥教学单元导师与政治社会学教授。他出版的最新著作有《马克思 @ 2000》(London: Zed Books, 2000)、《全球化与劳动：新的“伟大转变”》(London: Zed Books, 2002)。即将出版的《全球化与社会排斥》涉及他正在为 Kumarian 出版社编写的题为“转



变中的全球化”的作品中的大量内容。目前正在研究从劳工运动视角看反全球化运动。

**卡洛斯·奥亚(Carlos Oya)**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政治经济发展专业讲师,他在该校完成关于塞内加尔农村政治经济与自由化的博士学位。他最近四年在莫桑比克政府工作,新近在从事关于莫桑比克农村劳动力市场与贫困的研究。他也是马里、毛里塔尼亚与安哥拉关于农村贫困与减贫战略的顾问。

**托马斯·I·帕雷(Thomas Palley)**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该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建立并授权从美中关系角度警示和报告国家与经济安全情况。他著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负债、分配与宏观经济》等。

**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 纽约宾哈姆顿大学荣誉教授,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圣玛丽大学副教授。他是 64 本著作与 450 多篇论文的作者或编者。他最近的著作是《新发展政治学：帝国主义与社会运动》。

**雨果·雷迪斯(Hugo Radice)** 利德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院教师。1970 年协助创立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他最近主要研究全球化与东欧资本主义复归,撰写一本关于全球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专著。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Alfredo Saad-Filho)**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政治经济发展专业高级讲师。他著有《马克思的价值：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London: Routledge, 2002),与本·法恩合著《马克思的〈资本论〉》(London: Pluto Press, 2004),并是《反资本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导言》(London: Pluto Press, 2003)的主编。

**马科姆·索耶(Malcolm Sawyer)** 利德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参与编辑《应用经济学国际评论》,是丛书《现代经济学新方向》的主编。他是 11 本书的作者,最新的两本是：《欧洲：发展与期望》和《21 世纪货币与金融政策再考察》。他编辑了 18 本书,包括《UK 经济学》、《第三条道路经济学》等。他发表的论文接近 150

篇。新近的文章包括《卡莱茨基论货币与金融》等。

**安沃·塞克(Anwar Shaikh)** 纽约新学院大学社会科学和政治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他也是巴德学院赖维研究所宏观模型组成员和一名资深学者。他是两本著作的作者,最近一本是与托那克合著的《国民财富衡量: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账单》(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他最近的文章包括《谁为福利国家的“福利”买单? 一项多国研究》(*Social Research*, 2003)等。另外,他还撰写有关国际贸易、金融理论、政治经济学、美国宏观政策、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与危机理论的文章。他也是《剑桥经济学杂志》的副主编。

**萨波·辛哈(Subir Sinha)**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发展研究系讲师。他最近的兴趣是发展过程的控制与反抗、印度农村发展史、当代世界共同的社会运动与国际发展态势。他还出版了关于印度环境保护、农村社会运动与有关主要发展议程章程等方面的论著。

**简·托波罗斯基(Jan Toporowski)** 利弗休姆研究员,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资深成员。他在柏克贝克学院与伯明翰大学研究经济学以后,到世界银行工作和从事基金管理。他的著作之一是《金融的末日:资本市场通货膨胀理论》。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的学术传记。

**亨利·维尔特迈耶(Henry Veltmeyer)**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圣玛丽大学与墨西哥扎卡特卡自治大学副教授,从事国际发展研究。他最近与詹姆斯·彼得拉斯合著《脱下伪装的全球化:21世纪的帝国主义》(London: Zed Books, 2003)。